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还是要说不



## 亲美心态

我出生于 1964 年，70 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 年代我在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

我记得 1987 年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煎熬，我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今天的眼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那个时候，在晦暗的环境当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色之中说：“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 - 起大笑起来，这件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这句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触摸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是在他的青春期前后，他都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野营，没有偷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这方面的教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里得到国际局势方面的讯息，因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较“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个西方大国的名字，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U-S-A”；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投降书》，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上月球，并且最早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明显，它不是特别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上层的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的国家。——即使是在全中国都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难通过各种类似的印象对美国产生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隐约的好感。我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迹。

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一代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

有一天上课，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要帮我们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中美之间打过朝鲜战争，但美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容了它）。而对苏联，则是完全不可原谅：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的叛徒（苏联人很坏，从《列宁在 1918》中发现：列宁身边的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定：从老沙皇到新沙皇。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说明我们同这个邪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都让我们看不起。我们对这个北

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统治的国家充满了憎恶和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名叫《红杉树》。

在那美丽的西湖边，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滋润着友谊雨露。

红杉树，红杉树，你带了美国人民的友谊，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

啊——愿你茁壮成长，挺拔的红杉树！

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鼻子当年的好处。尽管政府公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须结盟。十几岁的我开始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攻势，并且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就曾为此不安，他曾对基辛格说：我是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除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势力的领袖，只要他亲美，他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德是个政治侏儒，诗人聂鲁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务，几内亚的塞方·杜尔不可救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叹，我尤其痛恨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威望的非洲，也出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亚革命之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号角》出现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都使我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以使人感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险：鲁巴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加什米，当特使打开包时，炸弹爆炸了，加什米当场丧命。几乎全体的阿拉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交关系。几天后，米格飞机轰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绑在椅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雕，两个国家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失败，我还以厌恶的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

少年的我心底的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戏剧的名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线的参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联意欲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千方百计的阻挠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扼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人们，你们都干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害美国志愿人员……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白呢？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

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这一切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俊的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不和美国有关。插一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一点我不愿多做宏议。

当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这一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烈的代表意义，“挑战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我的辅导员对我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那一年，里根到了上海，天哪，真让我们倾倒。他参加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作台上，礼貌地向女工提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工一定会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领导我们走”。

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美国太强大了，而复苏的中国机体上还有一些瘦弱，而且美国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须受一种限制；而且何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注定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点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他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天你怎么能够“告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最陷进“美国情绪”的时候，我还是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

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嫩。这件事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过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尤其是在国际交往方面的。

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在 firsthand 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们貌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定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小民族的斗争，以毫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哂。

## 再认识：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漫延

对上一个题目我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线索：我（或可以加“们”）的亲美有一个真诚感受到功利感受的过程。我在末尾讲了一个插曲：我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它给我带来的诗意般的冲击——我也必须说，它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可靠的。既然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摧毁十年的信念，那么十分钟之内树立的信念也可能在一秒钟内被再摧毁一次。

李鹏总理曾在八年前很诙谐地回答过一个外国记者的提问。外国记者问的是这一届政治局中有许多都是留苏学生，那么这种构成会不会对中国外交的倾向性产生影响，意思是说：会不会产生所谓的“亲苏派”？李总理回答：留苏人员在领导层中的比重是历史形成的，因为五、六十年代只能去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学习。记者的推衍是说不通的。

假如照记者的逻辑，我们现在大量的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将来的领导层是不是就要形成一个“亲美派”呢？——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李总理的话是非常明确的，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信心。同时他也道出了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国家留美学生的比重相当大，他们回国以后势必成为我国未来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以上事实没有丝毫的担心，我夫人就想出去，我亦不反对她去。对于有智识的人，能够长见识的人，对真理能有感悟能力的人，势必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不必要有什么担心。我所要说的是：宽泛而无孔不入的美国印记，在我们自身心理上造成的瘟疫，倒是值得好好说上两句的。

首先我想提到一本杂志，名叫《读者》，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原名《读者文摘》现因知识产权原因改名为《读者》的这一本。我知道中国《读者》同美国《读者文摘》不能等同，我也知道《读者》选用国内的作品比重较大，我更知道《读者》的追求及其民主性。但是对《读者》杂志的看法，九十年代初，朋友们和我就很长时间地议过。

《读者》实质就是一处小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乐园（注意：原文如此，我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又加了一个“小”）。

我冠之“小小资产阶级”不是借意识形态之刀来砍人，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一个批判概念。为什么这样说《读者》？《读者》跟“亲美的心理瘟疫”有什么联系？这么说吧，《读者》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小人物们的虚荣心，她使得“小小资产阶级”们通过一些个难度不大的哲理（美学）破译使人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我又回到最初的例子美国电影《农家女》上面，我当年“寻根”时，最激赏的一段国会演说辞，大意是这样的：在俺的老家，有一位医生，人们管他叫张医生。张医生给人治病，治好感冒别人就送给他一块馍，治好偏头痛别人就送他一把大葱，有时什么也没有，张医生也不说啥，他明白村子的人都挺穷。村里人找张医生挺好找的，张医生就在门前挂了块匾。上写：张医生楼上可天有不测风云，医生也有得病的时候，终于，张医生一病不起。下葬那天，村里人商议着给张医生凑钱立块碑，可是他们实在没钱。于是乎他们把那块匾插在张医生的坟头，未来往往的过客都能看到这样一行字：张医生楼上今天，一位总统死了。他的国际联盟的理

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历史会给他刻一块碑，上写：伍德罗·威尔逊楼上活脱脱的一副《读者》文风，隽永而通俗，热情而克制，甜蜜而不流汁，微酸而不涩喉。

从好莱坞到兰州，基督教的道德观，十字军的荣誉感，专栏作家的审美情趣，装点着上亿读者的迷梦，滋养着一代新的“农家女”。

这种虚伪的言论空气充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之中。每一段庄重的声明都以一种诗意的、竭尽心声的形式加以发表，一种干净的、貌似真诚的语言操作，一个被八股文操纵了两百年之久的国家，一种善于以精品散文来掩盖严峻事实的国民情趣。不要忘了这个住在“楼上”的伍德罗·威尔逊是这样给世界治病的：他毅然牺牲中国的利益把青岛划给日本；他的所谓“国际联盟理想”因为欧洲列国不愿他指手划脚而被他羞怒地放弃。这样一个善讨价还价的威尔逊和“楼上的医生”有什么修辞上的天然联系？啊，我们幻妄的心被它的情趣感动着，我们的腹中涌起饱食快餐后的咯气，我们津津乐道地沉溺于厌世的痛苦之中，我们模仿美国式的坦率和纯真，却迷失掉了原本身上含义更深的质朴和艰辛。我工作两年以后，在一次处理旧信件的时候偶然翻出几封大学期间我寄给家里的明信片，它的文风使我作呕，它呈现的“民主精神”令我羞愧难当——亲爱的爸、妈：圣诞快乐！顺祝你们新年快乐。我刚从南京——高邮——扬州——镇江走了一圈回来。没有通信，你们又生我的气啦。请原谅我，不管我在形式上有什么欠缺，请相信我是永远爱你们的。今天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频节目里两次听到德克萨斯的州歌《家乡的绿草地》，温暖的感情充溢我的心胸。

爸爸提到的希望（指争取入党——作者注），请以后不要再提了，我不想以后跟爸一起过党内生活，而且互称同志。

那一年我已二十二岁，当我二十五岁重新翻出这段极其轻挑不恭敬且略冒傻气的文字，我头脑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小年纪，尽不学好。”第二个反应是：这段以明信片形式传达的别扭文学给我的父母造成怎样的痛苦？以及会给我留下怎样的笑柄？这种今天看来是无病呻吟娇揉造作的仪态层层充斥着数我数年之久的大学求知生活！

继续回到现实，在我毕业、工作、婚姻、社交的方方面面，我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响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浓厚了。这应该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我的圈子是一个足够长见识的圈子。我认识的人当中不下二十个直接去了美国，这足以让我泛起惊奇和嫉妒的心理。

我听到了以下评价——“相信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已从感性转移到了理性。美国就社会而言，是一个安定的社会，法制健全，整个国家运转有序。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人的权利得到极大尊重。

就移民或我这样的外国人而言，见到的老美大多都友善，因为个人与个人的距离近，不会产生国内式的神崇拜。在美国，地位高下之分，并无国人那般大，美国是精神上的天堂。……”“当然，在美国，由于私有制，任何人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下，无论领导、平民）还是富翁、百姓。……这种压力，连我都有。尽管我目前的学习和工作中，导师和其他人从不责难和苛求，但我内心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是一种被环境同化后的产物。这种压力之大，有时难以承受，说穿了，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美国人拼命把握今天，享受今世。因为美国是个高强度的社会，人人才会在工作之余，拼命休假。”假如我以阿Q式的精神去攻击这种感受，那么，我就是不诚实的人。我

们可以批评国家观念的不成熟，也可以抑制个人主义的冲动，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妨害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纯真表现。但我确实难以忍受像我们这样一个有丰厚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的大国成为美国人的广告橱窗，这绝不是出于哈马斯式的民族主义或假道学式的陈腐情感，而是基于十数年来我们感情泛滥的深深忧患。

当我们一度最无助而热烈寻觅西方的时候，从学术界到普通国民的感情都未曾像今天这样失掉尊严，都未演变成甚至整个民族的想像力都为美利坚所钳制。我还记得徐志摩先生描述那张上帝之子的“傲慢的脸”时的惊讶心情，还记得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后在一个场合中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娘稀匹，都是帝国主义！”我甚至有时候怀疑：美国人待人接物的无所顾忌的态度都是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惶恐不安的面貌“惯”出来的。因为美利坚确实是一个实在没有底蕴的民族，他们绝对对发展中国家的谦恭风度抱存一种贱胚心理。而且这种贱胚式的心理自克林顿开始愈加明显。这种民间交往及国际事务上的贱胚心理我会专门讲到。但先进大国膜拜的失衡心理偏偏又是人类在逆境中的弱点。举一个例子：刚刚下台的某国著名外长，他受过良好教育，又代表的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国，但是他在安理会上的所做所为，确乎是比美国还体现美国利益，尤其是包括跟他同文同种的民族的事情，他都显示出一种可耻的软弱，难怪一部分国民咆哮着要绞死他。我们长期经受国际事务的历练，认为民族主义注定是逆世界潮流的、劣根性昭著的表现，而只有世界主义的（实则是美国价值的世界主义）才是现代人唯一的理智的选择。国外把只拟定一种备选方案而无选择余地的方法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据说：美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任顾客挑选，但又附加一个条件，只许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实际上就是不得挑选。在迷恋于美国情绪的同时，一种霍布森选择悄悄地来临，它潜伏于我们的肢体和状态之中，我们开始了新的进军——签证、美援、思想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我们成为美国广告最广泛的受众和最热情的传播者，于是下面我要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我很欢喜。

##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

这题目其实可以改成《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且变成以后，还自觉很高贵》。高贵是一种凌云于众生之上的悲戚感。我们接触美国，很容易获得一种进化的感觉，于是乎我们回头来，把我们曾赖以生存的人际社会不放在眼里，或者假装沉重而实际上根本不想负担，或即使是负担了，也在无形中体现了美援。我们的心在喊叫：“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当我们在无情地嘲骂自己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实则我们的自我骂誉以及热烈的回应，是同我们的文明背景极端相称的。只有一种大国的大国民才具备解剖自己否定自己的优容，这体现着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往往一些小民族在这方面是神经质和一触即跳的。但不幸的是：“进化者”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歪曲这种自我解剖的意义，把这当做他们解脱责任的思想武器。这到底是幽默感的沦落？还是认识方法的扭曲？他们有机会享受进化的喜悦，但突然间，

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势利小国民。

早在十三年以前。我在大一的时期。我就蛮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不是以自我奋斗的代价来体现优良，而是借助那些附加的手段来标榜自身的价值：比如混迹于高干子弟圈内呀，接触一些高层内幕呀，掌握一些思想界领袖的个人轶闻呀；或干脆就是：比较早地欣赏到一盘地下流传的歌曲磁带呀，……等等。他自以为拥有了这些，就可以做我们的思想先驱，可以高超于我们之上。我不否认那个时代里，地下渠道是我们赖以学长见识的重要手段，但这只能是暂时的、辅助性的、有缺陷的方式方法。不，事情的本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左右？大而化之，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怎么可以这样被钳制？有一次在十分激愤的状态下，我对妻说：“你不要跟我提 XX，也不要提 XXX，即使我和他们最要好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有一丁点思想上的光辉！”

那些为出去而出去的人，从来都不是中国的精英，从来不是！”我大概说这话的时候很凶狠，妻非常痛恨我的有失风度。因为她了解我，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比一般同学多经历了一些磨难（说老实话：有一些待遇不是很讲道理的。），也曾经愁眉苦脸，悲观失望中也萌生过逃遁的愿望，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是美国价值观的鼓吹者和卫道士。但我绝对是用一种，总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一句话，我在真实地摸索，这是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摸索，可以上溯到主人，和近代的梁启超们。——但事后我要反省自己。

我何尝又逃脱得掉这样一个层次：即嫉世式的愤愤不平？懊，美国应该接纳我，我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有想象力，我对未来有一种均衡的、平和的风度……这就一下子回到我的题目上了。

奴隶有两种，一种是总在欢天喜地的奴才，一种是愿意承担更大责任而甘心痛苦下去的奴隶，直白了说吧，忧国忧民的奴隶。我最近经常说：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

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知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十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以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我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教人感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竞于智谋，当今竞于气力。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经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我不过想说明，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更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前面我已讲过：对环境的怨恨以及功利主义使我们以势利的心欢呼大



国的渗透。这种急切的、迷恋新欢的心情好有一比，比什么呢？有一个讽刺故事，一户英国家庭获得通知：他们购买的彩票中了本轮的头奖，在欣喜若狂中，他们扔掉了家中原有的东西。

故事的结尾是彩票公司来人，吞吞吐吐地表示歉意。——获得了新的想象空间后，人最容易把原先熟知的事物弃之为陈腐。我们长期以为自己处在神圣的反抗状态，陶醉于“低调”或“反调”，而偏偏没有认识到我们民族文明的生态史观。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把大量的奴性的言论作为“快论”而加以激赏。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弥漫于全国的空气，故作清醒高超，实为乖张轻佻。我突然想起《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骂他女儿（她正在张罗着为非洲人募捐）的那一句：“你怎么净跟美国人学一些不着四六的事呢？”在我所住的这个城市，工业是非常密集的，因而环境上有很多令人不快的现象，我们市每年都要搞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创卫，这样才能勉强的进入全国大城市的中游。这一年的创卫高峰期，一位电台主持人发起了一个类似于“绿色志愿者”的组织，这个创意博得了热烈的欢迎，踊跃参加的中小學生（包括少数大学生）不计其数，他们的许多公益行为是纳入了市府的轨道的。但既然是一个松散的、可以彼此交流的团体，势必会引发某种讨论。我和几位电台的同事私下也议过这件事情，其中有些结论使我记忆犹新。

由真善美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们闪光的纯真的信念，谁不希望家园看起来有情调一点？谁不希望在一种情调中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但我要说了：“绿色志愿者”们对工业发展的认识及他们冠以的标题，已很深地打上了追星族的烙印。他们自傲聪明的小小发泄，不过就是表演一种外来文化而已。对现状有着更沉重认识的父母及他们的兄长，是绝对不赞成汽车为蛇让路的。杜德伟唱道：help, help, help 这个地球需要快乐来拯救这种理念只有吃现成饭的人才会奉为神明。拯求的代价是牺牲。苏联的积累因牺牲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我们的生产也正在付出代价——而十字军们却让我们先在车库上镂刻花朵！是谁把大量的奢侈的、无用的、浮华的观念传导给我们？help, help, help, 上海话说的：帮帮忙。我们不需要美国式的老天真和美国式的焦灼来拯救我们的心灵。

美国人有一句话，假如美国有一天变成法西斯的专制国家，一定是人民投票公决的结果。

那么相似地，假如中国人成为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那么这亡国奴的结局也一定是我们通过艰苦奋斗和对“真理”执着追求以后获得的。

所以严肃的任务来临了，即：对美国说：“不”首先要对自己说“不”。以上的谈话都在贯穿着这个意思：如何抗击心灵上的滋扰，而落地有声他说出这个字眼来。我们都是阿Q的后代，实在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辞钝意虚的逞一时之快。

我们的心灵滋扰来自何方？来自于落后境地中的怨恨，来自求索中的困顿，来自第三世界式的失落心理。

美国继冷战后的最大广告策划是海湾战争，爱国者导弹在天空充分表演，伊拉克的总统卫队以师为单位在地毯式轰炸下溃烂荒原。于是这场面加深了我们奴隶式的惧惊感。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像个半老徐娘的交际花似的在国际事务的核心搔首弄姿，等着上次日的新闻头版。于是我们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对美国抱景从心理。但是这所有的广告效益——已经不能像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蛊惑人

心，它的穿梭外交频率和它的广告收益黯淡成正比。里根曾经说的：“和平要通过实力才能得到。”但马歇尔式的利益纽带——已不复存在。地区问题上，各政治领导人乐于倾听美国人发言并劈手势，看上去越来越像是对友谊及历史的尊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唯一有点像超级大国的，就是它在北约势力范围、在东亚及其他的一些个基地还驻了一些兵和机器，在这里飞翔一下，在那儿游弋一下。假如没有欧盟、日本和其他盟国的输血，像海湾那一次表演他是一分钟都支撑不了的。克林顿的防务概念就很像一种电子游戏或某种战争系列剧：“我们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强大的防务。……这种防务需要的是较少的人员和永久性的武力，但却有更大的陆上、空中和海上的机动性，并真正致力于不断发展高技术武器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实际上就是一部美国传奇片的政论再版，看一下美国人胡编乱造的影片吧：明明是偷袭德黑兰营救美国人质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却变成了美国特种部队伸入敌国腹地，英勇顽强地救出了美国志愿人员；明明是美国费九牛二虎之力东进越南西山战俘营，却发现他们钻进了一座空房子，却变成了“兰博”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越南、从柬埔寨救出一拨拨的美军战俘。“特种部队”式的幻想支撑着美国从成人到青少年的自豪感，他们看来：那些包着头巾、戴着斗笠的民族，在美国大兵的手提机关枪、火箭炮的面前不过是一堆血肉而已。不，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有人指出了：以为靠一个空降师就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的意识是极端荒谬可笑的。美国战胜伊拉克（？）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历史性联盟的结果，至于美国介入格林纳达、美国横扫巴拿马，根本无任何广告价值。

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大国单独统治全世界的局面。冷战结束后，局面也并未像某些人希望的逻辑那样发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令人欣喜的征兆：从欧盟到俄罗斯，从日本到亚洲的新兴国家，全世界都在传达着上帝的真理：在国际事务中，最需要约束的是美国，最需要在权力分配上得到教训的亦是美国。而像我们这样一个同美国对抗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心灵深处却不可避免地触摸到美利坚合众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俗上的冲击，我们这样一个谦逊的、优容的大国，人民在学习的谦恭风貌。

上类似日本，但在坚强的内在品质上却往往显得薄弱、缺乏敏感和自尊的风度。如果说美国在政治上的强权可以在我们这里遭到失败的话，那么他从心灵到肉体上对我们的临幸，则是我们某些人心甘情愿承欢而蹴成的。

电影《大撒把》里有一个情节，女主人公播放一盘先她而去美国的丈夫寄来的录音磁带，那欲火如炽而又冷酷无情的表白教我不寒而惊：“亲爱的，以上我给你说了一段英语，我到了美国以后……亲爱的，为了我们的幸福，你必须把孩子打掉……（十分凶狠）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将……”结尾的词肯定是“绿卡”（greencard）。我猜这个声音传达的不单是逃离中国的急迫心情，肯定还有一种比普通中国人率先进化的秘密的喜悦。这种中国式的趣味令我惊恐地想起我周围的很多人，很多看起来很循规蹈矩的人，许许多多的不算平常人的人，许多被称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人，一旦哪一天，他们惊喜地逃遁，回过头来以进化的优越看着我这样的留在国内搞改革的人，我又将作何心情？“没有美孚，你们将变得一片黑暗。”？！

我周围曾生活着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幼小的时候很乖觉，比顽劣的男孩子更细心地爱祖国河山、敬慕英雄、尊师重长。妈妈说：“来，孩子们，我教你们唱《我的祖国》。”男孩子肯定是一溜烟地跑开，嘴里喊道：“不爱唱！”而女孩子则悄悄地拿起马扎，依偎在母亲身边，细声细气地学唱：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呢——耶耶——枪！”大人们称赞：比起小子来，姑娘贴心多了。但是十多年或二十年以后，丝毫没有迟疑扭头便扑向白种人怀抱的常常是“贴心”的丫头；而默默地在教育界、新闻业、商业界、军界为国家忠实服务偏巧是当年被视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小子们。苏联的一位刑侦学家说：“不要相信给儿童看的动物小说对猎犬的赞美，再忠诚的猎犬，只要陌生人给它嗅一嗅手里的香肠，它也会毫不犹豫地撇下原先的主人跟别人走的。”有人会问：你到底想说明什么？——我没有性别观和贞节观的暗示，我不会那么无聊。我以前坚信我们民族深刻的从容感和幽默感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会得到体现，我们本该早一点发现：原来加在孩子们身上的禁锢本就是对象象力的极大束缚。当此时此地，文化精英们以貌似解放的态度轰炸全国的学龄或学龄前儿童时，我们的儿童何尝不是陷入了另一种想象力的坟墓？他们认定全世界最好的绘画是《圣斗士星矢》、最好的音乐是刘德华的、最好的舞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最好玩的智力游戏是《消灭萨达姆》。每当圣诞之夜，我会在约瑟堂遇到的大量追星族，他们疯狂的眼神透着一种神圣：厌倦，厌倦，厌倦！

尽管理念告诉我对这个要用一种民主的超然，但我们最后做的是一——，我们一群人划着十字闯入群，嘴里高喊：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酷似《农家女》中的一个经典镜头。在国会选举前的党内提名代表大会上，管家高呼：“卖鱼喽！”一片欢呼声。

约瑟堂前亦是一片狂呼。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我不能说美利坚是一个“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民族。但美国人面临世界事务的艰难选择时，越来越多的，是“透着眼神里的慌”。被广告策划人和电脑神童所统治的白宫，它对世界事务的反应已经不能同它的大国应有的智力背景相匹配。它的领导人在语言表达上开始抄袭从杰斐逊到肯尼迪的演讲录，他们开始用社交性的语调处理一切巨大事件，白宫的文风越来越带伪饰色彩。与此相对照地，中等国家领袖——包括小国领袖都显得比白宫领导人更加出类拔萃。从福特开始，领导人及其顾问们的智力滑坡就日趋明显。

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美国人斗争意志的衰退及相关素质的沦落。如果说：里根——布什尚能表现出老战士的余勇，那么，从黑豹党行列中走上政治舞台的一代，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果毅和决勇。在反苏反华反共时期尚能激起的全民性的警惕，到今天，已随安宁和富裕落花流水去也，选民更多地趋向于一种没有远见的、牢骚满腹的政治选择。就如佩罗所说的：人民多多少少被当成了进行策划的对象，策划的手段是商业的推销和传媒的活动。

在美国，已经不存在活跃的政治思潮，求新求异的刺激被当作变革精神加以喝采。

一句话，美国人似乎正在失去独立思考的乐趣和相应素质，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文学及思想的繁荣，对美国人来说已成昨天。

正是美国人对青少年的漠视和纵容造成了整个国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纪念，这就是为什么沉重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产生开放的错觉的原因。

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他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

国青年。——对于青年一代的成熟、进步、发展来说，以上的领先绝对不是次要的和无用的。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

美国未来的干部基础，就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而且美国当前的民意基础——堕落一代的思维印记越来越明显。

我们和美国的青年一代打交道，发现他们的“开放”和“民主”之后蕴含的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这种印象决不是由小国民式的窥视他人式的阴暗心理获取的。我们越来越多地肯跟美国人打交道，除了他们的纯真个性令我们获取比较新颖的可以鉴赏的“物种奇观”外，真正体现在发达民族成员上的优良信号可谓是越来越少。我们无不宽容地看美国人唱京戏，跳江南水乡舞，藉以得到文化反差上的快感。但假定再深入下去。启发性的东西几乎等于零。

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结论：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会是未来先进民族的特征？怎么可以产生这样的感觉：人类光明的火炬将由被称为“电脑神童”的幸运儿来执掌？一则美国的新闻报道可以给我们以启示。许多的美国人成年累月地隐瞒自己的文盲身份，不少孩子震惊地发现自己所崇拜的父亲原来是一个文盲！这种奇妙的历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疑点。

举一个例子，现在国内的女孩子喜欢傍大款。我多次跟别人讨论过“傍大款”的复杂心理状态。问题是：“傍大款”除了“功利超越”状态外，有没有一种“真实超越”的动因？结论是有的。男人的风度和气质应该说是一个诱饵（仅次于钱）。“有了钱，气质自然好。”这话肯定不是喻世式的讽刺，它符合人类的真实心态。哪怕是一个出身贫贱、形容猥琐的家伙，只要他有了钱，他就会历练出一种自信感和厌倦感，这两点恰恰是名门子弟最重要的特征。所以不能否认这在易于感伤的女孩子的心中微妙的回应。

以上的比方可以用来剖析我们盲目追随美国个性的致命的错误。

美国人的天真简单之所以在我们这里有市场，是因为它笼罩了一层美国物质背景的迷雾。假如我们认定它跟美国的文明成果的创造有着必然联系的话，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其实美国人的简陋寒伧恰好是文明成果的赘生物，是被福利奶汁喂养出来的深刻惰性。

美国形象的广告效应容易使我们犯这种因果倒置的错误。

美国的年轻一代注定是葬送他们大国地位的“八旗子弟”，他们太多的不良嗜好和娇滴滴的豪门风气。

有这么一个美国青年，他来中国教书，他的母亲在机场上抱着他嚎啕大哭。母亲认定儿子去的是一个地狱般的国家，而且会死在那里。一年以后儿子健康快活地回去了。

告诉母亲你错了，他的母亲仍不相信，死活不肯让他重回中国。——这个故事可以说明美国人普遍的在心灵上的闭关锁国。

而就是这样孤陋寡闻的一群，又在充当美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强大的民意基础！

据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不下数百名外国政界要人，包括总统、主席、部长会议总理、党的第一书记、元帅、政治局委员、部长，他们被政敌搞掉时，无一例外的被指控为“中央情报局间谍”。毋庸置疑，美国在历史上成功地扶植了一大批美国利益的代言人，以中美洲联合果品公

司、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包装资助亲美势力。

但美国从未在思想上征服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旦美国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时，这些民族往往选择宁食野草为生，而绝不向美国价值低头的道路。文明的欧洲，即使承蒙马歇尔计划雨露之时，它亦显示出哲学、政治、经济上的强大自尊。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条规律，在二十世纪美国处于繁荣顶峰之时，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具备这样的思想魅力，从门罗主义到以后历届总统的国情咨文里诞生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不能对世界大势哪怕产生些许的约束。

指导人类合作的最闪光最深入人心的思想，没有哪一条的发明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即使是在战后对世界均衡影响较大的机能组织一联合国，美国的表现亦像一个坏明星似的缺乏克制，因而失掉了领导世界所应具备的道德力量。

在美国国内，有难以数计的各种思潮，美国劳工协会、美国革命妇女联盟等等。据说七十年代末邓小平访美时，有一群以张春桥为精神领袖的政治活动分子在街道上示威。

美国人外在的思想丰富以及活跃的精神，会让人高估它的文明深度。然则这些思潮的价值从未进入过世界性的精神宝库。全世界的妇女运动、劳工运动、文化革命、青年论坛，从来是遵循着它自己的规律来进行的。

美国的文化轰炸看起来越来越像干力气活，大布景、大劳作，一、两个时髦人物可以领十数年的风骚，奇技淫行的技巧成为艺术进步的最大标志。技术主义的演进和思想深度的锐退已经是公众艺术鉴赏的通病。

美国人底蕴的缺乏令美国无法正确认识世界，并且最终影响到正确认识自己。比如，在他们的心目中，第三世界的领导人都是卡通画式的暴君；他们执着地希望在美国文化辐射以外的地区，有更多的美国观念的输入。当新加坡人的皮鞭抽打一美国佬细嫩的脊背上时，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被抽紧了。他们实在不堪这样的创伤，他们大哭大嚷，大喊大叫；他们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美国人也可以用鞭子抽。娇滴滴的缺乏痛苦历程的脆弱心灵在这一刻被刺得叫唤起来，这就是没有出息的美国。

美国的没落，可能比我们所预想的还要早。因为它已经显示出集体民众心理上闭关锁国的强列征兆。

这种群众心理的闭关锁国不可避免的造成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大乖误。

现代历史上的腐朽政权往往出现在美国势力范围以内。在海地，杜瓦利埃家族的可耻统治在美国的庇护下维持了五十年之久。全世界最著名的一系列人民革命都是对美国失败政策的回击。

在东欧，左派力量一系列的胜利是对美国目光短浅的世界战略的最大的惩罚。

全世界反美的声音不再像过去，是对帝国主义意志的勇敢姿态。全世界反美的声音现在有了精神加物质作为武器，我分明听到这些怒吼中有另一个声音在说话：你凭什么当中心，你不配。——对美国，人们不再是纯粹道义上的反抗，而是对世界现实的一种澄清。

这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具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

在所有对美国说“不”的声音中，日本的最响亮。日本人对战后日美关系的全面质疑，实质是对战贩意识的涤清。宫泽前首相对美国工人素质的

怀疑，证明了日本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得到启示？我曾问过这样的问题：难道民族主义的就一定是劣根性昭著的吗？在 80 年代，我们处在校园生活——即思维的最活跃期——我们口诛笔伐国民劣根性，从宗法观念到社会风俗，从文学观到竞争意识，我们没有现实责任，因而我们在批判中得到轻盈的解脱。

也许我们有一种轻巧的世界眼光，不大看得起日本，因为这个日本的第三次更生是麦克阿瑟用刺刀和军用物资建立起来的。再加上“大东亚共荣圈”给我们回忆上的嫌恶印记，寻找“原装”的物欲冲动把我们的探求真理之路铺向了美利坚。

然而回过头来再看日本民族的文明生态，有一种历史演进的因果感却是让我们嗟叹不已的。

当学者们把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南洋以华人经济为支柱的新兴地区纳入大中华经济文化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闪念：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战后复兴的三大历史革命，证明了它在形态上更像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继承者？日本的富国，带着丰沛的儒家血统。

日本人在建筑、园林、茶道、剑术、礼仪上的优雅情趣，比中国本土还具备更浓郁的中国古风。

尽管敏感的日本人坚信其民族文化同中国文化是大不同的，他们冠以“东洋文明”的名称，试图平行于中华文化。但其国民风范上一惊一乍的形态。表现出与大国地位不很相称的“村气”。不管日本史学者如何醉心伪造上古天皇世系表格，如何苦心积虑地创作大和民族的神话世系，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日本民族飞黄腾达的内在之核实则是：孔孟之道。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今天从这句话，读出了呛鼻的辛辣味道。

怎么看怎么像，怎么看怎么觉着：我们在自身文明的核之外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我们感激有关大中华经济文化圈的天才创想，它表现出我们雄心的端倪。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大中华经济文化圈将从一种尝试性的探讨变成一种成熟的理论，一种政治理念，一种现实。

我们过去太多的“好说好商量”，太过的共容的谦恭。现在特别需要改一改作风，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沉浸于我们大国式的美，从山河构造、从全体人民的雄心和我们历练痛苦之后的超然风范中，汲取我们走向世界的力量。

## 打开智慧的窗口

达赖喇嘛写过一本小册子《智慧的窗口》，在西藏以地下形式在一部分分裂主义分子中间悄悄流传。据说这本书的深奥和思想的冥远，就连大学者都无法遽然明了。

不能不由此谈到西藏问题，我和我电台的同事曾和美国朋友有过争论，并深感茫然，确实需要面朝智的窗口请教再三。

这次谈话是在重庆的一家烧菜馆进行的。青年人嘛，本来也没有什么“莫谈国事”的忌讳。因为一个很自然的由头，我们谈到了西藏是美国人首先发难的，他生硬他说：“你们的军队应该撤出西藏、你们应该让西藏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前途。”我问。“你小子凭什么这样说？——本来西藏是我们的事，我完全可以不许你掺和进来。但我今天给你一个特许，你可以放肆。我首先告诉你：我不会跟你讲考据学和历史变迁——说了你也不会懂。我有很多的西藏同学，他们有的是活佛的亲属，有的是康巴人，总而言之，来自各种利益阶层。他们给我带来的讯息和你在全美电视新闻网上得到的讯息是完全不一样的。西藏从来不是我们的殖民地，她接受中央册封、指导、屯军以及治理的时间比你们祖先登上北美大陆的时间还要长。

历史和现实都在肯定西藏即中国。”另一位中国人也说：“你们得到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手段是极端不光彩的，为什么不把你们的兵撒出去，让墨西哥人回来搞全民公决？”老美瞪眼：显然他是头一回听说德克萨斯原来是后娘！他耸肩摇头：“不，不，德克萨斯都是美国人，而西藏人和你们是不同的民族，你们知道的：达赖喇嘛——他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代表西藏人要你们尊重人权。”我们耐心地跟他讲：西藏的精神领袖不止达赖喇嘛一个人，况且，“达赖喇嘛”也是脱自于蒙古语，表明是中央册封的宗教领袖。不错，西藏人民对达赖有感情，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牧民的帐篷里往往供着达赖和毛主席的像，还有班禅。我们也愿意谈一谈人权，实际上，达赖的宣传机构对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社会牧歌般的描绘是不真实的。许多西方的电影家曾拍摄过西藏的酷刑，那是难以想象的。西藏的宗法社会曾维持过一个相当凶残的贵族阶层，历史上西藏的人口锐减同凶残的奴隶制度关系很大。达赖要“人权”不过是想煽动西方社会支持的策略而已。——跟他解释这么多我至今深感后悔，我太过于相信美国人的悟性了。他嘀嘀咕咕地用很多浅显的比喻来摆脱事实的交锋，西方式的急智和简化问题的典型做法：“比如一个人在家里殴打他的妻子……”“比如一个人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比如……”假如我再碰上这一类事件，我再去陷于这样一类高中生式的胡搅蛮缠，那么我将是一个愚蠢的人。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我惊异于美国舆论的误导，荒谬到了这种程度。他们无视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帮助西藏人民强大的事实，在地域经济上显示了惊人的无知。当这个美国人冷笑着说我们每年从西藏剥削走大量钱财时，我们全体——包括和善的翻译和最不愿意吵架的女孩子——都炸了起来。我克制住愤怒，对他说西藏是一个落后地区，中央政府的财政输血是巨大的——资金的流向与他所说的完全相反。他顽强地否认，说：不，你们每年在旅游业上获取了巨大的好处，你们通过西藏赚钱。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句话：……的人才是愚蠢的。我们在场的人一，二，三，哈哈大笑起来。

这场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论以一个喜剧场面结束，一个名叫周帆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以工人阶级的姿态凛然站起来，对着喋喋不休的美国人断喝：“住口，不许你在这里搞和平演变，娘稀匹，帝国主义！”美国人立即做了一个滑稽的投降姿势，之后，哈哈……智慧的源泉从何方而来？我面对圣贤，存在诸多的困惑。我的困惑不是因我本身而发，而是面对充溢全球的虚假信息的忧虑。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然而，当葛伦堡的“流亡政府”任外界面前把自己装点成西藏新闻的权威发布中心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忍不住问个究

竟：当圣贤启蒙智慧的时候，他为什么阻咽了子民们智慧的源泉？当他从事政治斗争的时候，他的智慧为什么沦落为世俗的技巧？西藏，神秘的土地，圣洁的雪山。作为民族大家族成员之一，我不会装着比西藏人更了解西藏。但是，我必须在国会两院乌鸦们的喧嚣前默默念诵。

对于美国人来说，以下的警策是必须的：一个民族的智慧并不随着他的大国地位而提高；一个民族的发言权并不伴着他的财大气粗而更具权威性。这和人的个体现律是一样的。

美国人这一点很放肆，它太讨人嫌，太给脸不要脸。发展到整个民族品德上，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事务显得缺乏教养。对本民族的内在机能的演变缺乏警惕，导致了它今天意识深层的妄尊自大和贱胚心理。

世界上有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他对别的民族投入了一些关照，有时候这种关照还挺慷慨。但就好比一个人那样，他也在帮助别人，并且有成效，但是这一切的付出赢来不了应有的尊敬？美利坚民族就在于一些不能赢得尊敬的事情。

早在三十多年前，戴高乐就指出，美国的霸权正在扼杀欧洲，不让欧洲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美国正在阻碍欧洲同东方的和解，“总之，从各方面来说它都是一块绊脚石。”美国的对外援助显而易见的透着一股小家子气和急切的求报心理。它不像其他的有些大国，对外援助带有一种高尚人格的色彩。因此，它对他国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物质援助和志愿服务，很自然的引起施受国当政老以及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警惕。故而我频频的看到世界列国民众的抗逆和斗争。一度时间我们还替美国大鼻子感到挺抱屈。

但我们仔细想一下，即使是罗斯福这样的伟大领袖指导美国的时代，从政界到民众，美国人对外部世界亿兆人民深蓄的力量——又何曾真正敏感过了我们不指望美国人是那稣，引导世界走向光明的航程。

美国人缺乏历经苦难的伟大民族的悲悯情怀，所以从智识阶层到普通劳工，注定无法进入其他民族的内心——直捷了当他说它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基本素质。技术主义的美国喜欢拿大炮和轰炸机说话，物质主义的美国乐于用鼻子前的胡萝卜牵引别的民族在它的格子里跳舞，然而，当它的这些魅力衰退的同时，我们发现它还在喜滋滋地重复着过去的呓语——这些呓语过去是以大炮、轰炸机、胡萝卜为代价而推销的。

百足之虫的美国还在维持着它的体面，然而它思想背景的孱弱无法阻挡其他大国——包括即将成为大国的大国——响彻世界的声音。

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伊朗革命，它以极端的形式再现了我们父辈的不屈精神。我以崇敬的心情看到圣战者的牺牲，它以严肃的人物告诫我们中国青年要对自己加以警策。

当冲绳人民以万众一心的精神冲击着美国军事基地时，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不会是仅出于道德满足式的原始愤怒。美帝国主义历史罪孽的必然报应——在这一刻显现了。历史的因果感——尚未降临到歌舞升平的美国人身上。然而应得的教训的首先是我们——我们有必要再想一想沈崇事件造成的中国社会演变的深刻后果。

我们的生活不像日本人那样舒适，我们在战后得到的好处不及日本的万一。但我实在担心处在美式日光浴初级阶级的我们，在国家基本权力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有没有失掉像其他的苦难民族那样的警策？”最近台湾的局势对我们的心灵就是一场考验。



美国国会的乌鸦们——他们代表了某一些民意——张罗着“武装保卫台湾”。正如我们所料想到的——好像是五、六十年代对峙的重演，第七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洋，当成亿的中国青年热烈而兴奋地讨论着一切可能时，想过没有？假如一切临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底气，勇敢地站起来对那些美国佬大吼一声：“你敢？！”我心里回荡起黄尊宪颂扬黑旗军时那首战鼓般的诗！

我说过：中国是一个有热烈文学情感的国家，诗酒般的画面可以一壮我们的行色。

但是随着社会价值的深刻变化，实用和物效占据了我们的更大空间。我们更多的不是用英雄主义的态度看待威慑，而是采取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但怎样才能叫“现实的态度”？如果构成我们国家基石的起码要素都不能成为最大的现实，那么还有什么能算得上是“现实”的？我们部不愿意看到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冲突的焦点。甚至说了：我们不愿意看到因为使用武力而使整个国家出现困难的后果。

但深厚的历史感将使我们在美国的耀武扬威面前涌起高贵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铤足蓬首地以血肉之躯迎接美式火箭，我们会赢，这是最大的事实。这是那永恒的规律告诉我们的。

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大陆开高尔夫球场的台湾老板：假如在台湾搞“全民公决”，赞成独立的人会有多少？他回答说：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五。从其他的资料来看：对台独最有利的预测是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这样一种民意基础，确乎是台湾社会现实的反映。台湾人民有着较独特的感情历程，因此一部分人民出现一种异乎中国传统的骚动，或者叫迷航。这种迷航其实是非常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来导拔一下子的，或者文雅一点说：确乎需要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体民意来否决一下子的。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于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

对我们来说：台湾的从属地位是真实的，不容辨别的。当李惠堂被国际奥委会驱逐出会场时，他说：美国人越使劲越糟。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淤弋，导致内心受折磨的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那个彼岸。那个彼岸突然发现很孤立，很疲惫。它的内心在说：打一打，没关系，然而它更沉默的内心说的却是：我经不起折腾了。

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心灵上有这么一次短兵相接，这是两国人民意志上的抗衡。这更是对中国人民最基本道德观的考验。

我们退一千步来设想：即使上苍注定要气力战胜道德，有一天非打不可，而且很大可能出现阿根廷人在马岛那样的羞辱，我们有没有意志来承受这个东西？”这种设想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好比我和你妻子逛公园，歹徒用刀逼着你抢走你们的钱财，你忍耐下来了。然而歹徒并未罢休，他示意你滚蛋，并胁迫你的妻子朝密林里走。

这时，你明知反抗只能徒增流血——然而，仁义的情怀令你反抗了，并且喋血了。凡夫俗子是很难将此认同为一种智慧的。

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

流血会让歹徒的淫兴消退，流血会使妻子激起勇敢的心，她可能因此

逃脱厄运，或以自尊的悲壮的心消除自己的耻辱感。流血将在未来岁月中向歹徒复仇，它将在命运上对作恶的人以压迫。

尼泊尔前国王马拉亨德写道：牺牲的热血，我们也会有。

堂·吉珂德式的战斗形象绝对不是以雅滤的意义照耀人类的。二十世纪的事情证明：公理会战胜强权，高扬的精神理念将得到历史的回报。而美国人在这方面是绝对缺乏道理勇气的。

所以我们以坦荡正大的强力纠正台湾部分势力的迷航时，应扭过头逼视美国人的眼睛喝出这样一声：“你敢？！”不要忌言“准备打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领袖阶层才放弃了毛泽东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断以及有关动员。全世界为此舒了一口气。

前苏联的一部反华影片对中国托儿所孩儿们玩耍的镜头作如下解说：“在各地的幼儿园里，玩具枪是孩子们所喜爱的；但在中国，玩具枪是孩子们唯一的玩具。”言外之意，整个中华民族，从领导人到小孩都“好这一口”。“黄祸”的恐惧心理，与我们对帝修反的嫌恶和警惕心理，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谁也不比谁松弛多少。我们曾经无限激动地向往有一天的来临，指望那一天改变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那一天也许是：苏联红军冲进了我们的课堂，枪杀了我们的老师，烧掉了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班干部当了汉奸，而我们（当然包括班上最漂亮的女生）齐齐到背后去找队伍，再也后的幻想，自然是《青年近卫军》跟《英雄小八路》的混合物。

自然的，我们自小喜爱打仗游戏，喜爱每一件画面的或现实中的武器，直到我们步入成年，我们仍然热衷于“战争审美”。

我们对上述事物的鉴赏，包含了对传奇的追求和武夫们勇毅精神的倾慕。这注定了我国人民战争观的东方特点，是和人生理想密不可分的。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劳动，也意味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都一看便知，这里头丝毫没有攫取的成份。

中国人民的集体品质，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帝国主义的基因：即贪婪。甚至中国人的对外战争也缺乏一种基本倾向：即暴力倾向。中国的战争正史是一部仁义之师“恭行天罚”的说教史——我们的父辈常常向我们灌输这种“战争道德”。

毛主席逝世那天下午，我们一齐蹲坐在球场上。在丧父的哀痛中聆听了那个对全世界的许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二十年来的事情证明：中国是遵守了这种国家道德的。

但是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存有疑虑：不称霸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做“超级大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争取做世界势力的积极领导者和强大斡旋者？我们没有理由因“瓜田李下”之嫌向世界隐蔽掉我们的雄心，我们没有必要因国力的迟钝而“口将言而喂哺”。连利比亚这样的国家都敢于提出“小联合国”这样诗意而可爱的想象，那么试问：我们是否应提出一场战斗！当大规模的世界冷战结束。许多重要国家和组织都变得面貌不清的时候，我们是否多想一下重塑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正义色彩是足够了，但感觉令人缺乏信心的是强度不够，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是意志的强大。

我们多一点精力去设想：我们今、明、后天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或国家联盟负起更大的责任。

从自由思想者的角度。我对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弃权持担心的态度。因为我有这么一种“唯恐”——唯恐这苦心积虑为西方人所轻慢。

这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式的苦心积虑在未来更加尖锐的国际矛盾中会不会显得孱弱无比？——稳健未必能左右逢源，跃进也未必会失掉此岸。

西方就在我们的地盘上动手，我们别小瞧了尼加拉瓜们袖珍小国联盟的议案，更别小瞧了塞内加尔与台湾“建交”后的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常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在国际事务微妙变化之中。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期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列之中，更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

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

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曾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湾社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小调，其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年的一部分。李与一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的人，他走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八”血腥之夜时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大屠杀给台湾人民的心灵创伤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道：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程度深的缘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景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他在台湾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了台独理念的由来。由此我不能不提到日本，因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闹不仅引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抗的种子。根据“集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们可以由日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推动，进行一次危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同盟？那时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放弃既定目标。

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

我们认为：至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应将那句克制的警告再递进一层（“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至少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

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

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可能波及面更深更远，甚至于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如果一切凌辱无故而加之，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

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

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青年开始怀疑，为祖国应征去死是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这种价值观早已被其父辈所认同）。那么，中国是不是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彻底确信这一点？在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到华盛顿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前面留影（那墙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的诅咒）——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中国大兵。

由此我联想到将来，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

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 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

英国著名外相麦克米伦说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已经逼近了国际合作中永恒的真相的核心。

在本章开宗明义地检讨亲美情绪时，我曾毫不犹豫地退出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厌恶心情——顺便指谪几句我国社会的“标准”用语，动不动“前苏联”、“前苏联”的，好像一夜之间谁都有了历史沧桑感的样子。苏联就是苏联，它是一个永恒的具象，且在时空中它永远是现实。我毫不掩饰地说：如今我有一种较彻底的回归，我对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有着前所未有的好感，这种好感，从苏联解体那一天起便达到了质的飞跃。

一个广大壮丽的国家在一次狩猎之后，便四分五裂。这使我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

同样，作为强大国家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种很强大的积累是以民用消费品短缺为代价赢来的）。同样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

民主德国的实例也能印证我的困惑，民主德国曾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紧随英国，在东欧阵营中光彩夺目。然而在完成统一以后，却变成西部财界的巨大无底洞，这不得不让人们发问：到底咋啦？理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一夜之间发生了，当这些国家在痛感中翻过身来，似乎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发出了丧失言说能力的嚶嚶。

五年以前，俄驻北京大使馆曾热情支持一本中国企业专题画册在俄境

内的传播，那本画册充斥了白砂糖、猪肉之类的产品。一时间，独联体国家的萧条令我们有许多嗟叹。

可是我们差一点忘掉了基本概念：即使俄罗斯在世界风景中继续黯淡许多年，她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二流国家。就像我们越发痛责自己，越发不满足于我们硬件和软件的缺乏，我们就越发坚信我们作为现代化大国的基本素质已经具备——一样，一事情。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两国基于未来宏大目标的合作，我们热情地注视着中国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亲善。我们以尊敬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的痛楚，认定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福音。

着眼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必将成为思想上和利益上的盟友。同样的着眼点也将放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比较有前途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如德国、东欧、东盟和南非。这绝不是一种诗意式的跳跃，而是基于世界变化趋势的深刻事实。

我们的利益守恒原则是基于未来的不求回报的原则，这出自于东方佛教的“功德”观。

因为我们深信世界大同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拿破仑起造了两个多世纪的舆论。今天已经拥有了实现的空间和模具。

对远大目标的企盼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弃和对西方采取孤立主义态度。

因此，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的。麦克米伦小语：“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鹏总理出访法国，带去一大堆订单，全然不顾英美人幽怨的眼神。此举我双手造成。

我极端赞成对西方贸易的“长官意志”，——不要跟我奢谈“政治和贸易是两回事情”，这一守则对西方政客们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西方七国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正好是我们贯彻“麦克米伦精神”的最好契机。

“费厄泼赖”——公平竞争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法则。对于顽冥不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取消订单才是医治他们忘乎所以的最好药剂。

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尚有思想活力的法国。

同样的，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具备良好大国雄心的德国。

以后也赞成把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那些政治上表现一贯良好的发达国家。

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言概之，才是最大的“费厄泼赖”。

同样的，关于《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的题目，也想试图就中国对于不发达世界的责任做一点探究。

我们曾有过“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

因此谈到责任问题，我们的民众有一些逆反心理。

我们可以完全不理睬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跟他们较劲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是否应该采用一种更博大的战略。以铺开我们的善果、打开我们的经营、丰富我国劳动者的世界经验，为我们走向全球做更全面的预备呢？要知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相比，后者是无法“费厄泼赖”的。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痛苦经验。

因此增加对世界贫困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也是中国最大的“费厄泼

赖”。

## “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

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在动力。

时髦人物的政治花轿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景观来丰富新闻的可视性的。但是不能否认——时髦人物（或事物）容易引起错觉，就像我看《阿甘正传》，重温那两首著名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和《圣弗朗西斯科》，我长期以为——反战和嬉皮士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社会主流。克林顿就是搞反战出身的嘛，但克林顿为什么又如此费神地否认那段革命历史呢？克林顿也偶然吸过大麻，但克氏于吗又要请求美国人民的谅解呢？试看吧：“特种战”照样在打，柬埔寨照样在炸，海岸线照样在查。这就是美国的基本历史和现状。所以不要认为那些可以上头版新闻的校园抗议、亚拉巴马暗杀是构成现实的头等要素。美国人热衷于输出这个，有没有标榜其社会生命力的居心？我看是有的。我喝天津的美国牌子可乐，这是一种纯外销（指美国以外——作者）产品。里面有一股让人腻歪的浓浓的砂糖味，而我知道美国人自己喝的可乐没有这种重的糖份，美国人卖给我的香烟，尼古丁含量也比他们自己抽的高得多。所以静下心来。思量一番到底我的错觉出在哪里。

当我年过三十，我意识到我亦加入人生当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了，尽管——特点是不太那么“沉默”。我在电台工作，曾同“美国之音”业务上有所联系，这些同行们工作上非常认真，从他们寄资料的行动中也看得出他们很有财力，我向他们的认真和慷慨致敬。我相信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和我一样也属“沉默的大多数”——不太那么花哨的中坚势力，我至今认为他们对我们业务上的帮助是开卷有益的。

但是我要说：“美国之音”在整个亚洲的推广，从汉语、泰米尔语到乌兹别克语，它所源源散布的一切，从社论到摇滚乐节目，又何尝真正占领过亚洲的心灵？当它竭力鼓吹世界的一种“变化”时，它又何曾看到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后一种即是世界格局的“多数”，今天也不算是太沉默寡言的“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概念——或称思维方式，首先适合于我们。我们长期以来认识政治全貌喜欢用一种轻巧而浅薄的方式，即：高层内幕、时髦人物的沙龙怪谭才是决定国家方向、透射国家真实现状的权威窗口。这种肤浅的见解，缘由于我国人民千百年以来独特的政治热情以及——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政治权力受压制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尚对政治频道传播的正统讯息存有疑虑，存有很大程度的不满足感。老实说，对这种心情，我是有同感的，我也对现状有很大的不满。但我可以肯定他说，每一个普通人从政治频道接受的讯息，包容了他所迫切了解的国家进展的基本大势。从这一点上说：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一切是真实而有份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思潮的演变——尽在你认为是很普通的消息之中。

是什么促使我们不珍视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到“美国之音”里面寻找真

理呢？是什么令我们迷信“美国之音”的道德勇气和自由姿态呢？他们住得那么远，却装着用一两颗卫星就能窥视中国偏远山村械斗事件的样子，装出一付每时每刻都能洞悉政治局会议发言记录的样子，他们对我们采用一种对待小国的态度。它的社论，对世界上每一件稍有影响的事件说三道四，企图以此来影响别国的知识阶层。冷战以后，“美国之音”继续向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传播蛊惑性的言论——话说回来，美国所不喜欢同样不喜欢美国的国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美国之音”的随意性及其记者的老顽童式态我们已经领教得够深的了。

在美国新闻业繁荣和新闻手段发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我怎么说它好呢？我记得中国的一位小说家曾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圣经》的语言，意谓小说家须像上帝那样说话。美国的新闻工作者至少是对我们的报道方面，明显的有那么一种《圣经》笔法，这种笔法对我们感知上的贻误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比如说，某个事件由十个画面组成。美国人往往不是公正而智慧地把最重要的几个画面组合一下，使之成为有世界气魄的新闻产品。他不这样做，他是把其中对他的立场最有利、对公众最具轰动效应的一两个画面重复那么七、八次，其他的哪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画面，只要是他认为对其武断不利的，他会毫不犹豫地隐去。美国的新闻好不好看？好看！连我都这么说，因为它确实像艺术广告，很精采。还想不想看？对不起，ByeBye，尤其是美国人几次对世界性重大事件的惊人歧误之后，我越发坚信我的上述判断。

美国的歧误是有祸心的，它就像童话里吹魔笛的小丑那样，引着城中的老鼠向别处走。

美国的世界阴谋，就是以魔笛呼唤世界各国未来的领导人，循着它的动静向它靠拢。

然而就在它陶醉于广告奇效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世界上“沉默的大多数”要举手发言。

我认为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发言者。

而且中国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多数。

早在七十年代，美国人就讥嘲中国是“有一等雄心的三等国家”，这种理念支配着它的政界要人同我们打交道时，自傲多情地悲我们的天，悯我们的人。尼克松最爱唠唠叨叨的一个细节，是他如何如何去抚平周恩来那一颗受伤的心灵（编得有鼻子有眼：二十年前在日内瓦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向迎面而来的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耸耸肩膀，摇摇头，说声“NO”扬长而去）。尼——周之间的握手固然是战后最伟大的世界性事件之一，然而尼克松急吼吼的抢先握手又基于一个认识错误——这个错误在当时看来是史实性的、不那么重要的；现在看来，这种心理上的谬误从中美重逢的一开始就在作怪，且演变为中国已经日趋富强的时候，这种谬误开始兴风作浪了。

有人问：如今在中国在安理会上比较频繁地投弃权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有逐渐丧失对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同样的疑虑也诞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援外政策的巨大变革。

而事实是：当今中国的外交是赢得了国内人民和当事国人民的巨大同情的。中国正在为未来大国外文的巨大能量积累功德。

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

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

唯有人民中国的外交，是大国当中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的外交。

而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孽债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得到报应，而且势必将面临一场世纪末式的总清算。

美国世界性能量的全盛时期的标志——欧洲煤钢联营、中央条约组织、中美洲果品公司等等，有的已经更生，有的在人民革命中土崩瓦解。

有一种变化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过去，在国际会议会场上，每当出现谴责美国霸权的声音，美国代表，总是非常傲慢地站起来，下巴一摆，像黑社会老大似的指挥着欧洲的和第三世界仆从国的代表集体退场。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几乎是沒有。

美国国内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败坏已经形成了孽果，这一点用不着再做预言，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成熟的世界：“沉默的大多数”意欲发言的世界。

这个世界令大中国的外交视野无限开阔。

困极权主义传统而倍受美国压迫的大国，我指的是像俄罗斯、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东山再起，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世界舞台上足够的发言权。

那些战后世界革命橱窗式的中小国家，如越南、古巴、南非和正在诞生的巴勒斯坦，皆以巨大的善意和真诚的热情寄予中国以希望。上述国家可谓说代表了第三世界的民意。

从可能性上看，中国几乎可以跟所有的主要大国及国家联盟成为密友，这就是中国在世界形象方面美国所不能匹敌的优势。

百余年前汤因比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末不再成为超前的了。我再将其内容明确一下：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

时间表就在我老去之前。

中国目前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极端类似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且赶超的时间表是跃进式的。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墨西哥那样的歧路。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

需要刹一刹那些动静：对国家进步视而不见的嗡嗡吵闹，尽管这种吵闹过去一度是有益的，现在所有的“意义”只能归于玩世，而过去最玩世的先锋分子已经变得很有出息，并且成为世界声音的一部分。中国的内部已经变得很真实，气沉丹田。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思想繁荣的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

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给中华民族一颗坚韧的心，引我们走向至大至美的二十一世纪。

下个世纪，“一即为多”的哲理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活动舞台上变为现实。

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



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 我唾弃那种中国人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支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三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身上这件 T 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

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1995 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五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美国，呆了三个月，过边境去加拿大——啊，我从没有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候——从来没有过——好像上帝过于偏爱他们！

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再让自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地方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要开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到摄氏四十多度吗？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时刻啊？她就那么轻易地下结论：上帝偏爱美国人。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能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我们还记得多年前的费翔热。当这位三流歌星来到上海时，不知多少女青年赶往万体馆想一睹这位有西方血统的歌手的丰姿。我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还刊登了这样的花絮：两个女青年站在印有费翔照片的演出海报下，对费翔的眼睛到底是灰色的还是蓝色的争执不下。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症结。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像宋强所说的那样，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他们又出现了某种臆想，他们暂时变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它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今年三月七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 X 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

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三十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建议，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样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 paper（纸）。”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在法国你向一位老人打听道路，最好不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很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乎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倾覆和鄙夷时，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文明！

前些日子，我在《小说选刊》上读到一篇小说，具体内容忘记了，但里面有一个情节却引发出我的感慨：某外企老板特别青睐他的一位中国雇员，并准备把他送到国外培训以便能回来后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这位老板带着喜爱的雇员去吃西餐，不厌其烦地教他如何使用刀叉。如何喝汤。当雇员用勺舀咖啡喝时，老板厉声制止：“不对，把勺放到小碟上端起来喝——千万要记住，没有那种喝法！”（大意）西方人来我们中国用筷子是种什么情形呢？简单他说，怎么拿的都有，怎么用的都有。

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为自己在异国的种种尝试感到趣味无穷，一边把筷子并在一起去碗里捞菜——而中国人则是宽容的，甚至根本不会想到去取笑他们。老外嘛，用筷子笨拙一点并不丢份。那么，为什么我们去外国就非得熟练老道得跟他们无异地使用刀叉，为什么非要把他们的姿势和咀嚼动作模仿得维妙维肖呢？难道刀叉是文明，而筷子只是猎奇的对象？去他妈的吧！如果要谈文明，我只想说，刀叉其实最落后于时代——我们的遥远的祖先在掌握了如何使用铁器后，就是用刀切开野兽的肉在烘烤以后再叉起来吃的，西方人只是把刀叉专门化，而且做得精致了一些，其间的进步并没有质的飞跃。而对筷子的使用则不一样，它对手的要求很高，对人的协调力也更苛刻——而且，它更具有艺术性以及和平的象征性的渴望。

目前，很多国内的宾馆都让自己的同胞寒心。你打一个电话去宾馆时，接线生总是向你咕噜一句英语——有的还好一些，后面接着来一句汉语：“你好，XX 饭店”。有的干脆就百分之百地涉外了。你在前台计房时告诉你的是 XX 美元 / 天，房间里的订餐单上的目录总是先英语然后在括号里再写上汉语菜目——走进宾馆你整一个在国外的感觉。

我有疑问，如果这样理解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是否太狭隘了一些？处处想到外国人方便，又处处给自己的同胞设置路障，这就叫走向世界？我看还不如说走向丢人、走向失格更贴切。

对自身的血统不予认同，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危机蔓延的可怕后果。有很多喜欢舞文弄墨的家伙到国外之后，很快就能弄了一串在国内畅销八方的书来，什么《北京人在纽约》、《纽约上空的夜莺》，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娶个外国女人做老婆》等等。从书外披露出的种种情况看，全是精神失衡之后的自我补偿手段——在现实生活中一败涂地，于是虚构了一个易于被自己操纵的世界：金钱、性、豪宅、声名

再加一点忧郁，利比多释放了，而且还成了旅美旅澳什么的作家，真是一举两得。

还是我开篇谈到的那位王先生，他有一次醉后大哭：“呜呜——呜，中国真他妈俗气，真他妈单调！这个土地上只有繁殖就是不可能有爱情，人家马克的那种爱情在中国是找不到的呜王先生几次恋爱受挫，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把这种心情化成愤恨一下子投向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那就只能从更深的方面去找原因了。

王先生有几次谈到马克在泰国的艳遇，大致情形是这样的：英国无业游民马克先生（据说其父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到泰国旅游，觉得泰国真是男人的（特别是有钱的男人）天堂，他尽情享受，与一个又一个东方少女相互使用性器官。但几天之后也有些倦厌（体力不支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于是买了机票准备回国。

在即将离开曼谷的前一天晚上，马克百无聊赖，于是信步走一家临河的小咖啡屋。当一位少女给他端上咖啡时，他一下仿佛受到了电击，目光也呆直了——他从没见过这般清纯脱俗的女孩，而且整个晚上他都没能想出一句话来跟那位姑娘说。在临离开之前，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在一张纸上匆忙写下这样几句话：我叫马克——我马上要回英国——但我一定要回来把你娶回去。他把纸条连同小费塞在那姑娘手里，然后便魂不守舍地逃也似地走了。一年以后：马克果然又去了泰国。当他来到那家咖啡屋所在的街道时。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屋不见了，那片位置上是新盖的一家饭店——这番景象使马克头脑一阵阵发晕，几欲跌倒——他不加选择地走进了某家酒吧，一杯一杯地给自己灌酒——这当儿，一双手从后面蒙住了他的眼睛，一个轻柔的、天使般的声音低声唤道：“马克……”结局是美好的：马克蓦然回首，然后便激动得大吼大叫；然后他们紧紧相拥着去了宾馆，然后……马克完成了爱情，一个人来了中国。

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是一个大花花，他专门在第三世界的街头、校园、饭店等场所转悠，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孩便上前搭讪问路。据说他每次出国旅游时，包里总要带十打保险套……他的爱情可以像唾液那样，随时随地分泌。

当他在蹂躏我们的姐妹时，我们还应该感到幸，因为，她们得到了“人家马克的爱情”。

我快窒息了。

为那种中国人！为那种洋奴！为那种洋奴嘴脸和行径！

我唾弃——啊呸！

## 遏制，反遏制，反过来遏制

1.“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尽管美国本土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告诫自己的政府“不要同中国打冷战”，比如基辛格，他就认为同中国对抗对于美国来说代价太高了。但在事实上，美国近几年来对中国实施的完全是一种遏制政策，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叫“软硬兼施”，尽管形式上各不相同，其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中美关系何以走到目前这样的危险边

缘的主要根源。

深刻的意识形态歧见，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倾覆姿势，霸道的国家主义和领袖欲是美国人之所以“遏制”的基本出发点。另外，我认为，整个美国对中国所形成的知识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深刻、明晰和全面得多。

一九九二年上半年，我曾与一个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的美国留学生韩盖德同桌共餐。席间，我们因为西藏问题争论得差点不欢而散。韩盖德的观点是：自从中国“侵占”西藏后，每年都要从那里攫取：上百亿元的财富，并由此造成了整个西藏的贫困落后，人民生灵涂炭——这简直就无从讨论了，他可能以为达赖喇嘛时期的西藏是多么丰衣足食、歌舞升平、繁华似锦呢。

“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么认为的。”——韩盖德反复这样强调。想一下吧，在一个传媒高度“自由”、“发达”、“公正”的国度里，竟然对中国生发出那么多“稚童”的观念，对东方的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有如此大的偏差，这是多么可怕又可悲的一件事！

认为中国是一个苏联式的扩张主义者，是一个邪恶的帝国，有必要“让它呆在窝里，别出来惹事生非”（美国一参议员语），这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另一个主要依据。

最近，中国军队在台海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以及此前的中国政府在南沙群岛、钓鱼岛等的一贯立场，都被美国视为中国搞军事扩张的一个征兆。但是，请问美国的政府和国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对包括本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有争议的领土提出主权的权利？难道中国只有很大度地拱手相让才能证明中国没有野心？至于台湾问题，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一与台湾岛的台独猖獗有关，第二显然与美国的不可告人的用心有关。美国的那些政治家内心绝对不会愿意大陆与台湾顺顺利利地实行统一的。如果统一，他们手里对付中国的筹码不是又少了份量很大的一块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人的态度既理智又明确。第一，我们希望能和平统一台湾；第二，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被外国势力所干预，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两个观点，我觉得每一个富有智识和公义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不管李登辉如何辩解，我们只要读一读他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就可以对其用心予以洞察。所以，如果把中美关系的今日格局仅仅理解成为两个国家相互之间的误解和意气用事就有点牵强了。

为什么偏偏要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你们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什么不能放弃武力好好地坐下来谈呢？谈一百年也没有有什么嘛，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不要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领导世界上己任。在台海演习时，美国的决策是愚蠢的和不慎重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才是一种公然的挑衅。

美国防部长佩里居然以这样的口吻威胁中国：“谁也不要忘了，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我也以这样的口吻来奉劝美国：“谁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如果有谁认为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维持自己的长久的霸权地位和冷战后格局，不择手段地使用阴谋、谣言及武力威胁与贸易制裁，它除了能短时间地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外，其后果对美国 and 整个西方世界来讲也是灾难性的。请看看《中国青年报》在

1995年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吧，美国已经成了中国青年最为讨厌的国家了——与一个有十数亿人口、有几千年文明史、正在重新崛起的东方大国蓄意为敌，其政策也太不明智了。（见《中国青年报》1995.2. 只要遏制存在，反遏制也将成为中国的长期战略）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卸任回国后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本书值得国人一读。当然这并非说书中的所有观点本人都同意，至少该书作者是在对中国有了充分的认识、理解及思考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是一本诚实的、公允的著作。中江认为，美国在七十年代初期并非像它口头所说旨在加深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而接近中国的，换言之，中美关系正常化只不过有利于其对苏联进行遏制而已。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检视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近二十年的第一步，美国的所有动作都有它的深藏的有时是秘而不宣的底蕴。这个底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一，千方百计使中国变得为它所用；第二，为了使中国变得能为它所用，先让其的国家统一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把自己的“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进而使中国如同东欧及前苏联那样一夜间改朝换代——这就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所有的侥幸心理都必须抛弃。反遏制，这是中国在中美关系的进程中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在美国所采取的每一个遏制中国的步骤中，我们都必须针锋相对，绝不能有一点点姑息与宽容。比如说，如果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使美国“保卫台湾”的决议成为有效的行动）如果他们使《与台湾关系法》临驾于《中美上海公报》之上，并且违背“上海公报”的基本原则，使出口台湾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逐年提高；如果他们继续鼓动李登辉二度访美；如果他们坚持向达赖集团派遣特使……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中美关系的级别降低下来。对于被西方列强宰割、掠夺羞辱了多少年的中国来说，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举世公认的主权国家的国家元首，被邀访问华盛顿，但又不承认是国事访问——难道是像李登辉那样的“私访”？在这一点上，中国坚持了原则，获得了尊严——我们不去华盛顿。并且所有的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一点、将来，无论哪一任美国总统想访问中国，我们最好也希望他以旅行和休假的形式来访。

这并非什么意气用事，也不是睚眦必报。因为我们必须告诉全世界：谁也别轻慢中国——否则，他将会背上一笔长久的债务，可能会加倍地偿还。

3. 对于美国的霸权行径，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的遏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掌握主动，仗义直言地维护本国及其他弱小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美国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欺行霸市，胡搅蛮缠，我们就应该尽其所能对它进行有效的遏制——以上观点是我和周围的一些朋友一致认可的。进而言之，这不但是我们的权利所在，也是我们的义务使然。

在前一段时间古巴击落从美国领土起飞的、进入古巴领空的古巴流亡者的飞机事件中，我们赞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正义的、智慧的举动。在事实真相未明的情况下，美国借自己正值安理会主席国的有利地位，大造声势，瞒天过海，甚至把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儿童把戏（通过驻外使馆使古巴外长延迟入境）也使将出来，妄想匆忙炮制一个谴责古巴的决议——哪里还有什么公义可言？中国代表那时体现了一个负有责任感的大国应具备的态度——为什么不给人家一个阐明事实和观点的机会？联合国虽设在美国纽约，但它

并非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府，你已经有多少次行联合国之名而取自己所需了？古巴，一个选择了与美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南美小国，几十年来一直被美国的强权政治及经济封锁戕害——这也可算是怀璧其罪的一个国际例证了。美国经常攻击一些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可言，那么，既然你所奉行的是多党政治，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中你不能容忍多种意识形态、多种国家体制的存在？必欲剪除而后快？你们的民主精神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体现一丁点呢？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必须从此更加明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

中俄相互迅速接近虽然不具有五十年代的那种结盟性质，但在这两个有着漫长边界的伟大国家各自经历了一段一言难尽的劫波之后重新执手相看毕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现在可以说，两国的关系比五十年代少了些浪漫，多了些真实——因而可以发现得更为成熟、久远而少波折。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同俄罗斯的关系发展成为一种战略伙伴信任关系，而且双方都应认识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决定正义与否，而且在超越意识形态之后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应该看到，北约东扩对俄罗斯人的心灵震击之大、伤害之深是难以言喻的，这其实还是美国对俄罗斯进行遏制的一个决定性步骤——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整个西方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华约不复存在之后，美国把自己的利剑顶住了俄罗斯的鼻子，使其在自己称霸世界之前已经不战而屈，而且永远失去了恢复昔日荣耀和大国地位的能力——这着棋既毒且狠。

所以说，当前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的命运已经有了相互连接在口起的基础。

在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是不太愿意在美国的指挥棒下跳舞的国家，所以对中国而言，法国更具亲和感——虽然我们两国的关系也颇多周折；但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文传统、自信、坚强并且有着光明前途的民族。它们的电话、文学、绘画和领导人与美国相比显然更有魅力。法国比美国少虚伪，多公义；少霸权，多独立性。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我们希望希拉克主义能继承戴高乐主义的优秀传统，不要屑于在西方合唱队中担任一名合唱队员，而是以自己的独立的悦耳的声音歌唱。我们记得，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是戴高乐先生领导的法国——所以他现在成了举世公认的伟人，我们也永远记得他的名言：“不要等它（中国）在使你不得不承认它的时候再去被动地承认。”斯言真哉。

在亚洲国家中，马来西来和新加坡的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对美国说不了。马哈蒂尔就曾经针对美国的伎俩这样指出：他们先跑到一个国家去散布“XX 威胁论”，让这个国家买他们的武器；然后再到对方国家去同样摇唇鼓舌，既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军备竞争，自己又赚得大笔利润（大意）。真是活生生地刻画了一个好商的嘴脸。

新加坡人的骨头同样是硬的。我们还记得那个在新加坡违法乱纪的美国青年费伊，他被新加坡法庭判处鞭答后，整个西方世界都一片哗然，克林顿更是对新加坡软硬兼施，要求免打。他此时可能忘记司法独立这一概念了——或者说，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但别国的刑罚就必须依其意志行事，否则就是野蛮和落后的。这分明还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心态在作怪。

所幸，新加坡人照打不误，畅快淋漓。这样的鞭答正是对西方价值至

上主义和司法歧见的拷问。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我们应该与周边国家建立长久的、相互信任和依存的关系，每一个亚洲国家都要谨防成为美国人手中的一张牌，相互间应求同存异，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及相似的文明背景下共存共荣，对外国势力在亚洲的存在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对种族歧视和强权政治不可姑息，只能遏制，这样，我们才能适应新亚洲时代。

## 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

〔美〕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强烈否认美国像过去遏制苏联那样正在努力遏制中国。他坚持说，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接触的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纽特·金里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全国见面》节目中说，我们应当帮助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府，他马上接着解释说，他的真正意思根本不是指的颠覆。

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外交辞令？因为对一个新兴的、有威胁性的中国采取任何合理的政策都会有两个组成部分，即（1）在中国不屈不挠地扩大其势力范围时予以遏制；（2）颠覆中国的假马克思主义，但仍然残酷无情的独裁专制制度。不许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可以容许论说文作家说出这样的话。

遏制的意思是不是指同扮演旧苏联角色的中国进行第二次冷战？并不完全如此。这场斗争并没有意识形态成分。苏联在即将瓦解之前一直具有吸引力，世界各地都有同情者。今天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已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如今的中国更像是个旧式独裁专制国家而不是执行救世主似的任务，它一心追求权势。它更像是 19 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对于它所处的欧洲大陆来说是太大和太强了。

中国的邻国现在也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现在中国正在把其势力扩大到南中国海，宣称靠近它的 4 个紧邻但处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军队可以到达的地区之内的一些小岛是属于它的。这些小岛距离中国数百英里。俄罗斯和西方的国防开支确实已经减少，但中国的国防开支正在大幅度上升，在过去的 10 年内增加 1 倍。这些经费正用来发展洲际导弹、实现陆军现代化和建立一支远洋海军。

中国并不仅仅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新力量。它现在把导弹和核技术输出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中国同巴基斯坦的联系是对中国的宿敌印度进行侧翼包围的行动。伊朗是个可利用来给旧的帝国主义分子西方制造麻烦的国家。

遏制这样一个恃强凌弱者必须从它尚处于早期时开始。这就是说要同中国的邻国建立关系，先从同越南建立关系开始。尽管我们决定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出于感情冲动，但是冷静地看一看，这样做的意义是地缘政治性的，即越南是中国的宿敌（它们两国曾在 1979 年进行过一场短时间战争），因此，我们必须使越南成为我们的朋友。

只要看一看地图，你就可以了解到遏制战略的其它组成部分：（1）同

民主的印度建立新的安全关系，印度现已摆脱它同苏联结成的古怪的冷战联盟；(2) 延长美日联盟，该联盟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的威胁，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决意要在日本京都出售汽化器，这样一来它就危及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的基础；(3) 巴结俄罗斯人，尽管俄罗斯人在别处是多么的犟，他们与我们在中国有共同的利益。

遏制并不是进行冷战干涉。遏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一项强权政治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咄咄逼人的法国。当代，大西洋联盟曾经遏侵略成性的苏联。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西方未能遏制住崛起的德国，其结果是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在这个 21 世纪新兴的大国身上出现。

但是仅仅遏制中国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金里奇无法明确鼓吹的事情，即颠覆中国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

颠覆这个政权要从毫不动摇地支持像吴弘达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吴弘达因为他从事争取人权的工作而现在被关押在中国，对他提出的罪名是他从事间谍活动。从道义上看，支持吴弘达的理由是明显的。但是除了道义上的理由之外，还有政治上的理由。美国曾经遏制过苏联，但是从内部推翻苏联制度的是索尔仁尼琴、夏兰斯基和萨哈罗夫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吴弘达和他所代表的千千万万的人是对中国独裁专制制度构成的最大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以极其凶恶的态度对待吴弘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吴弘达的一边。

经济制裁起不了作用。美国过去曾对经济比较疲软的苏联实行过经济制裁，但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现在强劲发展的情况下，若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那就更加没有用处。最好是公开地进行争取人权的斗争。不让北京主办 2000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对北京的严重打击。不让中国按照它所希望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对北京的严重打击。其次，希拉里·克林顿应当答应吴弘达妻子的请求，在美国带头抵制预定于今年 9 月的合法性。不让北京主办这种活动就是发出严重的信息，即要么实行自由化，要么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我们政策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为了换取容忍和民主化的表现才给予这种公开的特殊待遇。

遏制的目的是要防止战争。但是，促使政权发生变化，使中国成为宽容的民主国家，则是和平的更可靠的保证。现在是施加压力并保持压力的时候了。

(美《时代》周刊摘要)

##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要走火

针对台岛内的分裂主义倾向甚嚣尘上，中国力求通过各种方式予以阻遏，虽然现在的局势从表面上看趋于平静，但是，树欲动而风不止，转机并未真正出现。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及少数西方国家并不真正愿意看到大陆与台湾实行统一——即使如美国所宣称的那样，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恐怕美国人在内心深处也是极不愉快的。



一个正在逐渐显露其重要性的、在意识形态上迥异的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大有好处的。这种分裂分治的现实可以逼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受到羁绊和干扰，而美国又可以随时随地打楔子。含混不清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的表述，国会与政府之间的看似对立又能迅速协调的政治把戏——以此手腕来操纵两岸关系的风云，并且还能巧妙地深藏私心，实在有点自欺欺人。

比如说：“签订了中美三项联合公报，然后再通过国会整出一部《与台湾关系法》，一旦台独主义者马蹄声急，而中国政府、不得不严肃地表明态度时，华盛顿的国会山便扑腾起来，一边叫嚷要重新定义《与台湾关系法》，使其能临驾于中美联合公报之上，一边找出词条，因为在那个“关系法”中，美国人只是“支持两岸和平统一”，所以，武力是非法的，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如果中国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美国就有“保卫台湾”的权利和义务。

可以这么说，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其实与美国不无干系；中央情报局的帐号上为台湾的分裂主义分子拔出多少款项以便其羽翼渐丰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大白于天下。然后，美国人再要求你和平统一。此时，台湾似乎成了美国利益的一个符号，而不是中国隔海相望的领土。

进而言之，美国的战略是，第一，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第二，剥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有使用和平线以外的手段的权利；第三，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让中国不能妄动，否则，就是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构成威胁，因而必须遭致惩罚和唾弃。

但是，美国不要忘了，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并不会按照它的思路走。进一步说，中国的原则的确定并不是哪个领导人甚至哪一届政府心血来潮时一笔挥就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原则，既体现了国民的意志，又考虑到两岸的各类变数及外国势力干预的各种可能性。正如江泽民所言，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没有哪个领导人敢于无原则的妥协，因为那将会使其成为历史的罪人。

美国将两艘航空母舰派往台湾海域，以“尽可能地发出强硬而明确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明确的：如果两岸开战——谁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场面——美国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军事干预。

这个信息同时也是含糊的：因为它仅仅是信息；如果美国要付诸实施，我相信它也会计算到底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首先，它能够像对付伊拉克那样，让许多西方国家集合在它的周围，以联合国的名义“合法”地与中国对抗吗？其二，它能在亚洲国家找到一呼百应的盟友吗？其三，中国不是伊拉克：中国没有去侵犯另一个国家，中国是在为主权、领土完整而战（这一点，联合国的决议已经昭明）；中国也不可能像伊拉克那样在狂轰滥炸之下顷刻便附首称臣。并且，美国在亚洲的几次战争并未能全身而退，如果悍然与中国对阵，那意味着它所进行的是本世纪最大而且最胜负莫测的赌博。

这并非说，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抗衡，更不能表明中国穷兵黩武。如果中国甘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只是因为如前所述，谁坐视台湾的独立，谁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我们也应该向美国传递以上这样一个明确的、强硬的信息。

所以，美国目前应该做的，是尽量少让台湾问题复杂化，很清楚，整

个事情的转折点正是因为美国自食其言，使李登辉获得了赴美签证——它的象征意义及微妙性并非美国不能了解的。如果以此来探实中国的忍耐限度——试试水温——那么中国无疑会被激怒，因为美国选择的是一个最为敏感最有禁忌的部位。说得不客气一点，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私处”。

基辛格博士说：“如果敌视中国成了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经常现象，我们就将找不到同盟者。对中国而言，台湾不是一个外国，而是一个 1895 年被日本占领，从而开始了对中国领土蚕食的岛屿。中国对这种被认为是分割行动的反应，犹如当年美国北方各州对南方各州企图脱离美国的反应。”不能据此说，基辛格就是一个亲华人士，只不过这位美国的前政府高级官员更具有正直开明的气度、尊重历史和自己心灵的勇气及个人智识与战略目光。我们也不能说，美国国内的其他人士（如金里奇、杰西·赫尔姆斯等）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与基辛格相比仅仅是认识上的差距。唯一的结论就是，中国统一被视为一种危害美国的长久利益的行为，必须尽其所能，使台湾海峡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是，很显然，一旦问题变得严峻和必须选择时，美国将“很难找到同盟者”。

## 支持台独没有历史根据

〔美〕莫里斯·迈斯纳中国又开始在台湾北边和南边的海域试验它不断增加的导弹力量。从去年夏天为抗议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进行第一轮导弹试验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敌对。

台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中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但是，台湾历史上没有什么支持台湾独立的东西，国际法上就更少了。

除了土著人（通常认为的南洋人 LAYAN），台湾到 15 世纪或 16 世纪才见于史书之中，那时海盗和从中国、日本、葡萄牙和荷兰来的商人把它作为基地。在 17 世纪的中叶，台湾成了被打败的明朝的最后堡垒。明朝最后的军事保卫者、冒险家郑成功离开大陆，在击败荷兰人以后，确立了他在台湾岛上的统治。

1688 行政管理上作为福建省的一个府。

直到 18 世纪和 19 世纪才开始从大陆大量移民。多数移民来自沿海省份福建和广东，那些人的后代现在被称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从民族、语文和文化方面看，他们同住在他们祖籍省份的各民族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台湾现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发生在 1894 年至 1895 年的战争中，现代化的日本击败腐朽的清政权的时候，日本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战利品，归它所有。台湾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时间长达半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多数台湾人也这样认为。

若不是 1950 年 6 月爆发朝鲜战争，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很可能是短命的。那场战争使蒋介石政权依赖第七舰队，使台湾成为事实上的美军保护之地。

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并不完全是从民主的理想出发的。在 50 年代和 60 台湾的统治者，而是把自己说成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毕竟是它存在的理由。

1972 纵观台湾历史，显然没有支持台湾独立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根据。

除了中国在西太平洋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外，台湾（和大陆）还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台湾独立的远景黯淡。看来可能的是这样一种前景：在承认台湾 20 世纪独特的历史的基础上，在大中华的框架内实现高度的政治和经济自治。

这种安排只能由中国各党派自己作出。如果美国政府出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介入中国内政，那么，（台湾）实现真正、持久自治的可能性也将会减少。

（摘自美《洛杉矶时报》）

## 美国的外交是不诚实和不负责的

无论哪一个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或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应以诚实守信为本。

每一个国家都应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但这并不表明可以不择手段、出尔反尔，甚至施用欺诈、设局、造谣惑众等令人不齿的伎俩，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很多场合从不讳言自己领导世界的使命——姑且不谈他们的这种“无降大任”是否应属自作多情，但他们在外交上的一系列诿使人存疑：这个国家到底是幼稚还是狡猾？美国让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就是一例，当时，克里斯托弗亲口告诉中国外长钱其琛，他说美国不可能给李登辉发放签证，因为那样做是违背中美之间的三项联合公报的。

这就是美国递给中国的口信，而且有几点需要说明：一、克里斯托弗说这番话时并非在他们家厨房里说的，他是以一个国务聊的语气向另一个当事国的外交部长给予了承诺；二、克氏给予这种承诺时不是在酒后，不是在“心神丧失”（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常用语）期间，也并未收到胁迫和诱导——中国人相信了美国人。谁知仅隔一个星期左右，白宫又正式宣布将给予李登辉的人境签证。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同时，他们发言人为政府的举动提供了理由：李登辉此次赴美仅仅是一次“私访”，他只是以一个校友的身份回他的母校参加一项纪念活动——在一个以自由和民主为本的国度，对这样的访问没有理由加以拒绝，故而，李登辉先生访美并不违背中美三项联合公报。

难怪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来访进直言中国人对此有一种被出卖和被凌辱的愤怒心情——“他们总是有理，他们总是正确的。”不能给李登辉签证，因为那不符合中美三项联合公报。

应该给李登辉签证，因为它不违背中美三项联合公报。

——到底哪一个声音是美国的声​​音？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人是怎样完成这项从违背到不违背（中美三项联合公报）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论证的？美国人是否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特别是中国）传达一种态度：我们怎么说都是对的，因为现在是美国的领导世界。

简直近乎于泼皮无赖了。

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两年前的“银河号”事件。这是美国人在国际关系中又一次扮演“舍我其谁”的世界警察角色，贼喊抓贼，无法无天的丑恶嘴脸大暴露。你可以逼迫中国的船只接受你的检查，因为你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银河号”装有运往某中东国家的违禁化学品。如果“银河号”拒绝检查，那么全世界马上便会闹腾得不亦乐乎，因为中国人肯定干了见不得阳光的勾当了；如果“银河号”让你检查。这便能又一次确证你的权威——没有美国管不到的地方，没有美国管不了的事。

祸心重量，动机险恶。

那么，当你们在“银河号”兜底翻之后，有没有向全世界认认真真发布告示，有没有怀着愧疚的心情为中国洗清冤屈？你们没有道歉！

据此可以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时时表现出一种既专横霸道又用心险恶、不具备责任能力的可憎面目。捕风捉影、独自尊大、虚伪无常、不负责任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的几种基本特征。

美国人拖欠联合国十六亿美元会费，最近一些国会议员竟然怂恿他们的政府把这笔帐一赖了之。但是，他们在联合国却又能颐指气使，炮制这个议案那个声明，挟联合国以令全世界——实在是咄咄怪事。我觉得，倒应该针对美国提出一个议案：如果拖欠联合国会费达到一定数目，超过某个时限，就应该自动丧失会员国资格。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具有这样的义务——要勇于承担起在全球范围内反不公平的角色，对于某些大国势力利用联合国来损人利己、惹是生非，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大声说“不”。

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就江泽民谈话内容答记者问问：尼克你对中国主席江泽民接受美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有什么要说的，特别是他仍然说，美国决定让台湾总统访问我国一事使他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第二，他说他愿意同台湾总统李登辉互访，对此，你有何评论？第三，他本月早些时候与克林顿总统举行首脑会晤时是否将要求克林顿就台湾问题做出进一步的保证？你是否有……伯恩斯：关于第二个问题，那的确是该由中国和台湾领导人来决定是否举行会晤的问题。

关于头一个问题，我不会使用那个词，因为我认为美国一直在同中国政府直截了当和坦率地讨论那个问题。今年夏天，我们曾多次谈到这类问题。我们重申美国在这个地区奉行的政策是以一个中国为依据的。我认为在 10 月 24 日的首脑会晤时没有必要花很长时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虽然我确信会提出这个问题。

问：我可以接着提吗？具体他说，江主席在一次访谈中说，在美国决定让李登辉访美之前一星期，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显然是对这里的中国使节——说，让李登辉访美是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的。

我对你提出的问题是：国务院或国务卿本人在美国宣布（让李登辉访美）之前是否向这里的中国使节做出这种保证或说过这样的话？答：嗯，曾经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使节（当他还在这里的时候）多次讨论这个问题。

我无法——我记不起在那些会晤中谈话的所有情况，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公开地、详说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同中国政府非常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了解我们的立场，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重申过。你们知道，三四个月来，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我们对发签证和台湾问题以及我对中国问题的立场说得一清二楚。

我们奉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奉行的不是一中一台的政策。在美中关系上，关于这一点的确不存在什么神秘莫测的事情。当两国的总统和主席会晤时，我相信他们将好好地交谈，回顾过去几个月的历史。但是他们的确无须再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多的说明。

问：尼克，中国主席说，在宣布（李登辉访美）之前一周，国务卿对他或对中国方面说，这种访问将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精神。这是否属实？答：我想，你知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在其他场合提出也许是合适的，但是现在提出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一向认为江主席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是非常直率的，我相信他在私下讲话时也是如此。但是你们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让我们别再提了吧。让我们着手为中美关系办实事。我们两国应当建立良好和稳定的关系，应该讨论这种关系中的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些将是关系美国和中国进入下世纪的前途的问题。

问：尼克，你能证实国务卿的确曾对中国大使说过那番话吗？答：不能。既然我们将继续谈这个问题，那就让我再回过头吧，我不能证实私下……我不能证实我们私下同中国人讨论时所作出的内容。在那个问题上，我无可奉告。在发签证之前和之后，我们在同中国人会晤时谈了许多事情，而有些事情没有提到。我不准备谈《新闻周刊》刊登的报道中所说的任何问题。坦率他说，我对这样做并不感兴趣。

我是说，让我们着手为美中关系办实事。

问：我有否接着再提个问题。4月17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纽约会晤中国外长钱其琛。

据说当时美国一家重要报纸在非常显著的位置刊登一则消息说，国务卿对钱先生说，他亲自就这种情况征求了意见，找了一些国会议员，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想阻止李登辉访问美国“那是办不到的”。这是否属实？在国务卿和钱先生4月17日会晤时是否确实传出这样的消息？答：好吧，现在就让我对卡罗尔破一次例吧（笑声）。我之所以要就这个问题说几句是因为我参加了那次会晤，并且记得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4月17日在纽约会晤时，国务卿的确向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表明，美国国会主张给李登辉发签证的情绪非常强烈。

这就是那一天谈话的非常个体的内容。

问：尼克，国务卿本人公开说，他也许没有把这一点对钱外长说得足够清楚。

答：我记不得那番话了。

## 组建“反中国俱乐部”即不光彩也不会成功

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对手的日子既寂寞又无趣。

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宣称“自由世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冷战中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带给他们的快慰和兴奋并没有持续太多的时间，美国立即发现，如果不寻求一个新的对手，如果不为自己及盟友们树立一个公敌，并群起而攻之，而遏制之，那么，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将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如果听任这种矛盾的激化和漫延，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基础就会一朝崩溃，最后使冷战的胜利成果变得滑稽可爱，意义趋向零。

这对美国来说，确实太可怕了。

1. 卞和无罪，怀璧其罪于是，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靶子。当中国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时，它已经和“邪恶”、“威胁”、“不遵守规则”这类词连在了一起。

首先，尽管中国一直强调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受到阻滞。但美国却不然，只要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于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异类的”，而“异类的”国家是可以不需要提出其他理由就可以予以攻击和剪除的。

其次，中国已经以其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广阔的市场和对国际性问题的独特看法越来越引起世界瞩目。换句话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成为世界范围内反不公平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无疑对美国的霸权心态投下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个亚洲的世纪的来临，对于美国势力在该地区的传统性存在提出了挑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日本冲绳市民对于美军基地所表现出的空前不满和愤慨，我们也听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对美国开始疏离和厌恶。从地缘政治因素考虑，把“中国威胁”作为一项理论提出并千方百计使其成立乃是当下非常紧迫的任务。

2. 美国正抓紧组建“反华俱乐部”要想使“反华俱乐部”拥有相当数量的、相对固定的和坚决的成员，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必须寻找到这样一些国家，他们能够在对华关系上存在着彼此一致的或近似的利益；这些国家将面临这样的可能：中国的发展壮大会使其无所适从，如果在他们与中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领土领海争端），那么，中国的大国地位的日渐上升将会让他们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南海诸岛、钓鱼岛以及台湾、西藏问题都是美国人为形成这样一个反华联盟而随时随地能够大加利用的牌。

美国一国会众议员（我怀疑此人小学有没有毕业）最近大放厥词，他说，南海诸岛离中国本土如此之远，（中国人）居然还对此提出主权要求。这种说法只能加深我们对美国国会的人员素质的怀疑。我们不能说，阿拉斯加远离美国本土，它就不应该属于美国，因为它看上去更应该归属加拿大；塞班岛离美国更远，它更不该属于美国，因为它看上去更应该归属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人的理论就更加让人莫测高深了。他们认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对台湾实施过统治——其潜台词即是：台湾已经基本上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了。他们把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几百年来凌辱与宰割所产生的后果当作既成事实，逼迫中国人接受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这完全是一副丝毫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嘴脸。在任何没有道理的地方，他们都能建立真理。

所以，哪怕一个政党的宗旨是为了建立台湾共和国，是为了使台湾独立于中国，这种政党的存在也只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中国的批判、抑制或者几次军事演习就是不可原谅的，就是加深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就有必

要吹起喇叭，带领一千人马围攻中国。

这是哪一家的逻辑？多年来，美国总是力图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打进相互不信任的楔子。他们利用几个国家都声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一事，不放过任何机会宣扬中国威胁。这种做法真是一箭多雕：第一，他们的军火生意会越做越大；第二，东南亚国家必定会紧紧依附于美国，从而形成一个不自觉的对中国的包围圈；第三，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有了合法合理地保留下去的理由。

1996 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从这个文本看来，日本人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加入了“遏制中国”的大合唱。这个宣言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东亚驻扎十多万美军。

很显然，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与一个敏感地区的某国建立精神全新的安保体制，里面包含了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阴谋。作为一个“国权模糊”（中江要介语）的日本，如此行动确实意味深长，这预示着日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部要把中国作为一种假想敌来确定自己的方针战略。

在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之后，美国防部长佩里对报界发表谈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认为，中国以军事演习名义发射导弹是一种威胁，是想让人产生恐怖心理，我们现在也这样看。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是想向世界表明中国不惜使用武力。

这不仅是对台湾，也是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美国认为维护西太平洋的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向中国表明美国有使用武力的准备是重要的。”这番话明确无误地表明，首先，美国不惜使该地区情势复杂化；再者，美国通过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游说和宣传，其建立反华俱乐部的主旨正在迫不及待地予以显露出来。

3. 中国绝不能后退半步对于美国的阴谋，中国千万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我们应理直气壮地表明：任何外部势力对台湾的干预都将被看作是蓄意与中国为敌的不友善的举动，妄想使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要求将不可能得到回应。同时，我们应展开全力方位的、细致务实的外交，晓喻世界各国，使他们理解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考虑和长期战略。既然联合国有关决议已经对“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概念予以确认，那么，中国反对台岛独立的任何举动都符合国际法的。而美国国会所谓“保卫台湾”的叫嚣只应看作是美国人不明事理或者心机险恶的又一供词。

至于南海诸岛，中国有阐明自己立场的权利，即一个国家对有归属争议的地区应该具有提出主权的权利。这个问题虽不容小视，但也并不严重。中国对此已经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重要的是，几方能够坐在一起，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在几方立场暂时无法靠近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未尝不是明智的举措。一个基本前提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美国人在该地区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仅仅因为领土争端就把“中国威胁论”引入以期建立一个反华同盟将会使所有当事国都会付出代价，而渔利的只是美国。

再谈到日美安保体制的意义确定，这似乎不太让人吃惊。

在国权问题上，日本现在确实比较模糊。这与他们在战后的立国政策有关。日本是在美国的扶持和帮助下走出二战的废墟的，几十年来，他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国家意识上都受控于美国，成为一个被

美国所监护的孩子——日本的身份比较尴尬，他们的富豪可以凭借金钱购买美国，但他们在国际上的发言却很少有真正的自己的声音...不要指望日本能真正地亲近中国。他们的立场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鸿沟已越拉越大。

在中国的核试验问题上，日本这次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甚至以冻结对华贷款相威胁。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中国了解日本国民的感情，因为“日本是遭受过原子弹之害的唯一的国家”。

但日本没有理解，中国是二战期间损失最为惨重的亚洲国家；上溯几百年，中国一直是西方列强宰割、掠夺、欺凌的对象？日本有没有理解，中国几乎从未伤害过日本，但日本伤害中国的次数却数不胜数。

日本人有没有看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中国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是最低的。

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他们的较高水平的核战略格局后，马上调转头来要求中国放弃核试验，这仍然是典型的强权政治的做法。

世界上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承诺过：我们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决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所有的在美国做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一旦动作便是大逆不道。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亚洲的疏离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日本必须明白，与美国结成一种专门针对中国的同盟对他们来说是得不偿失的。首先，在所有亚洲国家中，日本的口碑确实不好。二战期间，日本给整个亚洲带来的痛苦可能在一百年后都无法消除殆尽。怎样获取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信任、怎样帮助亚洲崛起，这应设是日本的一个明智、明晰的目标。日本必须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它不应该表现得那么激动和语无伦次。如果日本想表现自己在台湾问题上没有野心，没有旧情未忘，它就应该学习亚洲其他国家，把台湾问题看作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其次，认中国对台湾的态度引伸出“中国威胁论”是没有任何法理根据的。前几年，日本有一位学者一直在鼓吹中国分裂。认为中国的分崩离析将会永久地消除日本的担心，所以，我们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在有意无意间接受那种荒唐、无耻的观点，进而做出再次伤害中国人的举动。不要逆亚洲潮流而动！

至于日本不满足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而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愿望，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事则需要假以时日，谨慎对待。首先日本并不具备独立的外交表现；其次，日本对历史的反省离亚洲各国人民的要求还很远——这一点，日本的作为与德国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日本目前仍不适合担任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因为它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印度或非洲的某一个国家也许比日本更适宜。

4. 撇开一个，敲打另一个为了击溃美国建立“反华俱乐部”的阴谋，中国应该及早行动起来，在建立亚洲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前些日子在曼谷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证明这种设想将是可能的。

我并不主张中国人打这张牌那张牌，“牌”说其实是国际政治中一种短期的、肤浅的行为。我们应从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寻找中国与欧洲，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东盟.....各种利益的连接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现实与前瞻的基础上，不能被眼前的利害所迷惑。应该建立良性的、理解的对话机制。中国应表达这样的观点，把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其后果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其他国家应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和繁荣并不



会因国际政治中一些邪恶势力的压制和阻挠而受到太大损害——这个进程是必然的、现实的。学会平等地对待中国，与中国建立互惠互利的和平伙伴关系总比对抗更有益。

中国在国际关系的一些主要行动中，要有撇开美国的胆识与构想。所谓“撇开美国”，其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要支持一些中小国家为反抗美国的强权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2）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经济合作。如果美国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我们就应把主要精力转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寻求投资、市场及其他贸易合作。应在民众中号召抵制美国货，不着美国电影，不吃美国的小麦和大米。

这里举一个例子，对于摩托罗拉公司来说，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久闻其名了。据说该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年来赚取的利润已超过五十亿美元。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这家广告公司承接了部分摩托罗拉的广告业务。他私下里说，美国人他妈黑，而且心口不一。摩托罗拉是一直许诺要向中国逐步转让他们在通讯业的高新技术的——这一点也是该公司当初与中国合作时的保证之一。但是，时至今日，摩托罗拉向我们转让了什么呢，换句话说，现在他们能让中国人独立制造什么呢？——据说只有他们生产的BP机上的金属链条。

我的这位朋友曾去设在天津的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参观。他说，所有的中国工人下班后，都必须经过一道具有极敏感的探测功能的电子门，以防工人们一不留神顺便带走什么——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是，对于工人中的嫌疑者，他们保留搜身的权力。

美国所标榜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到哪里去啦？（3）北约的东扩和中国所面临的显性或隐性的“反华同盟”，使中俄两国开始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现在，是我们两国从地缘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角度认真探讨一下双方在多种领域合作（包括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的时候了。

（4）在远东地区，通过多种手段消除美国势力的渗透。应使该地区国家懂得，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一个随时会引发灾难的火药桶，美国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回到什么地方去。

日本必须认识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中国人对待日本总是显得那么宽容、宽厚、宽广。在侵华战争时期，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论用何种愤怒的语言描绘都不为过分。

但是，当日本战败后，中国的不少普通老百姓却默默抚养了许多日本人的遗孤，用他们的话说：“孩子是无罪的。”随后，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又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当下的情形是，日本正以中国继续核试验为由，冻结对华日元贷款。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怨报德的国际“范例”，它提供的解释是，日本从来就没有好好反省过自己给大半个亚洲人民带来的深切痛苦；进而我们还能引伸出一个教训，对一个有深重罪责的国家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惩罚和提出正义的要求，这将会使其转眼间又骄横自大起来。在很多时候，中国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向前看”，例如八十年代中期我们邀请了三千名日本青年来中国访问，希望把我们的和平信念通过年轻的一代传达给全日本，传达给未来——我们太善良了。在那三千名日本青年中，我估计真正了解日本侵华真相，真正知道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史实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我认识一位在北京师大学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大西留美，在一次舞会

上，我直言不讳地问她：“你知道日本侵华时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人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刺耳的问题，也许这个提问与当时的环境不太适宜，我们毕竟是在轻柔、美好的音乐中跳舞。果然，她的手一下子从我肩膀上滑了下来，有点神经质地反问：“您是什么意思？”我淡然一笑，继续往下说：“有三十万，南京几成空城。”我已觉出了她的不快，因为她的舞步近乎于应付了。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我们又在另一个场合相遇了，她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在师大的逸夫楼一楼舞厅，她主动邀我跳舞——我又鬼使神差地问道：“你知不知道五十年前日军在南京是怎么干的？”她猛地停顿下来，站在那里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您别忘了，张先生，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言罢，返身坚决地走向了座位。

也许是我太无礼了。

事情早已过去，提这种事没有什么意义。

特别是在舞会上，这更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

我确实忘记第一次对大西留美小姐说过这番话，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我说话的神情。

很多事情表明，敲打日本，在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是重要的。

在美国开了一个可恶的先例之后，日本国内也有些亲台的国会议员鼓噪着要求邀请李登辉访问日本——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们跃跃欲试，也想试探一下中国的承受力，那么它将会承受意想不到的后果。

日本人要把对华日元贷款同其他问题截然分开。要知道，这种贷款在很大的程度上带有一种道义的对过去的补偿成分。

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客座研究学者赤叶恒雄说：“日本现在等着看华盛顿发出的信号，当华盛顿的信号混乱不清时，日本的信号也混乱不清。”这句话道出了日本外交的实质。

事实表明，日本在国际中总是确立不了自己的主张，“美国一打喷嚏日本就感冒。”甚至不惜抛弃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呕心沥血修复的双边关系，实在是缺乏二十一世纪战略眼光的表现。

对于日本来说，把和平仅仅作为一种愿望是无济于事的。鉴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应好好地学习和平，驱除野心。作为一个亚洲的日本，不要心甘情愿地罢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供其驱使，以期分得一杯甜羹。

## 人口问题的药方

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美国及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包括梵蒂冈）一直咬住不放，大加攻击，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借出席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机会，又一次指责中国，认为我国的妇女不能拥有自由地决定要几个孩子及要孩子的间隔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则和人权是紧密相连的。

在北京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来中国访问，他受到了邓小平先生的接见。两人在交谈时布什又一次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予以质疑和不满。邓小平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意见，但如此

一来，中国每年将会多出生至少 2300 万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说确实已不胜负担——你们美国可否增加中国的 2300 万移民配额呢？哪怕一半也行。” 布什当时被这个建议惊呆了，他把手伸进裤兜飞快的掐了一下，用力微笑说：“下面我想谈谈两国的文化交流问题……” 虽然近似于一个幽默，但至少道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或者说，如果不把计划生育当成一项基本的、长期的国策，其后果显然是灾难性的——不仅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指出，在这个问题（中国的人口政策）上，美国无权指责中国，事实上，“人们应该感谢中国的人口政策。” 弗雷泽在批判美国的所作所为时鞭辟入里地剖析道：“……美国相信自己永远正确，反对她的总是错。

美国总是将自己的观点附以道德色彩，经常给反对观点带上非道德标签。” 公理总是存在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弗雷泽在西方世界的仇华声浪中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公诸于世，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应当历史地、理智地、前瞻地来看待和分析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能把“妇人之见”捧作圭臬。

有必要引进“人口异化”这一概念：生育本来是一件神圣美好、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使人类文明得以保存和发展。但是，人口爆炸将使地球变得拥挤不堪，入不敷出——这是人们公知的道理。具体化到中国，庞大的十二亿人口对于资源本不丰富、耕地日趋减少的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实，“人多，干劲大，好办事”是一回事，但请想想二十亿或二十五亿人口的中国将会呈现怎样的局面——饥荒、贫困、乞讨、瘟疫、内争——这些现象难道不会出现吗？生下孩子，但无法使其温饱，不能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样，中国就没有未来可言，世界的未来也将因此而变得黯淡和极度苦闷。到那时，美国每年不得不接受中国的难民恐怕远不止 2300 万这个数目。

在中国的农村及边远地区，还有不少家庭囿于传统心态，信奉“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我们的政府为改变这种现象所做的工作不可谓不多。在多种国际场合，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人民的发展权利”，急速的、无节制的人口增长肯定会使整个民族的发展成为泡影，而且还极有可能使历史倒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西方的那些人权斗士们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如果不是浅薄、偏见、自以为是，就是别有用心。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让美国政府及美国国会来接手中国的全部事务——他们对中国人口将会采取哪些对策？也许一开始他们会发表演讲，他们会告诉每一个家庭，要几个孩产，何时要孩子，这都是你们的权利，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权，请放心大胆地繁衍吧。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根了——所谓站着讲话腰不疼也。

超越具体的现实，大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不根据国民性的历史心理积淀来分析问题并提出正确的有时会痛苦的对策，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至于前一段时间被西方国家渲染得极其可怖的“孤儿院——死亡屋”事件，有证据认为这是一桩针对中国政府的彻头彻尾的阴谋。美国及英国的一些新闻媒介根据一位“来自中国某福利院的医生”的说法，大胆假设，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认真求证，便开动机器、作足文章，并得出了“中国政府故意让那些孤儿在得不到救助的恶劣环境中丧生”的结论。

起码，中国的绝大多数心智正常的人对这种结论会嗤之以鼻。

难道确实实是中国政府灭绝的人性，并且瞒天过海、非常秘密地执行一项成批杀害孤儿的计划，或者说，这也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之一？我们通过探访北京、青岛、兰州、义乌等地的孤儿院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发现，《纽约时报》及英国某电视台等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中国的现实。这种歪曲和诬蔑已经到了十分不要脸的地步，其目的就是想在世人的面前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邪恶的魔鬼的帝国”，并且永久地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

在青岛的一家孤儿院里，钢琴、电子琴及孩子们的各种玩具琳琅满目。两个孩子抢着为我们弹奏钢琴，其他孩子随着歌声咿咿呀呀地唱歌——这样的情景为何英国的电视台没有拍到？兰州的孤儿院是一幢精致的二层楼房。在我们到达时，孩子们正在吃下午点心，水饺、蛋糕、香蕉……每人一份。这种画面，《纽约时报》是绝对不肯慷慨着墨的。

原因只有一点，所谓的西方新闻自由，已经渐渐地被猎奇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偏见的自由及歹毒的仇化心理所充斥。中国首先是邪恶和残暴的——然后再设法证明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一贯的行事方式。

对于这种已经极大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灵的、给一个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伤的谣言，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借鉴一下李光耀的做法，理直气壮地去起诉他们。可以向中国的法庭提起诉讼，也可以向美、英法庭呈诉状。我们不能丧失在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立场的勇气——同时，应该让更多的西方人走进我们的孤儿院，去与我们的孩子交谈。

条件只有一个，别带着恶意进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中国外国概莫能外，都可能存在着渎职或责任心不强的现象，如果因此而造成后果，应就事论事，以个案办理。比如说，如果哪家孤儿院因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对儿童带来伤害和死亡的后果，就不能把屎盆子扣到整个国家头上。前些时候，苏格兰发生的一起成年人持枪打死十几个儿童事件，英国电视台也没有直接把帐算在梅杰政府的头上；美国每年那么多例的持枪杀人案，是否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美国法律允许私人购买枪枝弹药，所以那些死于枪口的无辜者是美国政府故意的有预谋的杀害行为——这样的推理你们愿意让其成立吗？控制人口，是为了使每一个降临于世的生命都具有这样的可能：她不因饥馑而转辗呼号，不因缺少教育而被现代文明所摒弃；她应能在身心的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并对人类的和平与繁荣有所贡献。与此相应，我们倒要劝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让自由女神手上的火炬洞烛一下你们自己国土上的丑陋的、违反人类发展规律的种种现象——自由女神不是一个骂街泼妇——让她换一个姿势，坐下来，闭起眼睛想一想——不要只注意别人眼中的刺，不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

## 独生子女政策是为紧急避难而施行的政策

〔日〕中江要介我在北京任职时期，作为护士参加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女儿到北京后不久即前来看我。

她是自愿去地方医院进行短期工作之前来向我辞行的。那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她再次来看我时无精打采，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受到一种无

法形容的文化冲击。”她从北京乘火车辗转到农村医院。很想赶快进去，但无意中向医院门口的垃圾堆瞥了一眼，突然发现了个死婴。面对这副情景，受到了难以言状的打击。

听说中国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其尸体多被连续数日丢弃在现场附近，完全被当作一种“东西”看待。这在日本是无法想像的。那么，中国是否没有人权呢？在谈论中国的人权时，切勿忘记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有 12 亿多人口。撇开中国拥有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这个事实就无法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

把 12 亿人口统一起来，给他们房屋住，再让他们填饱肚子，这是需要超出想像的政治力量和努力的。即使只例举粮食这一问题，能制定一个将来不让全体人挨饿的体制，也决非易事。而且中国的人口每年都在迅速增加。据推测，其人口到本世纪末有可能远远超出原来预测的 12 亿，轻而易举地达到 13 亿以上。

面对这样的以等比级数增长的人口问题，中国作为一种紧急避难措施而推行的，即是抑制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先恐后地指责中国的这项措施。

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从宗教角度衡量，认为是违反人道的行为而难以接受。确实，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如果生了不能成为劳动力的女孩，就不至报户口或做出弃婴这种凄惨的事来，这也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欧美各国所指责的全部都击中要害。中国有中国的情况。如果控制人口失败了，就很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也就是说，会形成为让一个人活而大家都活不成的事态。因此，必须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加快速度完成现代化，以摆脱贫困。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加之，还存在着生死观的差异。从中国人看来，死尸只不过是一种“物体”。正因为这样，才能在认领人到来之前放置不管或者干了随便弃娶的事来。在这里，隐含着价值观的差异，决不能因这一件事就简单地断定中国无视人权。

（李乃成译）

## 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也是半满的

请记住今天：1996 年 4 月 24 日，当我写下上面这个题目时，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西方一些国家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经投票决定不予审议和表决。投票结果是，27 票对 20 票，另有 6 票弃权。而且，自 1990 年。

同样应该记住，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赞同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只有日本坚定地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而接受美国保护的韩国投了弃权票。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也把自己的手伸向了中国。

因此，这样的表决便具有了象征意义，它预示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人权”一词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同时也说明，在“人权议案”的背后，美国欲盖弥障的“遏制”竭力已经使大多数国家反感透顶。

记得在 1991 年 9 月，英国首相梅杰为签署香港兴建国际机场的协议访华，当他与李鹏总理交谈时，咄咄逼人他说：“访华前，我收到在野党政治家要我在与中国，总理会谈时一定要将人权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信。”李鹏的回答也是精妙和有力的：“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上写道：“千万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达一百余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历史所安排的讽刺几乎使人哭笑不得。自二战结束的 1945 年上溯一百年，中国被那么多西方国家蚕食、掠夺、凌辱。用我们历史书上通常的说法：丧权辱国。一百余年间，他们无视、践踏中国人民的人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堪称世界罕见。而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的毒贩子，为了使其在中国倾销鸦片的“权利”不受侵犯，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样的人权记录，难道是时间所能消蚀的吗？在上海外滩的黄埔公园门口，那一块“狗与华人不能入内”的木牌，已然把华人驱进了禽兽的行列，而且其地位尚不如狗——这种人权记录你们当时又是如何审议的呢？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何时由一个（一群）大规模的人权践踏者成长为如今这样正气凛然的人权卫道士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真能成佛倒也罢了，但中国人心中总存留着种种疑问。

西方所提出的人权是不是一种臭哄哄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以美国为例，在海湾战争中，它与西方其他国家出动多国部队，把伊拉克从科威特的领土上赶了出去，并且使战败的伊拉克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不允许它恢复重新发动战争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它却操纵一些国家迟迟不解除对伊拉克的各种物资的禁运。我们经常能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伊拉克的普通老百姓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受到严峻的挑战。由此引出一个命题：如果美国人承认人权超越一切，人权具有普遍性，它就应该对伊拉克的老百姓心生慈悲，使他们免于饥谨、疾病和失学的磨难，使他们不至成为路倒。但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却显示了它的坚定和冷酷，因为萨达姆政府违背了美国的规则——更确切他说，这个曾在两伊战争中接受了大量美援的国家却离经叛道，触犯了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于是就变得不可饶恕了——必须受到最彻底的惩罚——直至另一个亲美国的政府上台。在此期间，人权问题为轻，美国利益为重。

同样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当与会国决定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野蛮轰炸造成数以百计的平民伤亡时，美国却反对这一决定。投票结果是 52 票对 1 票。

也就是说，也只有美国决定容忍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的屠杀——可能还是在内心支持的。

这也难怪，美国的犹太人利益集团不喜欢美国政府去附合其他国家。于是，政治选择代替了对人权的尊重，而且还是一种肮脏的政治选择。

所以说，中国政府提出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就绝不是一种辩解了。

如果克林顿愿意，同时如果我也愿意，咱们可以一起到哥伦比亚电视台 60 分钟节目中去就此问题对谈一下，我想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先生，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轰炸使平民伤亡惨重，而您居然让您的代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52 届年会上逆所有国家的意志反对谴责这种公然剥夺无辜百姓人身权利的暴行，对照你们在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上的态度，

是否可以这样说，你们的人权概念有一个双重标准？”我相信克林顿接下来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嘛……得分开来说……”“分开来说”，意思很明确，就两个标准。

我们并不讳言，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尽善尽美。政府之所以提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含义包括这样的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及中国的现实情状，中国的人权保障的迫切任务是争取让所有人都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及我们的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竭其所能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逐步富强、康健，这难道不是改善人权状况的具体体现吗？超越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不怀善意地横加指责，拒绝“平等对话”，以祖师爷的身份对中国予以教导、训斥，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孤立中国，把中国打入“另册”。

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是美国国会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每次必提的。但是在新近出笼的1995“据可靠消息”之类的让人“宁可信其有”的词句，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既攻击中国政府仍然没有使西藏人民的在活水平得以提高，又反诬在拉萨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大规模建设破坏了那里的独特文化——其言其行只能说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的一位前文化部副部长，一个知名的老艺术家。当他以娴熟的英语、张弛有度、出神入化的演艺在美国影片《小活佛》里担任一个角色时，预示着他同时也对“某种信念”产生了疏离。在这部恶意的反华影片中，多次把西藏称作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难道我们的这位艺人不知道吗？是片酬的不能抗拒的诱惑，还是对角色的钟情痴迷？是他的一种痛苦的妥协，还是他已化人角色，浑然不知身是客？这也就不惮是他本人的悲哀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插进来的话题。

有句谚语说：只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是半满的，运用到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指责上，这句话在某种范畴内是恰当的。他们只对我们的不足盯住不放，却视而不见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更为可憎的是，通过夸大事实，歪曲事件真相，乃至造谣诬蔑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开展“人权”的冷战，就不仅仅是认识上的偏差了。

其实，不久以前的那次关于中国孤儿院的报道就因为策划上的漏洞而使恰好对此多少有些了解的西方普通公民愤慨异常。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就有很多人动员起来为中国孤儿院对孤儿的照顾进行辩护，大量的支持中国的传真信件把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占用了好几天。一位叫博尔丁的美国妇女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到中国儿童福利院收养孤儿的）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的情况。”更为恶毒的是，西方媒介还使他们捏造与剪贴的情节与中国政府联系起来，描绘出一个中国政府蓄意谋害孤儿的令人发指的画面。这种拙劣、道德败坏、前所未闻的诬陷即便是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要为之瞠目结舌！

如果这位诬陷者到中国来，我想可能会被不计其数的愤怒的群众用石块和棍子砸死——先彻底地剥夺他的人权。

**美许多收养我孤儿的家庭驳斥一份攻击我孤儿院工作的报告**

美国收养了中国孤儿的父母们已动员起来为北京对待它所收养的孤儿的做法进行辩护，这种做法是对目前有人对中国提出的指控作出的出入意料反应。目前有人指控中国孤儿院中虐待孤儿致死和玩忽职守。

自 1995 年以来，大约有 5000 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中国孤儿。这些家庭中有许许多多家庭已开始利用电台的节目、传真线路、报纸的评论版和互联网来反驳亚洲人权观察组织 1 月份发表的一份极有争议的报告。

这份 331 页的报告主要是根据中国的一名医生的证言和文件资料写成的。这名医生曾经在上海的一所孤儿院工作过。

这份报告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并要求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方针。中国政府已经否认了这些指控。

据在纽约的一位女发言人说，一个由收养孤儿的父母组成的全国收养组织担心，针对这些指控，中国将会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因此敦促它在美国的 35 个分支机构同决策者进行接触，“并且让他们知道，这些指控是片面的。”他们认为这些指控是故意歪曲而采取的耸人听闻的手法。

纽约的一名心理学家和中国两名孤儿的养母艾琳·克罗格在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的感觉是，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克罗格和这个组织——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其他人说，他们所参观的中国孤儿院中的照管人是按良心办事的，对他们所照顾的孤儿的福利是极为关心的。他们说，这样一项故意的和极其严重的玩忽职守的政策是难以置信的。

华盛顿的一位物理学家查克·博尔丁说，许许多多家庭响应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号召，向中国政府监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部门发出了传真信件，表示支持。

博尔丁说，大量的传真信件占用了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好几天，博尔丁说，他不得不发出第二封电子邮件叫这些养父母们停止发传真信件。

波士顿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尚蒂·弗赖伊——她 1994 年收养了一个中国婴儿——说，养父母们反应如此强烈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份报告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恰恰会伤害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儿童。

她说，如果中国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养父母们可以提供费用和捐助，帮助改进孤儿院的设施，那么吃苦的将是中国孤儿。

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新英格兰分支机构主席弗赖伊说：“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孤儿院中的状况可以改善，我们正在对此作出努力。但是我个人看到的根本不是报告中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们说，北京看来正在用有限的资金来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成千上万儿童——大多数是女孩。

博尔丁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情况。”

## 暧昧的日本



这个题目源自 199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斯德哥尔摩皇家文学院接受颁奖时演讲的题目为《暧昧的日的我》。大江说：“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ambiguity)，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

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

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我至今还在冥思苦想大江以上叙述中的一句话：“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这个论断本身就极其暧昧。试想一下，一个把画家和国人能撕裂开来的“暧昧”，何以会成为一个暴力延伸的因子呢？或许是日本这个奇特、神秘的民族为了挣脱内心的束缚和孤立而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手段吧。按照大江健三郎的说法，一个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日本，因为“理解的滞后”而仍然置于一种悬空状态。在这里，“理解”被日本当作了“自我救赎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能够照亮民族灵魂的灯盏。令作家苦恼的是，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填平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鸿沟，与西方世界又产生了机体上的排异现象。这是一个美丽又痛苦、傲慢又渴求抚慰的民族。

至今，我仍对二战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一说不予认同。其实，盟国对日本的胜利并不彻底，而在当时，中国对此认识也不像美国那样深邃和长远。美国的“新绥靖主义”使得日本得以保留皇权——其理由是，这是日本的象征和人民的灵魂依托。但结果却使战争胜利的成果变得黯淡无光。把日本保护起来并纳入自己的战后体制，是美国确立自己霸主地位的最成功的一招棋。这样，在远东地区（共产主义势力迅猛发展的地域），美国建立了远离自己本土的力图抗衡和消解共产主义影响的堡垒。作为在二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却部分地丧失了选择惩罚方式和对战后日本的走向提出有效建议的权利。

1972 正常化的呼声又一次使当局焦灼不安。一方面，他们对美国这种在关键时候自行其是，而且没有向日本透露一丝风声的“无情无义”的举动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恼火；另外，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地缘政治上的隔绝与真空又让日本的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已。在这种“形势比人急”的情况下，田中角荣终于排除干扰，来北京谋求邦交正常化。

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能说明日本当时的“暧昧”心理，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员国的席位而必须驱逐台湾这一问题上，日本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反，但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以后，他们却时不我待地到北京来与周恩来碰杯。这种婢女地位与自主意识的顶撞而呈现出来的古怪、无惜的举止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国的尴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们往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对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议案之后，日本国内仍有不少政治家对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将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抛弃蒋介石从道义上讲会使日本蒙羞。因为正是蒋介石先生在战后“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几百万被俘将士顺利地回到了日本而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并且也是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一些权利，才得以使日本既保留

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国那样被分占的局面。蒋总统中正阁下对日本可算是恩重如山。

于是，在田中访问中国之前，日本内阁却先派出一名叫椎名的特使前往台北去解释日本方面的意图。但椎名这个角色显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负担的。解释什么？怎么解释？或者是道歉加谢罪。这如同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司空见惯的种种情景：另外的爱情对现存的婚姻产生了严厉的挑战，但离异又被旧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连的利益所困扰，而且还将面临某种（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诉——如何使自己偿愿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失分、在利益上蒙受太多的损失，这个问题要处理好确实不大容易。椎名在赴台之前也对自己的使命懵懵懂懂：“就这么一张机票让我去？让我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给他布置任务，连“相机行事”这种话都没有授于他。由此可见日本当时的局面是多么混乱，政客们似乎全都对现实和后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断力。

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厢情愿，即要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又想保持与台湾在外交上“以往的状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婚姻观。周恩来知道日本这一想法后，在人民大会堂以少有的愤怒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想干什么？”一个当头棒喝又使日本人救火似地赶到北京来解释。其情其状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既好笑又为其感到可悲。

我们可以说，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这毕竟是一个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前辈的宽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怀为之感叹。日本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们看到了，而且也承认了，但是，他们在感激之余为了释放自己的负罪感，却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中国之所以如此宽宥日本，是出于他们“大中华”思想的谋略考虑，而且还隐含着跨世纪的野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与你纠缠于历史，是因为中国要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现实环境，以谋日后称王称霸。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在其种程度上也是可悲的。

1. 如果中国多初不放弃对日索赔……我们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考虑，把日本国内的好战者与日本国民分开。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面向未来的考虑。我记得周恩来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赔偿战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但是，做恶的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赞同周恩来（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呀。我们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度，赔偿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两国能世代友好下去，不要再发生以前那种伤害我们的事了；况且，如果真的使战争赔款成为日本人民的巨大负担，那我们这笔钱时心里不是也不好受吗？为了中日友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这种朴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维，很遗憾却没有得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

如果我们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呢？或者说，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结算呢？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中国人的狭隘和出尔反尔，因为现在有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对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换得日本对我们真正友好起来。换一种说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的，自救性的，他们对中国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时常挂在嘴

边的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所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炽烈的感情。

其实，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战争罪行给受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其中国为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因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程度最深而被裁定的获得的赔偿最多。但是赔偿份额的确定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

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仍与西方有很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

问题往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越来越明晰。不错，作恶的是军国主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集体幻觉，军国主义又怎能那么顺利地开动战争机器呢？“暧昧的过程”使日本去侵略别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论调。

而中国人把军国主义和国民分开只是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摆脱战败和耻辱带给整个民族的那种绝望和悲愤，能够重塑国家形象，并通过邦交正常化使两国携手在亚洲开辟一个新纪元。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宽容之树却结出了酸涩、变异的果实。

我们是否弄懂了这一点：当我们不愿把负担放到日本人民头上时，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空前的苦难却也没有了补偿的希望，我们的前辈的滴血的心灵却无法寻求哪怕是象征性的安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赶走侵略者这一点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填了。

我们如果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将比现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所欠的债务予以讨回，既天经地义又能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一个更为容易进入的点。

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今天在日本对华贷款一事上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们不放弃也不迫索（但是要计算利息），日本还能动辄以冻结这笔贷款来要挟中国吗？他们不可能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对华贷款是具有某种补偿性质的——这一点双方都心知肚明——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要求中国放弃核试验等同起来考虑就是一种卑劣行径，是一种在国际政治中最令人讨厌的行为。

尽管以上的一切都是假设，在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权利的时候，我们只能保留这种“假设”的权利了。

2. 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自 1978 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双方度过了一段回想起来非常温馨的时期。

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出于对下个世纪两国也能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考虑，亲自倡议中日青年加深交流，其高潮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千日本青年来到中国与中国青年联欢。

由此可见，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放眼世界未来和确定中国的轨迹。三千青年来中国，其形式可能有点矫情，但决没有虚情假意。

当时，我尚在上海华东师大做老师。在日本青年即将到达上海之前，我们像迎接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重大节日那样，打扫校园，采拮鲜花，并且学习速成日语，以便见面时能用简单的日语与人家交谈，使其不至拘谨、不适。学校的话剧团在赶排主题为日中友好的话剧，当时我的学生宋强还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曾在侵华战争中强奸中国妇女、但战后却一直致力中日友好的日本

老人。他演得特别投入，台下经常听到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但从此以后当他走在校园里时，所有女生都远远绕开他走，令其十分苦恼。操场上的草皮也被精心修剪，栏杆油漆一新——因为将要在哪里举行一个中日青年大联欢晚会……一切都如过眼烟云！

一切的一切！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付出的激情已经消解在冰冷的现实中。日本一次次地把背朝向了中国。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人权进行过大规模蹂躏和剥夺的国家，有什么资格来奢谈人权，来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众所周知，近年来，日本国内的不少政要总是逮住时机就翻侵略亚洲的案。比如，教科书上的所谓“进入中国”，你们难道是坐民航客机来的吗？比如，在一张图片上，一个日本士兵用刺刀挑起一个中国婴儿举向空中——从没有听到日本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啊，真残忍，真羞耻啊。”听到的反而是：“南京大屠杀？有三十万人吗？这是不是为了仇日而采取的宣传伎俩？”更有甚者，他们居然还想在《纽约时报》上发布广告，要为自己洗清冤屈。

虽然日本政府迫于亚洲各国的压力而如是再三地使一些“胡说八道”的高官引咎辞职。

但是，让我们往深处想一想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前赴后继者？这显然是一幕戏，一幕早已排演好了的戏。也许现在主宰日本那些政治家心灵的信念就是：过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那么人也就能改变——更确切地说——改写过去的历史。

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总之，日本军队到过中国。进入的方式可以“暧昧”一点。

比如，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就到底杀了多少人来回纠缠，反正死者不会开口说话，也没有资料确切、细致的记载。而且，时间越推移对日本越有利。

比如，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人对于亡灵的正常的追思方式。如果中国就此说三道四就冒犯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这就是日本对于中国人民的人权的态度。

联系到在第六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日本追随美国支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采取行动”，就更显得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一点，作为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对待战争的反省就显得比日本要深刻和真诚得多。

一份资料说，战后多年后，德国共付出几十亿马克来主动赔偿那些被他们国家侵略和带来痛苦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的赔偿更为巨大。这不失为减轻德国人灵魂债务的方法之一。

在德国，如果为法西斯招魂，法律将予以严惩。

当勃兰特总理访问波兰时，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向二战中牺牲的波兰人的在天之灵下跪。

这一举动并没有使他的信誉遭损，反而使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没有一个日本首相到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过，没有一个日本政治家到中国来，用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方式来为我们死去的同胞祈祷过。

但他们可以在靖国神社，对着战犯的牌位下跪——因为，那是些“为国捐躯”的人。

所以，由此得出结论，就是日本的人权观其实也是“暧昧”的。他们

并不真正尊重人权。他们尊重的只是西方的价值观，只是西方的对华战略。正像他们当初要与中国邦交正常化那样，因为美国人已经走在了前面，不然，日本决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即使在实现正常化时，日本人的考虑也是很实际很有“眼光”的：中国将是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如果按六亿人口算，每人买一双日本产的鞋子，那就是六亿双哪！

即使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日本对于西方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两样的。一位赴美留学人员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比出口到中国的在质量上要好了。这位叫张广群（《第三只眼睛看美国》）的留学生在书中说：日本是一流的产品输出欧美，二流的产品自己使用，三流产品销往中国。丰田公司的“Camery”及日产公司的“Maxima”这两种型号的车是专在欧美出售的。而北京满大街跑的“皇冠”、“蓝鸟”、“公爵”之类的车则是专门为中国生产的。

由此可见，从汽车的销售策略上，我们可以一窥日本这个民族的奇怪的文化心理，亦能映照出日本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遵循的不成文的原则：面向欧美，背朝亚洲。而且，日本对自身的“处身性”也极其暧昧和苦恼——无论亚洲还是欧美，都没有正直地对它予以认同。

3. 日本应该韬光养晦不可否认，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与伦比的奇迹。

对于整个亚洲来说，日本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亚洲现阶段飞速发展的经济，日本也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

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当人们提起日本时，除了对它的国土有所确认外，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日本似乎还有许多致命的结构性缺陷。

二战以后，日本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它首先被作为一处对抗共产主义火种的工具而被美国加以利用了。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及二战后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洞——就是说，这种过渡是突兀的、被外来势力强行附加的。在美国的精心挟持和喂养调教之下，日本长成了一个奇怪的形态：它有着肥硕的身体，但脑袋很小；日本的面容上是那种力图把桀傲不驯和狂燥深深隐藏起来的谦恭。可以说，虽然战后五十年日本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拥有了足以傲世的高新技术和外汇储备。但是，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依然是痛苦的和不被明确的理念所支撑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日本人几乎个个都是工作狂，有很多人甚至恳求老板能让其留下来加班，但下班后，日本男人却很少有直接回家的，他们总是想到酒馆去大喝一气，对着卡拉OK吼几嗓子，然后才神智迷糊地往家走。

在按受西化时，日本并没有把西方人文精神的精髓与自身的血液融汇在一起——他们只接受了表面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民族如果被一个邪恶的诱因所激发，必然还会干出使世界骇然的事情来。

说得率直一点，日本想在亚洲坐正龙头老大的位置而且拓展生存空间之梦想从来就没有彻底湮灭过。现在，端倪的显露足以让我们警惕起来。

比如，现在日本国内有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已经在为二战中自己的行为而小声辩护：“我们当初只是为了让亚洲从西方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而实现共存共荣才这么做的，只是出于一种无法推脱的义务上的考虑。”我们只能把这种话语理解为“造势”，它和“进入中国”等语汇一样，都是日本殚精竭虑仔细选择的。所以，为什么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韩国）

对日本的言论这么敏感，因为，他们已经嗅到了其中的危险气味。

联系到台湾问题上日本的态度，还有中国的核试验问题，日美新安保体系的确立，以及日本国内蠢蠢欲动的改宪论调——美其名曰“在国际事务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亚洲国家内心的想法是：谁起作用都行，日本一起作用我们就忐忑不安。

日本的民间政策机构世界和平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份《日本综合战略大纲》的报告。

报告开宗明义他说，宪法并非不灭的大典，认国家利益考虑为正确的修订根据。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日本前首相、被称为“超级鹰派”，的中曾根康弘。

他竭力赞同在冷战后把中国作为“第一大假想敌”进行牵制和制订日本今后的亚洲战略：拉拢东盟国家，与越南进行防卫对话，同朝鲜改善关系。投入 25 万亿日元的巨大预算，推进中期防卫计划——而且这一切都要在不刺激中国的情况下开展，也就是说，悄悄地、温和而坚决地推行。

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定义，其最关键的内容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长远战略目标，为了使这个战略目标中针对中国的想法能得以顺利贯彻，克林顿在东京假惺惺对桥本说：现在是美国和日本共同领导世界的时候了。并再交重申支持日本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座位。

这无疑对日本打了一针强心针。

并且使日本又进入新幻想时代。

其实，美国谁也不能领导，它只能领导它自己。

日本谁也不能领导，有时候连它自己都领导不了。

所以说，韬光养晦对于日本才是最重要的。韬光养晦，第一是要自省，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正确、深刻地予以认识；自省还包含着，对自己这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策予以检讨。如果仍将自己视为美国监护下的孩子，日本的立国基础就总有崩溃的那一天，第二，韬光养晦有利于日本培养自己的德行。人要有德行才能立于世，国家也要具备德行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日本恰恰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具体到前面所说的“三流产品”，具体到日本的一些很有名气的公司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欺诈及以次充好的行为（北京的消费者对“松下”及“索尼”的控告就是一例），具体到日本对中国的以怨报德——这些表现难道不需要好好修炼吗？第三，作为无条件投降的日本而且其认罪态度远比不上德国这一事实，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敏感心理，日本在修宪、防卫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及跟美国结盟的限度上应慎之又慎，千万别一看气候适宜，马上就想跳将出来充当角色——甚至要充当领导角色，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富者心态。李光耀就曾经说过，他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在亚洲行使武力。

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4. 中国不应同意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当日本在世界各地鞠躬打揖，希望其他国家支持他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同时，中国应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的想法不太成熟，我们不支持日本获得这个席位。

联合国是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由盟国倡议成立的。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虽然在战后五十年期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把“放弃根据国权发动的战争”写进了宪法。但是，要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种要

求显然对联合国的初始构想提出了道义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并非说，将永远把日本排除在将会对世界发挥重大影响的国家之外。针对日本国内对二战的认识远未得到澄清，而且，诸多事实表明，日本并没有真正确立一个有保障的和平体制，现在成为常任理事国不合时宜。

日本在世界上不具有代表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日本却没有这样的资格。单单作为一个经济巨人显然不是能做为常任理事国的充足理由。

作为日本本身来说，正如中江要介所言：是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换言之，日本的国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里。因为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亚洲各国与它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填平，且还有加深的趋势，所以说，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孤立是一桩事实。一个唯唯诺诺，亦步亦趋跟着美国的国家如果成为常任理事国，还不如干脆给美国两个席位得了。

如果谈代表性。亚洲的印度、印尼，非洲大陆有好几个国家显然都能胜过日本。

甚至德国在道义上和人文理念上都比日本更有资格。

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应被充分考虑进去。如果日本真心诚意地想为了促进亚洲的腾飞而作出贡献，起码的一点是必须做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尖端技术合作及投资、经济援助上不附加条件地帮助邻国。不能对欧美无原则的崇拜，对亚洲邻国却当作穷亲戚而给脸色看，前倨而后恭，肯定不会赢得包括东西方各国的尊重。

所以，日本还是暂时放弃对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争取，留在外围踏踏实实地多做点有益的事情为好。

## 太平洋地区的伙伴

[美]查尔斯·克劳特哈默 9 是叶利钦，克林顿对他倍加称赞，并访问了莫斯科；另一个是克林顿。对他来说，充当世界领导人正是他今年秋天在电视上边行竞选宣传的素材。甚至派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到中东促使以色列与真主党停战的次要访问也是为了支持竞选，即佩雷斯的竞选。除非佩雷斯能对黎巴嫩目前的战事拿出某种解决办法，否则他可能在下个月的以色列选举中败北。

动机归动机，而在对外政策中最终起作用的是结果。甚至克林顿时外政策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必定会承认，在这次世界之行的其中一站。克林顿取得了重大成功。

在东京，他使日本第一次同意在和平时期把军需品转给美军，并研究在发生危机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现在，这看来可能像是外交方面平淡无奇的事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向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向中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日本终于准备考虑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了。

这是重要的新闻。

我们不是为了享有日本完美的音像器材而征服日本并按照我们的想法

重建日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在二战以前便显示出某种——我们可以这样说——军事才能。我们想控制并利对这种才能，把它放在我们一边。

50 安宁写入了宪法，但 50 年后的今天，光有安宁是不够的。

日本是强大的，中国正蒸蒸日上，而美国虽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已经累了，特别是单独行动很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我们几乎是单枪匹马。我们的确与一些较小的盟国一起战斗，但不是与日本。

不能再这样了。随着冷战的胜利，美国人已厌倦承受监督世界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美国在军事上有能力单独对付亚洲的任何侵略者，但在心理上它没有这种能力。如果日本在发生冲突时采取旁观态度——例如台湾——那么将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将很难获得渡过难关所需的国内支持。

这就是 4 月 18 日的东京联合宣言如此重要的原因。其重要性当然不会对中国没有影响。

不言而喻，美日的重新结盟就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立即提出了抗议。实际上，中国的强烈抗议再次证明，日本与美国开展积极的军事合作的历史性转变意义重大。

克林顿的转变不像日本的转变那样有历史意义，但同样受人欢迎。3 年来，政府一直把日本看作经济掠夺者和实际的敌人，现在终于弄明白了。日本是朋友，如果说该地区存在潜在敌人的话，那是中国。

政府是花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在高度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下，经济增长率达两位数，这并未引起政府的多少担心。它 1994 年在南中国海争夺岛屿（其他 5 个国家对这些岛屿提出了主权要求）的行动也未引起多少担心。它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口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技术的行动也是如此。

引起政府担心的似乎是中国上个月对台湾明目张胆的军事威胁。实弹军事演习、导弹发射和海军对部分地区的封锁很难使美国不加重重视。挨了当头一棒以后，政府看来已经认识到消极地与中国打交道以及与日本对抗的政策造成了多大危害。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转变。

当然，克林顿与日本人交好可能仅仅是选举年的一种战术为了在东京有一个良好的、没有摩擦的接受宣传媒体拍照的机会。把主题从经济转为地缘战略仅仅是竞选策略吗？这只有克林顿知道。我们必须观望，看看如果克林顿得以连任的话是否会保持这种转变。

如果他保持这种转变，克林顿在莫斯科的第三次首脑会晤及克里斯托弗第 21 次访问大马士革都不会载入史册，但克林顿的东京之行会作为一个重大的开端载入史册。

新的对日本政策分清了敌友。它开始把日本作为与美国一起监督太平洋地区的伙伴——虽然是小伙伴，但最终成了伙伴。最重要的是，它为迎接 21 世纪的重大挑战——遏制中国——奠定了基础。

（摘自美《华盛顿邮报》）

## 焚烧好莱坞



与政治上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蛮横一样，以巨大投入制作、包装出来的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所谓“美国文化”，正对全球各地实施着侵略。充斥着极度暴力场面、性犯罪的好莱坞电影，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观感，侵略的结果不仅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更使它们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受到残酷的绞杀。

1.“天生杀人狂”与“救救孩子”如果说好莱坞电影曾以歌颂人性的善良、博爱、自由、平等而赢得世界的尊重的话，那么现今充斥着色情、暴力、犯罪等所谓社会问题、探讨人性扭曲的电影在对人们的感官进行猛烈的刺激之后。留给人们的无疑只剩下躁动、恐慌和心灵的迷失了。

1995 在其首府银川市，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对好莱坞影片的热爱远远超过了香港电影和国产电影。且不说当时正在放映《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等好莱坞大片的电影院门前人满为患，就是一些镭射（当时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正激烈地进行着，镭射放映还没有取缔）电影厅里也挤得满满当当。因好友的盛邀，笔者有幸观看了一部叫做《天生杀人狂》的美国影片。这部影片的导演正是赫赫有名、专门拍社会问题让美国人发抖的奥利佛·斯通。这部被誉为“二十世纪暴力经典”的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则又真实的故事：一个生活在底层的青年，不能忍受其女友的父亲对女友的性骚扰，与女友一道杀害了她的全家之后，开始了逃亡。逃亡中唯一的乐趣就是杀人，仿佛两人的精神内部空虚、迷惘到只有杀人才能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存在似的。杀的人越多，他们就变得越出名，越受人敬重和崇拜。一些美国青年甚至像 NBA 电视镜头里说“Ilovethisgame”一样大喊：“IloveXXXandXX”。而警察也疯狂地说：“抓住他俩可以使我一夜成名。”当他们被抓住后，美国人像突然失去了什么似的，街头上开始出现支持他俩的横幅，他们的肖像也出现在大街小巷和崇拜者的衬衫上。一位极欲成名的电视记者决定采访他们并最终进入了监狱。那一刻全美国的人都涌到电视机前，随着被采访者像总统竞选般煽动性语言的传播，人们变得疯狂起来，砸汽车、烧商店，美国一夜之间演变成暴力的现场。而镜头前杀人狂此时抓住了机会，劫持了记者，开始了监狱逃亡。

精彩的一幕出现了，随着目睹杀人次数的增多，电视记者突然掉转镜头对准自己大声喊道：“我受不了啦，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杀人啦。”并且成功地帮助杀人者逃离了监狱。在一片树林里，杀人犯杀死了心甘情愿被他们杀死的记者。唯一的理由是：这才是真正的崇拜。

由于影片大量动用了蒙太奇、黑白与彩色互换、MTV 的手法，对视觉极具冲击力。看完后我已是一身大汗。朋友突然问我：“有没有杀人的感觉？”当晚半夜，我冷不丁地想起这句话时，再也睡不着了。

也许斯通揭示美国暴力犯罪的社会问题的用意在于警示美国，但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其他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否能理解并接受影片的全部涵义呢？美国人在经济衰退、暴力、性犯罪、同性恋、吸毒等社会问题的重压下的人性迷失，是否能启迪别国的人民呢？回答这些问题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正如充斥着摩天大楼、金钱、凶杀、性犯罪的美国电影超出了一位中国少年的判断能力一样。

受商业利益驱使的好莱坞，正越来越多地制造着类似的影片，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着不同肤色的人们尤其是少年。在美国面临着越来越多暴力犯罪（不知好莱坞的类似影片是否对美国的犯罪真正起到警示作用，又是否催

化了一部分人的犯罪意识)的时候,或许正有一个黄皮肤的少年浑身躁动地走出影院,拿起一块砖头砸向街边的橱窗,极快且又满足地消失在夜色中。

一位朋友曾讥笑我的这种担忧,他的理由是:好莱坞不光是这类影片,事实上好莱坞是以《乱世佳人》、《阿甘正传》等类影片确立并维护自己世界电影艺术中心的地位的。对这一点我承认。但我同样反问我的朋友:占大多数的是哪类影片,好莱坞每年制作的上千部影片中、典雅、挚爱、温馨,直面人性善良的电影又有几部?就拿去年引起的十部大片来说,有七部是好莱坞的,除了一部动画片《狮子王》和一部《阿甘正传》以外,其余的全是充满暴力、凶杀、抢劫的动作片。这些宣扬所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为了取得理想的票房收入,无不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制造出大量残酷的凶杀和爆炸场面来冲击人们的视觉。我相信我是个看电影不会去犯罪的人。而一个受到教育还不多、涉世未深的少年呢,也许他不会去犯罪,但电影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丑恶人性的张扬对他有多坏的影响就很难说了。

写至此,笔者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救救孩子!”<sup>2</sup>。“焚烧好莱坞”——法国人为愤怒好莱坞无疑已掌握了电影如何吸引人的机密,于是以更大的财力投入了制作,并把它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以期收回更多的利润。好莱坞究竟以此获得了多大利益不得而知,但电影里凶杀、性犯罪等镜头的增多和越来越大肆的渲染似乎多少透出这个机密的所在,而这个机密使好莱坞获得的收益也可以从好莱坞巨星的收入中窥见一斑:“魔鬼”阿诺德·史瓦辛格的年收入约为2300万美元;布鲁斯·威利《纽约大劫案》一片的片酬为1500万美元,史泰龙在《二十二世纪的执法者》一片中的收入是1300万美元,黛咪·摩儿因《脱衣舞娘》得到了1900万美元;因《与狼共舞》一举成名的凯文·科斯特纳去年离婚时分给前妻的财产就高达一个多亿……难怪世界各地的大小影星(包括中国)对好莱坞趋之若鹜。

让人惊羨!

让人惊羨之余回过头来。

让人惊羨之余回过头来发现,中国电影在自家的电影院里人头稀落的情景。

而就在我们引进十部大片。国人津津乐道,纷纷涌向影院。掏出钱包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侧,法国人行动了起来。

首先是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桌上,法国人向美国发难了。唯一的理由就是好莱坞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不负责任地进行“文化侵略”,使法国电影工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与此同步的法国本土,法国电影界团结欧洲的同仁,在艺术之都巴黎的一个清晨,由著名影星德帕蒂约亲自点燃,烧毁了近百部好莱坞电影拷贝,其中大部分都是充斥着暴力、色情、凶杀、吸毒等镜头的商业影片。其中一位资深影人说:“这不仅仅是法国和欧洲的愤怒!”整个活动在一种缓慢、无声、有序而又悲壮的氛围中结束。

给我讲述这段故事的是在法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位朋友,他说法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自尊心让他极为震动,因为平日里以自由、散漫著称的法国人给他的印象是那么不关心国家。但就是同样的法国,几年前决定取消城市街道上的英语标牌,以维护法语的尊严。

的确,作为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法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特别是法国电影,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其浪漫、质朴、博爱、自由、

平等的艺术魅力为弘扬人性、构筑文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电影成为艺术注入了更多的内涵，并因此在世界电影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

而今，充斥着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好莱坞电影以暴力、色情为手段来占据电影市场，使以追求影片艺术内涵和质量而著称的法国人深恶痛绝。他们痛恨国民的脆弱，痛恨好莱坞的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他们燃烧起来的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所要宣示和捍卫的是电影艺术的尊严、法国的尊严、欧洲的尊严、文化的尊严、人性的尊严！

3. 从好莱坞看美国闲来去朋友家做客，朋友七岁的儿子聪明可爱至极。他将我送他的变形金刚很迅速地改成一辆卡车，加入到地上摆满了各种枪械玩具组成的战斗部队当中。玩得兴起，便又偷偷拿他母亲的眉笔在脸上左右上下划了几道，手端冲锋枪冲到阵地中间，嘴里边“突突”地响，边大叫：“我是魔鬼！”他模仿的大概就是好莱坞的动作明星施瓦辛格。暴力作为个人英雄主义的衬托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而个人英雄主义又反过来以更强的暴力来制暴。这就是好莱坞暴力电影一个最普通的表现方式。如果说60年代左右出现的美国西部影片单骑独行的游侠成为千百万青年人崇拜和模仿的英雄，表达了伸张正义、抗击强暴、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精神实质的话，80年代以后出现的“城市英雄”形象就怎么也与“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联系不上了。这些单打独斗，关键时刻不惜违反法律以暴制暴的英雄，在好莱坞极尽包装之能事的特技效果里，以每走一步就杀一个人的方式取悦着观众，除了给人的感官带来冲击外，唯一说明美国社会的，就是这个强调个人的国家，现实中极其缺少挺身而出的英雄。

其实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一个警察一年内不见得能向罪犯开几枪，弄不好哪颗子弹打错了，就一辈子脱不了干系。

个人英雄主义的出现固然与好莱坞追求商业利益有关，但实质上与美国文化追求个性解放、自我崇拜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由于自我的过分释放，人与人之间极度冷漠、相互间不负责任、缺少安慰与照顾，对公众事务、社会生活麻木不仁。人们对“英雄”的渴望只是等待“英雄”来拯救社会，而不是自己去做英雄。

有一个事例可以窥见美国人对“锥幕英雄”崇拜的实质：《环球文萃》前不久登载的有关消息说，美国动作巨星、银幕英雄施瓦辛格的传记出版时，一个美国女孩极其兴奋地对记者说：“我就是喜欢看他杀人。”是的，我就是喜爱看他杀人！

是的，喜欢看杀人！

是的，喜欢杀人！

是的杀人我料想这个女孩如果真有机会目睹一场真的凶杀场景时，会很冷静且极有兴趣地旁观的。

我有些害怕美国人了。

伴随着个人英雄主义出现的。就是美国文化里腐朽的享乐原则。由于严重的债务危机、家庭破裂、种族歧视、暴力犯罪、性解放、吸毒等社会问题对美国大陆的浸透，美国人充满了极度的悲观、迷惘和自甘堕落的情绪。而这些又被好莱坞作为取得利益的手段大肆地渲染到银幕上。这些所谓的艺术化的社会问题影片或许是好莱坞的编导们启示社会的手段，但高片酬、大投入很难具有这样的说服力，追逐票房的影片公司所关注的也最终不是影片的社会效果。在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里，钱，开始是，而且最终也是人们追

逐的目标。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在这个社会及他们的电影里肆意横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美国影片总是交待给我们这样一个假象：美国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社会。在这里你不需要太勤奋的工作，也不需要刻意的选择和奋斗。说不定哪一天，幸运之神光临你的头顶，你就实现了你想要的一切。虽然以前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实际上美国人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追求自我的结果使他们不停地变换工作，而不是努力地在某个行业、某项领域内刻苦敬业的拼搏下去。

好逸恶劳是这个国度里最弥漫的气息。而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团结、刻苦、敬业、艰苦、努力地奋斗下去，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的文化所固有的、最优秀的部分。我们不想也不应该使它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侵略”中消逝殆尽。

4. 对于好莱坞我还是要做一个“伪道者”也许有人说我过于认真了。有点刚刚改革开放时“谈性色变”的味道。

是的，我是认真的。因为我不认真的话我就承受不了我自己。

因为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是整日地沉迷于好莱坞营造出的世界里。我大约看过了二百余部好莱坞电影。因为对电影的无知我翻阅了大量评介电影的文章和杂志，每天在书籍和电影里来回地求证，求证的结果使我确认，所看的影片几乎均为所谓的经典名片（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经由台湾和香港到达中国大陆的盗版渠道十分畅通。对此香港人的解释是：不是美国人自己盗出来的我们哪有饭吃。我们最头痛不是如何盗出来而是如何运进大陆。）

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影上片越靠近现在，里面的暴力镜头越多。这些经典影片中少有暴力和色情的只占10%左右。

我倒是可以有理性地在看电影的时候命定它是“艺术”的。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来命定。实际上很多的影片让人实在无法把它与艺术二字联系起来，那的确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暴力或色情的场面。最可怕的就是那种所谓艺术化了的、夸大的场面。一部有关越战的片子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镜头：一把刀架在一个美国士兵的脖子上，因为他勇敢地不透露一点消息，刀开始向上运动，还是慢镜头，然后有力而缓慢地向下砍——去，人头缓缓地与脖颈分开，鲜血冲天而起，殷红了整个银幕，这时编导及时地打出片名。

而二十岁以下的中年青年、青少年呢？他们会理智地、努力地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光怪陆离的美国电影吗？实际上，美国文化及生活方式侵害的决不是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也不会一夜之间就让中国人改变。而恰恰最可怕的，就是侵害了在未来将要承担中国建设的一代或二代。

话说回来，到今天我都无法肯定美国人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有一点确证无疑的是，美国人至少是不负责的。

以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不负责的方式来对全球的未来不负责任。这更让人觉得可怕。

去年圣诞，美国推出了一部以地铁为主的暴力影片，据说观者如潮。而就在第二天，纽约的地铁里发生了与电影里所描绘的一模一样的暴力案件。

美国国内舆论大哗，有些负责的议员（很难得）就此在议会上展开了较为激烈的呼吁，建议好莱坞在拍这类影片时手下留情。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不敢说时下的美国青年，正是从畅销书、电视、电影里学会如何更隐蔽地进行犯罪的，但至少可以说这些东西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作用。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缘起于美国社会的功利主义。追逐短暂的、眼前的利益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最明显的特征。

就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人曾提出独资在中国生产、发行音像制品的要求，这一点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当然拒绝。

别人不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在这一点上，我是一个不折不扣、毫不犹豫的“伪道者”，任何一个还没觉醒、对此不屑一顾的人，也可以用最标准的国语说我“伪道学”。我会很欣然的接受：“是的，我伪道。不过你敢把你家孩子放在我这儿一个月吗？我有二百多部美国影片让他一次看个够。”5. 十部大片的引进与中国影人的责任去年的十部大片，着实在大陆掀起了热潮，热潮涌动之际，冷落的一角仍然是国产影片。中国影人可以列出诸如投入少、电影发行体制等一系列客观而正确的因素来评介这种现象，但翻遍报刊也难有文字表露他们对自身的深刻剖析。

也许在他们的内心正进行着更为深刻的思索。

在所谓诸多客观因素里有两种说法让笔者不屑并有些愤愤然。

一说是电影发行体制问题，说还没有真正与市场接轨。在这一点正是让国人讨厌的美国人打来一记响亮的耳光：分帐。一下子就进入了市场并赚了许多的钱。只要你拍的片子确实好，就不怕找不到进入市场的方式。

二说是投入的问题。好莱坞影片投入大、制作精良等等。“给我那么多钱，我也能拍出那样的电影。”这句看似充满豪气的话其实充满了自卑和推诿。就像一个穷人说：“给我那样的机会，我也能赚那么多的钱。”好莱坞电影投入大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同样投入不大的影片拥有了极佳的票房。比如《狮子王》是3400多万美元，票房收入1亿多美元。3400万在美国，着实算不上什么大投入。还有只投入了900万元的《黑色追辑令》，票房也是1亿多。第6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影片《远离拉斯维加斯》只有400万美元的投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改革开放后，中国影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他们的刻苦努力下，中国电影也正一步步地走向世界。这是很令国人欣慰和敬重的事。但欣慰和敬重之余，国人又有些不满了：怎么老把镜头对准过去？我不敢说这是因为编导想讨好外国人的胃口；也不敢说剖析过去对现今的中国启迪不大；更不敢说编导对现今变革的中国人心态无从把握。

但有一点是确凿的，中国影人很是掌握了一整套把黄土地、破棉衣拍得很美的方法，与其相称的是，中国文化里糟粕的东西被描绘得更加丑恶，甚至近乎邪恶了。

中国影人提供出来的是，我们曾经这样，我们不应该这样；而不是我们现在应该怎样。

而这正是国人现今极其需要的。

不论好莱坞的电影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精华的还是糟粕的，它都给至少是现今的美国人提供了他们生存中所需要的。比如试图唤醒美国精神中勇敢、拼搏的个人英雄主义（唤醒没唤醒姑且不论），比如生活方式，比如生存环境，甚至极端的颓废倾向。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差距。

当然，中国影人们对此正做着百倍的努力，但努力的还不够。离现实最近的也就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其中最近的镜头离现在也有十几年了。

如果说十部大片的引进已把国人重新拉回了影院的话，那么国人正等待着极具现实震撼力的国产影片。

如果说十部大片再交引进后，国人又只看这十部大片，那说明不是国人爱看十部大片，而是国产影片确实没法看。不要继续有滋有味地在过去的窑洞里去刻意发掘什么新东西（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重新看见了旧东西）。怀旧是容易衰老的；只爱怀旧，则是病态的。

更不要抱怨十部大片抢占了中国的电影市场。毕竟才十部，还没有泛滥。在感官刺激只是冲击国人的视觉，还没有侵袭到他们的思想之前，你还来得及用中国文化优秀的部分、现今中国最需要的东西来拉回国人。要及时对现今中国的思考交流给国人，让国人去比较、去思考。

从这一点而言，中国影人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弘扬中国文化，抵抗文化绞杀。

## 致美国国会的报告

（仿卡夫卡）尊敬的议员女士、议员先生们：承蒙各位抬爱，给我这样一个曾经的中国猴子提供了一次发言的机会。我忍不住想搔一下脚心来表达我的喜悦和荣幸啦。

虽然由于实验的结果我已退去所有的体毛（也不能说所有，还有较为隐秘的几小块），并露出了与诸位一样白皙的皮肤，但有些劣根性诸如有事没事地搔痒（这是我后来才渐渐明白的，并至今为之深深地羞愧）还没有彻底改掉。这需要时间，我会尽全力缩短这个时间，并且希望诸位能够给有关的机构再增加点费用，加速把我彻底变成白人的实验——最好能是日元。怎么说呢，有些东西我还不能明白。反正有一天我听见了实验室里的克林顿先生（之所以能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是那儿的头儿）悄悄给家里打电话，让把日元存起来，说是比美元坚挺。千万别给中国的人民币，虽然在将来的日子它可能比日元更好，只是我忌讳我的食物和药物是用中国钱买来的。

开始就提到钱有点太急功近利了。但请原谅。我在学会你们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我比我的同类更加辛苦。我特别注意把握你们的兴趣点。这使我受益非浅。比如今天的盛会。

作为一只曾经的（请注意：曾经的）中国猴子能来到这个国度，是因为据说我在那儿受到了迫害；或者说即将受到某种我说不清楚的——实话说以我目前学会的思维状态所不能理解的——迫害。当时，由于几个伙伴偷吃了我们第二天才决定去吃的一片树林里的果子，我们开会决定批评他们，并且进一步商量如何解决随着群体的增大而果实日见稀少的问题。

我的发言无疑多了一些，招致了一些颇有威望的长辈的训斥。现在想想，那时的我是多么愚蠢呵。自以为整日在森林里攀援，随手摘吃那些未经

加工的果实，就是莫大的幸事了。真该感谢那位瘦高个子的蛇头，把我偷偷装在一个箱子里，在熬过几天的黑暗之后，到达了你们的国度。

说实话，开始的一段时间很不适应。无人跟我交谈倒是次要的，因为我从我的父辈身上承接下来了忍受孤独的天性。这种天性据说已形成了好几万年。几万年有多长我弄不清楚，但从日后的刻苦学习中我得知，比白人开着船来到诸位先生脚下的这块土地的时间长许许多多。

猴子的劣根性之一是好动。呆在笼子里的感觉被愚昧的我认为是一种伤害。我极度委屈。试着从每个铁栅的缝隙里向外钻。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徒劳，却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这个人类国度的自由是由无数栅栏来体现的，你可以从每个栅栏看见外面的广阔空间，而栅栏的宽度正好掌握在既让你过不去，又不便你陷入绝望的绝妙尺寸。于是每天我都从栅栏的缝隙里向外望着，间或把手和脚伸到外面体会一下自由。渐渐地我也懒得把脚伸出去了，开始觉得小的空间也逐渐变得大了。由于看惯了自由的空间，我也就对自由失去了兴趣，或者说，呆在笼子里就是我所理解和应得的自由，其实呆在这样的空间里我很安全，别的什么东西不是也同样进不来吗？我可以不必担心食物被别的同类抢去。我也改变了一见食物就抱着它缩在一角的愚猴自扰的习惯，还大可以把它放在那儿慢慢享用。

提到食物，诸位先生们，说实话从一开始的无法下咽到现在的大口吞食，我是历经了非常艰苦的磨炼过程的。我的无知的味觉一开始十分抵抗，抵抗的结果是好几天没有人送食物过来。但愚蠢的韧性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就在人们第二次送来食物时，我仍然拒绝这些东西。能咽一点儿是第四次，抑或第六次（我记不清了）才发生的，孱弱的身体使我的味觉彻底消失。我终于可以吃进食物了，这使我十分高兴。等我开始大口吞食这些现在尝起来有滋有味的东西时，我为自己开始的愚蠢的抵抗感到羞愧。

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种食物在各地，包括我离开的那个群落，遭到全面地拒绝。有消息说：我原来的群落终于找到了一种能让果树迅速生长的方式。这使一直爱喝果汁而对吃果实的方式极其厌烦的诸位先生十分震惊。决定停止供应果树生长所需的原料。但奇怪的是那儿的果树仍然生长而且越来越茂盛；并且也不让先生们继续采摘他们的果实。而就在此时，我们——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词，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变成（白）人，但在我的内心已把你们看成是你们的一员了——生产果汁的机械所需的燃料的价格被另一群落给抬高了。真使人气愤！人类是多么伟大呵！诸位先生的朋友可真多，一夜之间就把那儿给围了，那儿可是什么也不生长的地方，也好，饿一饿他们，有时候就得来一点硬的。甚至，怎么说呢，我还没有完全学会你们的语言，找不到词儿，按我过去所呆的地方的说法就是：霸道一点，也没有什么。否则没得果汁喝岂不是十分痛苦。听说朋儿现在已饿得说不出话来了。做得好，再饿一下，看他们是否像我一样改变了过来。

请原谅我用琐碎的事情干扰诸位的清听。话说回来，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无疑变得十分懒惰了，甚至连思考一下都不可能。人们也任由我这样发展下去。我之所以改变以致于今天有机会参加这个盛会，得益于一个叫彼得·吴的同志，他来实验室做检查时我们认识了。原来我的笼子他以前呆过。他现在在一个马戏团里混得很不错。这是个热爱马戏的地方，他说。

语气让我十分羡慕。他来做检查，是因为人们把他与一只南美猴子交配后，生下的猴子没有生育能力。属于不良杂交。这是这个地方的社会问题，

他说。语气还是让我羡慕。你应该学得聪明点，他告诫我；否则，你永远是一只猴子，中国猴子。

他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用了很长时间思考怎样才能不是一只猴子，尤其是中国猴子。

这对于我是多么艰难的一个问题呵。要知道突破自身的迷障是多么困难。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能慢慢触及本质的思维方向，那就是首先要看起来不像猴子。但这又有一个问题。猴子是什么样的？这儿没有水。更没有同伴。我开始讨厌自己的愚蠢，讨厌自己作为猴子的无知。

事情的解决完全缘于一次偶然。一次百思不得其解的当儿我猛抓自己的毛发，一片一片的毛发脱落了下来。这引起实验室里所有人的注意，他们纷纷围拢过来。我看着自己毛发脱落的地方：那儿是一片白皙的皮肤。这与围在我周围这些人的皮肤是多么相象呵。可以想见我内心的喜悦。我拼命地抓呀抓呀。但有一些地方仍不肯脱落。在抓毛发的过程中突然一丝光芒划过我的脑际：对呀，我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人呀！

于是，诸位先生可以想见，我开始了漫长的、改变自己为人的过程。开始我仅仅是模仿人的举止、还有那么点不自信，认为自己无论是智力还是知识都不足以为人。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担忧完全是一种浅薄的表现。这个国度的人判断事物的标准并非那么深奥。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以及转眼之间又改变自己的看法的现实，让我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个人的好恶就是最好的原则。这对于一个猴子来说不难做到，甚至可以说天生就会。而就在此时，我身上的变化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决定把我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研究：由于多年的离群独居，我还能不能像一只猴子那样生活，或者说同类能否接受现在的我。这个决定使我欣喜若狂，我试着展露压抑了许久的一些东西，比如竭斯底里的大叫，呲牙咧嘴地向另一个同类示威，把粪便扔到它的食物里，当众与一只西亚猴子做爱同时又假装迫不得已地被一只东亚母猴所勾引，痛打那些不让我保护的傻瓜等等。最让我气恼的就是那只东亚猴子，她先是勾引我然后又不让我得手，每每在我气恼的时候又总是撒着娇希望得到我的保护并给我一些她偷来的食物。有那么一两次我甚至发现她偷的正是我的食物，但保护欲带来的满足使我总是原谅了她。

这样展露的结果使我深信自己的行为已越来越靠近了人的行为，或者说，其实已基本上是人的行为了。耳濡目染人类社会的一些优良习性以及来自人类社会的优越感——哪怕是我隔着栅栏与人相处——使我极其蔑视眼前这样愚昧、肮脏的同类。我甚至学会了这样一种本领：如果我发现，或者说我认为，某些聚在一起猴可能对我不利，又不好与它们直接对抗时，我就采取各种手段，比如挑唆，恰当地传播一些谣言之类的，将它们分化，然后毒打一只看起来好对付的猴子，以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当被挑唆的一群相互之间殴打起来的时候，我也不免做做和事佬。当然，这种和事佬可不能真做，还得留些小矛盾。让它们不会再像以前那么相好。至于猴王嘛，那个老东西，我只不过不愿取代之，有它反而好办事一些，反正它得听我的，否则，它吃不到精美的食物岂不是很难受。

总之，放入猴群的结果使我无意识中间锻炼了领导者的能力，也更使我向人类告诉了更大的一步。由于我的迥异表现，我荣幸地参加了另一次实验，与你们人类社会的一群看起来有某种缺陷的人，比如，天生不会说话的啦，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我要竞选，我要竞选”的啦，呆在一个别致的地方，每



天都吃同一种东西，按照人的指令在各种仪器里钻来钻去，我最讨厌的是，人们动不动就把一个尖尖的东西刺进我的皮肤，抽取我身上的液体，这让我十分惊慌，有时还拿一个亮亮的东西照照我的眼睛，使一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但为了改变为人我还是忍受了下来。我的忍受没有白费，当身上最后一根毛脱离了皮肤后我陷入了极大的喜悦，我拼命地大叫，一种模糊的冲动中我捕捉到了那个唠唠叨叨的人的惊恐的目光。于是我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要竞选，我要竞选。”虽然我没有理解它的确切涵义，但我还是大叫着，拼命地大叫着。

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诸位先生们，我内心的激动你们可想而知。当我站在这儿，回头想想过去的岁月。一切都已变成了成功之后的美好回忆。变而为人是那么地漫长又是那么地简单。我庆幸自己的皮肤是白的，而不是他妈的黑的或者是黄的。我庆幸……怎么说呢，我激动得无以言表了，请允许我用下面的一回问话表达我无法抑制的激动和对诸位的崇高敬意：你们能否告诉我，你们也是这么变过来的吧？！

谢谢！

热爱你们的乔治·克林顿·M

## 美国的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

“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是医学上的一个名词。似乎是指那种对人好时万般柔情，极尽呵护之能事，而一旦翻脸又变得凶残冷酷、犹如禽兽的异常表现。据说，无罪开释的辛普森就犯的这种病。辛普森曾在过去的岁月里，无数次毒打老婆及他所爱过又要离他而去的女人。近日离他而去的芭比莉小姐慑于这样的威胁，终日不敢离家人半步。

“自恋性”这样的症状发生在现代美国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美国文化中追求自我解放、崇尚自我创造的因子，因几个世纪的动作和积淀，连同这个国家在经济、军事上的强大，一起膨胀起来。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战略表象上的成功和由此而来的失落，使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更加导向没有根基的虚幻；导致了美国人的过分崇拜意识。个人价值异乎寻常的高于社会价值。不受家庭束缚、免遭其它群体羁绊、不屈从于他人愿望、完全自立自主的个人被认为拥有最大限度的创造力。事业上的成功被片面地理解为完全是个人的动作。内心的善良和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得到了固执的维护和隐匿而不是开释。

他们确信别人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总是单独的。就说明了美国人这种虚幻的自我崇拜导致的道德上的孤立。在这儿，美德成为个人的魅力，与孤立、反社会的英雄合为一体，英雄也因为彻底拒绝加入人群，而反衬了自我道德的高尚。追求个性的独一无二，以致使人永远无法与社会属同。精神深处的孤独迫使他们更深入地走向自我的内核并把它随意地张扬出来。这时的张扬并非渴求理解而是释放和渲泄，于是你便看到了残缺的个人制造了一种由暴力、性犯罪、同性恋、吸毒与政治、摇滚乐、环境问题、金钱至上、功利原则同构的美国社会。

“自恋性”与美国文化多年的膨胀，排斥、阉割、同化弱势的异质文化

所形成的严重的西方中心论不无关系。表现在国家肌体上就是所谓的制度优越论。中国人最有体会的论调就是现代化即西化。与西方文化中心论相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经济、政治实力，认为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西方物质文明才是现代化的标志。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一观念，在自身传统文化受到摧残之后，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而亚洲的崛起，古老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物质文明碰撞产生并逐渐形成的亚洲现代经济文化模式，无疑对于这种“自恋性”是个很好的打击。

“自恋”的美国当然一时难以接受。正如他们自己人奈斯比特所说的：“这种接受犹如当初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一样意义深远。”他所说的“意义深远”中有哪些“意义”我不太清楚（也可能他不敢正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东方文明的复兴以及由此焕发出的凝聚了几千年的能量，对于一向自认优越的美国人乃至他们文化中浓重的“自恋情绪”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是必然而且强大的。

不接受并不意味着不予理睬，接受也并不表明是真诚的握手合作，“自恋”的美国为了能够保证自己“自恋”下去，便开始频频插手亚洲事务，让亚洲国家相互制肘，干涉这儿的国家内政，企图以此来延缓甚至消亡亚洲的崛起。中国必然首先成为他们的目标。

于是这又暴露出美国文化中与“自恋”相承的“极端利己主义”特性。“利己主义”本身就不好，更何况是“极端”的。如果说“利己主义”是指尽一切可能改变一切因素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话，还能让人接受；而“极端利己主义”则含有某种要伤害别人利益的偏执和疯狂了。美国在插手世界事务时，有个叫得很响的借口就是维护“全球利益”。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句话应该是“全球的美国的利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维护的正是这个“全球的美国的利益”。动不动拿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维护的并不是所谓的人权，还是这个“全球的美国的利益”。

“自恋性极端利己主义”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院来治疗。

出现在一个国家，一个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身上，便意味着威胁和潜在的疯狂，便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侵略。

这是世人应该警惕的。包括美国人本身。在这种病症还没有发作之前，加以抵制、诱导和改变，而不是一味的屈服和顺从。顺从只能助长它的气焰。

所幸的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还要迈出第二步、第三步；所幸的是美国的西方盟友，也正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提醒着美国；所幸的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正越来越紧密地联合起来，分化、抵抗霸权主义所造成的威胁和伤害。最近联合国人权会议在否决以美国为首提出的反华决议案之后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就很能说明问题。

## 其次伐兵：我看中央情报局

现代史上一位政治家曾告诫暴怒的民众：“你们应当避免无谓的恐

惧”。民众的恐惧——演变为抗拒，是酿造群众自发革命的最好酵母。

半个世纪多来，中央情报局及前身战略情报局一直是世界其他政治势力恐惧的源泉。

中央情报局是美帝国主义除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以外，实践其世界阴谋的又一大法宝。

美国的康生——麦卡锡就曾对蓬勃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产生过同样的恐惧。

殊不知反美势力的反应强烈程度远甚于“非美委员会”。尽管随着时代的演进，各国的专政机关变得比较文明，对付亲美分子和中央情报局代理人的执法队不再那么血腥。

但这并不说明：在今后的某一天。我们不会对罪恶的中央情报局采用更为严厉的执法。

中央情报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渗透从来没有停顿过。

里根当政时期，对华的大规模间谍活动，可谓是达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高潮。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东亚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听上去像“嗟尔胡来”），专门负责向中国派遣特务和在中国招募极少数败类充当特务的工作。搜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

与内战时期提供大炮、轰炸机、美式坦克、手提机关枪来屠杀我们的年代相比，中央情报局现今的手段儒雅而丰富：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海上划艇。

在“嗟尔胡来”氏的妙手之下。美国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系统的情报网络。

然而我们强大的国家专政机构从来不是吃素的。

被中央情报局内部称赞为“上帝赐给我们的高手”的罗承勋于1983年被宣判10年徒刑，他用出卖情报换来的黑钱购置的伦敦住宅让老鼠去享用了。

1986被我警方逮捕。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严正对待伯恩斯的非法行为的同时，也表现了最大的仁慈和厚道。按伯恩斯的所做所为，换了别的某些国家，当局会毫不犹豫地以“间谍罪”将其处死的。“别跟我来劲，我们碾死你这个窃贼像捏死一个蚂蚁！”我猜军事法庭上的易卜拉欣·优素福上尉会这样回答山姆“二叔”的大哭大嚷。

连美国人都感到有些窘。所以到了一个月后，另一名不争气的中央情报局间谍卢顺序（好名字：落网按顺序来）被我司法当局判处二十年徒刑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干脆失口否认此事与他们有关。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罪恶行径——以上事件只能称得上是皮毛。很早以前，世界政治家就尖锐地指出：中央情报局与其说是一个庞大的特工组织，毋宁说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一个推行美国不可告人政治图谋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刺探功能为一体的“地下国务院”。

当美国50年代出兵朝鲜，西柏林一群文化人与之遥招呼应，“文化自由联盟”随之诞生。该联盟在以后的10年内在35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创办杂志几十种，举行若干次较有世界影响的大型艺术节。这个联盟的立场很鲜明：每逢类似于波兰的波茨南事件这样发生在东方国家的异动，这个组织便立即作出反应，或抗议，或声援，嗨，好热闹。

是谁出钱资助这些文化人？《纽约时报》揭开了这个秘密：正是中央

情报局在秘密资助这个世界性的组织。

——《纽约时报》把内幕曝光之日，恰是美国卷入越战不得人心之时，中央情报局的到处插手已经臭不可闻，拿了中央情报局钱得以在全世界开展活动的文化自由同盟，在秘密资助之事暴露后，不得不宣布解散。

文化自由同盟的丑闻，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中央情报局的渗透方式是绝顶聪明的。如果说世界特工史上曾有一场“革命”的话，那么，“革命”的荣耀非中情局莫属。

中央情报局通过五花八门的形式掩盖它在世界各国无孔不入的存在。切莫以为，只有无声手枪、窃听器和微型胶卷才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手段，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央情报局已经将“非情报工作”——即思想的、形态的攻势放上了战略的首位。

从这一点上，我们再来反思历史上反美国家清洗政敌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什么动辄将政敌称之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代理人”的心态了。

就连八十年代在我国大学校园中出现的“上帝之子”丑闻，中央情报局也插足其中。

指导中国学生的性活动——这是中情局的“希望工程”系列之一。

四川民间俗语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中央情报局忙活着呢。对艺术的襄助，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业务之一。福特基金会是以资助先锋艺术而闻名于世的，然而有两点需要澄清的是：其一，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很大部分来自于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赞助人——中情局；其二，受惠于该基金会的先锋艺术家主要是美国人，如行动派画家勃洛克。

中情局把钱给勃洛克，成功地达到了标榜美国的公关目的。通过无政治色彩的名人效应向它国意识深处渗透——中情局可谓用心良苦矣。

直接插手吴弘达事件以及策划《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出笼，是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形象系列诋毁行动的一部分。

吴弘达的一本书《劳改营：中国的古拉格》在美国的出版，源于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他所任职的“劳改基金会”，就是中情局的密切组织之一。吴为美英两大媒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炮制有关中国监狱的恶性性专题片，在中国大陆的刺探计划均由中央情报局特工直接参予制定。

所谓对中国的“人权攻势”，就是这样一场特色彩色极其浓厚的对华战争。

“一九九四年，美国的蓝登书屋（RandomHouse）和台湾地区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者对这部书做了许多宣传，甚至用夸张的语调进行吹嘘，说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本书问世后，不只毛泽东个人传记，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写作，都将受到重大的影响”——恨不得干脆说“都将被彻底改写”。

且不说作者李志绥的“轻薄为文”透射出的令人厌恶的不诚实和自吹自擂，以李志绥的个人经历和能力，是绝对写不出这样一本书的。实则是：若干名背景晦暗的捉刀者在李的身份笼罩下，参予了这本书从立意、编排到细节的整个“包装”，诸如像这样的话：“我要将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申诉给公众”。知情者议论道：像这样的意识及文风，

根本不是李志绥所为，是长期从事反共的台湾军队宣传工作者直接捉刀的产物。

中央情报局为寻求这样的宣传品出笼，曾做过近十年的物色，并在确立目标后，通过它的松散雇佣人员直接进入这个写作班子，并且在这本书的发行宣传至始至终充当主要角色。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世界战略最险恶部分的承揽者，尽管它的趋势是：以表面的非特工的形式加紧向美国体外渗透。

它意欲在精神上暗杀世界的独立潮流，扼杀非美国家的强盛之路。

够了。够了。我想起了某人曾一言命中的：“当你以为你正在和美国人民进行一场民间交流时，中央情报局就在你身边；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味时，殊不知你已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我要对美国喊出：走着瞧，不要太张狂了——将来我们会向你们的阴谋战略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

孙子云：“上等伐谋，其次伐兵”。——实现对他国安全的屠戮，美国越来越依赖象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利器”。在智利暗杀阿连德，搞臭多米尼加民主政府等等，中央情报局起了美国政府通过公开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当一个国家在公理上无法战胜别人时，“其次伐兵”式的血腥污秽战略必将是首选方式。美国在公理上的孱弱。与阴谋诡计的发达，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智谋必将走向末日。

## 方励之夫妇的流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

〔日〕中江要介美国外交标榜为正义而拔刀相助，但在背地里，却常常隐藏着死乞白赖、自私自利的战略方针。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后，不久发生的方励之夫妇流亡事件，难道不也是美国政府的阴谋吗？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以“中国的萨哈罗夫”闻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与其夫人北京市人民代表李淑娴是在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天，即1989年6月5日一起跑到驻北京的美使馆恳求人身保护，而约在一年后的1990年6月25日，经美中两国外交交涉，结果方励之夫妇暂去英国。方励之自1986年站在民主化运动的最前列以来，成了谋求民主化的人们的象征性人物。如从其来龙去脉来说，天安门事件后该夫妇对中国的民主化感到绝望，并感到自身难保而逃到美国的大使馆，这并不奇怪。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一般人推测，从方励之非常适时的行动看，是否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此事？可以作为证据的，就是1989年2月26日所发生的事。这一天，访华的美国布什总统在北京举行了招待晚宴。被邀请的有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主宾是国家主席杨尚昆。

方励之夫妇也被邀请去参加晚宴，这激怒了中国政府，在门口即拦阻了该夫妇进入宴会厅。

对美国政府当时的做法，副总理、原外交部长吴学谦日后对访华的日本要人是这样评论的：“本想遵循和平原则来发展对美关系，但决不能容忍美国这种赤裸裸的干涉内政的行为。例如，布什总统访华时，唯独没把邀请方励之夫妇的宴会请柬交给中国方面，而直接交给了本人，偷偷地招待主宾

不欢迎的人是有失礼貌的。无法想象这是对待朋友的做法！”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反对的方励之，一句招呼都不打就让他坐到如此重要的涉外宴会席上，这是万分失礼的。此事本身就意味着干涉内政。美国政府决不可能不了解方励之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根本不是由于疏忽而在这样重要的外交场合犯了错误。很明显，这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故意制造的动作。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方励之即在事前察觉到戒严之事，立刻逃到美国大使馆，也是时间上的巧合。尽管其他民主运动头目都被捕了，他却捷足先登美国大使馆的门槛，请求庇护。

这只能令人想到，是美国在引路。方励之事件的发生，既使被怀疑是为日后的尊重人权外交正当化而导演的一出闹剧，也不无道理。把尊重人权视为高于一切的布什的美国，对所谓无视人权、使站在民主化运动最前列的学者感到生命危险的中国，是不能放过的。因此，收容了方励之夫妇，并对中国施行经济制裁，迫使其民主化。这难道不是为运筹此事而导演的闹剧吗？这种推测决非虚构和妄想。围绕事件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后来美国政府的做法，让人自然得到这样的认识。

不过，默许方励之夫妇出国的中国也是难对付的。中国政府让布什得了分，可能是将来要他偿还这笔债。不久即以此为借口探寻援助的线索，中国默许的背后难道没有隐藏着这样的考虑吗？这就是所说的外交。如果日本只追求表面现象而悠然自得，那么会给日本的将来带来黑暗。

中国会不会出现像叶利钦那样的人物。会不会给方励之夫妇完全平反，这无人得知。

这是将来的问题。

（李乃成译）

## 新孤立主义会使美国成为“垮掉的国家”

1. 庸俗新闻与新闻自由 1994 投向了那一场场激烈精彩的绿茵大战。但是有一天，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把镜头从球场调转开了。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警方正在追捕辛普森，直升机、警车、高速公路……所有情景如同我们司空见惯的好莱坞电影画面——但又不是电影，而是新闻。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黑人公民实现美国梦的一个象征物辛普森因杀人嫌疑而受到指控并企图逃跑——于是，足球变得极其不重要了。全美国的心脏都掉到了喉咙口，真是精彩悬乎刺激。

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的新闻自由。首先，他们有一个形象的关于新闻的比喻：人咬狗才是新闻。就是说，前所未闻的事情的发生才是新闻。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美国的新闻现状，再联系它的文化背景与国家意识，我们就能发现，新闻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在美国正被越来越严重的庸俗新闻观所取代。

庸俗新闻观的几大特征是：失去道义评判能力及社会责任感，追逐丑闻并且千方百计做大，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万事万物以及自愿孤立于世界以外，更严重的是，在功利主义驱动下不惜造假。

闻名全美的邮包炸弹杀人犯（现已被抓获）给《纽约时报》等写信，

并责令这些报刊把自己的论点全部刊登——他们居然照做不爽，其依据自然也是新闻自由。但这种自由委实可怕——因为它其实极不自由，它是受到恐吓后才如此这般的。同时，从《纽约时报》做出这种决定的那一瞬间开始，它所必须具有的公义、信德已经全部崩溃。美国到处谴责恐怖主义和不受胁的誓言受到了无情的嘲笑。不管如何辩解，《纽约时报》从那一刻起便贴上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标签：恐怖主义分子的工具。

追逐新闻并使其成为更大的丑闻，这种例子在美国俯拾皆是。性丑闻、暴力丑闻、经济丑闻——新闻监督也是一个很神圣的词，但在美国很多记者心目中，其出发点已经绝对不是新闻监督了——而是销量、收视率、金钱、职位和声名。所以，他们才会大炒麦当娜，才会如临其境地报道抢劫杀人案，如此等等。社会责任感是需要时才会被提起的词。

另外一方面，他们确信自己的（或者是美国的）价值观至高无上。于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地方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妄加评判，并且以讹传讹。指手划脚。比如，当他们在诅咒中国压制人权时，其实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未到过中国；当他们吹捧达赖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时，却不知道达赖在西藏时接收的贡品有许多就是人皮和人骨做的。

还是那个《纽约时报》，当它对恐怖主义者表示倾从和俯首时，一转脸却对中国露出了牙齿，振振有辞地自问自答：我们为什么要遏制中国！

为什么？就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神秘人物写信勒令你：不许放屈，否则……美国民众中的极端功利主义正在毁掉这个国家，而美国新闻界的推波助澜只能使这个国家垮得更快。

七岁的美国少女杰西卡与其说是在一项意料之外的飞行事故中丧生，还不如干脆说是被所谓的从她父母身上体现的“美国精神”及美国新闻界合伙谋杀的。当杰西卡准备驾驶飞机遨游长空并力图打破年龄上的飞行世界纪录时，美国的各类媒介轰轰烈烈地为其造势，三大广播电视网更是倾力上阵，把美国人的生活硬是推进某种仪式之中。但是，他们全然忘却了这样的规则：只有年满 16 岁的人才能取得飞行证，所以，从法律上讲，这次震惊全美的飞行其实是一种非法行动。事后，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有关人士才站出来说，从技术上讲，杰西卡只是一名乘客；所谓“创造世界纪录”是一个伪造的概念，从航空的角度讲它毫无效力。

但悲剧毕竟发生了。七岁的杰西卡，在她临飞之前我们看到了她如花般的笑脸，随后我们又从电视画面上目睹了飞机折翅扑向大地的惨状。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杰西卡的母亲哈瑟韦女士在事件发生后却异常镇定地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在快乐中死去”。

不可能！一个七岁的孩子不可能在快乐中死去。一个没有责任能力的孩子，被一种虚拟的“国家精神”（再通过媒体急剧放大）为着私利谋杀了！这算不算对人权的粗暴剥夺？——只是在形式上遮掩了许多东西。

如果杰西卡成功，如果杰西卡能顺利飞抵华盛顿并且和克林顿总统共进晚餐——这将成为令人振奋的消息——最直接的结果是电视收视率上升，报纸销量上升。媒体巨头们有福了。

如果杰西卡不成功——像现实演示的这样，收视率与报纸销量也会大幅度上升。媒体巨头们同样有福了。

2.“朕即世界”？……世界要镇你！

这第二个题目的由头还得从 1994 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始说起。当数以

亿计的球迷把目光投向绿茵场时，一个权威民意调查网对东道国的受众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60% 的美国成年人根本不知道本土正在进行着一场人类盛典——世界杯足球赛！美国人对一种世界性运动的排斥或云蔑视由此可见。他们由来已久的期冀影响国际足联的“改革”意图——将足球赛分解为六局，以便球员休息间隙插播广告——令全世界为之晒笑。然而，他们推销其“聪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认真——不得不令我们认真看待美国人的心态：由于丧失了对世界的感知而涌发的“朕即世界”的自大感。

宋强曾断言：美国大学生对本土基本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普遍逊于中国的高中生。

我同意他的见解，即以上素质对于当今人类竞赛绝非无用或次要的。“新孤立主义”首先不是源于国家政策——尽管我们从克林顿的当选看到了美国世界义务的敛势；“新孤立主义”首先发源于美国人的心灵。

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它在人类之林中多么先进强大，只要他失掉探索世界的兴趣，只要他无视知识贫乏的危机，他注定要在当今竞争的世界里倍尝落伍的滋味。

令那些朝顶峰大国冲刺的国家感到窃喜的是：美国这只兔子仍在“头号超级大国”的荫凉下瞌睡着。由于失去了探索的原动力，它的人民把精力渲泄在童心式的把玩之中。

美国从成年人到孩童的游戏都在昭显著人类末日的征兆。

他们是如此排斥攀援上升的快感，以致于他们不能接受足球的小比平和平局。他们不喜欢过程，他们太易于收获财富的历史令他们丧失价值追求的良好心态。

我力图向《魔鬼辞典》引荐一个条目：对人最凶狠的惩罚莫过于——给这个人提薪并且使他习惯于拿高薪，并在心理注入高薪的同位素，然后怎么办呢？然后，突然大幅度降薪，并且迫使他安于这个，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美国人人都在心里充满了富裕社会和超级大国的同位素。这就是临近降薪的前兆。

新老孤立主义的共同特征：排斥世界上的异乎于美国的思想观。

老孤立主义的做法是：美国人每时每地觉得它是孩子头。即使对待它最亲密的盟友，它亦在合作中暴露出优越的心态。锱铢必较，甚至是夺人之功。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人便在英国朋友背后狠捅了一刀，踞其传统利益为己有。美国人的不仗义，使之早已湮灭了奔向伟大目标的禀赋。

如果说老孤立主义尚有野心勃勃的中世纪智谋色彩，那么。新孤立主义则标志着美国人智慧和远大雄心的全面倒退。

新孤立主义甚至包含了对美国伟大历史的排斥势态。

他们尝试着内部变革的吼声汇为一个声音：我们要不劳而获，我们需要一个关心我们好奇心、同性恋和满足我们各种嗜好的总统。

他们认定这是摆脱羁绊奔向未来的首要目标。

他们自大地以为：外部一切问题统统与美国无关。

他们天真地以为：美国的一切皆是世界各国未来的模式。

所以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事件是世界的头号新闻。

一个叫苏雨霄的美国宗教流派领导人断言：美国人民已经丧失了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因此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这就是结论。

## 对美国说“不”的中国铁娘子

1995年2月26日，北京市中心长安街上一处毫不起眼的灰色建筑物外面，汇集着上百名身背长短镜头照相机以及摄像机的人群，他们是来自各国通讯社和电视台的驻华记者。

在灯火通明的中国外经贸部大楼里，一场唇枪舌剑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正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着。而双方主持谈判的代表，恰好是两位女性。美方是律师出身、讲话字斟句酌的贸易谈判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而中方则是现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

当晚11点，两位女代表同时离开谈判现场，出现在世界各国记者面前。宣布双方草签《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消息，中美两国间长达20个月的知识产权谈判终于落幕。

当时一家外国通讯社记者在发出的电讯中称“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中美之间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纠纷由来已久，从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摩擦。1990年，宣布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应当说，中国方面对知识产权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

1992年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愿意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对这一问题的保护工作，而美方则承诺取消对中国的特别调查。

但是事隔两年后的1994年6月，美国又再次挥舞起“特别301”大棒，不考虑中国政府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作出的努力。要求对中国进行六个月的调查。这一次，美国人针对的是与计算机行业相关的激光唱盘等产品的盗版问题，认为中国的侵权行为给美国企业造成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中国与美国之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一共进行了七轮磋商。在谈判开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铁娘子”之称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语气坚定地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发言，认为中国在短期内已经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过程，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美方提出的非法复制激光唱盘的问题，专门组织力量收缴并销毁了数以百万计的盗版激光唱盘和录像带，关闭了有关的侵权工厂。

平心而论，美方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无可厚非的，中国人也没有蛮横无理地拒约这些要求。不过，美方谈判代表们却在谈判中层层加码，他们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如要求在中国设立独资的新闻出版和音像制品公司等等。在音像制品对外开放市场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之间至今也未能达成一致。而美方在海关边境措施、版权认证制度以及行政执法部门的权限等问题上提出的要求，连美国本身也未能做到。尤其让中国人感到不快的，是美方对中国的司法和立法程序也提出了要求，甚至要求允许美国在中国设立侦探事务所。你还不不如让中央情报局在北京设一个挂牌的分局哩。

面临着六个月最后期限的威胁，面临着美方宣布进行贸易报复的现实

可能性，吴仪，这位深知双方底牌的中国女部长，偏偏没有被美国人吓倒。这位头发略有些花白的中国“铁娘子”，在记者招待会上毫不客气地警告美国：“你们宣布报复清单之日，就是我们公布反报复清单之时。”1994年。而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仅仅在两个小时以后，中国就公布了对美国贸易的报复清单。

消息传开后，一家日本通讯社驻北京记者在发回本国的电讯中曾不无感慨地评论说，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缺少的就是像中国的吴仪女士这样敢于对美国人说“不”的灵魂人物。

1995年经贸部则随即作出反应，也公布对美贸易报复的最终决定。从这两份清单来看，美方将原定为28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削减为10.8亿美元，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大宗商品如运动鞋、箱包等产品则不再包括在内。相比之下，吴仪拿给美国人看的报复清单除贸易外还增加了投资一项。对于新增加的投资一项，美国人是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的，因为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正竭力争取在中国合资生产汽车的许可。可以说，增加内容后的报复清单击中了美国人的要害。

清单公布后，坎特又亲笔致函吴仪，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进行最后谈判，争取尽快消除分歧。而吴仪的回函则很明确：同意恢复谈判，但是地点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

随后，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由工作组级别上升为谈判代表级别，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也从美国飞抵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共同主持最后阶段的磋商。

中国打出的投资牌开始见效，在美国国内一些大企业老板叫苦连天的抱怨声中，美方代表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在有关中国立法与司法权等问题上没有再提出过分的要求。而中国则也作出了一些务实的让步，在顶住美方在华独资生产音像制品、软件和出版物的要求同时，允许以合资的方式生产上述产品，双方的立场逐步靠拢。

2 进展一直十分缓慢，从25日到26日凌晨三点，也只完成了四分之一的工作。结果双方一直连续工作到26日深夜十时，这场贸易大战才在双方代表香槟酒杯的相碰声中化险为夷。

当丝毫没有倦容的吴仪和巴尔舍夫斯基出现在已守候十多个小时的各国记者们面前时，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们投向吴仪的目光是充满敬意的，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是一位敢于对美国人说“不”的中国女人。她所展现出来的，正是现今中国不畏强权、毅然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尊严的姿态。

## 谁在“轻柔地走”？

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指出来告诉中国人，当美国宣布与越南复交并在河内举行大使馆开馆仪式的时候，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出人意料地参加了开馆仪式，这一举动可以说是罕见的。美国人这样做自然不会是回忆起他们与越南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更不会是为了欣赏河内的热带风景。这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克里斯托弗没有说。倒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麦凯恩毫

不掩饰地道出了个中缘由。这位美国参议员说：“美国和越南有共同的利益，即遏制中国的霸权。让经济上有活力和稳定的越南强大起来，达到可以抵制其北方强大邻国的地步，这绝对是符合我国的安全利益的。”这句话再清楚不过他说出了美国政客们心中的真实想法。

随着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少数向来托庇于美国的亚洲国家也纷纷应和说他们受到了中国的威胁，而美国则从人权、复关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上着手，采取具体的行动来遏制中国。美国《华盛顿郎报》就在它的社论中建议政府不要让中国获得主办 2000 年奥运会的权利。在讨论中国复关的时候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此后的事情发展证明，美国确实是在这样做，而且的确做到了不让中国主办 2000 年奥运会，中国引人注目的加入世界经贸组织谈判也一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1995 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中国经济力量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事情。这篇文章还语重心长地告诫美国应当放弃与日本之间的争执，巩固好联盟阵线，而欧洲则应当抛弃过去喜欢冷眼旁观美国与中国争端，以便坐收渔人之利的做法，只有和美国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遏制中国。

就在英国人提出遏制主张以后的第二天，美国销量极大的《时代》杂志也刊出一篇由著名专栏作家克劳萨默撰写的文章，认为西方应该像当年召开维也纳会议遏制法国一样，设计出一整套方案来对中国进行遏制。

这两家杂志率先提出遏制中国的主张以后，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纽约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都跟着这股潮流，步调一致地要求美国政府刻不容缓地对中国进行遏制。《纽约日报》的文章甚至走得更远，对“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质疑，理由是台湾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只有 10 年时间在中国政权的直接治理之下，认为“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国际法上存在着疑问。值得注意的是，英文《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封面文章《轻柔地走》首先肯定遏制中国政策的必要性，继而又含蓄地暗示，成立不久的东南亚安全会议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配合美国，巧妙地遏制中国。

日本的《时事解说》周刊则说得比较明白。这份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尽管一直公开说明它的政策是与中国“保持接触”而绝非“遏制中国”，但是私下望已经展开一系列行动，与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一个“对华包围圈”。

看来，想遏制中国的的确大有人在。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叫嚣者的各自丑陋心态，又不免使人嗤之以鼻。心有不甘大肆叫嚣者有之；唆使别人而自己旁观者有之；有劲使不上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如此一帮还没有“乌合”便打着自己肚里算盘的遏制论者如何找到其共同利益来进行乌合，实在不是值得中国人深深思索的问题。

对于这些腔调或行动，中国政府该抵制的就抵制，该制衡的就制衡，该反驳的就反驳，该不理的不理。只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的时间太久，以免耽误了自己的进程。

而中国的民众们，实在是应该行动起来，比如不去买这些国家的商品，就会有效地遏制这些聒噪和行动。

## CBS 事件让美国华人愤怒了

——我们不是间谍 1938 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火星人入侵美国东北部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科幻小说改编成的节目。也许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播音员们太出色的缘故，美国社会在眨眼间变得令人啼笑皆非，各地平时冷清清的教堂挤满了哭哭啼啼的全家老少，一边忏悔一边祈祷上帝能在火星人的部队到来之前赦免他们的罪过。在东西部各州的公路上，到处是开着车不知该如何逃生的美国人，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事后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大约有 170 万美国人相信节目的真实性并且四处逃难。

两年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又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再次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94 主持人宗毓华主持的电视节目。

节目一开始，操着满口标准英语的宗毓华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这个节目的主题：“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请各位收看有关美国最大的间谍网的报道。在这个节目里，我将告诉你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个间谍网，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伴随着宗毓华解说出现的，是形形色色的美国华人工作时的画面。

宗毓华对着全美电视观众侃侃而谈：“所谓间谍，并不是你想象中身穿风雨衣的形象，他很可能就住在你的隔壁。经过周密的调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发现了中国是如何向美国渗透谍报人员的。现在每天都有乘坐着飞机的中国公民合法地进入美国，他们看起来在外表上是非常普通的人，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有可能是间谍。”在直播室里，宗毓华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中国谍报工作》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迪米亚德斯，开始了一场耸人听闻的对话：宗毓华：迪米亚德斯先生曾经在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机构工作过，他不久前撰写的《中国谍报工作》一书出版以后，给美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它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迪米亚德斯：我的意见是，目前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府都未能对来自中国的间谍渗透作好思想准备。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谍报系统与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情况有些不同。

宗毓华：一切都是从北京开始的，当一名中国学生或科学家申请去美国，中国安全部门的官员就会找他们谈话。根据迪米亚德斯先生的证词。这些中国学生或科学家会被告知，他们留在国内在家人将成为有效的人质，他们被要求在美国先呆下来；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和他们联系，这些人的潜伏期并不确定，有的可能要在美国潜伏若干年以后才会真有人来找他们。

迪米亚德斯：对！沉底鱼，这是中国情报部门的行话，意思是说这些人像沉在海底休眠的鱼一样，西方情报界称之为“休眠情报员”。

宗毓华：那么你是说他们会沉在海底什么也不做吗？迪米亚德斯：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等待着时机。

说到这里，宗毓华指着背后的画面说：“看！这个男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休眠情报员。然而从外表来看，他们与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一旦他们混入美国社会，就会慢慢变成社会的一部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很难发觉他们，因此也无法判断到底会给我们造成了多大损失。

迪米亚德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来自中国的休眠情报员并不在少数。根据我的估计，在这些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当中，每八个人

就有一个人是潜伏着的间谍人员。

在直播室里，宗毓华和迪米亚德斯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补充，拼凑着一幅中国情报人员的形象。由于这一节目是在晚间的黄金时间播出的，所以估计至少有 1200 万美国观众收看到了这个节目。

毫无疑问，迪米亚德斯的《中国谍报工作》一书的出版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特约节目的播出，使得美国社会对美国华人有多少是间谍一事议论纷纷，从而给许多华人移民的生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每 8 个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中就有 1 人是间谍的说法，使得许多美国企业对华人雇员充满疑惧。这对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一些在职的华人则无形之中被另眼相看。在疑神疑鬼的心理作用下，不少美国企业已经暂时减少乃至停止聘用中国雇员，另有一些看到新闻节目后恐慌万分的美国房东则开始委婉地拒绝把房租给中国人，以免被华人用来认事“间谍活动”。

美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国内的民族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经过六十年代由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倡导的民权运动。美国社会从表面上来看已经取消了种族歧视制度。然而制度上的取消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个国家不再存在以肤色取人的习惯，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虽不像 60 年前那样露骨，但是社会各个层面仍保留着若隐若现的歧视现象。而且与以前情况不同的是，白色人种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并不亲自登场，而是充分地利用一些有色人种的代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避免了种族歧视过于表面化的缺点，从而使这种隐蔽的歧视更凑效。宗毓华就是这样一例，客观地说，凭借着自己的刻苦而跻身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著名主持人行列的宗毓华，自身的奋斗也很不容易，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她身上似乎刻意与华人社会保持距离的另一面。

现侨居美国的美籍华人陈燕妮女士就曾经记述过华人社团一次原本为宗毓华授奖的大会，到头来宗氏不到场的憾事。每当宗女士提到中国人时，总是用“那些中国人”来显示自己的黄皮白心。不过话说回来，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观，无法勉强，只是问题在于如果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的同胞就有些过分了。也许美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能将一个人与她的血统生生割断，能使一个人向自己的母体渲泄无情，能使一个人在功利面前失去起码的道义。真不知宗氏婢女怎么想的，当美国因她的节目而掀起排华风潮时，她走到大街上领受到的就是热情吗？也许她不需要热情，那么好，中国驻美大使馆可以拒签她的护照，禁止她今生踏入中国的土地。

这几年来，在美国各地的电视节目或者报刊上，也时而会出现指称华人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传闻，有的文章甚至言词确凿他说中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已经在规模上与前苏联不相上下。本来，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新闻从业人员多少部有些故弄玄虚，不时制造些耸人听闻消息的习气。华人社会也没有那么多功夫去驳斥每篇报道。

不过，这次有关华人间谍网的说法已经有些太离奇，尤其是每 8 名中国人中就有 1 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更是给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出了一道难题。

对这类报道一向都抱着比较宽容态度的华人这次没有保持沉默，在一些旅美著名华人的参与下，团结行动起来，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抗议。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旅美华人工程师及科学家协会在写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信中表示，新闻报道不能仅靠一两个人没有根据的说法为依据，尤其是这种

新闻报道已经在美国社会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每个中国人都存在着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而且即使现在没有从事谍报工作，若干年以后也会活跃起来。该协会在信中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必须进行公开的道歉，否则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在华人社会作出反应之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宗毓华并没有把它看得很严重，潜意识里认为华人的这次行动只不过与以前一样，都会以虎头蛇尾的结果收场。宗毓华本人在接受一家华人刊物采访时也只是语气平静地对此事说了一声“抱歉”而已。

这种平淡的说法自然不能让华人社会感到满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华人社会持续不断地爆发出对这一事件的强烈抗议，事态的发展迫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宗毓华不得不作出公开表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在写给一家华人团体的信中不得不表示：“我们充分认识到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守法的学生、访问学者及公民。如果说我们的节目未能对这一点予以证实，那么我们愿意表示道歉。”这位总裁同时在信中表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在10月22日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作出认真的努力。纠正以前的说法。

10 明：“我们无意使人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每年合法地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访问学者及移民都受到中国情报机构的雇用。如果说我们给观众造成了这样的错误印象，那么我们愿意表示遗憾。”这种声明并没有干干脆脆地表示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歉意，但是考虑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向自认正确，认不肯对自己的节目表示歉意的历史来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明显已经感受到来自华人的压力，作为一家依靠收视率生存的新闻媒介，在作出决定时自然也不能不对社会的反应予以考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一事件表明，中国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姑息了事了，各个华人社团在这一事件中也空前地团结一致。

这次事件同时也使广大华人认识到，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少数民族，华人群体在受到美国社会诬陷的时候，如果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任人评说，任人践踏。

华人在这一事件上的空前团结，也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的日益壮大。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大陆的国人，有责任将国家建设得更好，为了自己的同胞不再受气，为了自己的同胞不再变质，为了未来的一代或二代能理直气壮地走在相同或不同的肤色中间。

## “孤儿院事件”——美国人自己说不

致编辑：关于《中国人否认虐待孤儿院里的孤儿》一文（注：指《纽约时报》1月刊出的文章）。

毫无疑问，上海孤儿院摆出最佳面貌让外国记者看，以驳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的指责，该组织指控在中国一些儿童被故意饿死。

但我也认为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儿童福利院院长韩伟城（音译）的解释是可信的，1989 我虽然经常在本栏目中批评中国的不道德行为，但我

认为说什么政府的政策故意饿死儿童，以使弃儿人数减到最低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

即使如罗森塔尔在 1 月 8 日专栏文章中认为的那样容忍共产党人的冷酷无情，因缺乏资金和设施造成的错误和疏忽也不应该看成是官方的计划。

拿出中国刊登在贵报 1 月 6 日新闻报道中的图片，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连续播出的镜头，并不比 1 月 10 日在黄金时间直播节目中播出的美国国营收容所中弱智者受到虐待的画面更令我感到震惊。

如果中国的宣传机构下结论说，美国的这些虐待事件是美国政府批准的政策，那将如何呢？蒂英西·通纽约 1996 致编辑：关于贵报 1 月 9 日的新闻报道和罗森塔尔 1 月 8 日有关中国孤儿的专栏文章。

罗森塔尔先生的争论文章是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写的，而人权组织的报告宣称，那些儿童是被故意饿死的，贵报的报道说该说法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这不是很成问题吗？除了报道指责的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使中国儿童遭到抛弃和死亡呢？许多死在孤儿院里的儿童，到那里时就已经患有重病、残废和营养不良。在些孩子的父母通常是中国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失效者。由于医疗费用要个人承担，因此穷人不可能为这些孩子提供必要的治疗。

家庭连最起码的医疗都负担不起，就会遗弃孩子，寄期望于国家来拯救。到这个时候，许多孩子已经太虚弱，活不成了。

我希望罗森塔尔先生在使用孩子们的痛苦作为其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之前，考虑这种“证据确凿”的报道。

马修·科尔曼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96 致编辑：关于贵报 1 月 6 日和 9 日就人权观察组织有关中国孤儿院的报告刊登的几篇新闻报道。

我是一个将要领养一名中国女婴的母亲，我花了数百小时研究收养中国孩子的问题，同已经收养中国孩子的父母及一些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机构交谈。

我认为，中国政府和孤儿院的保育人员都尽可能地努力工作，来照顾数以千计的这些弃婴，并且为那些能够为孩子提供爱和家庭温暖的美国人尽快领养到弃婴提供便利。

我恳请你们再调查一下，不要让美国公众因对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兴趣而严重影响这些孩子的长远幸福和那些想领养孩子的父母们的梦想。

艾利斯·贾丁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96 上面是美国《纽约时报》1 月 15 日刊发的三封读者来信。值得指出的是，这三封读者来信在译成中文时没有进行任何文字上的改动，完全是美国读者原汁原味的信件。

1996 幼稚地强调说，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故意让孤儿院里收养的孤儿饿死。在此之前的 1995 年 6 月十分耸人听闻地声称，中国政府故意饿死孤儿院里的儿童。

这三位美国读者的来信，对于《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来说，恰巧是致命的一击。

这三位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来信说明了什么呢？一、艾利斯·贾丁在无意之间道出了美国新闻界一向喜欢耸人听闻的习性。美国的报纸为了生存，而记者为了一夜之间成名，刊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恶习。任何一位略有些头脑的中国人都不会相信，自己的政府会制定出故意让孤儿院儿童饿死的计划，美国人的这种报道跟天外奇谭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孤儿院内对儿童照顾不周的事情或许会偶尔发生，但是美国人必须记住，中国政

府并不是希特勒政府，中国孤儿也不是当年二次大战中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记得当年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时曾经说过，这样做会使他一夜之间闻名全国。很有可能，《纽约时报》的这位记者也有同样的阴暗心理。不过，也只能是丑名远扬了。

二、蒂莫西·通相当坦率地揭出了美国的“家丑”：美国国营收容所倒是存在着对弱智者虐待的现象。

放心，中国人不会得出结论说。美国国会制定了一项故意虐待全国收容所里的弱智者的政策。也不会说洛杉矶警察局制定的政策就是毒打黑人平民。

三、《纽约时报》自己也承认。人权观察组织关于中国儿童被饿死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

《纽约时报》也不是美国超级市场入口处到处散发的无聊小报，既然刊发这些无法得到证实的消息，那也只能说《纽约时报》这样做无异于自甘下流。

四、马修·科尔曼总算说句公道话，儿童的痛苦不要被用来作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国人应当告诉美国人，中国人曾经抚养过当年侵华日军的遗孤，污蔑这样一个宽容的民族实际上是非常卑鄙下流的。中国的孤儿院并不需要美国人这种假惺惺的关心，中国人再穷再苦也能养活这些孤儿。美国人如果真的很关心儿童，倒是应当去关心那些在越南战争中丧生在美国“地毯式”密集轰炸下的儿童，去关心那些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儿童的人权。

还是那位美国读者说得一针见血，请不要把儿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美国人果真那样悲天悯人的话。

## 日本正在加入遏制中国的大合唱

尽管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尽管日本近年来看到亚洲经济的发展前途而号称“脱欧入亚”，但是从政治的概念来说，日本仍然属于西方国家的同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正在有意识地加入到美国遏制中国的大合唱当中去。1994 年对和平的威胁，政府方面也冻结了对华的援助，一些政客则竭力鼓吹要冻结对华日元贷款。如果说美国人是用赤裸裸地显示军事力量来威胁中国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日本正在悄悄地以经济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到底有没有权利进行核试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中、英、美、俄五国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没有签署，而中国政府已经很明白地对各国承诺。一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就会立即停止进行核试验。因此中国进行核试验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如果与另一个核大国美国相比，中国的核试验次数只有 44 次，而美国的试验次数则在 1800 次以上，中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也只有美国的 1.2% 左右。从 1964 年 10 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天起，中国就单方面明确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相形之



下，美国人从来没有作出类似的承诺，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就多次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中国之所以发展核武器，目的就是要打破核垄断，使自己免受外来侵略，这完全是正当的行为。

中国政府总理李鹏 1995 年在接见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就直言不讳地对日本人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曾经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与日本向中国提供贷款一事是无法相比的。对中国的核试验作出过度反应，采取经济办法对中国施加压力，更是不可取的。”事实的确如此，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使中国损失了至少 1000 亿美元。日本人总是以为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乃至贷款能够压制住中国，其实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中国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自然也很希望能得到外来的援助，但无论是当年苏联撤走技术人员，还是美国人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人从来也没有在外来的压力之下低过头。

日本人用停止对华援助的办法来威胁中国，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感到担忧，因而开始在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核武器试验问题上加入到遏制中国的大合唱当中去。

在围绕着中国核试验问题反复纠缠的同时，日本国内新闻媒介也在为中国东海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十分可笑地以附属国自居。呼求山姆大叔出面干预。

位于台湾北端的钓鱼岛。历来被看作台湾岛的附属小岛屿，根本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甲午战争以后，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附属小岛自然被日本割走。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将台湾归还中国，而钓鱼岛因太小且没有人烟，对其归属问题中日双方都没把它当回事，直到 70 年代，由于在小岛附近勘探出石油，才在主权问题上发生争执。

根据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调查，钓鱼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估计达 44 亿桶，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该岛无疑是十分诱人的。于是从中日建交时起，日本多次要求中国明确该岛归属日本。为了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一直大度地回避该问题并将之搁置起来，继而又提出共同开发的新建议，体现了一个大国的风范。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可能割让我们的领土，即使我们不在乎这个小岛，岛是不大，可国家主权事大。

一位留学美国后回国的朋友在北京街头发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没有注意到的现象：满大街的日本“皇冠”、“蓝鸟”、“公爵”之类的汽车在质量上均比不上他在美国时开过的同类型日本汽车。尽管这些日本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是一样的，但是其它方面的差别则很大。这位留学生的一辆日本日产汽车在美国风吹雨打了 11 年，汽车车身上的喷漆仍能照出入影来，但是国内公路上的日本“蓝鸟”没有一辆能做到这一点。这位留学生认为，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保养问题，而是与质量有关。从 1984 年开始，日本汽车的燃料系统就已经采用了电子喷射装置，而中国 80 年代末期进口的“蓝鸟”轿车却仍采用化油器。这位留学生曾经和日产汽车公司的一位代表谈到过他的这种印象，日方代表起先坚决否认这种可能，但是当这位留学生举出具体事例以后，日方代表变得很尴尬，无言以对。这位中国留学生因此感慨他说：“日本人是一流产品输出欧美，二流产品自己用，而三流产品则卖给中国人。”北京《中华工商时报》一年前刊发的一则报道似乎证实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

看法。

当时北京中关村一家公司的人员开着一辆丰田轿车，不幸发生车祸，汽车撞到了墙上，虽然司机只受了轻伤，但是却暴露了这辆轿车存在的问题：方向盘内的安全气囊毫无反应，根本不像宣传广告所说的那样迅速打开。这家公司找到丰田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日方代表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反而认为安全气囊没有打开是由于汽车撞墙时没有达到一定的速度。据一位汽车工业界的专家分析，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汽车既然能将砖墙撞开一个大洞，本身就说明汽车当时的速度很快。而且退一万步来说，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维修期间免费为车主提供一辆同类型的汽车，供车主日常使用。

事隔不久，一位中国读者又写信给《中华工商时报》，反映自己购买的一台日本彩电刚用了没有多久就莫名其妙地无法显像，至今投诉无门。《中华工商时报》在刊发这封读者来信的同时，善意地提醒读者，一些进口货未必像中国人想象得那么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因此中国消费者不能盲目地认为购买外国产品是明智之举。

如今，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马路上，总能看到花费巨额外汇进口的日本汽车；走进许多中国人的家庭，似乎总能发现一台日本产的电视机或者其他家用电器产品。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总是不能满足于乘坐国产轿车，总是要想方设法换成一辆日本汽车。

无怪乎有人曾经愤怒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五十年前日本人在军事上打败了中国人，而五十年后又在经济上打败了中国人。”也许有人会说，贸易自由化现在已是全球的大势所趋，买日本汽车也是考虑到质量比中国车好，一切都无可非议。不久以前，一位中国记者访问过韩国，这位中国记者非常吃惊地发现，韩国首都汉城的大街上奔驰着的，几乎全是国产汽车，很少能够看到进口汽车。在韩国，每个人在购买轿车时选择国产车并不是政府的强制性规定，而是出于每个公民的爱国心。正因为如此，美国人虽然一心想打开韩国汽车市场，但是直到现在每年在这个国家的销量也不过两千多辆。许多韩国人即使移居到美国，也不买美国车，因为他们总是自豪他说韩国车是世界上最好的。

再看看日本这个把自己生产的汽车推销到世界各地的国家。美国人为了打开日本的汽车市场，和日本人展开的汽车贸易谈判可谓旷日持久，美国人一度威胁要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现在，美日之间的汽车贸易谈判基本达成了协议，日本或多或少地对美国人作出了让步，然而直到今天美国汽车公司在日本每年的销量也始终未能超过一万辆。

提倡购买国货从来就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更何况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尤其是中国现在还处在艰难起步阶段的轿车工业，更需要民族的每一分子来加以维护。如果说我们中国的政府代表在日内瓦为了保护民族幼稚工业而费尽口舌，而国内却偏偏花费大量国民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的宝贵外汇去购买进口汽车和家电产品，那么即使中国海关征收到一些关税，又能对民族工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尼克松曾经在他的一本书中这样形容日本商人：“他们也未必愿意通过发展援助、投资和技术转让，使其他国家发展到成为日本未来的竞争对手的地步。”在吃过多亏以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们已经发现，同日本企业进行合作是非常难的事情，有时一套设备买来后发现，为了维持生产，就必须源源不断

地从日本人手里购进原料。而这些原料都同样要用有限的外汇去购买。所谓的合作。也并不包括关键的技术转让。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从来都不是那么真心诚意的。戴高乐有一次曾经尖刻地形容过来访的一位日本首相是“一位半导体推销员”，这句话很形象他说明了日本的本性。日本人向来关心的就是在中国销售了多少辆轿车和多少台电视机，他们是绝不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和别人分享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得极为明显。

合作当然是两厢情愿的事情，无法勉强别人，然而中国绝不应该成为日本汽车和电器产品到处泛滥的国度。中国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以乘坐日本轿车、使用日本电器为乐事的民族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外国的产品所挤垮，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国内的民族工业被别人挤垮的时候，中国人，你还能拿什么去买日本人的轿车和电视机呢？加入遏制中国行列的，不只是经济上的日本，还有一个军事上的日本。今天的日本，穿着制服有军衔的自卫官有 23 万人，穿着便服而没有军衔的事务官和技术官有 2.5 万人。

其中陆上自卫队有 13 个师共 15 万人和 1200 辆坦克，在人数上已超过英国，主战坦克数量超过了英法两国；海上自卫队有 160 艘舰艇，规模超过了英国和意大利，位居世界第 5 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来计算，已经是世界第 2 位，仅低于美国。日本《朝日新闻》杂志就曾经很露骨他说过：“自卫队业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力量之一。” 1950 年，下令建立一支 7.5 万人的警察预备队，目的在于维护混乱的社会秩序。同年 8 月，警察预备队正式建立起来，而日本也从此迈出了重振军备的步伐。

1952 年力量被定名为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同时创立航空自卫队。日本独立的海陆空三军框架由此确立下来，而且一直在不断得到发展。

自卫队的成立，与美国在战后对日本一些战犯不再追究战争罪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出于当时在亚洲扩张的战略需要。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实际上变成了美国军队的后勤基地。

过后不久，美国又与日本签订《美日安全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日本纳入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

1987 年的军费开支就一直在增加。1991 年时，日本的军费为 343 亿美元，到 1995 年就猛增到 472 亿美元。

伴随着军费剧增的，是武器装备迅速现代化，装备的水平和更新换代周期已经超过了美国。从装备上来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用最新的 89 式自动步枪装备校级以下的军官。

截止 1995 年底部署了 24 套美国“爱国者”地对空导弹。陆军配备的新式防化车目前连美国人也不会制造。海上自卫队现在已经部署 16 艘最新式的“春潮级”常规动力潜艇。

在最靠近中国的长崎县佐世保停泊着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而且日本的计划是再部署 3 艘。日本的驱逐舰不仅规模是亚洲最大的，扫雷能力也是世界最强的，反潜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航空自卫队现在拥有 160 架 F16 战斗机，这个数字仅次于美国，而且正在同美国联合研制下一代 FSX 战斗机，预定到 1998 年时部署 130 架。日本目前还拥有 100 架反潜巡逻机，在全国 28 个防空监视所装备了自动警戒系统。

根据当年《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的防卫范围应当限制在日本四

岛。但是在进入 80 年代以后已经不声不响地把它的防卫范围扩大到太平洋中的关岛和巴士海峡周围。

这表明，日本当年制订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 1992 年 9 月开始，日本人在“为国际社会作贡献”和“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借口下，先后 11 次派遣自卫队到海外执行任务，日本宪法中不得派兵海外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被废除。

从经济和军事上来说，日本现在都可以被认为是大国。而且日本近年来一直鼓吹要“运用防卫力量为国际社会尽责任”，乃致于竭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为了给扩军制造理由，日本开始为自己编造各种说法，认为亚太地区仍然存着像朝鲜、南沙群岛和北方领土等没有解决的问题，日本增加防卫力量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不可或缺。

美国人的“中国威胁论”如今也被日本人利用来作为扩充军备的根据。日本首相府在 1989 年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认为“中国是一个军事大国”。从 1991 年起，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每年都专门谈到中国。1995 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就很明确地提出：“对于中国扩大在海洋上的活动范围”，有必要加以注意。日本防卫厅防卫局长秋山昌广声言，日本“应当提高质量，争取成为强有力的自卫队。”在具体行动上，日本目前正在同美国共同研究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在 4 个供选择的方案中，就有 3 个方案的目标是对付中国的。日本防卫厅为此新设立了导弹防卫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明确地提出：“首先要分析中国的导弹所构成的威胁。”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竹冈胜美承认，在冷战时代，自卫队的训练是以苏联为唯一敌人的。日本人的说法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

日本现任防卫审议官大森敬洁在有意无意间露出了口风：“要对冷战后日本周围的环境进一步作出分析，对自卫队力量作出新的部署是很有必要的。但这不是说立即就优先部署到西部。”从日本将世界上最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部署到最靠近中国的佐世保以及导弹防御计划来看，中国很显然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假想敌”。

对于日本的这一行径，中国除了在对日政策上来取决不退让半步的态度，告诫、提醒日本以外，更应该加强与中西亚、俄罗斯及亚洲其它国家的合作，对现实的遏制进行有效的抵抗，对日本军事力量在未来对亚洲构成的威胁进行预防。

## **拒绝，是因为目的没有达到；被拒绝，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中国申请重返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时间是这个世界组织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实际上中国早在 1989 年初就已经达到了复关的要求，当时的关贸组织也准备着手为中国复关制定一个最后的复关议定书，但是由于美国对这一问题的阻挠。中国的复关谈判变得复杂而艰难。

1948 签了字，这份文件，就是 80 年代末期才在中国变得几乎家喻户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根据这个文件建立起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以后，正在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当我们这个世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全球经济发展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区域化。欧洲联盟现在已经在着手实现经济上的一体化，在成员国内部逐步取消关税，取消人员往来的限制。甚至打算发行共同的货币。在北美洲，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拆除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在贸易往来上的壁垒。修建三国间直接往来的公路，人员、资金乃至货物在这个地区内时流动是不受阻碍的。在亚洲，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日渐活跃起来。这个组织成立的时间不算太长，成员国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还存在着分歧，然而亚洲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正在使该地区的重要性日益为人所重视，甚至连远在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如阿根廷也愿意以亚太国家自居，要求加入这一组织。这三个组织，代表的都是世界上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也代表着在成员国之间互相给予方便，而对共同体以外多少有些排斥的趋势。

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多年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互惠又排他的世界经济格局。好几年以后，一些学者就担心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格局不同于“亚洲四小龙”当初经济起飞时的情况，因为那时全球的经济对发展出口是极为有利的。一些主要的进口大国如美国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潮水般涌入国境的外国产品保持太高的警惕。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产品展开的“反倾销调查”远远不像今天这样频频发生。因此，中国要想模仿“亚洲四小龙”当年的出口增长经验，将远不如当年四小龙那样得心应手。

应当说。这些专家学者的忧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发达国家在强调贸易自由化时，所隐含的意思是对于经济共同体内的国家互相给予优惠关税，而对“非我族类”的国家进口品则挥舞“反倾销”这面大旗。一年以前，中国的新闻界曾经广泛报道过国内一家出口企业受到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调查并勇敢地到美国法庭应诉的故事。这家企业的应诉成功了。原先带有惩罚性质的关税税率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由于这是中国第一家出口企业赴美为自己“讨说法”，国内的新闻媒介也就格外重视，给予了详细的报道。其实，中国受到外国“反倾销调查”的出口企业绝不是一家。中国出口商品先后有 200 多个种类被外国采取过限制性措施。

1994 美元一涉及到国内 1000 多家企业。1995 年，美国又宣布对价值 2 亿美元的中国自行车进行同样的调查，迁涉到国内 100 多家企业。1995 年，中国政府与美国达成协议，同意将中国的蜂蜜出口量限制在 1.9 万吨以内，此后每年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增长率将限制在 6% 以下。

当国内工业面临来自外国的激烈竞争时，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会转而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

中国国民经济的国际依存度已经使中国必须保持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是世界上头号纺织品大国，可以这样说，是中國人在装扮着整个世界。1993 年，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额是 270 亿美元，但是为了完成这一数字，中国也进口了 88 亿美元的纺织原料及纺织机械。

换句话说，中国 270 亿美元的纺织品出口收入是以 88 亿美元的纺织原料和纺织机械进口为代价的。

1994 年，两者相比较就会计算出，中国的国际依存度为 42%。1979 年

的时候，中国的国际依存度只有 8% 左右。这种变化，一方面说明了中国 1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与世界已经联系在一起。在今天中国生存的世界里，有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市场，而我们无缘享受这些地区性的贸易自由，因此重返关贸总协定，争取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中国人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

1986 在向关贸总协定组织递交申请书的时候，中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复关三大原则。中国的第一原则是，中国是复关而不是入关。复关与入关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者在涵义上是有着很大差别的。1950 年 3 月，当时的关贸总协定曾经制定过一系列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性政策。中国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能够享受到这些优惠性政策。但是，该原则却遭到美国的反对。美国代表认为，复关的说法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上的，另一个则是法律上。

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关贸总协定各项条文中没有关于退出或重返的规定，中国要求复关就意味着开了一个先例。此外，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希望的是能够享受 1950 年制定的优惠条款，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履行过关贸组织的义务。如果同意中国享受复关待遇，就等于破坏了“履行义务再享受权利”的原则。

中国的复关第二原则是：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复关的主要条件是中国实行进口关税上的减让，但是以谈判的具体内容来看，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要价太高。

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复关，是中国提出的第三条原则。在一般人眼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恰恰是这毫无疑问的一点构成了中国与美国之间争执得最激烈的环节。

1995 向作者列举过美国人的理由，这些理由来自世界银行的白皮书。白皮书里列出了四项指标。

首先，中国 1994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4.3 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在全球排名第二。

第二个指标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在世界上排名第五。第三则是中国的出口规模 1994 年已达到 1215 亿美元，处于世界第 11 位。第四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方依据的是不同于传统计算方法的“购买力平价”法则，认为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应当为 4000 多美元，不能算是发展中国家。

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美国人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综合国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做到为发达国家发射卫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像北京一样现代化；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能得到像中国那样高的评分。按照美国人的逻辑，中国应当以发达国家身份入关，不能享受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

从 1987 年到 1994 年 12 月，中国一共和 40 多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了 19 轮谈判，欧洲虽然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未必与美国看法相同，但是在基本立场上都差不多，那就是要尽力使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这样的谈判可想而知进行得非常艰难。

1994 布了中国的最后决定：如果在年底以前无法结束谈判。中国将不重新提出谈判的要求，而且也不会再宣布新的入关出价书。中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涉及到 1995 年 1 月 1 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将取代关贸组织，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一日期以前完成谈判，就无法成为这个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12 第 19 轮谈判。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第 19 轮谈判最后还是破裂了。破裂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而这些方面都涉及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这些都是无法轻易作出让步的。第一，关税减让问题。中国是一个高关税国家，有 6 多种商品在进口时需要支付关税，且进口税平均在 65%左右。当时中国提出的是在 3 年内将关税总体水平降低到 35%以内、但是日本及澳大利亚的要求更高。第二，非关税措施问题。这主要指进口商品配额许可证制度等。这些虽然不符合自由贸易的要求，不过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无法一下子取除这些措施。中国的方案是对一些重要进口品的限制加以保留，其余的则在四年内取消。美国对此有异议，他们提出首先应当对中国打算保留的部分予以取消，因此双方很难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第三，市场开放问题。美国对中国潜力巨大、利润丰厚的保险、银行、零售和旅游等服务性行业一直抱有很大的兴趣，而且在谈判中要求让美国企业取得进入这些行业的优先权。第四，投资政策问题。中国对合资企业产品的国产化比例有一定要求，像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现在已经达到了 90%以上，这主要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另外中国还要求合资企业应做到外汇自行平衡以及产品返销国际市场要达到一定比例等等。这些对合资企业的要求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世贸组织要求发达国家在 3 年内取消这些措施，而发展中国家在 5 年内取消。而美方却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取消这些规定，这分明是在阻挠中国复关。第五，中国到底以发达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复关的问题。

艰难的第 19 次谈判失败了，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就此时世界关上它的大门。

1995 会议时宣布了一个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决定：中国将从 1996 年 4 月 1 日起大幅降低进口商品关税，总体关税水平将降低到 23%。1996 年 4 月 1 日，这个决定已经付诸实施，涉及到的商品种类多达 5000 种。

中国的复关谈判走过的无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历程，中国至今仍未能走完这个历程。

在复关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能使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能够从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上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感到担忧。因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份量在不断下降，而中国的复关无疑会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美国的一些单方面贸易措施如“特别 301 条款”及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等将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而不能轻易动用。在各种情况下，美国能够打的牌实在已经差不多了，因此总想从每张牌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然而，美国人也发现，就像在政治领域里中国人不会轻易对他们作出让步一样，在涉及到民族根本利益的时候，中国人同样不会让步。

贸易从来就不是单方面一厢情愿的事情，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美国人可以宣布对中国商品进行报复，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是中国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其他国家不会跟着美国人一条路走到底。当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时候，中国人仅仅相隔两小时也同样能够拿出一份类似的清单。不论贸易如何自由化，国际间的贸易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能够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就在 1994 年 12 月中国复关谈判破裂以后不久，一家法国原子能公司——法马通公司就兴高采烈地从中国政府手中得到了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的合同，而美国的公司总裁们只能怀着嫉妒而又失

望的心情看着这一切。对于这一点，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大约是最清楚的。中国民航公司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已经从波音公司购买了 167 架飞机。而根据波音公司的估计，在今后的 15 年当中，中国国内乘飞机旅行的人数会每年增长 22%，中国有可能要购买 800 架左右的飞机，这个市场的潜力和利润是可想而知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现在只有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北京合资生产吉普车，而德国大众和法国标政、雪铁龙公司等都在与他们展开极烈的竞争。如果美国人要在中国生产新的汽车，同样也必须得到中国人的同意。如果美国人继续给中国人制造麻烦，那么中国人有可能向美国公司关闭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

## 遏制反而将中国导入了更大的国际合作环境

1. 遏制中国将使美国最终不得不退出亚洲时下的美国，就像一位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突然间让他退休一样，心理上根本无法适应拔剑四顾无敌手的局面。美国人潜意识里就在寻找这样一位对手。欧洲人和日本人虽然也不时与它争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毕竟都还属于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因此也只有经济上迅速发展的中国变成了美国人的潜在对手。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发展恰恰印证了这句老话。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美国在全球的极力扩张达到顶峰也开始步入衰退的世纪。现代美国社会的虚假繁荣，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均负债两万美元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情形就像房屋的地基建造在沙滩上一样，一旦海水涌来就会在顷刻间倒塌。谁也不能否认美国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人自己也痛苦地发现，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所占的份量一天天在下降。相比之下，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今已发展成为了全球一支不容小觑的经济力量。

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远远没有赶上美国，但是美国人却已经对这个国家被唤醒的潜力产生了恐惧感。

“遏制政策”一词原本出自于当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乔治·布坎南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一份报告，是美苏冷战时代的产物。但是对于至今头脑仍停留在冷战时期的美国人来说，最担心的是一个经济上不断发展、军事实力日渐增强的中国或早或晚都会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抢先一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为美国人必然的选择。

为了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人首先从政治上孤立中国，在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联合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与此同时，在美国人看来，遏制中国强大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中国陷入分裂状态，这样就没有精力顾及到经济上的发展。美国人声称“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国会甚至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西藏派驻特使，这与 50 年代时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训练西藏叛乱分子，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做法，目的就是要在西藏地区制造不稳定。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当年苏联也正是采用同样的手法，鼓励外蒙主要求独立，然后在事实上把外蒙



古变成了苏联的附属国，使中国从此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人之所以打破许多年来的惯例，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派遣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乃致于通过“武装保卫台湾”的议案、实际上都在于或明或暗地支持台湾独立的权力。

经济也是美国人遏制中国的手段，无论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还是最惠国待遇，美国人都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反复纠缠。硬是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更多的市场。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大批地破产倒闭。

当中国的经济陷于混乱状态的时候。美国人也就用不着担心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也就保住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

面对这种毫不掩饰的遏制中国政策，我们中国人应当怎么办？应当坦率地说，中国人现在最需要做的仍然是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目前对美国的贸易需要可能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但是中国人早就向世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能力发展好经济的民族，只要中国目前的经济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就完全能够在下个世纪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力量。现实的力量是无情的，它胜过一切的辩论和谈判。美国人其实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们只能暂时地阻挡中国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却绝不可能永远把中国排除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任何一个国家也阻挡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中国人现在完全可以不再参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让世界贸易组织好好思考到底需不需要中国加入这个问题，想通了再进行谈判。美国人在经济上遏制中国。中国人同样也可以反过来遏制美国。你们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之日，也就是中国公布对美国商品制裁清单之日。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中国人也同样可以按着自己的规则行事。如果美国继续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处处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与中国为敌，那么美国在失去中国的同时，是否还能在亚洲站稳脚跟呢？今天的亚洲国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唯美国之命是认。美国人在亚洲扩张的历史已让亚洲国家看清了美国人是怎样一副嘴脸。不论美国人如何标榜自己对亚洲和平作出过多大贡献。

亚洲人都很明白美国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而且这两场闹剧到头来都是以美国人自讨无趣地带着深重的运尸袋退出战场结束的。美国人可以在亚洲煽风点火。然后脚底抹油地溜走，但是亚洲国家却仍然要留下来和中国继续相处。

2. 卡别人的脖子、喘不过气来的可能是自己现在让我们退一万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退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那么情形又会怎么样？中国毫无疑问需要发展对外贸易，需要自己的外贸人员绞尽脑汁地向世界推销中国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在经过十多年的开放之后，已经越来越与我们周围的世界密不可分。

然而，这也并不是说，中国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需要是单方面的，这个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

不久以前中国领导人对法国的访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法国空中客车公司老板在拿到中国人的订货合同时欣喜若狂的心情。由于受到经济不景气的打击，这家法国公司这两年可以说一直在苦苦地挣扎着求生。这家公司 1995 年不仅没有任何盈利，而且亏损 1.95 亿美元。可以毫不夸张他说，中国的这份订货合同就等于是保住了许多法国人赖以谋生的工作机会。

谁都知道，美国波音飞机公司 10 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飞机市场的主要供应者，占据着中国飞机市场 70% 以上的份额。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购买他们的波音飞机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中国人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美国人：世界上并不仅仅是美国波音公司在生产飞机，当美国政府把贸易大棒挥向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还有别的选择。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人的操纵下可以拒绝中国人的加入，但是却不能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贸易。中国的市场，是向一切愿意平等地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开放着的，同时这个市场也可以对任何试图压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关上它的大门。

很难相信，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世界贸易组织能够真正有资格被称为是世界性的组织。

美国人可以拒绝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中国也完全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耗资 10 多亿美元的飞机合同是全体中国人的血汗钱，根本没有必要交给一个处处为中国人发展设置障碍的外国政府。

法国人现在已经后悔了，因为四年以前他们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而违背了“一个中国”政策的诺言，向台湾出售 60 架“幻影”式战斗机。法国人也许没有料到中国人会那样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们关闭在广州的领事馆。而且在这以后的几年当中，法国人一直很难得到中国人的信任，也很难再在中国市场拿到数额巨大的订单。在中国这个发展迅速的市场上，法国人已经尝到了当年短浅的眼光给他们带来的后果。四年以前发生的不愉快已经教训了法国人，他们开始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要在这样一个市场更好地进行贸易往来，就必须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来和中国人打交道。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当中，美国人之所以要竭力压制中国使其作出让步，其实就是为了占据中国更多的市场份额。然而美国人却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这样做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中国人绝不会拿自己不发达的民族工业去做交易，美国人对中国进行压制只能促使中国失去对他们的尊重，他们的产品只能是更难进入中国市场。

台湾每年都要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去聘请美国国会游说团体，为的是能够影响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决策。但是中国根本用不着花这笔钱。中国一项大额订货合同给予或者不给予美国公司，这本身就足以让那些心急火燎的美国企业界人士去充当免费的说客，对于那些妄自尊大、思想还停留在几十年以前的美国议员们来说，也只有来自本国大企业老板们的呼救声才会给他们上最好的一课。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就一直在这样做。中国的航空市场在今后的 10 年当中将要购买大约 800 架民用飞机，到底这些飞机的订单交给谁，这个问题应当让美国人自己去考虑。同样的，中国批准哪家公司在这个国家设立合资汽车公司，这个问题也可以交给美国人自己去考虑。

3. 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但民族主义还是要的如果说中国 10 多亿人口在历经了种种磨难之后能够过上现在的生活是一种奇迹的话，那么中国人也同样有能力实现下一个奇迹，那就是使中国人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法国一位很有远见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曾经在他亲自撰写的《当中国觉醒之时》一书中这样说过：“当中国的 12 亿人口动起来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这个世界就变了。”不管美国人愿意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也不管他们在意识到这种情况时如何本能地采取行动来压制中国，中国人现在都已经真

正地觉醒过来了。在 21 世纪朦胧的晨曦之中，一个经济蓬勃发展、军事上强大而且政治上更有信心的大国轮廓，现在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了。而且可以大胆地预言，即使美国能够阻挠中国的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于一时，中国也终将会有一天强大到世界贸易组织不得不主动地承认它。

1995 辆增收牌照税的传闻。一时间，北京的各个汽车交易市场都挤满了急急匆匆地拎着满满当当的钱包前来选车的市民们。一些单位的看门人开始注意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单位的空地上出现了门窗上挂着大小、花花绿绿饰物的小汽车。不用说，这些汽车是私人的。

今年春节，作者给附近的朋友们打电话贺岁，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在长长的电话线那头显得颇为兴奋，大声地告诉作者他们夫妇两人将随着旅行团，去新马泰旅游的消息。

上海市一家旅行社的老总一见面就叹起苦经，他根本没有料到报名参加旅行团去东南亚旅游的人会出现爆满的景象，以致于没有想到早应该为自己的朋友多保留一些名额。

早年间，只记得中国人常常用好奇而又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相同或不同肤色的人们从开着冷气的旅行车里走出来，鱼贯进入各地大大小小的友谊商店的场面。那时节，这些身着不同服装、胸前挂着相机的人们在中国人眼里差不多与天外来客一样神秘，而现在有些中国人也开始跨出国门了。

不久前，作者曾经与当年在大学里执教过的一位美国教授通过电话，无意间聊到北京出现的“购车热”。这位美国人感慨万分地说，这在他执教于中国的年代里是没有料想到的事情。

其实，我们当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人说，十九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二十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呢？有人说，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呢？也有人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重新走向辉煌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人们已经意识到：只要这种社会的变化持续下去，下一代中国人就完全有可能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国度里。

问题的实质是在于，中国人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度过新世纪的太阳升起之前所必然要经历的一段艰难时光？应当说，历史的发展给予每个民族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中国具备很多优越的条件，而现在最缺乏的则是经济实力和国民坚强的意志力。

可是，漫步在中国的街头，总是时时感觉到中国人不自信的地方。北京的一座立交桥旁气宇轩昂地树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广告词是：“毗邻亚运村，中国之长岛。”上海很有魄力地开发浦东，提出要使上海变成亚洲的又一个金融中心，打算建设一个金融发展区。本来是很激动人心的计划，也非要把它称为“东方曼哈顿”。让金融机构重新迁入上海外滩，力图使外滩发展成上海的金融中心，也非要称之为“上海的华尔街”。

明明是花费了巨额广告费用的中国白酒，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后面播出时，也硬要来上一句：“XX 酒，中国人的 X0”。任何事情，仿佛只要沾上外国，就变得高贵了许多，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眼下的怪圈。甚至连卖香烟的老太太，也在摊位上打出一辆印有外国香烟标识的阳伞，似乎这样做就很自然地得到了顾客盈门的保证一样。

对于这些缺乏国民意识的行为，中国人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这样做，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虽然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但加拿大人也很注意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加拿大政府规定，加拿大电台如果播放美国歌曲，播出者必须向演奏者和制作公司支付版税。即使是在酒吧和餐厅里播放美国音乐，也要支付版税。政府用这笔钱建立基金会，支持加拿大的演奏者和音乐制作公司。

作者有一位朋友在法国留学，这位朋友的体会是，如果轻易对一位不相识的法国人讲英语，法国人很有可能根本不理睬你；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规定是 60% 的节目必须是地道的欧洲节目，刻意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法国人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奎回合谈判里，对有关影视产品的争端中表现出的固执，也让美国人领教了法国人的厉害。在谈判中，法国自始至终反对将影视产品尤其是电影产品列为普通谈判项目，而是将影视称为“文化工业”，用意就是不让美国好莱坞占领国内市场。法国人的做法也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响应，欧洲联盟更是发表声明，要求乌拉奎回合谈判在“目前和未来”对欧洲影视工业给予“特别待遇”。

从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美国人在这一领域里的沙文主义嘴脸：1992 年，美国出口到欧洲的影视产品总值为 30 亿美元，而欧洲输往美国的数字则仅为 2.8 亿美元。但是美国的代表仍然不依不挠地叫嚷“没有赚到足够的利润”，要求欧洲各国作出让步。自始至终，欧洲人没有答应美国人的要求。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曾经告诉过自己的国民，必须学会讲汉语，即使每个新加坡人都讲英语，西方人也不会把新加坡人看成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在美国，有一群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被人们称为“ABC”，他们有着中国人的外表，但是只能讲英语，思维方式也完全是美国式的。然而在美国白种人眼里他们仍旧是“中国人”，而华人社会则把他们看成是“美国人”。这些人首先面临的的就是民族认同感上的危机，在社会上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群体，而在心理上则又找寻不到皈依感。白人有白人的社会，华人有华人的社会，他们该属于哪个社会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充分意识到必须具备强烈的民族抱负，并自觉地投身到本民族崛起的洪流中去的时候，这个民族才有可能受到历史的青睐。

在非洲的土地上，生存着一种蚂蚁，这种蚂蚁在遇到河流阻断去路的时候，总是会齐心协力地抱成一团，横渡大小河流。湍急的河流常常会冲走并淹死一些不那么幸运的蚂蚁，然而这群蚂蚁最终还是到达了河流的对岸，奔向新的生存环境。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感和抱负的民族在遭遇到历史宿命考验的时候，需要的也同样是。

## 如果美国要遏制中国，这将超出它的能力

〔美〕基辛格在今年四月份的一次谈话中，美国副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中美关系、亚太问题等发表了讲话，现将其谈话要点整理如下：关于中美关系我喜欢中国人民，70 年代以前，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此后我就一直研究中国文化，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并确实为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

这并不只是因为个人的好恶，因为我相信中美关系的发展附合两国的利益。现在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我们认为应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作为一个老人。我愿意回忆一些往事。早在 70 年代时，当时毛泽东是主席，邓小平是副总理。我和邓谈到我们中美两国都不有求于对方。毛泽东看了我的谈话记录，第二天接见我时，他称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我们若不想互相得到些什么，就没有必要见面了。实际上，我们是有共同利益的，都是因为时时方有所求才走到一起来的。《上海公报》的基本目的就是防止在东亚出现霸权主义。在维护亚洲的稳定方面，我们有共同利益，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互相有所求。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时，中方就反复强调“一个中国”的立场。

美国六任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承认中国这一立场。台湾也一直没有声称要独立。

但近来这方面出了问题。我认为，美国不应该改变立场，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一个省。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能表明不使用武力，对稳定形势会有好处。当然这只是表明中国的政治立场，并不表明中国在承担某种国际义务。美国在这方面不应该做任何事来鼓励台湾独立。我这个观点不只是在这儿说，在美国也这么说。美国应限制在台湾的官员级别，我们应该多对话。

在我们建交的最初 15 年里，我们从来没谈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主要谈如何协调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我从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我们两国应协调对外政策，我对中国国防部长不能按期访美非常遗憾，我希望双方重新安排这次访问，如果他能访美。我愿意在纽约邀请他参加一个晚宴。

现在中美间还在争吵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核技术。但这不是个大问题，而且照我看。可以以一个妥善的方式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并不比我们笨。它当然知道如果它的周围国家中出现新的核国家，首先对它不利。所以，如果我们以美国有一个国内的法律为理由，要求中国服从我们的不扩散主张。那是对中国的一种诬辱。它决不会接受。但如果我们和中国就此进行平等的讨论，不需要我们教训中国，它会看到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两国的专家再来讨论细节问题，这种争端就能解决。

今年是美国非常困难的一年，因为美国人在竞选中并没表现出任何远见卓识。如果中美两国继续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都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一向致力于中美友谊，愿意为它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我期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同中国军人会谈，以前我只是在一次晚宴中见过中国军人，其他就再也没有接触的机会了。

关于美日安全联盟在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后的前十年中，中国一直是赞同美日双方保持共同防务的关系的，你们的领导人向我们明确表明，希望我们在亚太地区留下来，你们的领导人也鼓励日本继续与美国结盟。我想日本独立防务比美日共同防务对中国更不利。而现在我们正是采取了共同防务的方式。

关于美国的战略思想不要认为美国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战略。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更没有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这是因为我们不像中国有 5000 年的历史，美国只有 200 年的历史，我们没有长城，

没有侵略过别国，也没有遭到它国的侵略，所以并不能以战略的眼光来看世界。

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战略是要阻止在欧亚地区出现一个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大国，那么，我要说，没有力量能阻挡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美国如果想遏制中国，这将超出美国的能力，耗尽美国的财富。而且也没有国家站在我们这边。

我认为，中国的军队如果向东南亚或者朝鲜挺进，那就会发现同美国处于敌对的状态。

但是，你们不可能那样做，所以，你们不会构成对我们的威胁。当前，我把台湾问题放在一边不谈，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

对俄国也是一样，美国并不想遏制俄国，只要俄国不把它的力量投送到边境之外，美国就不会认为俄国是美国的威胁。我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俄国的国内发展我们不干涉，但若向海外扩展，就成为战略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与你们不同，它是喜欢扩张的国家，而你们则不同。

美国向何处去，今年美国大选后会有一场大辩论。我在去年 5 月美国保守派人士举行的一次晚宴上，讲到了上面这些观点，他们不喜欢。但我认为 10 年内会有变化，美国的政策最终会朝着我的观点靠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关于今后 10 年内东亚形势今后日本将继续积极发展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很可能拥有核能力。它正在中亚、东南亚等地广泛投资，事实上是在包围中国。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很不稳定，它现在的状况绝对维持不了 10 年。俄罗斯未来肯定趋向民族主义，但其重点是放在欧洲还是亚洲还不一定，上个世纪它的重点是放在亚洲，后来放在了欧洲。而现在则很不稳定。印度正将实力向印度洋扩张。印尼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未来的亚太地区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将出现相互竞争的关系。

（潘星译）

## 中国：民间的觉醒

在这个千差万异的世界里，要做到不受干扰并不容易，以暴敛暴富而先发达起来的西方阵营，他们，总是怀着暧昧的心理对发展中国家指手划脚，言东道西。在充满殖民者腐朽气味的西方语境中，似乎他们的意愿就是上帝的旨意。

绝非耸人听闻，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西方人都在设计着他们的阴谋，中国二字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书上。一些坚持西方至上立场的西方人士认为，通过金融、科技、市场的垄断和不断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一样可以达到殖民主义的目的。因此，他们一方面微笑着和我们进行着经济贸易，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进行渗透，试图改变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使我们放弃自己的准则和立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事实说明，西方人和我们交往和进行贸易，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平等互利这个原则，他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只有围绕西方行事才能步入现代社会。尤其是美国人，他们言必提到美国制度和标准，时刻不忘炫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

力、甚至蛮横到要每一个国家走西方发展模式的地步。

但是东方可以走这条路吗？我们略为考察一下西方的发家史：绅士的英国大约是靠卖鸦片起家，算起来是近代最大的毒泉；而自由美国是一个武器走私贩子，法国也做了不少海盗行径，德国和日本做了什么，大家都清楚。可以这么说，西方国家的整个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就是世界人民的大灾难时期。这一段路我们没法走。如果我见到美国那位一贯对中国噪舌的参议员多尔，我会对他说：请闭上你的尊口，中国的事务中国人知道该怎么做。

的确如此，美国人说话越来越叫人烦。我相信每一个听到美国人蛮横话语的中国人，或者跟他们打过交道人的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这种想法。甚至约翰·奈斯比特，这位漫游东方并承认东方将成为下一个世纪的经济中心的美国人，他写了一本畅销书《亚洲大趋势》，他可谓是一个“西方忧患论”者，在以满嘴的殖民者话语论述了东方的成就之后，他告诫西方应该如何加紧与亚洲竞争，以维持西方在历史上的垄断地位，听起来仍是那样地刺耳。

美国和它的西方盟邦，给发展中国家的每一分美钞经济援助，都无不塞进政治附加条件。

他们从来都这样认为，受援国必须在按受美元的同时接受他们的种种无理要求。有钱，就可以而且应该左右世界的局势。这种霸道行径已经被诸多发展中国家识别。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多边贸易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谁都不是永远的庄家，美国也不是。事实说明，当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以后，就有几十万美国白领阶层恢复就业，将来，还会更多。波音、通用、福特、摩托罗拉、微软、IBM、麦道等等公司，正迫切地进入中国市场。以期他们已经停滞的经济重新振作起来，而其它西方列国亦不例外。纷纷为扩展中国市场而奔忙，甚至为市场的占有额而发生争吵。

在具体利益面前，西方人绝没有东方人的温良和谦，他们为中国潜在的数千亿美元的市场而勾心斗角。

逐步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已经较充分地认识西方。十年前我们还会把每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外宾，甚至给予他们某些特权。现在不同了，西方人在中国与中国公民一样，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而善良的中国人，也逐步学会和西方人打交道。

我们开始拒绝购买他们的三流技术，限制他们在中国掠夺性的投资，毫不犹豫地制止他们把西方工业的和精神的垃圾拿到中国来。中国决不是西方梦想中的后殖民地。早在数年前，湖北的武汉人民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武汉的经济发展在我国大约处于中游，这个城市与我国众多城市一样，希望有大数额外资投入。武汉新建起来的电视发射塔在与黄鹤楼隔江相望的龟山上。

当时号称亚洲第二，雄伟壮观。被武汉人民引以为骄傲。美国健牌公司相中了这个电视塔，几经谈判，购买下了塔身的广告权，于是，美国人在武汉电视塔上写下健牌的缩写字母。从此，那个电视塔形如一支巨大的健牌香烟，竖在武汉人民的心头上，看了是那么刺眼，那么不舒服。原本足以引为骄傲的建筑让武汉人感到耻，成为一块心头之病。时间不长，武汉人坐不住了。起先是武汉的学人发起讨论，主题是我们应不应该要这笔美钞，然后是武汉普通市民介入，他们认为，应该把这美国人的标记从电视塔上抹去，他们说，我们情愿全市人民每人每年拿出一块钱来，也不愿电视塔上有美国

人的广告。以后的事实是。健牌从此在电视发射塔上消失了，武汉人把一块心头之病去除了。

武汉人率先学会说不，这是中国民间的一种觉醒。

八十年代美国的麦当劳及肯德基长驱直入，挟太平洋彼岸之风吹遍中国。当时有一件被外国人当作笑柄的事在北京发生：麦当劳是西式快餐厅，它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早点或面食店。一对北京青年居然在里面举行了婚礼，无知和盲目的崇外令人哭笑不得。

但时隔不久，一位上海人来到北京东四，他专门选择在美国肯德基店的对面，开设了北京第一家中国快餐店：荣华鸡快餐店。这家快餐店从开设那天起，就把大量的顾客吸引过来，生意十分火爆。

稍后，河南人也不甘落后，把他们取名为“红高粱”的快餐店开到北京，意欲与麦当劳一争天下。

民间的觉醒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势必会成为中国的另一种声音。在中国人大代表督促下，中国政府下令禁止官员坐进口车就是一个例证。96年初，中国政府下令关闭国内所有的激光放映厅，以遏制西方色情文化对中国青少年的毒害。这也是在民众的敦促下由政府采取的断然措施。前不久，江苏省一位普通母亲含着泪水控诉了一家合资公司出售色情光盘对她的儿子造成毒害。这个时间，正是美国参众两院以保护知识产为名扬言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之时，这里面是否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方面对中国横加指责，但他们的公司到中国来无视中国法律和民众利益的事例越来越多。近两年来，中国公民起诉西方公司的案例直线上升，仅北京一地，在过去的一年中就有数起全国有影响的诉讼。北京两位普通工人耗时数月，迫使日本一家公司为不实广告之举公开道歉认错。一位北京老人，也为美国公司出售的劣质心脏起搏器愤而起诉。西方人抓住中国民众喜欢洋货的心理，一些公司见利忘义，甚至以为中国民众软弱。在产品质量、标准和售后服务上大打折扣；而向中国一些地方企业出售淘汰设备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今后西方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必须老老实实。欺骗和掠夺再没有市场。这是我们要正告西方人的地方。

西方人与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还会使用一种伪诈，采取一种非对抗手段，在一片友好、伟大的赞扬声中，巧妙地把危害环境、影响生态的产业推向中国或者其它发展中国家。这种恶劣的行径也逐渐被中国知识阶层揭穿。“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羊绒！”这是意大利以生产羊绒男装闻名于世的杰尼亚时装公司总裁赞扬中国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在北京农学院陈济生教授的耳里，是那么的刺耳，并且引起他的震怒。意大利人喜欢中国的山羊绒，日本人爱吃由中国进口的山羊肉。陈济生教授愤怒他说，他们爱穿，爱吃，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养？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几乎都已经不养山羊，最重要的原因是养山羊会破坏生态环境。山羊适应性强，可以把植被啃光，树叶、树皮、甚至连草根都不拉下，这使得发达国家限制他们的农民养殖山羊。他们需要的羊绒及山羊肉都依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口，所以，他们在得到羊绒和羊肉之时会这般赞美你，目的显而易见，用心昭然若揭。

英国现今暴发的疯牛病，震撼欧盟和整个世界。欧盟各国纷纷抵制英国的牛类食品。

中国是较早抵制进口英国牛的国家之一。早在 1990 年，由中国动植物



检疫总所起草、由农业部批准的一份《关于严防牛海绵状脑病传入我国的通知》，明文禁止从英国进口牛类制品。

但这是一次艰难的抵制，英国方面一边以优质牛品种为名鼓动中国地方进口其牛种，一边对抵制部门施加贸易压力，甚至以扶持中国农业为名鼓噪。他们最终没有得逞，中国进行了一次有效的防范。这个事例说明了西方国家心理的阴暗。以中国当时的检疫技术和手段，已经得出英国牛有疯牛病，比中国科技发达的英国，绝对不是检测不出来。

由此可以看出，在和西方人打交道时。我们决不能放弃我们的原则，不然，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带来太大的损失。

与西方人打交道，我们已经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这就足够了。余下的事情，是我们在谈判桌上平等地利益共享，我们可以把他们不合理的要求推回给他们，同时，告诉他们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这是一件如同喝茶一般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却付出了整整一个世纪，这个世纪我们付出太多了。

但是，我们仍要警惕的是，西方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霸主地位，他们总是会在经济以外寻找事端。美国已经别有用心鼓噪中国威胁论，以图在远东挑起争端，谋求更大规模的军事插足，这需要我们的明察。美国人的军事干预从来就不做亏本的买卖，海湾战争的赢家只有一个，它就是美国。波黑再度给美国提供一个武器市场，习惯发战争财的美国，他们有这个传统，并且轻车路熟。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如没有世界军事争端，诸多候选人就无法在竞选中大作文章。卡特曾想从伊朗解救美军人质的军事行动中争取选票，卡特的不幸是那次行动失败了；里根把砝码压在星球大战上；而布什的海湾行动更加明显；现在的克林顿及多尔，都把运气放在台湾海峡上。美国这个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它如果不树立敌人，似乎就没有了生活的目标。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当他们“最后的敌人”前苏联解体以后，他们陷入迷茫，无法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今天，中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在未来的 20 年中，经济将得到稳步快速的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而中国的近邻，其它亚洲国家也会以骄人的成就崛起。东方的复兴使我们这个星球的经济中心偏移，后发达国家将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大部分市场。西方的市场资源会受到极大的遏制、萎缩。二十世纪末活跃的西方资本随着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巨增，将不再是诱人的馅饼。而西方经济却进入了一个大的调整期，失业率空前高涨，国内问题暴露，矛盾重重，亚裔人才回流，甚至西方的高级人才也纷纷涌往东方。

亚洲国家不再是为争夺投资而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而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西方高级人才。

随着西方神话的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东方文明的复兴。为争夺市场，西方阵营磨擦加大，美国与欧盟发生不可弥补的裂痕，日本也准备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好处，中国已无可争辩地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也许，我们可以看到百年轮回的一个奇异现象，西方将再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资本一个可能的去处，那就是非洲。但非洲也将是一块觉醒的大陆，他们会不会任西方宰割，这看来不是一个未知数。

诚然，在今天，我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自己终将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用不着西方来指手划脚。包括海峡两岸的问题。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祖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代化的进程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历史的车轮毕竟是向前的。面

对西方，他们的科技、投资我们需要，但也是他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附加条件，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我们现在说不的声音还不够洪亮，但毕竟开始了，这是足以让我们心情舒畅的一件事。很好，我们扔给了西方人一个反思的机会，这是二十世纪最后日子里的一件东方式的圣诞礼物。

## 人权牌的结局是让你最终丧失人权

制裁是美国首脑的口头禅。制裁的理由种类繁多，如果汇编成一本《美国制裁大百科全书》，将是当今世界一部非常宏伟的著作。可以开创一门“制裁学”，让全球的学者们共同探讨美国的制裁文化。但不论制裁的理由有多少，最终一点，就是你不要违背美利坚意志，这一条是根本大纲，如果不清楚这一点，绝对拿不到博士学位。

自越战以后。美国人民厌战情绪和国际舆论导致白宫不敢赤裸裸出兵侵略他国，而白宫首脑又不甘心不干涉他国内政，经济制裁就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骨子里的念头就是，把这个国家先搞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再唆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发动内战，或者起来推翻现政权，从而扶植亲美政体。这就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嘴脸。

美国的所谓制裁，大体上有两种手段，一是经济封锁，二是军事围困。美国对弱小国家进行制裁的把戏年年上演。甚至对西方盟国也明有恐吓。民主和人权是美国人叫得最响的词汇，也是惯用的制裁由头，可是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很多国家的经济一蹶不振，人民失业，食品短缺，生存受到极大威胁，以剥夺人权的办法来逼迫一些国家改善“人权”——动机实在单纯。

不知道美国的哲学思想怎样来解释这一悖论。我想，以美国的侦察卫星、情报特工网络的发达，不是看不到被制裁国的人民在制裁期间的生存状况的，甚至连侦察都不要，即在制裁前便可以预想到制裁的效果。一个资本不能流入，产品不能输出的国家，首当其冲的受害人是谁？当然是该国的人民。

那么，再让我们考察一下美国的人权纪录。就在 1996 年 4 月 1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高速公路上，一辆载有 20 余名墨西哥人的货车被美国警察截住，墨西哥女子莱蒂西亚·冈萨雷斯和她的男友遭受到两名美国白人警察的残暴殴打。这位柔弱的女子，像成千上万墨西哥人一样，怀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她想象中民主自由的美国，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一踏上美国国土，这个一贯标榜人权的富有国度，却是用警察的棍棒来迎接她。当被打后，电视记者来采访她，她像一个吓坏了的孩子，闪着痛苦的泪花。针对这个严重践踏人权的事件，墨西哥政治协会主席维多利亚·贝卡女士是这样评述的：这并非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警察老爷的拳打脚踢被拍成了录像带。

美国警察的粗暴野蛮，决不止这一次，1991 年，黑人罗德尼·金遭到四名白人警察殴打的事件立即引起洛杉矶骚乱，造成 58 人死亡，3000 多人受伤，想必美国人不会忘记。

而这一切，又该由谁来制裁美国？民主和人权至上的白宫首脑们，也没有一个因此而引咎辞职。

看来，美国也不过如此而已。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做出断决，外国人在美国得不到人权保障，美国人就不应该要求他们的公民在外国享受充分人权。一件颇值玩味的事是，美国人最近又为他们的同胞在日本监狱过得不太舒服而提出人权要求。只不过是这三名美国人不是非法移民，而是强奸了一位 12 岁的日本少女的强奸犯。

去年 9 月，三个美国驻扎在日本冲绳军事基地的美国士兵强行轮奸了一位 12 岁的日本少女，他们被判处 7 年徒刑，关在日本横须贺监狱。这座监狱要求关着的美国犯人与日本犯人一样，要严格遵守监狱的规章，每周五必须工作 8 小时，另外，每月给予 37 美元工作报酬，不许使用电话。美国一个人权组织代表团前来视察后，立即对日方监狱提出批评，理由是在横须贺监狱关押的犯人遭到十分严格的管制，以致于使他们的精神长期处于恐慌之中，不符合保障人权的要求。这种批评，大约只有美国人才提得出来吧？或许，美国人会以为，他们的批评是非常正常的，但在东方人眼中，却是要滑天下之大稽了。对待这样一帮禽兽不如、居然强奸 12 岁的少女的人，总不能把他们安排到度假村或者五星级大酒店去吧？同时我们不禁要问，那位不幸的少女的人权，是那么不值钱么？美国人到底是美国人，我们只能这样说。美国人侵犯别人，不是侵犯人权，而别人侵犯了美国人，那就是侵犯了人权，哪怕是这样三位“英勇的美国士兵”。所以美国一贯是从尊重人权始，到蔑视人权终。无论在其本土，还是在世界。

有一位朋友笑云：美国是一个“我要”式的国家；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要你不准干我才能干的事；你不准动筷子，我要通吃……如此等等。仔细想想，这实在是一个蛮横的黄口小儿的作派——作为美国又不会这般简单了。

## 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

将来也不会给你这个待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这个二战后暴发起来的新贵，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家伙。美国没有传统文化价值观，嘻皮士、朋克、极端个人主义代表了美国的总是短命的思想潮流。据说，美国开始搞足球联赛前，就准备扩大球门。如果真的这样实行的话，传统的足球价值观在美国就大打折扣。克林斯曼、马特乌斯、巴乔、桑切斯等等世界大球星的风采不再，因为一个扩大了球门足以使美国的三流球星成为射门机器。美国就是这样来消解他人威权的。

美国的商业贸易同样如此。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猫匿着许多东西，而最根本一条，就是满足美国的霸权欲。自从 1980 年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以后，美国就从来没有一天不试图用它来干涉中国内政，极尽歪曲、羞辱之能事。首先，美国将这个世界的国家划分一二三等。以富有和接受美国话语为第一等；二等为与美国亲近，并能制肘别国的国家或者地区；三等为保持

独立尊严，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对于这后一等，美国即用这最惠贸易国条款来向对方加塞美国种种私货。以中国为例，美国两会在每年一度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讨论会上，蛮横地加入美式的民主、人权条款，直至要中国放弃台湾和西藏。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使贸易最惠国待遇里面的猫匿昭然若揭。

中国完全可以不怕美国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的民众也决不会答应放弃领土主权来换取美国的区区美元。这是美国人应该看到的。

假如我们不要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否就无法进行了呢？从过去的美国经济制裁证明，并非如此。中国减少向美国市场出口，弊处是中国会减少美元收入，外向型企业受到相应的制约，减少一定就业机会，这是中国暂时必须克服也能够克服的困难。

但这一点，美国和中国是对等的。而以中国目前投向美国市场的产品结构来看，则并不完全无利。中国目前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多以资源类为主，农业、手工业产品出口美国仍占主要成份；另一种是，损害环境的工农业产品。从留住资源，保护环境的长远利益来看，倒未必是弊。

相反，美国公司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良机，将使他的盟友和竞争对手在中国大获其利。

他们在中国获得市场以后，即以中国为基地，将贸易扩展到中国周边国家，从而在整个亚洲市场上占有大量份额，这对美国公司不能不是一个重大打击。从目前的势态看，美国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比他的伙伴略逊一筹。尤其是日本。在电子产品、汽车和工业设备上，日本和德国已经领先于美国；在通讯业上，爱立信与摩托罗拉平分秋色；美国在中国较有竞争优势的 IBM、微软、AST、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等公司，前景也并不明朗。

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采取敌意政策。中国民众很可能会把购买力转向别国或者国内品牌。

美国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中国民众自觉抵制有敌意国家的产品是有传统的，如果中国政府还能胸怀大度地宽容美国人的话。

白宫还应该看到的一点是，在当今这个世界，独霸全球的梦想是实现不了的，即使是使用航空母舰和核弹。一个贸易条款的神威更是要大打折扣了。弄不好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白宫在对他国的虚张声势，指手划脚，任意指责的同时，美国的公司却忧虑重重，担心他们苦心经营打开的中国市场被白宫的政客们毁于一旦。美国的公司和民众如果不遏制白宫的随意性和虚荣心的话，他们受到的损伤将是最实质性的。

美国人素来有自恋情绪，而白宫更有煽动国民歧视他国的传统。为了选票哗众取宠，夸大、歪曲事实，既伤害他国人民利益，也伤害本国人民的利益。白宫在今天应该意识到，玩弄相同的一种戏法，最好不要超过三次，不然观众会全部退场。贸易最惠国待遇这着棋也是如此。

尼克松的《超越和平》可以看作是他献给美国的政策遗嘱。这位经历复杂的前总统在上帝频频召唤之时目光似乎更深远了。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要再拿什么最惠国待遇去为难不可阻遏的中国了，也许，二三十年后，中国人会为到底要不要给美国最惠国待遇而争论不休呢。

我相信报应。我深信会有那么一天——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要记住仇恨！维护领导地位的方式是：制造争端，再去调停。但

这是最拙劣的美国的国土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问题又好像很清楚，美国在美洲大陆。

但是，我们分明又看到满世界驻着美国兵，满大洋游弋着美国的军舰，而且年年都在美洲以外听得到美国的枪炮声。美国一贯喜欢私闯民宅，不请自到，没有乱子，他还会送上乱子。

前总统布什有一个讲话很能够说明他们的心态。

海湾战争之前，美军来到海湾地区，他们是来维护所谓海湾和平的，起码他们自己这么说。他们来到之后，给了伊拉克一个最后通牒，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退兵，否则，将向伊拉克宣战。伊拉克没有退兵。萨达姆强硬得可以，结果当然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布什说，当时伊拉克没有退兵，如果他们退了，将是一件非常令人尴尬的事。

尴尬之处在于，美军继续留在海湾的理由将不充分。

50 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日本冲绳县地方官都不肯在美国军事基地的继续征用土地合同上签字，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以民主和人权为准则的美国是否听到了日本人民的声音呢？想来是一定听到了，但他们为什么不滚回去？要保持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这是美国人的话。

但你一个美洲国家，跑到远东地区来保持军事实力干什么？美国人现在说，要遏制中国的威胁。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不远万里，跑到别人的家门前抽刀拔剑，虎视眈眈，来遏制别人的威胁。暂且不说它的荒谬，就是在美国本土，华盛顿的警察，可不可以跑到纽约去长期执勤？中国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中国一心一意发展国内经济，所谓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军队没有去美洲，而美国军队却呆在亚洲，呆在中国的周边，到底是谁威胁谁？美国已经变了，这个打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用鲜血换取了独立和尊严的年轻国家。

又在二战反法西斯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暴露出国家结构上的缺陷。这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国家，很难说不会步大英帝国和德意日异想天开欲统霸世界的后尘。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多少防务力量才够？》的社论，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看了肯定要吓一跳！社论说：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美国的军事开支比其它国家最高者还要多出两倍多，实际上，它超过了美国所有潜在敌人的军事开支总和。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受到比美国军队更好的训练。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装备有美国的精良。然而，许多富有思想的观察家（这些人并非总是国会议员）仍然怀疑国家的安全需要是否得到真正的满足，尽管国家每年的军事预算达到 2600 亿美元。

在 40 多年的冷战中形成的防务计划和政策，以及由此制订的防务预算，已不适合冷战后的时代。美国尚未在明确美军应该准备执行什么军事使命的基础上，为新时代制订出连贯一致的政策。

10 还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今天的军事开支是几十年来最低的。国会的一些人对此感到惊恐，要求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但是又无法具体地说明为什么需要增加预算。为增加开支而增加开支对确定防务战略毫无帮助。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劳伦斯·科布在最近一期的《外交》季刊中所指出的：“防务开支应该根据潜在敌手和盟友的努力来衡量，而不是根据前美国政府来衡量。”用这种常识的标准来衡量，2600 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看来绰绰有余。相比之下，俄罗斯只有 800 亿美元，中国不到 300 亿美元，伊朗、伊

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朝鲜和古巴，加在一起约 150 亿美元。

克林顿政府就职以后不久，国防部对冷战后美国的军事需要进行了它称为自下而上的审查，最后的结论是，美国应该保持差不多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能力。估计的作战地区为东南亚、阿拉伯半岛或周围以及朝鲜。根据这一估计对需要作出了规划：总兵力 250 万。其中 100 万为预备役人员；12 个航空母舰作战群，共有 346 艘舰只；20 个航空联队，184 架战略轰炸机，3500 个核弹头。

这个预算，或者说防务，是不是试图要将阿拉伯半岛及朝鲜摧为平地？同时也说明了美国的另一种心态。在冷战时期，美国有苏联这个对手，他们军事力量存在的价值毫无疑问；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防务计划大大复杂。因为他们一时还没有找到潜在的敌手，这大约是美国人，起码是白宫很烦的一件事。没有敌对力量的美国，如何来制订他的防务计划？按说，这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大家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可以铸剑为犁，马放南山，加速经济发展了。但美国“有思想的人”可不会这么想，相反，他们的防务范围扩大了，他们甚至要把常备军事力量保持在可以同时打胜两场地区战争的规模上。这些“有思想的人”的确令人害怕。

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威胁到全球的安全。事实上，美国的军事威胁已经让世界人民感受到来自太平洋那边的阴影。我们甚至可以推算出我们的头上，多少人拥有一颗美国核弹头。

美国人为我们预备好的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决不要把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那批人想象成只会大把大把地花钱的花花公子，每年拿着 2600 亿美元去打水漂。不，他们的这笔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高的，决不是美国的大豆和小麦可以匹敌的。以战养战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基本思路。比如海湾战争，赢家是科威特吗？是阿拉伯世界吗？是群涌而至的西方盟友吗？都不是，唯一的赢家是美国。美国在海湾不仅名利双收，实验了他们的高性能战略武器，锻炼了美国士兵的作战能力，达到了向全世界炫耀军事力量的目的，而且为美国品牌的战略武器作了一个空前的示范广告。他们不但得到了短期利益，也为武器输出的竞争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仅爱国者导弹的订单一项，五角大楼的军火商就足以笑得合不拢嘴。在海湾战争中，希望分得一杯羹的美国的盟友，或许至今也没有想到。他们只是做了一次陪衬人的角色。

他们的飞机、坦克和导弹，在美国的品牌面前黯然失色，使得原本的市场也受到威胁。

他们出钱、出武器来陪美国玩了一场游戏。

这个游戏是揍一揍那个恶棍萨达姆，甚至不乏羞辱一下苏俄的飞毛腿。但是，他们也仅是衬托一下美国品牌的武器而已。说句过头一点的话，西方盟友手中的家伙落得的实际结局比飞毛腿也好不到哪里去。

也唯有制造区域紧张，以进一步搅混水，把局势引向动荡及军事争端，各争端国才会挤出巨额的外汇储备，纷纷找五角大楼采购武器。由此看来，美元的坚挺，导弹和炮舰也有相当的功劳。美国五角大楼每年从各国到底实现多少美元的货币回笼，大约只有五角大楼心里清楚，而不是商业部。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为了在军备中占有绝对优势，战略武器不断升级更新，在这种升级和更新中，当然要淘汰大量的过时装备，这个淘汰过程，

没有一个巨大的武器市场支撑，仅靠美国纳税人的钱，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些美国“有思想的人”敢说，“防务开支应该根据潜在敌手和盟友的努力来衡量，而不是根据前美国政府来衡量。”这些人为什么敢夸这样的海口？前提当然是美国的军备输出了。

聪明的美国人真不愧于他们的西方盟主地位，连比他们发达得早得多的西方盟友都肯被他耳提面命，美国式的智慧所走的作用着实不小。你看看吧，美国不断将他们过时的军备卖给人家，优势却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中。美国的顾客，也可以拥有相当的打击力量，但不是绝对的打击力量。比如对待萨达姆，他就不愿置他于死地，虽然阿拉伯世界希望这样。但是，你想想，如果美国彻底地消除掉萨达姆的威胁，阿拉伯世界还会那么热衷于采购美国的军火吗？还有，阿拉伯世界还会心甘情愿让美国把军事力量保留在海湾吗？事实上，世界上哪个地方局势不安定，美国在那个地方的军火生意必定好。关于萨达姆失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美国的小动作，或者说是一个阴谋：当萨达姆在西方采购武器时，美国得到情报闻风而动，将计算机控制的防空系统塞进了美国制造的芯片，而这些芯片中，装有美国事先研制的可以操作激活的电脑病毒。当他们向伊拉克进攻时。提前激活了伊拉克防空系统电脑中的病毒，使得伊拉克不战而败！

## 有两个克林顿：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看起来合法的

言必谈法制也是美国的一大特色。法制是现代社会的 basic 特征，但美国的法制有时候也走火，而且不是一般地走火。比如，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便是一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写进了中美三项联合公报。但是，白官却要立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并且纳入它的对华外交政策，这显然是一种走火，有意的走火。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跟一个合法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再跟该国一个与政府对立的地方省份保持关系，从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道义上，也不是君子所为。诚然，美国要制定什么法，比如说白人警察可以毒打黑人而无罪释放，大家顶多只有以人权和种族歧视在道义上声援美国黑人，谴责美国政府粗暴侵犯人权。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会像美国把坦克这种东西开进巴拿马去，将人家的元首捉将起来，在美国的法庭来进行审判那样，来对待美国。因为大家清楚，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还只有由美国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处置。如果别国以此为理由而把坦克开进华盛顿的白宫去，捉拿克林顿或者佩里，那样，是不是很有趣味？白宫会不会由此而赞美你是为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战的民主斗士？甚至提交一项议案，请求诺贝尔和平奖评奖机构为你颁发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我想不会，美国不会给你香槟酒，要给，只会给你一颗原子弹。

我们到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种种特权，可以做出超越常规的别国不可以做的事情。美国人认为，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朝鲜和古巴这些国家，是一些无赖的国家，指责他们不以常理做事情，美国人对他们很烦。然而，美国的一些做法比如《与台湾关系法》，

是不是也叫中国很烦？美国到底有多少类似于《与台湾关系法》的对外关系法？这大约只有资深和十分敬业的美国专家才清楚，而美国到底算不算一个无赖国家呢？关于这一点，暂且不去评述，但从美国做出任何一件事都有道理这一点来看，似乎很有嫌疑。

台湾当局试图谋求独立，甚至不惜花巨额美金购买联合国席位，这让数年来在东南亚无所作为的白宫感到天赐时机。白宫一方面向李登辉眉目传情，许以李登辉进入美国本土，鼓舞台湾方面士气；另一方面温习《与台湾关系法》，寻找在东南亚重振威风的机会。于是，当中国军队在东南部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并警告台湾当局不要分裂祖国、阴谋独立的时候，白宫找出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并把航空母舰开进台湾海峡。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到底算什么关系？一个堂堂的美国，居然一直试图想和人家一个小省份保持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即使是白宫云集两大党派的高级政客，也是难以说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来的。假如中国现在要为保卫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而战，白宫是不是会感到很荒唐？是的，肯定很荒唐。因为佛罗里达州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也是美国的，由中国人去保卫他们是不合适的，中国如果把军舰开到纽约港去保卫中国的利益也是不合适的，那是侵犯美国的主权。

所以，我们坚决认为，美国把军舰开到台湾海峡来，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是藐视国际法准则的典范。中国人是坚决不能够答应的！同样，利用西藏问题制造事端，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是徒劳的。

美国堕落了，而且是越来越堕落了。我们可以这么说，它不再是那个为独立而战的國家了，也不是那个把国家统一视为神圣的國家了，更不是那个反法西斯反侵略的國家了，它已在霸权欲望的极度发酵下变质，变得它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另外美国还是一个喜欢搜罗叛逃者及犯罪分子的国家，似乎只要是叛逃者，甚至是刑事犯罪分子，只要他们在白宫门前表达他们反对其政府的意愿或者言论，白宫都会将他们尊为坐上宾。因为美国因此又有了了一个声讨别国的借口，一次满足霸权欲望的机会。

讨厌而又徒劳的美国。

可鄙而又可怜的美国。

不知未来走向的美国。

## 美国：享受战斧

美国会亲自尝到自己出产的战斧式导弹的滋味吗？有一天，忽然有一枚战斧式导弹落在白宫的草坪上，发生比俄亥俄州大爆炸更为厉害的爆炸。这今爆炸今美国朝野震惊，他们会立即一边抢救一边清点导弹库中的战斧式导弹，终于清点完毕时，他们仍然十分困惑，因为导弹库中的战斧式导弹一枚也不少啊。当他们转而清点战斧式导弹的销售清单时，他们才猛然清醒，原来这是他们卖出去的战斧式导弹，当他们搞清了对手或者说作案者，便愤而发起惩罚式反击时，他们的导弹却又遭到对方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反击无



效。这是天方夜谭吗？不，非常有可能。如果它继续毫无节制又无原则地输出武器的话。

美国毫无节制地出售武器出来已久，因为武器销售，可以获得比任何商品更高的利润。

这个高利润可以支持美国超出任何国家的武器工业发展，从而保持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的地位。虽然克林顿政府专门制定了一项核心为“美国和其它政府在销售武器系统方面实行节制”的政策。编入到一项名为“第 34 号总统决定令”的文件中，但由不得美国的忧患之士庆幸，因为这种节制只是纸上谈兵而已，白宫并不打算实施。克林顿政府支持制订武器销售贷款计划的立法，还派遣商务部长布朗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武器装备展览会，反对国会提出制订一项美制武器接受国行为守则的决议。克林顿政府根本没有让美国军火商毫无作为的意思，他甚至觉得，在他的任期内有必要“维持国防工业基础”。

因此，美国享受战斧的前景仍然存在。

当美国将军火像吉利剃须刀、可口可乐那么随意销售时，美国当然也要笼罩在军事打击的阴影中，事实证明，美国在出售武器方面并没有什么安全考虑，美国的军事输出往往为区域争端火上添油。美国士兵也是相当感受到这火的热度。从 1990 年以来，五角大楼将他的士兵五次送往那些争端地区，五角大楼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他们是到那些地方去平息争端，恢复和平。这种理由相当不错。他们前后去了巴拿马、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

据五角大楼的情报称，前四次美国参与的冲突中，美军的敌手在发生冲突之前都曾接受过美国政府提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军事训练。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五角大楼提供的武器、技术和训练，又让五角大楼遭遇上了，这是一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还是自讨苦吃？当然，最终受到战火煎熬的还是发生争端地区的人民，他们在无休止的冲突和争端中饱受战争沧桑，失去家园乃至性命。他们决不会像美联社的记者发回华府的战况报道中的赞叹那样：美国的巡航导弹性能棒极了。

他们面对乌鸦一般密布天空的美国战斗机群只会感到暗无天日，祈祷上帝或者胡大，赶快收回这些战争的魔鬼吧。还我们安宁平静的日子，别让我们的孩子在战争中失去食品和受到伤害。

的确如此，五角大楼把自己在过去 10 年中提供武器的数据同这期间发生的 50 场重大战争的名单作出比较，在那个时期进行的 50 场冲突中，90% 牵涉到在发生冲突之前曾接受过一些美国武器或军事技术的一方或多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战争和冲突的美国化率正在迅速增长。美国的武器，美国的军事技术，握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立场的人的手中，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进行角逐，同时还有美国的情报人员及美国士兵。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有一个白宫和五角大楼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话题也是他们没有节制地销售武器和屡屡介入区域争端而向美国民众交待的借口，即是“扩大民主国家”。

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话，连美国朝野的反对派要说“不”都必须慎重小心。否则，反对扩大民主这绝对是一顶不好戴的帽子。民间势力说说也罢，如果准备入主白宫主政的人说不，说不定会连起码的机会都丢掉。因为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语境中，不参考世界区域争端已经成为不爱美国的代名词。

不过，五角大楼的主人并非都像共和党议员多尔那么迟钝，国防部长佩里在去年就指出：“许多国家，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前华沙条约联盟，正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武器。”

因此，美国军队必须作好准备，应付范围广泛的各种武器系统，其中包括以前在美国生产的一些武器系统。”佩里的确很敏锐，起码他已经弄清楚了美国现在受到来自哪一方面的威胁，知道这个世界上将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为美国人感到高兴，佩里部长的发言确实证实了美国的战略研究向前迈进一大步，彻底明确了五角大楼的防范目标，甚至可以减省多尔之流的一类议员满世界寻找对手的无功之劳，五角大楼终于确定了他们的敌人是谁。但有点儿不妙或者不大好说出口的是，这个敌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

## 不死的麦卡锡

今天的美国，似乎已经进入一个后麦卡锡主义时代，这些“承接麦卡锡衣钵的人”正阴谋立法，邀请“台湾总统”前往华盛顿。他们还促使美国国会议案承认西藏要求脱离中国取得独立的权利并将授权政府支持“独立的台湾”在联合国获得一个席位。这些后麦卡锡主义者，他们的作为除了再次把麦卡锡时代的黑暗和耻辱重新带给美国人民以外，不会再有其它什么结果。我们相信在美国只要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会像玛格丽·蔡斯·史密斯在《良心宣言》中说的那样：我不想看见共和党依靠诬蔑他人的四骑士——恐惧、无知、偏执和诽谤去赢得政治上的胜利。

麦卡锡主义时代是美国政治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个时代，它使每一个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如坐针毡。那个时代距今已有40余年。麦卡锡何许人也？他有哪些政治上的杰作？很有必要提醒美国人重温下那段历史。

1950 疑分子的运动。他把自己装扮成保卫美国免遭国内外敌人侵害的爱国者。批评麦卡锡的人们愤怒地指责他根据谣言和影射粗暴地破坏他人的职业和名声。麦卡锡以共和党参议员的身份，指责杜鲁门政府任命的国务院官员都是叛国分子，他们丢失或放弃了一些国家，让共产党人上台，对共产主义软弱。从1950年初麦卡锡声称国务院充满了颠覆分子到1954年12月，这位臭名昭著的共和党参议员遭到参议院同僚们的激烈谴责，美国整个国家都笼罩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中。在那个期间，美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国家，因为谁都有可能被随时的、恶意的指斥为颠覆主义分子，没有人会有安全感。

但终于还是有人站出来了，他们无法容忍麦卡锡的胡说八道、诬蔑和诽谤、专横和卑劣。

他们是共和党的参议员——新罕布什尔州的查尔斯·托比、佛蒙特州的乔治·D·艾肯、俄勒冈州的韦思·L·摩斯、明尼苏达州的爱德华·J·塞、纽约州的欧文·M·艾夫斯、新泽西州的罗伯特·C·亨德里克逊以及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他们签署了反对麦卡锡策略的《良心宣言》，这份宣言由参议院中唯一的女参议员史密斯起草并在参议院发表演说。

如今重读这位女参议员的《良心宣言》，仍让人感受到这位女参议员的正义感和真正的人格力量。同时，也可以用来比照一下现今。美国国会某些议员们的人格和心态。

史密斯在《良心宣言》中说：作为少数派政党的成员，我们不具备制订我国政府政策的权威，但我们确实有以下的责任：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澄清问题，以认真负责的公民的行动减少恐惧。

作为一名妇女。我想知道母亲们、妻子们、姐妹们、女儿们对她们的家人在参议院辩论中遭政治攻击有何感觉——我使用“辩论”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作为一名美国参议员，我对参议院被用作公共讲坛以散布不负责任、耸人听闻的传闻无法感到自豪。对从走道这一恣肆无忌地抛出未经证实的指控，我无法感到自豪。

对走道的另一边显然是装腔作势、不庄重的、旨在报复的对参议院已被用作诬蔑中伤的场所，用作以牺牲他人名誉和国家统一换取政治利益的场所，我感到不悦。对我们从参议院议员席上诽谤外界人士，把我们自己藏在国会豁免权的保护衣后面，稳坐参议院议员席不受任何批评，我无法感到自豪。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既不希望一个民主党政府粉饰太平，遮遮掩掩，也不希望一个共和党人诽谤他人，搞政治迫害。

史密斯参议员《良心宣言》中的这些话，是说给麦卡锡的，也是说给麦卡锡主义者的，更是说给美国权力走廊里所有踱步者的，它是一种良心的声音。这种声音已经存在着 40 多年了。然而，今天的后麦卡锡主义者愿意听《良心宣言》吗？根据麦卡锡的逻辑，只要反共，就是正确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那么，只要反对中国政府，他就是对的，是爱国者。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找出反对中国的理由。而最好的突破口，或者说，最能够伤害中国的，就是煽动台湾独立以及扶持达赖势力，谋求台湾和西藏脱离中国。

这些后麦卡锡主义者跟史密斯痛斥麦卡锡说的那样，他们想靠诬靠他人的四骑上——恐惧、无知、偏执和诽谤去赢得政治上的胜利。借助国会的讲坛，散布谣言，混淆视听，哗众取宠，对世界和平和他国内政横加干涉。我觉得每一个有良心的美国人都应为此羞愧。

后麦卡锡主义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市场，因为冷战已经结束，他们渲染的那种对美国的威胁也并没有出现，人们也不再会相信美国国会充满了颠覆主义分子。麦卡锡那种心理变态的人，即现在的我称之为后麦卡锡主义的人，他们不可能再取得麦卡锡当年的成果。从当时的环境来分析，那时候，二战结束不久，许多在二战中的战胜国包括战败国，都面临着一片战争以后的废墟，只有美国远离战场，在战争的后期事实上代替了英国成为盟国的领导国，美国说话的市场相当强大。因此，麦卡锡才能够借助诸多英雄用鲜血换来的地位胡作非为。今天的后麦卡锡主义者，则在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美国虽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经济上却无法一统天下；在文化上，越来越多麦卡锡时代以后出生的人，对美国这种麦卡锡主义遗风极为不满。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冷战专家们忽然产生一种失业感，一下子无所适从。这批人理所当然地把对准苏联和东欧的目标转移向中国，他们希望重操旧业。

但中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向着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局面发展。另一方面，前苏联和东欧人民发现，当他们开始进入西方模式时，美国的冷战专家们不过是一群见利忘义的货色，并没有像冷战时期那么对他们关注。既没有道义上的支持，也谈不上经济上的帮助，最终的问题还是得靠自己解决。这个世界的规律原本就是这样，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语，要吃桃子自己栽。

因此对于后麦卡锡主义，我们仍不能放松警惕，更不能心存侥幸。既然他们在国内可以像史密斯说的那样，在国外他们也决不肯放弃制造混乱的机会。他们会给我们制造麻烦，在鸡蛋里面找骨头。他们有挑唆煽动的专长，尤其是在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希望该地区多出乱子，以获得插手亚洲的籍口，骗取美国民众的选票。我们可以告诉后麦卡锡主义者，如果不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索性还是学一点做人的基本原则，不要丧失起码的人格。

## 如果需要，还可以弄出一个萨达姆

拳王泰森在狱中皈依伊斯兰教的消息并不令这个世界震惊，因为泰森是一个公认不守规矩的坏孩子。坦白地说，这个坏孩子即使做出更为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我们只欣赏他的拳技，喜欢看他把凶猛的右勾拳击在他的对手福尔茨，或者鲍的头上。

但是，美国的中东建立其权威，逐渐扮演伊斯兰国家盟主的角色，却比泰森的举动更教人叫惊，并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忧虑。如果我们看见海湾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正式亮相，带着西方盟国及阿拉伯国家玩了一场拿导弹打萨达姆的游戏，我们却不要忘了，这场游戏的开场锣早已敲响。早在美国放弃越南战场以后，卡特总统就把以色列和埃及拉到戴维营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并派出美军进驻西奈沙漠。在戴维营时期，阿拉伯国家还没有嗅出美国的意图，他们直接的反应是，认为埃及此举是严重的背叛，因为以色列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实际上美国是以色列的后台老板。在十月战争及其它所有的穆斯林阵营与以色列的战争中，都是美国用先进的军事武器支持了以色列，而穆斯林阵营的武器来源，基本出自前苏联。穆斯林与以色列之间的整个战场，完全就是美、苏武器的实验场和竞赛场。

被穆斯林世界视为叛徒的萨达特惨遭刺杀。

时间渐渐流逝。1980年，伊朗发生革命及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特发表讲话称：“任何外部力量试图获得波斯湾地区的控制权的尝试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重要利益的侵犯。”随后，卡特总统又派出一支快速部署部队驻扎中东。里根总统主持白宫以后，将快速部署部队划归美国中央司令部，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力量处于相等水平。

遗憾的是，人们普遍只认为美国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才把军事力量派往中东的。

这是一个误解，只能说是这时候美国才浮出海面。萨达姆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的中东思维应该从戴维营开始。种花生出身的卡特所埋下的

种子，让布什摘下了果实。

但美国没有忘记：以色列是他们在中东的头号盟友。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遭受到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的多次袭击，被激怒的以色列人准备奋力反击。但以色列人的愤怒被美国人压了下去，他们怕以色列人的暴怒反应会把美国人苦心经营的局面搞乱。因此，他们不给以色列人的 F - 16 战斗机发放识别器，并警告以色列如果上天的话，极可能遭到来自盟军的导弹射击。以色列人只好像个受气包似的强忍怒气坐山观虎斗。

自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实力进一步得到加强。令伊斯兰圣战者愤怒的是，美国趁势扩大了它在沙特阿拉伯及其周围的酋长国中的常备军事力量，甚至还在海湾建立了海军的第五舰队。在全世界，中东是美国不断加强其军事部署的一个地区。

这是一种让人觉得有点滑稽的组合。因为，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理念和人文精神同美国是大相径庭的。白宫过去曾经一再谴责他们独裁，搞恐怖主义等等。美国也不是穆斯林的真正盟友，美国的导弹通过以色列发射到他们的国土的事没有少领教过，但他们却异乎寻常地结成了联盟，美国开始了领导阿拉伯国家的新历程。

美国没有停止过同中东盟友以色列粘粘乎乎，他同敌对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另外还有两个国家对美国保持敌意，这当然是伊拉克和伊朗，这本身是两个敌对的国家，但他们都反对美国。美国真难让人搞清它在这里弄了些什么名堂。最近，它却又通过伊朗这个敌对国把武器输送给波黑穆斯林。看来，美国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标榜“博爱、公正”的背后，隐藏着一付比天狗还大的胃。

总之，美国在十九世纪以来，历经了“三大帝国”阶段。每一次，美国都通过对摆脱传统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实行控制而逐步扩大它在全球的影响。

美利坚第一帝国形成于 1898 年的西美战争以后，当时美国攫夺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加勒比海。所谓“第一帝国”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5 年至 1989 又在宿敌的前势力范围内确立了它的宗主权。苏联的解体促使美国将它的军事霸权地区（通过北约）向东欧和以前是中立的南斯拉夫扩展。美国更深地介入中东事务，恐怕也是为了与其东扩相呼应。

美利坚出人意料地在中东这块沙漠上确定了势力范围、他是如何取得这些专制国家的埃米尔或者国王的信任的呢？他在穆斯林兄弟中。怎么洗刷他的拜火教徒印记呢？白宫在这里大有赌博的意味。将来的美国，在中东地区也会遭到在越南那样的结局吗？美国果真从此皈依了穆斯林，而决不朝这里输送他的意识形态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是否会在中东再弄出一个萨达姆来呢？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真的是为了实现它所谓的地区均衡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只有两个字：霸权。

## 美国肯为台湾赔多少？

当有迹象表明台湾当局的台独倾向越来越明朗化以后，他们从美国那

里得到的承诺也越来越多。但美国人到底愿意为台湾付出多少？关于这一点，台湾当局也无法把握。

但有一点可以指明，台湾把宝押在美国人身上将是一个错误。历史证明：美国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是可以很容易抛弃盟友的。假如中国政府向美国作出某种交易的话，台湾很可能重蹈蒋介石 1949 年的命运。

问题是我们决不向美国作出有损尊严的让步。美国试图看到这一天。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所以，美国才如此地为台湾奔波。但台湾决不可就此作出错误估计，在台独的路上朝前走。台湾估算，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大于大陆，因此局势紧张时，美国会支持台北。

台湾的估算着眼点还在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上。因为台湾的存在，美国可以夺制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活动。这显然也是台湾当局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的存在给美国找到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籍口这是一个事实，但牵制的力量有多大，这就要进行认真分析了。

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使美国不得不正视这个东方巨人。美国在台湾、西藏及其它问题上骚扰中国，就证明美国再也拿不出什么新鲜货色。相反，中国的发展将逐步遏制美国在亚洲的霸权。

美国当然把中国视为它在亚洲实行霸权的最大威胁。美国在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沿西太平洋海岸建立军事基地，它的构想在于在亚洲的东方更新新月形包围，并以此来控制东南亚。美国可以不顾国际准则和中美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输送武器。

但无论如何，台湾设想把自己作为一张牌送给别人，主动权永远不在自己手上，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台湾当局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为倚仗现有的经济实力，就可以走台独的道路，这显然是一叶障目，拎不清骨头有几两重。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 12 亿人民不答应，台湾当局就是背叛人民和祖国。台湾民进党候选人、台独分子彭明敏的落选也表明，台湾人民不希望祖国分裂，分裂是得不到民心的。连美国权力中枢最偏袒台湾的势力，也明确表态，不希望看到中国分裂。

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架，中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完全用不着外人来干涉。

谋求美国保护。显然是引狼入室。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干预，东南亚各国心中并不愉快。台湾把美国势力引来，并且导致区域冲突和动荡，这对亚洲地区国家与台湾的关系同样有影响。脱离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亚洲国家，谁还愿意回到殖民时代？事实上，在造成东西方经济差距的历史成因中，殖民主义统治是最大的祸根。西方在东方的犯罪，东方各国人民深有体会，东方国家在获得经济发展的时期，无不是摆脱殖民统治以后，我们相信东方国家不会忘历史的疼痛。台湾人民不会忘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创伤。

亚洲人民反对西方军事渗透的热潮还将升温，因为这里不欢迎冲突和动荡。从将来的世界格局来看，不论从哪一方面，台湾寄托于美国的希望都不要太大，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台湾某些人以每年与美国保持的 200 亿美元左右进出口额和大约 450 亿美元存入美国银行来断定，美国在台的经贸利益重大，高于对大陆的经贸往来，这显然是一种短视、功利的想法。

大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潜在的市场能力是台湾不可比

的。仅近期的大陆市场吸纳能力，即有数千亿美元的可能性。大陆已与世界各国逐步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利益至上的美国不会无动于衷，所以在经贸方面，台湾不要期望值过高。

在中美的这场较量中，台湾作为美国的一张牌已经使美国捞到不少好处，但从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不能老想着。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速度的基础上，进入下一个世纪时，有足够的国际影响促使美国放弃它的不正当立场。因此，台独主义者应该看到这一点。相反，台湾坚持祖国统一之路，展开积极的对话，实行一国两制，一脉同根的中国人，一个广大的大陆市场，能够使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并获得最宝贵的资源。仅以目前从香港转口贸易来看，台湾所获不菲，台湾的民众工商业界应该清楚自己的前途所在。

在下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纪，美国还能为台湾付出多少？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没有在国际上获得它所需求的的东西。相反，美国的行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忧虑和不满。

因为连白宫都清楚，他们并非那么理直气壮，他们的干预只会带来区域冲突和局势动荡，这对谁都将不利。在这一点上，不管军事实力有多强大，也不可能保持最后的胜利。而最关键的是，美国不可能放弃在大陆取得的外交进展和他们的利益。美国在海峡双边政策上，采取所谓模糊战略就很能说明问题。虽然金里奇、多尔这些人对大陆军事演习表示愤怒，但是，他们的愤怒里面有多少水份，我们也是清楚的，因为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在大选前期说大话，哗众取宠，这是美国的一项传统。克林顿在与布什竞选中，克林顿不是也气壮山河地指责布什对中国立场软弱，无所作为吗？但以后的情况假若有商量、折扣可以再大些。事实说明，在美国这个国家，大选前政客们的话应该打八折，假若有商量，折扣可以再大些。如果你要把这时候他们的承诺、他们的种种战略思想当真去考虑，你就会被他们搞懵，美国人的游戏规则总是与众不同。

最好不要参加这种游戏。

美国最好不要“游戏世界”，当心吓着你们的孩子。

## 傻瓜不懂美国的心

美国的确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而且是最大的。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不论是在世界哪个地方，也不论是哪一天，都能感到美国的恐怖。美国的势力遍布全球范围，如果你不想听见华盛顿的声音，不受美国话语的骚扰，而想去寻觅一块净土的话，结果你会失望地发现：你无法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美国军事介入世界任何区域，也从来不要任何法理根据，它手中有一个通用于世界任何地方，适于任何国家的自产的法，那就是它称之为全球利益的东西。

美国是我们这个世界唯一享有全球利益的国家。进军巴拿马、海地、索马里、波斯湾、巴尔干半岛，是为了全球利益；在亚洲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是全球利益；在欧洲、美洲、非洲保持绝对军事实力，也是为了全球利益。这个全球利益既是美国人发明的专利，也是美国人唯一可以使用的

专利。比如，中国在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美国人金里奇指责说，中国的军事演习是恐怖主义行为。多尔更是口出狂言，他要让“中国好好在家里呆着，不要出来惹事生非”。这种恐怖主义语境。根本不用注明发表者是谁。世人一看即知，除了美国拥有版权，到人使用不了。因为这个语境，必须要有每年 2600 万打赢两场区域战争的能力。这些，只有美国能够。

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美国插手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也是出于这个全球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美国要把它扯入美国的全球利益中去，那是美国的事情。但要指出的是，美国把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和“独立”号开进台湾海峡，则是典型的恐怖主义威吓活动。

美国把他国的军事演习称作是武力的炫耀，这一点上，我们很理解美国人为什么说得很顺口，因为搞军事演习最多，区域范围最广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既在太平洋彼岸搞军事演习，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搞军事演习。在亚洲，他们与韩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国家。

也每年搞联合军事演习。这种军事演习，我们很自然地把它归纳为炫耀武力。自然，美国也会这样想。

如果说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原教旨主义是极端恐怖主义组织，那么，美国就是一个极端恐怖主义国家。美国实施恐怖主义手段的多样化和深刻程度，也是这些恐怖主义组织所不能相比的。美国的第七舰队是亚洲国家的心头之患，它给区域和平生活蒙上巨大的阴影。美国在中东地区埋上了火药桶。在巴尔干地区，美国的阴影可能比内战更可怕，因为美国的所谓“模糊战略”极易使各方面错误估计形势。美国既采取军事恐吓，同时还胁迫欧盟国家对他不喜欢或者不畏惧他的国家实施经济封锁，以达到破坏被封锁国家国民经济，制造国内混乱的目的。因此，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特别是小国弱国，不论离美国本土有多远。与美国有多么不相干，但在考虑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问题上，无不尽量采取回避美国的政策，以防招惹了美国，使白宫产生怒意而降临军事干预和经济制裁的大祸。

但事实上，不论你怎么行事，美国不可能不来骚扰。他们除了有一个全球利益这个干预别国的专利外，他们还能够制造出多种干预别国的法律，以对华关系为例，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说：“我们的对华政策反映在所谓的上海公报中，它们说，美国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这是 6 位美国总统已执行的政策，将仍然是本届总统执行的政策。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反映在《与台湾关系法》中，该法说，我们对所供应的武器系统承担一些责任，武器系统将使台湾能保卫自己，如果它需要自卫的话。”显然，美国可以有这样一个法。美国既可以给对立的一方提供武器系统而且合法，当然，美国哪一天如果想给另一方提供所谓的武器系统，它同样可以制造出一个法来。

在制造“法”这个方面，美国人比中国老百姓包一只饺子还要容易。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它的殖民主义及恐怖主义语气。对于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佩里说：“我们不撤离或减少驻在西太平洋的部队，我们打算那样做。我们在西太平洋驻有大约 10 万美军：在日本驻有 4.7 万，在韩国驻有 3.7 万，在西太平洋海面的军舰上有 2 万到 1 万。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它可以用来执行我们可能需要在该地区执行的任务。所以，我们不减少我们的军队，我们不应该减少。我本人认为，这支前沿驻军，在前沿部署的这支美军，一直是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地区的其它国家大多承认，美国在那里的驻军是维持和平稳定的一支力量，顺便说一句，也



是阻止在那个地区加强军备竞赛的一支力量。”美国当然这么认为，它的军队是和平的使者，这支强大的军队足以打击前沿的任何小国。

但是，西太平洋周边国家应不应该生活在美军的炮口下，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同时，美国的所谓“阻止在那个地区加强军备竞赛”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一些问题，即，你们不要发展军事，由我们美军来保护你好了。但是，这种保护是无条件的吗？美国臭名昭著的黑手党魁首卢西亚诺对一个小孩说：“你可以免费得到我的保护。”——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这么认为，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我们甚至还可以从美国的这个战略目标看出，美国的维持，是美国的军事维持。在长远的战略目标上，美国希望它能够永远保持在全球的军事优势，这显然是一个帝国主义长期独霸世界的野心。美国的所谓和平，也就成为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不要有谁来反抗美国的霸权，最好是每一个国家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美国暂只好实行它的军事代理制，先委屈地帮你们看看大门，时机到来，房子就是美国的了，这不言而喻，美国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他们不会撤离在西太平洋的部队，也不准备减少，现在和将来。

10 大多数人都希望美国军队从这里回到太平洋彼岸去的。即使美国的友邦日本，国内人民不也是愤怒声讨美军，要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吗？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帝国存在，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可怕的局面如今越来越明显。谁能保证明天早晨打开家门，不会有一辆美国的坦克停在你的家门口，并命令你拿出财宝，再老老实实地为美国效力呢？英帝国主义从前是这么干的，后来的德、意、日法西斯也是这么干的。下一轮，机会自然是美国的了，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遏制住美国的帝国梦。的是，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行动了。亚洲人民应该起来遏制一个既非亚洲国家、又不是一个没有侵略前科的国家军队在亚洲的军事威胁。

美国，傻瓜不懂你的心？国外问题是美国总统竞选年不得不搅的浑水媚内欺外是美国政治腐朽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一个暂时不可能改观的现实。美国这个号称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实质上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拨人轮流统治。政府只有一个，而两拨人都想入主白宫，所以，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把对方观为敌人。

竞选大战时期，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势必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其显要的一点是，由在野党发起一场对抗政党的强烈攻击。这种攻击不惜余力，可以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军事上来找突破口，还可以从人格上、性格上及种种可能进行攻击的地方猛烈开火。

但是不论两党之间如何互相投掷重磅炸弹，刀枪相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媚内欺外。

媚内当然是重要的，因为两党候选人都想从选民们的手上获得选票。因此，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中，曾有过蓄起大胡子来吸引女选民的事例。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都要奔走各州，进行一场竞选万里行。为了说服选民相信自己就是最优秀的，他们可以装出自己是一个温柔的孩子，或者是慈祥的父亲，或者是忠实的丈夫的面孔。总之，怎么能取得选民好感，他们就会怎么做，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需要。攻击对手，则是损害对方形象，关于这一点，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们都非常清楚。所以，在竞选中，都必须组织起庞大的竞选班子，在争取选民方面进行游说，在攻击对手方面则大力搜集对方情报。比如在克林顿竞选中，共和党人查出克林顿曾

在越战期间逃避服兵役，在这一点上，倒是有利于帮助美国总统模范守法。

总之，每一次美国的总统竞选大战，美国选民就有了一次主人地位的充分展示，借用中国商界现在用滥了的一句话：顾客就是上帝。对于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则是：选民就是上帝！因此，我们只有这样说，做美国的选民很不错，他们可以看到当选总统或者下台总统的笑脸。

然而，对于他国人民来说，跟他们毫不相干的美国大选则可能是某种灾难的开始。

当今世界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各个方面矛盾突出，久积的问题寻找不到良好的解决方法。纵观几届美国总统竞选，似乎总在诸如同性恋、妇女堕胎、种族纠葛方面做文章。总之，在国内问题上，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开不出对症的药方。

在对国内政策的实施纲领上捉襟见肘，美国的政治家只好把矛盾的焦点和显示政治才华的地方放到国外，这几乎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把美国推到一个奇怪和危险的位置上。

显然，白宫在国外发生影响远远比国内容易得多，把一支美国军队派到一个没有军事条约的地方去，立即可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并产生重大影响，这是白宫历届主人都十分明白且经常把玩的游戏。而一旦在世界某个区域引发战火，则更能把国内视线引到国外，既达到显示政治才能的目的，同时，还把国内矛盾有效转移。所以，在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两党争夺中，海外问题比国内问题更具吸引力。他们的相互攻讦、指责，可以大胆放开，完全不像国内问题那样，必须小心翼翼，唯恐一不小心，伤害到某一阶层的利益，使这个阶层的选民震怒，愤而上街游行示威，或者转而支持对手。

1996 温了，他们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攻击中国，把中国问题无限放大，甚至提出一个中国威胁论，以引起美国选民注意；然后，矛头一转，奋而攻击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的软弱，对中国制裁不力，没有领导世界的的能力，无法在亚洲维护美国的利益，会导致这个区域的局势动荡，如果长此以往，中国将会独霸世界等等。火力足，攻击猛，如同四年前民主党人克林顿攻击布什总统一样，虽然布什在海湾地区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现在，风水轮流转，该是共和党人攻击克林顿的时候了。

这种政治是腐朽的。因为想连任，就要在世界的某地找点麻烦，没有事也要挑一点事来，因为太平了，当然是显示不出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价值，这将会成为执政党无能而遭受攻击的靶子。而一旦麻烦来了，弄不好，又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靶子。卡特在处理伊朗问题和营救伊朗关押的人质问题上，显然就栽了跟头，让里根揪住不放使他连任的梦想落空。这就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他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牺牲品了。

这个世界的事情真是这么奇妙，因为有了美国以及美国的政治家。他们或者在国会大厦的走廊散步，或者在夏威夷海滩度假，或者到非洲去看看原始风光，但他们的脑子里不定何时就冒出一个主意，是不是要派一支什么军队到哪个地方去，或者还需要对哪个国家搞一下经济制裁。不仅是美国，还让西方盟国也别跟那个国家做生意，回到家把议案一写，喝杯咖啡或者加冰拿破仑酒，将议案交到参、众两院，于是，被美国政治家怀想起的那个国家，或者那个地区，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就来临了。政府的抗议，老百姓的失业，联合国讲坛上的纷争，《纽约时报》、CNN 电视网《泰晤士报》、路透社、国际合众社、欧盟、非洲统一组织、东南亚联盟、各国观察家、评论员、

纽约股市、伦敦股市、东京股市等等机器开动起来了，热闹非凡。外交穿梭、独立调停人、照会、屈服或对抗、难民问题、撤军时间表、抑制军备竞赛、停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人权记录、民主化进程，一大堆事就要折腾好几年，时间过得好快，美国著名政治家的回忆录就开始在美国书店畅销了。

美国人教育日本人，是耶？非耶？1996 少不了要就亚洲局势问题进行亲切友好地讨论。日美联合防务政策，中国与台湾的紧张状态，日本继续向美国打开汽车及零部件市场，日元与美元的比值，俄罗斯，东南亚，安理会新增席位诸如此类的事情，相信克林顿和桥本好有一谈。桥本针对美国要在西太平洋的防务保持实力，大约会向美国讨要一点地位，也就是说，请华盛顿别老是那样居高临下地对日本说话。

克林顿大约会给日本鼓点士气，给这个亚洲盟友上点联合防务之类的美国课，然后，带点好情报回白宫，以争取在竞选连任时多拉点选票。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的确有些暧昧。在过去的历史上，日本是亚洲的一个超级帝国，是侵略者；而美国，先是殖民地，后来反殖民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后，又成为一个反侵略联盟的盟主，再以后，自己也侵略一点别人。日本和美国以前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交往的开始，最显著的要算二战时期日本宣布发动太平洋战争，率先向美国不宣而战，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就了山本五十六，被打痛了的美国，再也不肯坐而渔利，甘当军火贩子。开始向轴心国宣战，打到后来，猛然朝日本的长崎和广岛狠狠扔了两颗威力无穷的原子弹，并在法西斯投降时，占领了日本国，这是本世纪两国交往的过程。

日本现在发达了，成了超级经济大国，在经济上开始与美国抗衡，两国悄悄打起贸易战。

然而，日本又保留着美军基地，在 4.7 万美军保护下生活，有些殖民地嫌疑。他们一方面为这支美军支付保安费，一方面摸着伤口，想起那两颗原子弹是如何大大地厉害，想想，日本的肚子里面总是有些委屈，似乎我们常人游戏，却打在要害部位，于是说，你怎么朝要害打？当然，现在的日本，心里头还有些别的东西，在克林顿访日以前，有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专门就日美关系耳提面命地教育日本学者。

日本记者樱井认为，21 世纪日本有可能被中国在政治上所压倒，在经济上被中国吃掉。

日本教授田久保则说，从长远上看，不知道亚洲乃至世界会因中国的举动而发生什么变化，但只要有日美安全条约，短期内不会发生急剧变化。然而，就这个问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莫斯给两位日本人上了一堂课。从语气上分析，日本人果真还保持着小学生的姿态，但美国人莫斯的话，似乎有另外的内容包含里面。这三个人坐在一块，日本人好像很为日本前途担忧，而美国人莫斯，则充满了下个世纪仍管理全球的信心。樱井说，我去年去了一趟美国，当时的感觉是美国对日本极不关心。莫斯说，的确如此，美国现在对日本不关心。美国过去对日本有四种态度：一种是慈父般的宽容态度，时间是 70 害怕日本，日本从 1992 年起走下坡路，这种恐惧心理随之消失，而现在非常混乱。

日本教授田久保似乎更相信美国，他的书生气比樱井倒是浓得多。田久保说，克林顿政权非常“内向”。共和党前年 11 月在选举中获胜，共和党更加“内向”。约瑟夫·奈保证，美国今后 20 年或半永久性地东北亚保持 10 万美军的军事存在。于是，日本人感到放心。

从现状看，日本不是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吗？无论是桥本首相还是新进党首小泽，都应该看到这种时代的变革，推动政治发展。关于田久保教授这个问题，莫斯耸耸肩便暗示性告诉他，我认为，金里奇是小泽，克林顿是桥本。小泽和金里奇都在向政治发起挑战。克林顿和桥本领导着软弱的政治团体，却没有好的主张。美国的国内问题和日本的国内问题差不多，经济停滞不前，领导人领导不力，于是，在野党便出来挑战，美国和日本都是如此。美国对日本这些问题不感兴趣。就是说“请行动吧！”因此，这是一个好机会，日本如何行动？日本在世界在亚洲发挥什么作用？对日本国民来说什么好什么坏？日本可以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重新起步了。

田久保接上话头，日本经济官厅掌握实权的官僚主张，日美两国在经济方面实现平等，无论在汽车零件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日美两国都平等地讨价还价，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

但是，在防卫方面，保卫日本的还是美国。如果美国撒手不管，那就得靠联合国。

现在，环绕日本的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日本不得不采取主动的方向发展。

樱井则对日本没有多少信心。他说，也许话有些不好听，日本的政治正处于脑死状态。

但田久保却将这种状态归咎于日美安全条约：日本人不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日美同盟比什么都重要的前提。使政治处于脑死状态的是日美安全条约，虽然经济是平等的，但日本的保障却要依赖美国。

老道的莫斯，到底不愧是老师，他的思维方式确有不同，他告诉日本人：我认为，安全保障就是经济。例如在美国的产业政策中，防卫政策就非常重要。计算机和技术等都是与防卫有关的东西。美国的防卫产业政策与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相同。换言之，对美国来说，防卫就是经济。就日本而言，今后防卫也会变成经济。美国现在最大的买卖就是武器出口。

如果日本不出口武器，日本的防卫产业就将倒闭。对尖端技术、军工产业和其他产业来说，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存在，日本的安全政策与日本的经济理应有直接的关系。

就安全保障来说，美国的海军保卫不了日本。保卫日本的是核武器、战斗机和高科技，而不是军人。看看海湾战争吧，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军人不是面对面战斗，而是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收集情报，然后发射导弹。未来的战争是技术战争，而日本拥有技术，因此，美国军队驻扎日本没有意义。对日本来说，安全防卫的对象是中国，如果日本依赖美国而不自己确定同中国的关系，整个亚洲的经济和安全保障就会产生动摇，台湾回归中国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对美国却没有多大意义。

田久保：就军事方面的作用而言，海上和空中也许正如莫斯先生所说的那样，但陆地有遏制力量这是看得见的东西。如果美军不从苏比克基地和克拉克基地撤走，中国就不会从西沙群岛进入南沙群岛。

莫斯：这没有关系。

田久保：不，有关系。如果美军从冲绳撤走，中国就会立即进入尖阁列岛，也就是钓鱼岛。

莫斯：没有关系，即使中国进入也没有关系。

田久保：也许没有关系。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美国认为不重要，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实行独立自主。假

如中国占领台湾，美国默不作声。

其它民主国家也不会置之不理。

莫斯：那么，情况会怎么样？中国进攻台湾并爆发战争时，美国军队从日本出征，而日本却袖手旁观。

樱井：大概将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只是名不副实的东西。如果日本人不考虑本国安全，也不考虑其它国家的事情，那么有必要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吗？有必要保卫像日本这样的富国吗？另外，对美国来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单方面条约，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却不保卫美国，这一内容鲜为人知，如果美国国民真正知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内容，就会愤怒地责问：“为什么干这种不公平的事情？”虽然日本提供了 8000 亿日元的经费，但是性命重要还是金钱重要？当然是性命重要。如果日本不进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的后方动摇，就会立即出现废除这个条约的论调。突破口也许是台湾，而不是北朝鲜有事的时候。

莫斯：不过，日本自卫队形同虚设，这么点人数大概什么也干不了。

樱井：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日本法制局的解释。美国起草通过的宪法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自卫队是在宪法通过后成立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也是在宪法通过以后缔结的。实际上，日本国防是由自卫队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组成的，但宪法中却没有这一内容。因此，应该就修改宪法问题展开讨论。但是，这不是件易事。

莫斯：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就是，桥本首相悄悄地跑到克林顿总统那里去，请求美国“修改日本宪法”。我认为，比起日本国民自己修改，在请求美国后进行修改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信任是日美关系的根本。美国不信任日本，但重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如果互不信任，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关系，美国怎么才能信任日本呢？如果日本表明自己保护本国利益的姿态，美国就会尊敬日本。维持现状，美国永远也不可能信任日本。

樱井：日本不可能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本国利益。不过，日本要明确表示：“今后花 10 年时间，降低美国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的比率，日本全部填补减少部分，当前需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双方建立平等关系。”

莫斯：但是，不可能制定这样的政策，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不制定 10 年计划，你说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

樱井：莫斯先生刚才说中国对美国和日本至关重要。日本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 21 世纪日本也许将被中国蹂躏。日本可能被中国的政治所压倒，在经济上被中国吃掉。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军队。中国有传统的中华思想，谋求霸权主义。我们在核问题上指责法国，而中国却坚持开发核武器。中国从 1955 年起就把成为核大国作为国家目标。中国投入巨额的预算，海军也在制造核武器，争取在军事上成为超级大国。如果美国除了日本之外在亚洲没有据点，并且出现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观点，那么，真正令人恐怖的就是中国的存在。现在一谈到安全保障问题，人们往往就把目光转向如何对待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如何对待冲绳美军基地问题。我认为，如果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威胁，国内论调就会发生变化。

倘若威胁日本存在的只有中国，那么日本求助的仍是美国。

田久保：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所长麦克·迪布在去年发表的名为《面向亚洲新的力量均衡》的文章中写道二十一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他预

测，中国现在争取成为经济大国，它今后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时，力量均衡就会立即发生根本变化。麦克·德林的观点与此相似，他在《纽约时报》上说，可以让日本发挥与中国对抗的作用，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莫斯：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三角关系中，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在 1945 年至 1949 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然而，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之后，日本对美国就变得重要起来。

不过，今后情况将发生变化。美国现在敬重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而且是个大国，所以是一个对手。在经济上，中国也非常重要。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已经不重要。

日本经济增长的机会不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又是单方面的条约，日本也不保卫美国。

因此，今后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最重要。日本要同美国和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对日本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樱井：美中关系也不会一帆风顺。我认为，中国想成为超过美国的大国，但并不想同美国进行合作，瓜分并统治世界。中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政治在自由主义的推动下也将开放，但政治意识形态能否完全成为民主主义，还是个未知数。

莫斯：中国经济再发展 10 年，就会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从长远眼光来看，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换言之，中国将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国要给予支持。再过 10 年，美中关系将变得比日美关系重要。从美国政府、智囊团和学会等的情况来看，主管研究所的人几乎都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美国没有多少日本问题专家。美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原来也是个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人喜欢和尊敬中国人。中国人是否值得依赖另当别论，美国看重力量，就是说重视谁在上谁在下，即实行强权政治。中国再过 10 年、20 合遏制日本。

田久保：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同盟关系，首先是要有共同的敌人；其次，经济利害关系比较一致，相互依赖性强；第三，价值观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

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密切。假如美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那就是战略性政治的联合，大概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不会同意。

莫斯：不过，美国不与之携手，中国就不会朝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除了提供合作以外别无选择。日本正在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不存在问题。

田久保：日本现阶段有危机感。如果日本出现危机感，1.2 亿人口中有优秀的人才，必然就会涌出杰出的政治家，并且发挥领导作用，日本没有危机感，是因为自己完全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莫斯：但是，在阪神大震之后，日本在管理危机方面提出了什么有效措施？我对此表示悲观。

樱井：神户问题的确暴露出了日本政治的贫困，让在野的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自民党在幕后唯唯诺诺操纵政治，这件事本身就令人啼笑皆非。

莫斯：对政治家的要求是有好的主张和领导能力。小泽和桥本看上去都有领导能力，但好像没有什么好主张，他们也许还没有把握住方向。美国

行动了，中国也行动了，而日本却按兵不动。他们不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日本就会成为受害者。

田久保：美国对北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实行干预政策，对日本实行封锁政策。美国认为，日本只要在宪法框架内行动，作一个听话的国家，顺从美国就行了。我认为，这是美国奉行政策的主流，希望美国也对日本实行干预政策。有一种“瓶盖论”，认为美国是瓶盖，如果打开瓶盖，就会从中冒出军国主义这一怪物。有许多日本人感到放心，以为有了瓶盖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日本人不信任日本人。

莫斯：我认为，如果打开瓶盖，就会长出美丽的花朵。日本是个可以独立的国家，教育水平高，拥有技术，而且主张和平，提供了许多政府开发援助，在发达国家中犯罪案件较少，有什么可怕？我全然无知。

樱井：作为根据国民的意见行事、负责任的国家，日本想搞好安全保障，不对别国构成威胁，在受到攻击时保护自己。如果做到这些，就可以要求修改宪法。坚持自由主义路线的人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军国主义。

莫斯：美国为什么不尊敬日本、不依赖日本？因为日本不与我们并肩行动，所以不值得信任。一旦实现平等，日美关系就将更强大。就像我最初说的那样，日本现在面临好时机。

克林顿总统定于4月访日，届时日本若说打算与美国实现平等，克林顿总统就会感到高兴，美国人也会感到高兴。

樱井：日本不应该永远是个像依赖父母的孩子那样存在。莫斯：桥本的名声何以在华盛顿这么高？因为美国喜欢吵架，桥本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不照美国说的那样行事。

美国人不尊敬不坚持自己立场的对手。也许小泽的印象比桥本好，因为，美国翻译小泽著作的是中央情报局。认为小泽有点可怕，中央情报局便翻译了他的著作。在这之前，美国国防部翻译过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的书。他们主张不向美国提供技术，因而让美国感到可怕。这种“可怕的人”对日美关系最有利。美国人肯定尊敬他们。如果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行动。美国人不尊敬不是对手、不吵架和不想保护本国利益的人，我认为，从结果上说，这不利于日美关系。

美国人莫斯上述一番奇谈，大约最能代表美国心态，这种美国式的教育当然是要挑起日本与中国的对抗，让既要美国保护，又与美国争夺利益的日本清楚，美国人可以甩掉你这个盟友，可以与日本的对手中国联合遏制日本，但骨子里更多的似乎要让日本加强军备，学习美国的防务经济模式。不过，美国人莫斯其言也直，武器出口的确是美国最大的买卖，所以美国才会在武器军备研究的投入占到高达全世界的60%！这果真是最好的教育，日本应该开始与中国军备竞赛，如此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获得经济利润，可谓是言传身教的范例。

如此看来，美国仍还是日本的监护人兼老师。这一点，想必美国人更加清楚。

但问题是，日本果真像莫斯想象的那么简单么？或者说，日本永远甘当美国的小学生么？日美双方大约都想让对方在军事上对付中国，而自己能在私下里与中国做买卖，主意都想得不错，看他们是如何拨动自己的如意算盘的。

## 抵抗是被动的觉醒，而实施抵抗必须占据主动

在未来的 20 年中，亚洲人有能力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降低到一个新的低点，并迫使美国人坐在亚洲的谈判桌上，而不是在白宫或国会发号施令。亚洲人和欧美联盟平起平坐的前提，有赖于亚洲区域的精诚合作。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亚洲人过去各自为政的结果，是被西方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导致无限的被动。

现在，亚洲诸国在经济市场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在法制和民主化进程中也逐步建立了亚洲模式。这将避免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重覆西方经济发展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伦理丧失、暴力犯罪等等旧辙。在通向现代工业文明中，亚洲模式将给世界其它区域进入现代文明送去曙光。

但我们仍必须看到，西方并不甘心失去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

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在亚洲充当着监护人的角色，美国人当然不会甘心从此退出亚洲舞台。因此，美国在亚洲始终保持着 10 万美军和第七舰队的庞大军事实力。

美国人拥有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的核弹。这是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的，亚洲国家刀枪入库，放马南山的念头不能萌生太早。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制衡的世界，新的冷战局面并未形成，制衡力量来自多方。或者说，西方进入一个战略目标散失的时代，它缺乏共同敌对的粘结剂，而美国的领导角色存在的必要已经值得怀疑。在冷战后时期，是一个经济秩序和国家角色重新定位时期，具体的表现，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时期。

抵抗美国应该是一个长期经济战略目标。想在某一天早上迫使美国就范，放弃它称霸世界的野心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非常幼稚的。事实说明，美国崛起的秘密之一在于它持久的、全面的实行人才争夺。二战时期美国最大的收获还不能算依靠军火输出和被侵略国的资本大量流入，扭转经济危机的颓势；美国的最大收获在于人才的大批流入。

以美国的原子弹研究为例，如果不是遭受和逃避纯粹迫害的大量犹太裔科学家的涌入，美国就可能不会先于纳粹德国获得成功。那个时期，美国既成为资本的吸纳地，也成为人才的避风港。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人才战略攻势，使这个民族最多的国家获得了全球的一流人才和后备人才。这是美国较之西方盟友高明的地方。当前，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景象是无数的亚洲有志青年仍源源不断地远渡重洋踏上美国国土，领取绿卡。

这是应该引起所有亚洲国家重视的事情。

引导人才回流是一个有利于亚洲发展的重要战略。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各机构服务的中高级人才中，亚裔占有重大比例。这批人才是我们真正储备在美国的宝贵财富，我们吸纳他们回来投入亚洲经济建设，比吸纳几百亿美元的贷款或投资更有意义。这也是抵抗和遏制美国继续称霸世界，保卫世界和平的有效手段。因为只有获得科技的力量，才足以使亚洲真正的强大。否则，单纯的短期经济发展战略并无法保证我们的和平与尊严不遭到来自美



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却不得不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中。殖民地文化决定了它的地位，很像美国的有钱的孩子，富有，但没有独立尊严。

亚洲有充分的信心唤回自己海外的孩子。中国已开始走出这一步，中国大力鼓励海外留学学者回国服务，给他们提供更为理想的环境，但目前仅仅是开始。华裔高级人才在美国硅谷引人瞩目的同时，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正在美国各大学留学。如果我们不把温暖的手伸给他们，我们将把投入巨额资金培养的最优秀的一批人才拱手送给美国。人才回流加上已有的科技实力，将促进中国和亚洲各国摆脱事实上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从属地位，成为真正的经济和文化的强国。

人才回流战略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东西方产业结构以及增强竞争能力的最佳步骤。实施这个战略，应该考虑到东方文化的凝聚力。这一点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竞争的优势。任何东方人都会放弃漂泊转而投入祖国的怀抱，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在中国，清华、北大的讲坛上，越来越多留学归国的学者在发挥他们的作用。在中关村，数千家高科技公司里随处可见留学归国学子的身影。虽然他们在美国的物质生活比国内优越，但他们更希望把聪明才智贡献给祖国。在海峡的那一边，甚至在整个亚洲，我们都能够发现，回归学者正在起到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力作用。正如《亚洲大趋势》中描写的那样：台北市以南的新竹科学园区是归台工程师的大本营。园区内 55 家公司，半数以上由曾留学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创建。在威斯康星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管理局长薛香川表示：“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既然硅谷中有那么多台湾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能集合一些人回来共同创业，那他们一定能帮助台湾建立起高科技工业。由于过去台湾的政治制度戒严，很多人去了美国，他们有些已经出现了中年危机，于是，我们就试着请他们回来创建高科技公司。”海外华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在美国公司中的发展受到限制，反而造就出一个个杰出的企业家。

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应邀于 1994 年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该院是台湾最有名望的学术研究机构。他说：“60 年代，多数青年人都认为在台湾没有机会发展，最优秀最聪明的都去了美国。”李远哲博士放弃了美国国籍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台湾。如今他正以其新身份致力于推动海外知识分子回台服务，其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如哈佛大学古生物学者张直光、物理学家弗兰克·方、植物学家杨尚发等。李远哲设立了“杰出人才发展基金”，目前已从商界募集了近 3000 万美元，协助海外学者和科学家回台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在 IBM 公司已干得够长了”。吴涛元说。他是斯坦福大学机电工程博士，曾任硅谷 IBM 公司研究开发主管。“因为人性险恶，我觉得在美国发展受到限制，而台湾却带给我更多机会。”1993 年工作，以后又去了 IBM 公司。是因为台湾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我才回来的。姚又文现在是台湾半导体工业公司产品质量负责人。该公司是台湾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元件制造商。

新竹科学园区内 155 家公司虽为私人所有。但国民科学委员会在土地、办公楼和研究方面都提供了资金补助，1993 年，其销售总额近 50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40%，到 2002 年，薛香川估计销售额将达到 500 亿美元。许多曾留美的台湾工程师是园区的最大功臣。

园区内有好几家公司在台湾高科技公司中位居前列。例如创建于 1980 年的全友公司占全球桌面扫描器 15% 的市场。

据统计，在过去 5 年中 有 600 名富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和工程师回台工作，其中不乏拥有博士学位者。薛香川说：“我希望在台湾看到一个个新加坡的出现。”台湾第二个科学园区将在高雄市附近兴建（高雄是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的世界第三大货运港口）。

薛香川预计第三个园区将坐落于台湾中部，而另两个将在 2020 年前建立。

如此诱人的奖励措施，对年轻一代来说，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等地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要比美国高科技公司更多、更优厚。

成千上万的留学美国的亚洲人才回国工作，促使全球范围内科技发展形势和科技力量的分布产生变化并重组。1993 年获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中有近半数 是外国人，他们毕业后大都继续留在美国，进入硅谷或诸如 AT & T 贝尔实验室等尖端科学研究机构工作。

这些富有才智的外国人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业周刊》曾撰文说：“如果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带着他们的技术以及关系网回国发展，这将会缩小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科技水平的差距。以韩国为例，近 10 年来留学美国学者功不可没，在下一代记忆芯片制造商业盟主竞赛中，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

三星电子公司已与其日本对手旗鼓相当。”《商业周刊》指出，目前已有上百名 AT & T 贝尔实验室的“校友”回到台湾。加强了这座岛屿“半导体和多媒体设备的出口竞争力”《商业周刊》形容香港是“电子通讯和音响器材的摇篮，这两项工业拥有数以百计的制造商。”并举王阿伦为例，王阿伦在美国受教育，是 NCR 集团的前任电机工程师，他创建了营业额超过 5 亿美元的 V 技术控制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智力型玩具及无线通讯设备，如今已经发展成全球性公司。《商业周刊》的结论是：科技人才的归国工作，“将导致下个世纪全球科技力量分布的重心东移到新兴的亚洲市场中去。”最起码的，这些人才可以加快亚洲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步伐。过去的三、五年间，科技赛场上各个竞争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在许多领域里，亚洲和欧美已并驾齐驱。亚洲有远见的国家已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全力以赴。

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随着亚洲英才的回归，有能力聘请西方人才的全球性大公司 将更具优势。如果亚洲能在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上兼顾，那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才选择这里发展，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人。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技术领先地位，在有些领域中也许还能继续。至于在全球经济中最具影响力的应用科技，还将有赖于许多素质高、懂得如何用科技改善人民生活的人才作出努力。

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和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后来居上，因为两国都拥有众多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能向全世界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服务的重心将由西方转移至东方，为亚洲带来繁荣与兴旺。约翰·奈斯比特毕竟是美国人，他是用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东方，在表述上，完全使用准殖民者话语。他的《亚洲大趋势》严格地说，不是写给东方人看的，他在为西方处心积虑，是西方世界的优患者和警示者。他要用实例来说服西方，要加紧与东方的竞争，唤起西方的紧迫感，否则，西方将失去以往的优势。但他的考察和预言中，却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甚至他对亚洲邻国及

台湾的介绍。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实证的经验。

未来的时代，争夺人才资源比争夺石油、矿产、黄金更重要。亚洲国家要在将来遏制殖民化以及美国的霸权，实施人才争夺战略比其它更有效。能够更多地把西方及美国的人才吸引过来，为亚洲发展服务，那才是真正东方崛起的时代。总之，在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亚洲应该打开更多的思路，认识西方的实力并增强信心，增加手段的多样化，摆脱被动，积极进取。

但我们不能走过去隔绝美国的老路，如果这样正合美国国会中某些极右分子的心意。

隔绝美国不是抗衡美国的办法，反而成就美国遏制我们的目的。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在亚洲和西方施加影响，让美国看清一个事实，即中国是正在国际间发挥影响的大国，中国热爱和平，不许别国来干涉内政。美国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利益和存在，美国必须削减它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西太平洋海岸的和平符合美国的利益。抗衡美国的手法应该多样化，任何简单草率的做法都会带来不良后果。

抵抗美国不是我们的目的，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相比较而言，我们是比美国更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东方人，我们的抵抗是为了打破现实的不平等，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立我们繁荣与富强的国家和美好的新生活。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美国与西方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中，确实存在着不平等。殖民者的梦想仍然存在，必将成为我们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阻碍。也许，对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更好。

没有炮舰和核导弹下的恐怖，也没有在文化上的渗透及经济上的掠夺。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和平共处。共享人类文明。但是，这只能是设想，因为美国不仅存在，而且永无休止地把它的手伸向世界各地，不断地全球各个区域制造各种麻烦和冲突。所以，抵抗美国就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当是我们鼓足信心的时候，也许一切并非如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说的那样乐观，但是前景已经展露，而中国在 16 年中创造的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也已经有足够的说服力。

## 我决不搭乘波音 777

波音飞机在未来天空中的飞翔，可能带给我们的，不再是天使般的自由和安宁。波音公司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飞机制造公司。在我国的天空上，波音系列也将成为主力客航班机。波音飞机的先进性和安全性似乎是已经得到公认了的。

但是，美国波音公司新近推出的最新机型——波音 777 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忧虑。

自 1995 年 6 月起，波音公司最新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波音 777”每天在华盛顿和伦敦之间飞行。这项飞机制造计划耗资 40 亿美元，它的设计完全是在计算机屏幕上绘制出来的。

对于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技术和商业上的胜利。

1996年1月，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提出的包括15架最新飞机的订单证实了航空业界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抢手的波音777起飞，波音公司将抢在对手的前面。

然而，就在波音777面临美好前景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经过4个月的调查，发现联邦航空局的官员两年多来卷入了一场关于波音777潜在的设计问题的非常激烈的争论，这种设计问题将引起严重的安全问题。

《商业周刊》查阅了数十件联邦航空局的内部文件并同该局为数众多的中层工程人员和安全检查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其中包括直接在波音777合格证项目中工作的几名人员。

这些人士中大多数在向《商业周刊》发表谈话时由于担心报复而没有报出自己的姓名。

他们说，联邦航空局的许多官员对于这种飞机是否进行了足够的试验依然存有疑问。

联邦航空局的一位发动机专家在提到人们担心如果螺旋桨叶片断裂波音777可能发生剧烈抖动时说：“这是一个安全问题，它可能导致灾难。”针对波音777的设计问题，波音公司的主管人员却拒绝对《商业周刊》的报道发表评论。

波音公司发表在书面上的声明认为，“在历史上没有哪种飞机像波音777这样经过如此彻底的试验。”联邦航空局的高级官员也不遗余力地为这种飞机辩护。联邦航空局合格证颁发处主任托马斯·麦克斯威尼说，如果他认为这种飞机不安全的话，他本来会“马上就停止颁发合格证的。但是这种飞机已经达到了要求它达到的每一项规定。”如果情况如这位官员说的那样，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据说，中国的一些航空公司也将准备购买波音777。但是，了解情况的人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为满足波音公司的计划，在当年4月19日给这种飞机颁发合格证时，联邦航空局的高级官员驳回了该局自己的工程师对安全提出的担心，而是坚持颁发了合格证。于是，受压制的人士从道义上对航空局表达了不满。他们说，联邦航空局管理人员在没有对可能的设计缺陷进行足够试验的情况下，就给波音777发给合格证，这种问题是由于联邦航空局有双重任务造成的：联邦航空局的规章要求它确保公众的安全并促进美国的航空业发展。对此，联邦航空局内部的检查人员也指出，联邦航空局应当规定制造商确保航行安全。

对于公众的指责，航空局则不予接受。麦克斯威尼干脆否认有这种争论。他认为，虽然飞机制造商“努力争取在给它们颁发合格证的日期前完成工作”，但是联邦航空局并没有为满足波音公司的时间表而匆忙行事。麦克斯威尼此话的可信度当然可以存疑，因为这不是联邦航空局第一次受到关于它同飞机制造商关系太密切的批评。在过去发布的联邦总审计局关于联邦航空局颁发合格证做法的报告中指出，联邦航空局在监督方面太软弱无力。在正常情况下，联邦航空局在一种新飞机设计的最后阶段才同制造商进行密切合作。在进行了试飞和检查是否合乎联邦航空局的条例之后且在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时才能批准新飞机合格证。

联邦总审计局甚至还批评联邦航空局在大多数取得合格证的试验中广泛依赖制造商的工程师。卡尔沃说，总审计局发现，甚至在仍然存在设计缺陷时，联邦航空局就批准了新型飞机的合格证，到头来，有许多事情联邦航空局试图解决，而制造商已经把飞机卖掉了。它们必须按时交货，否则就要

受罚，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仅仅因为中国的众多航空公司已经或可能购买波音 777 才为此担忧。

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司会带如此的头，因为你可以使联邦航空局的官员为你颁发合格证，但最后这些飞机却是给很多人乘坐的。如果飞机尚有设计缺陷，那对任何乘坐的人都可能是致命的。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尊重生命安全权力与否的问题，不知美国国会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当然，最主要的责任在航空局，因为没有合格证，任何飞机都不可能出厂。

专家们对波音 777 的安全担心。是由于波音 777 的异常大的喷气发动机螺旋桨叶片的大小和重量而引起的。由于波音 777 的设计采用两台发动机，而不是以前通常像波音 747 这样远程型飞机采用 4 台，因此它的螺旋桨叶片更大，也重得多。由于波音 777 的体积最大，而重量是波音 747 的两倍多，为数众多的联邦航空局工程师和检查人员担心，如果在飞行过程中，这些巨大的螺旋桨叶片中有一个断裂，就可能使飞机产生严重的不稳和巨大的震动，这种断裂过去屡有发生，从 1990 年以来，就有 24 家航空公司报告了螺旋桨断裂事故。虽然没有发生坠毁事故，但安全专家担心，波音 777 的螺旋桨的加大和加重会使得断裂产生的震动更加严重得多。专家警告说，波音 777 机身的抖动可能十分严重，以至于驾驶员可能看不清飞行仪表，这就增加了坠毁的危险。1993 年 11 月，泰国太平洋航空公司的一架 747 客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时，一个螺旋桨叶片断裂了，叶片的折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以至于驾驶员考虑在海上迫降。

虽然波音 777 存在着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但据联邦航空局有关人士透露说，尽管有这样一种担心，波音公司看来只进行了有限的试验，以了解一旦一片螺旋桨叶片断裂波音 777 天就让步了，不再坚持一年来力争波音公司作更多细致测试的要求了。

那么，为什么明知波音 777 存在着设计缺陷的可能而坚持让它生产呢？答案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巨额的利润。新的波音 777 系列是波音公司致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的努力核心。波音 777 有 350~400 个座位，它将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 A-340 和 A-330 需求量估计为 3000 多架的情况下，波音公司指望今后多年中波音 777 都可刺激销售额增长。

到 2000 年，波音 777 的年销售额估计将达到 120 亿美元。目前，波音公司已经将波音 777 售出 245 架。虽然有一些航空公司知道波音 777 存在发动机不平衡问题，但它比起波音 747 来，燃料费用可降低 20%，而运载的货物和旅客更多。在波音 777 身上发生的系列问题的确让我们感到忧虑和震惊！然而，更让我们震惊的一件事情是：美国联邦航空局对飞机发动机的管理条例还是 50 年代制定的，当时的螺旋桨叶片要小得多。鉴于波音飞机事实上已成为全球的 > 联邦航空局，对于人的生存权力来说，草率地颁发合格证书是否过于自由了一点？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不再乘波音 777。不，不再。

**别把自己搞得很自卑**

每个星期天看甲 A 足球联赛，使我充分体验到中国人生命里所蕴藏的巨大的激情。在那海啸般的声浪中，同胞们展示了温文尔雅的另一面。我几次想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来形容这种盛况，最后在键盘上敲下这样的字样：生命打开了闸门。是的，的确如此，中华民族是富有激情的民族，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这种激情让我联想到中国人在经济建设上的大会战。我曾经对大会战这种形式深恶痛绝，但认真考察一下，不论是像大庆油田这样的大会战，还是大跃进，在另一层面上，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那的确是风，是火，是在创造中释放出来的惊人的激情。

我一直认为。如果中国人始终保持这样的激情，同时又把握高度的科学理性，中国的发展将令世界瞩目。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一和国外比较起来。大家总有点信心不足。这种情况反映在各个方面，外国人的称道我们仍格外高兴，外国人的歪曲我们仍格外生气。我们把这称之为民族自尊心。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很简单，外国人说我们非常先进，那不见得，外国人说我们非常糟糕，也并非是如此，我们总比外国人清楚自己。过于敏感，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与民族自尊无涉。我觉得政府公布我们国家还有七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上很有理性，这可归纳为对工作存在自信的表现。

前几天看报纸，令人惊讶地看到，“精英”学者们居然提出一个后殖民文化的概念，意思好像是说，随着西方科技的引进，我们的文化已经全部丧失，成为一种“后殖民文化”，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论调。因为文化，它不可能不进行交流的，它确实具有共性的地方，中国人看《廊桥遗梦》也感动，是因为它讲了人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它是美国人写的书或者拍的电影。“后殖民文化”说，同样是表现出一种对民族文化的不自信。

肤色不可改变，但文化是可译的，并能够互补。有的东西甚至可以照搬，比如打领带的方式和不许公共场所吸烟，包括由人大代表选举自己的乡长和市长等等，这并非是殖民化的表现。经济运作方式更是如此，它是由人所创造的一种科学方法，行之有效的并被证实了比较合理的方法，接受它就如到邻居家去学包饺子一样正常，而不应该在此再多做文章。学习先进的东西，改革旧的经济运作方式，流行的说法是，与国际接轨。

这些不属于殖民化范畴。

英国人开车左行，美国人开车右行，他们都是西方人，我们总不能去找出第三条路罢。

关键的还是要行动。有了行动一切情况都不同了，想想过去放颗卫星下街游行庆贺，造一座南京长江大桥惊动全中国。现在怎样啦，长江上已有二十座大桥了。在经济发展上，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丧失了很多时间，痛也罢悔也罢，都是既成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进入状态”，不在状态之中很难做好事情。

从现在起，中国人横下心来 10 年不睡午觉，如同战后的日本国一心一意搞经济。届时可以发现，我们居然一下子走了那么远。想想十几年前，日本人还给中国人生产黑白电视，现在他们还会这么做吗？在电脑业也是如此，1994 年还唱 386 的戏，而在 1996 年，不论是 IBM，还是康柏，都不敢到中国来处理积压了。毕竟我们有了金长城、联想和方正了，而且市场占有

率并不低。用 10 年的睡午觉的时间来参与国际竞争这好笑吧？实际上并不可笑，如果我们以中国有 5 亿劳动人口计算，每天多出一个工作小时，那就有 5 亿个工时！如果折成货币，按每小时 10 元算，就有 50 亿元产值在增加。也就是说，中国把习惯的午觉不睡了，仅此一天可以多创 50 亿元产值。可见我们的潜能有多大。

信心从有效的工作成绩中来，说空话毫无益处。年后去中关村，居然就发现有打工妹在做电脑生意。当然她们都是老板从人才市场雇来的，但她们讲很多电脑的术语，她们脸上太阳晒出的红晕尚未褪去，手也不是那么细白，想象得到她是在电脑速成班毕业的，但这又怎么样呢？三年前她们见都没有见过电脑，现在被老板雇来做电脑生意，介绍诸如 IBM、微软、虹志、康柏等等品牌，它们的区别以及不同的性能。初见她们，心里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本科、硕士什么的。但是，由打工妹来介绍并且销售 IBM、微软、虹志和康柏不是也很好吗？现在，正是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关口。事实上，我们不是差于别人，而仅仅只是出发的时间晚了一点而已，只有这一个差别。其它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想得过多而产生的不应有的念头或者所谓的思想而已，把两千年前的事情与两千年后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理论毫无必要，虚构出一个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也无必要，重要的是，很自信地出发，甚至拿着还有些粗糙的产品周游全球。这没什么，大家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都一样。

## 趴在窗户上窥探不是好作派

我们经常鄙视美国的历史，说他们把一百年的东西就当成文物古董。在这一点上，我们自然是有足够的资格。他们的博物馆中，属于本国的东西确实历史不长。但我们鄙视过之后，又会有一种复杂的心情，那就是，他们的博物馆中，收藏着从我们这里抢去的大批文物。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欧洲也不老。比比历史，中国是足以自豪的。但是，一味的历史下去，是否有意义？我是说，动不动就提五千年文明史，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让它保留在初中课本中足矣，并不用挂在口头上。历史代表过去，而我们却生活在今天及将来。重过去而忽略现在，于世界了解中国并没有多大帮助。说到美国，事实上，我们指的美国人，大约就是白宫和国会那批人，是他们老想在中国面前抬手划脚，并不是美国人民想对中国怎么样。

美国人民不大了解中国，他们了解的渠道，多半是白宫和国会的渲染，加上美国媒体制造的轰动性报道。也因为如此，美国人民了解的中国，很可能就非常走样，而这里面，我们自己的宣传似乎也缺少一个很好的定位。

古老的国家，的确容易使人联想到部落和酋长什么的。当我看到中国申办奥运的电视宣传片时，我不知道我们为何要那样突出古老的皇城根。公正一点说的话，给人的感觉离现代太远，当然，作为旅游介绍的话，并不错，但它却是表现一个国家的形象。我在南池子住的时候，颇有感受。我住南池子的四合院里，恰好有一个窗子临街，这里又是王府井到天安门的一道。因

此，有不少外国人从此通过。在这些外国人里，有不少欧美人，老是扒到我的窗子往里看，亚洲人则并不这样。我想，这可能因为他们不大了解北京，对四合院有一种神秘感。起初我对他们的做法挺烦，这有什么好看呢？这是对他人正常生活的干扰。是侵犯人权吧？久而久之，我也习以为常。但我想到一个问题，这很可能与我们宣传有关，假如老外知道我们的状况，这样的好奇可以省去。比如亚洲人，他们就不会那样。

凭心而论，如果朋友提到我未去过的非洲部落，我的脑海里立即会联想到刀耕火种，想以像家长制的酋长或国王，离法制化和民主化很远。想到封建。而我们却在走向现代化，是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是的，当我们看到布达拉宫时，自然会联想到宗教，而看到长城与紫禁城，当然会联想过去的岁月，那已然不再的时光。因此，我看到很多当代的建筑门前，也摆上两只封建时代象征的大石狮子，总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今天，我们应该有现代化的标志，有现代化的氛围，而不仅仅只有长城。或许，三峡大坝将是一个标志，但现在还无法了解到三峡是否仍会修建得很古典。因为在建筑上复古之风已遍布全国。甚至修建唐城、宋城及其它城，这是以牺牲我们现代形象为代价的招揽。其实，在历史上，我们的前辈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那个时代的建筑特色，而并非一成不变，都以当代的眼光设计建筑。当然，在北京，业已有许多现代化的建筑物高耸云天。但在我们的骨子里，似乎更愿意突出古老。

去年我回南方，没来过北京的朋友问我，你见过真正的北京人吗？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满清皇族的后代。不说西方人会误解中国人生活在古老的国度中，即是国人，也还会想到那些封建皇族的后代。真正的北京人与“假北京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找不到。

实际上，连当年的爱新觉罗·溥仪也早就穿起了西装。

我曾与一位美国人交谈中美文化。说这话，这位美国人的普通话讲得比我还标准。

他照例是照我们的口径来作开场白的。他说，你们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你们很尊重传统。

听到这句话，我却不是通常的那般受用，我那一刻的心态有如一个玉颜消褪的女人被人家夸赞说，你过去是很漂亮的。或者被一位刚学说话的孩子误叫了爷爷。我们都是年轻人，为什么要一见面就让被人称之为古老呢？过去的中国，是历史的，现在的中国，是现在的，是有着现代法制和民主机制的人民共和国。不是留着长辫子，吸鸦片穿长衫的满清臣民。

所以，我们在确立形象时，以年轻的中国宣传为好，像故宫那些地方，作为旅游宣传足可，作为今天的形像宣传，则大可不必。如果美国的老百姓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现状，他们决不会很容易被白官蒙蔽，包括欧洲人。我们本身是处于现代和有着现代意识和行为观念的人，虽然我们的工业化在时间上稍稍晚点。如果我们时时不离古老和传统，那确实是授人以柄。

事实上，我们是很年轻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算，只有四十几年，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国家，也将充满现代的科学和文化意识。

**该怎样就怎样**



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这使中国作家很不服气，又很不舒服。因为中国既是文明古国，又是文化大国，生产文化而且出口文化，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均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度有人撰文说，老舍是差一点得上诺贝尔奖的，但就在讨论给他奖时，他却走向太平湖辞别人间了。很为可惜。又一说是鲁迅差一点得了诺贝尔奖的，但鲁迅拒绝了。

以上这两种说法，后来均被诺贝尔奖的评委所否认，是没有的事。这便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心头的诺贝尔情绪，居然纠缠了半个多世纪。

不过，我们现在的作家比往时的还聪明，索性不再杜撰谁谁差点得了奖，因为现在媒体很发达，不定又传到评委那里去，一旦被人家否定很伤感情和面子，现在的办法是，指出诺贝尔奖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多庸才也得此奖，而很多有非凡成就的人也并没有获得。如托尔斯泰等。连托老都没有得诺贝尔奖，我们为什么要得呢？或者说，不是我们不行啊，是评委没有眼光。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诺贝尔评委是西方人，对中国有偏见，印度和日本得了么，那因为他们一是西方的殖民地，一是西方联盟，而我们都不是。还有一说，是西方人不懂汉语，但诺贝尔评委说，世界上不光只有汉语难懂，还有好多国家的语言也不好懂。想想，的确是这样。

这里很说明我们的心态有问题，明明想得到的东西，却去鄙视它，并且旁证博引出连托尔斯泰也没有得。然而，事实上是，我在许多作家的书架上都看到了诺贝尔获奖作家文集。

似乎都齐了，包括大江健三郎的。我们的诺贝尔情结，其实很无必要，引伸一下，我们总不能因为奥运会是西方人发起的，就说奥运会金牌没有什么了不起吧？中国的文学，到底进入何等水准了呢？是不是好作家多得不得了，甚至是泛滥成灾了？有一次私下和几个文友议论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比，的确，搬着指头居然没有数出几部绝对应该得奖的作品，国内的奖项似乎都难以评下去，以什么去争诺贝尔奖呢？而鉴于我们的心态，中国作家还是不得诺贝尔奖为上。否则，极可能会争来一顶崇洋媚外的高帽。电影导演张艺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氏的电影在西方获奖多，于是就有人撰文推测，张氏是揣透了洋人的心理拍片的，所以才把中国拍得那么落后或者丑陋来讨洋评委的欢心。言下之意，张氏是卖国求荣了。但事实上，洋评委是否真的很喜欢看反映旧中国落后的电影，这些坐在家里的撰稿人也仅是一种揣度，是一种心态使然。

我们一边说洋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心里面又特别在意，甚至在意得过头。出国团体统一制作服装就是一例。想想那种情景，一拨中国企业家或者官员，穿着统一的服装，迈着相同的步子，带着相同的表情从巴黎或者纽约的街头走过，是不是怪怪的？你出国去完成你的任务，去干你的事，统一一个服装干什么？让一辈子也到不了中国来的西方人看了，哦，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啊，居然连穿衣戴帽都统一到一种式样！这的确是自己歪曲了自己。因为，在国内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啊，起码，我们穿衣戴帽是非常自由的啊，并没有哪级政府要求统一的啊，为什么出国就必须如此呢？说白了，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毛病。不过，这两年有所改观，大约是出去见识多了，心态也正常了些。毕竟，你在巴黎的街头走，并没有电影中的那种景象，会有好些巴黎人跑过来围观，哦，中国人来了。

大家都很正常，各走各的路。相反，这么一统一，倒引来侧目了。

北京市的“面的”是为一景。“面的”这种交通工具，还真符合国情，便宜、适用，收入好一些的老百姓承受得起。但是，两年前就开始有人臭“面的”了。每每打“面的”，就有“面的”司机发牢骚，并且举例说，夏利也就三个缸，不过如此而已。“面的”司机的心态当然不大对头，他们老想抓夏利臭它一臭。但是，如果没有人这么臭“面的”，“面的”司机大约是不会这么与夏利过不去的。但有关这些，还都不使我感到惊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有高级一些的人士称，“面的”这种交通工具，档次太低，影响北京市容。而北京，又是中国的首都，是国际大都市，是中国的窗口。因此，提议灭掉“面的”，改而上档次高一些的车子。

如果说，以安全性或者其它技术指标为由淘汰面的，那就没什么话好说。但以影响市容为由，确实里面有心态问题。这里，我要提一个问题，我们是为自己生活还是为西方人生活？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实力，坐面的当然坐得很好，老百姓喜欢坐这种便宜实在的交通工具。我们搭乘交通工具的目的，也是从复兴门到三元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摆谱。它影响了什么呢？在德国，出租都是奔驰，难道我们都上奔驰就为国争光吗？其实，作为公正的西方人来说，穷而奢华才是让人不能接受的。面的已经实实在在地体现北京人生活的进步了，并没有那些神经过敏的人说的那样，果真是影响了北京的市容。最关键的是，我们是活给别人看，还是活得自己感觉自在和方便。话再说回来，西方人来了中国，大约也并非专门来考察你坐什么车的，在王府井、建国门这些地方，西方人也骑着在天桥旧自行车市场买来的破自行车，这很正常。

对西方太神经过敏，在今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应该调整。关于爱国，用不着天天挂在嘴上。据说国奥队在兵败大马之前，主教练居然叫队员会前会后起立唱国歌，结果最后还是输了球。如果赢了，自然会少不了通过媒体爆炒一通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章。

但事实上，足球不是唱国歌就可以打败对方的。得有实力，还得排兵布阵得当。把事事与爱国连在一起，弄得神经紧张，这显然过了。而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是与格雷米奥的一场球，这场足球由一位中国裁判吹哨，据说是爱国主义使然，以至出现偏袒，结果叫人家涮了一通，而且以后带队到中国比赛，他们要自己带裁判来。这种恶劣影响，我以为已经超出足球本身了，因为外国球队有了中国人不讲原则这种印象，以为中国各界人士均是如此。对些，足协的某些官员居然还说，他们在日本就不敢这么说。这让人感觉远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从商业目的去考虑，偏袒是想赢球，为了门票收入倒还解释得通的。

有一种奇怪的心态在我们中间漫延。

一次坐公共汽车，有两个年轻人打架，一位十分可爱的北京老人扯住并教训他们，指出打架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错误的。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打架？这很不文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首都人啊。我想这种语境在北京的其它很多方面我们都能听见到。推出一个公式是：你是首都人。所以你应该讲文明。你应该为首都文明起来。在很多电视画面上，也见得到这种情景。然而，引伸一下，如果不是在首都呢？人是不是可以不讲文明？当然不是。这里面就有一种心态，我们一些人讲文明，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在美丽和秩序中，而是为了类似于首都、窗口之类的环境，这起码不是文明的根本所在。比如说

我们在别的地方，甚至在非洲荒野，难道就不要保持文明？在我们的心态中，的确有很多活给别人看的東西。

其实，我们的环境、服装、生活方式、文明准则等等，首先一条，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为了我们的卫生和舒适。比如餐馆的卫生，商场的秩序，都应该是主观为了生活的美好，给人看是客观的。把给人看为目的的文明，很难称之为真正的文明。如同去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市召开了，很多地方大打卫生仗，要开国际性的会了，搞好卫生吧，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会议过去，再去今年的北京许多地方，卫生情况依旧很差，这都说明了一种我们事实存在一种心理，给人看而不是文明的自觉及自需。

当然，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也有我们这种情况，也会搞突击性的环保活动。然而，如同我们这么明显，却并不是很多。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似乎要靠外国人的监督才有文明起来的动力，这倒印证了他们的話，我们的文明是他们带来的。

## 这样的贸易不要做

这些年，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上介绍，某某地方创利多少，创外汇多少的报道。这里面可以看出一种心情，即这个地方，不仅创利了，而且还赚来了美钞。其实，在我们国内，统计和结算是以人民币为标准的，因此，完全可以将赚来的美钞以人民币折算到一起，成为一个总的数目，完全用不着再在人民币的收入上，后缀一个创汇多少（对外贸易商务总结及汇报除外），美国人大约不会在赚取了多少美钞以外，再总结一条，赚得中元、日元多少吧。

当创汇成为一个体现业绩指标的时候，很能给拿着美钞到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一个好压价的机会。而且，不仅老外压价，在我们自己内部就出现竞相压价的要受损失。

因为急着创汇，加上信息不是那么灵通，或者说，明知道是要受损失，却还要去做，这就使中国的产品在实际创利中大打折扣。为什么宁愿少赚钱而要硬做成生意？这里面当然有想出成绩的因素。

精明的西方人大约看清了我们这一点，所以，我们外贸出口的产品，并不比销往国内市场更赚钱，很多甚至只达到保本。一些地方或商家解释是，为了多赚点外汇。诚然，想多赚外汇这个出发点并不错，错就错在生意上始终处于被动。一个外向型企业的经理这样说，我们并不想卖这么低的价，但我们不卖，老外去别的省份，我们同行都互相压价，所以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暂且不论这种状态对我们有多大损害，互相压价是一种商业竞争手段，对国人是，对外国人也是。问题在于，任何事情一旦超越常规，都是一种弊端。不赚钱而做出口生意，这大约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状况，以现在我们刚迈入国际市场而言，似还没什么可说，外国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也可能采取类似方针。关键的是，得有后援手段。日本佳能在打中国市场时，他们卖便宜货而不吃亏。日本佳能的 BJ30 喷墨打印机，在北京的价格已经跌破两千大关，这种很精巧的喷墨打印机，两千元的价格的确不算贵。在年前，我到

中关村去买回一台，体积小，性能方面也是不错的，算得上真正的物美价廉。但是，我错了，待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一个情况，那就是它的墨盒不便宜。用不多久时间，买墨盒的钱就超出打印机的钱。这是佳能公司的精明，以它的墨盒的价格，即使是白送一台打印机给中国真正的用户，他们都大有钱好赚。这就是他们压价的后援手段。

那么美国的公司呢？以 IBM、微软这些公司为例，在市场行销方面，也有自己的方法。

最典型的，要算软件的升级了。与电脑商密切结合的软件商，总是把每一种最新推出的新软件提高内存及运转要求，视窗 95 的性能没话可说，但是，并非中国用户都消受得起。前几年，386 的机型内置还用得上他们的软件，到了 1995 年，情况不同了，他们上 486 以最优秀的软件让你不得考虑他们的新机型。这里可以顺便说说美国的议员多尔，他指责中国盗版成风，已使美国每年在中国遭受达 10 亿美元的损失。事实上，盗版情况哪儿都有，否则就不可能产生出一个著作权法。在中国当然有盗版行为，但损失 10 亿美元纯属夸大事实。因为以现在中国人的电脑保有量来看，很多机型仍属 286 和 386，486 的热销，是到 1995 年才开始的。而这些 286 和 386 中，又有相当部份是属兼容机，这种组装起来的兼容机，内存大多在两兆之间，根本无法运转美国的新版本。至于光盘，也同样如此，即使美国公司到中国来免费派送软件，也真很难送出 10 亿美元的常规软件。事实相反，美国公司到中国来从最低机型进入市场，比如在美国已经消失 286 和 386 以后，仍在这里做这种低机型，已对中国用户伤害很大。因为现在手中保留有 386 这种机型的用户，面对今天的软件十分尴尬。

当然，这里不是说完全要照外国公司的方法做，但是，他们的经验确实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不要因此好容易盼来了一个买主，就竞相争夺，还没有从外国公司手里赢利利益，就在自己家里打得遍体鳞伤。

在今天，我们的商家确实在走两个极端，一是对国内市场定价奇高，一惯走高价位；而对国外市场则又定价奇低，到了只求保本的境况。甚至是国内赚钱国外赔，而导至这种结果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创汇，为了美钞。美钞很好，但也要币有所值。况且，并非是把产品卖给美国人就一定要不赚钱啊，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建立国家行业协会之类的机构进行协商，起码应该制订最低价目表，否则，外商大有空子好钻。而实际情况，中国产品在国外的超市上卖得并不是那么便宜，比起我们的口岸价来说。

## 拿开你肮脏的手：我们不要性骚扰

目前外企在中国的人口记录非常之糟糕，借遵守厂规为名对工人实行人身限制，出厂搜身检查等等，甚至有韩国老板对工人实施罚跪的事件发生。这些丑恶行为，不仅粗暴地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损害了中国工人的人格尊严，同时也给中国人民造成对当事人国家的不良印象。世界让人不能容忍的，恐怕还是性骚扰。

在中国的所谓外企，均指来自国外投资者兴办的企业或其商务代理。

目前，这些企业大多来自西方及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也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法律大约均不许业主侵犯人权，包括性骚扰。然而，他们在中国的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使普遍的中国人认为外企是最脏污的地方。一位中国母亲在阻止她的女儿进外企时，竟涕泪双流地对女儿说：孩子啊，你总得给我留张老脸出门吧？在北京和其它城市，的确有很多人认为，年轻美貌的女孩子到外企去当白领就是给外国老板做“小蜜”。即使在不这样认为的人心里，也觉得那里不是什么好地方，好女孩子难免会堕落。然而，到外企去就业对于青年人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工资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甚至有出国旅游的机会。也因为这个诱惑，外企老板或其商务代表，就以此作“甜饼”，抛向一个个天真无邪而充满幻想的女孩子。

外企的性骚扰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不仅在民间流传，而且屡见报端。上海的《青年报》曾这样报道：外语学院的一位南京籍的应届毕业女研究生通过人才市场推荐到某外企工作，但正当面试结束，工资谈妥，就等迁户口时，她却不辞而别，好端端的工作说放弃就放弃，搞得人才市场的人士好生不解。问了好几次也没有问出结果。直到最后不得已之下女孩进出这么一句话：在那里我觉得不安全。

目前骚扰外企女性白领的主要是他们所属公司的老外，仗着自己是公司或部门的头，远离故乡的他们常常仗着手中的权力，骚扰他们手下的女秘书、接待、行政助理乃至部门经理。

有的向她们传播不健康的或与性有关的照片、文章，有的向她们寄淫秽的挑逗性的信件，有的过份殷勤讨好雇员，以性关系作为改善其待遇的条件，或连连提出不正常的约会等等。一旦雇员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很容易动用诸如降职、解雇等手段。有的公司里，几乎每个月都有女员工莫名其妙地离开，究其原因无非是两种，一是受不了性骚扰主动辞职；另一种是拒绝了性骚扰被辞退的。有关人士就此呼吁：绝不容许性骚扰之风在外企滋长。

尽管有人怒目，但在我们各种报刊上，外企招聘女职员的广告仍是源源不断，而无一例外都要求年轻未婚、相貌端庄、性格开朗的女性，并许以优厚的待遇。北京人甚至有一句玩笑话：现在街上很难看到漂亮的女孩子了，她们都到建国门那边去了。建国门何许地方也？外交使馆和外企最密集的地方。

国人在大力呼吁健全法制，严惩性骚扰行为之时，来自外企的一方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

一位名叫约翰逊·亨里斯的美国公司驻京商务代理竟无耻地说：你们国家的女孩子欢迎我们骚扰，我们有钱，身体棒，她们不喜欢你们中国男人，所以，你们中国男人都吃醋。在现实中，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女孩，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女孩子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美国人的话的。一位愤而从外企辞职转而从事新闻的女孩说，那些老外都是些色狼！见过面请你上一次麦当劳，转回的路上就请你去他的公寓要你陪他上床。这位女记者介绍，那些老外很会摸中国女孩子的心理，从外国回来时，总免不了要带点什么外国香水、口红、巧克力什么的，有的明目张胆地说，要就请到他公寓去拿。这位女记者的一位要好的朋友说，一个老外甚至把她邀去给了她一包法国口香糖，就去撩她的裙子，她只好冲到窗前大喊救命，才得以保身。

但结果当然可知，这位拒不让老外撩裙子的女孩在第二天就被炒了鱿鱼。

老外们都急疯了。一位现在已经独立经商的女士说，我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心里根本装不下别的，整天就想着怎么才能不让老外沾上便宜，一天天地下来，就像在纳粹营里度日，每天走在下班的路上，才长松一口气，今天终于没事了。但有的时候，你真是想躲也躲不了，比如他找你要一支笔，你递过去时，他却不拿笔，毛茸茸的大手一把抓住你的手不放。有时他会叫你在电脑里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文件，当你找了半天正为找不到文件而心急火燎时，他就过来“帮你”，一个手敲键盘，一个手就搂住你的肩头了，趁机脸也贴过来，一股牛臊气快要把人熏晕过去。如果你反抗，他就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任，说你笨得连一个文件都找不到，不找出这个文件就别下班！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一方面是老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性骚扰，一方面是白领女性为保住一份工作而不得不面对性骚扰忍气吞声。但由于过去没有这个现象，或者有，却不严重，不普遍，因此导致司法滞后。现在，法律应该出来说话了。我们的政府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但不引起性骚扰。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正直的外国人也为之愤怒，他们说，一那些人在国内时，老老实实，还有绅士派头，一出来就变了，简直就像一条条公狗！一部分真正搞发展的比较著名的外企，也用极其严格的规定限制性骚扰活动。

绝对不容许其外籍职员发生如下性骚扰现象：语言骚扰、视觉骚扰、人身骚扰等，一经发现或举报，即予以辞退回国。

但非常遗憾的是，很多外企只考核利润而不考核职员的道德作风，对职员的生活听之任之。因而老外们有恃无恐，脸皮也越来越厚。有一位中年老外在骚扰其女职员时，不巧被其上司碰见，受到一番训斥以后，竟然不检讨自己的丑恶行为，反而说：“中国这个国家不开放，没有妓院，无法解决他的性饥渴，不尊重人权。”这真是荒谬之极的谬论，自己不轨反而说别人。

很多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受教育程度高，讲文明，有修养，尤其是一些向往发达国家的人，他们甚至也欣赏某些外国人的观点，认为外国的性解放好。中国现在也不是封建时代，跨国婚姻也不是什么新闻，但性骚扰是应该受法律制裁的，这一点我们要看到，否则，就是帮老外来欺侮自己的姐妹了。

就是一些有文化的西方人，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尚，对于外企存在的性骚扰现象，他们觉得很正常，并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应该付出的代价，你们不让他们骚扰，他们就不肯到你们国家来，他们不来，你们引进外资扣技术的目标就会难以实现。

哪个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甚至有一位西方研究汉学的学者说出，“性骚扰不会亡国，真正亡国的，是经济落后。英国人打你们，日本占领你们的国家，都是因为经济不发达，从这个角度来看，用性骚扰换取经济发展，是以小换大。”这种殖民主义话语，只让人听了愤怒。一个在北大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居然也是一付西方面孔，他说，中国有性压抑，在日本，性压抑是不存在的，电视台搞的性教育如你们电视中教做菜一样正常，你们始终是生活在性压抑的苦闷和阴影中。从你们的文学也看得出来，你们的文学，是一种中性文学，充满了一股太监文化基调，张贤亮写了一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小说，你们就抨击他，后来出了一套小女人丛书，你们也抨击，只有中性，才能在你们的文学界得到认可。

这位日本留学生简直是满嘴喷粪！一顿胡言！他这种片面歪曲，除了

可恶，也是无知。

在中国的男作家中，有很多是称得上硬汉文学，莫然、朱苏进、李存葆、周涛、梁晓声等都是公认的硬汉作家，在他们的文字中莫不张扬着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而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如残雪、徐小斌、赵凝、林白、陈染等，又都流淌着鲜明的女性意识，他们的作品，也都得到文学界的公认，中性文学是无稽之谈。

不论是外国人怎么辩解吧，性骚扰是不得人心的。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他们本国，都将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惩治。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在外企工作的年轻女性，大多可以称得上是优秀人才，有学历，聪明漂亮，甚至是千里挑一，如果那些敢于继发性骚扰的外国人无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他们一样会受到制裁。我们的经济发展，决不以青年女性的痛苦为代价，我们不要性骚扰。

## 冷战的终结者在霸权终结之前陷入失迷

“这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代。”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于 1776 年如是说。220 年过去了。如今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面临灵魂的考验。

由于地理大发现而乘帆船殖民新大陆一下暴发起来的美国，调过头来一看突然感到这个世界似乎还“欠”一笔什么东西。

二十世纪正临近尾声。

二十一世纪和新的 1000 年正在逼近。

美国认为自己是冷战的终结者。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使美国相信，共产主义被战胜了，而且不费一枪一炮。没过多久，美国就从“光荣与梦想”的沉醉中揉起了眼睛。

美国最终发现，在太平洋对岸，在古老的东方，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历史的民族巨人依然走在共产主义的途中。

美国自然不想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祝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美国是喜欢制造神话但不相信神话的国家。

从逻辑的观点看，美国不能因为自家历史的短促而妨碍对别国悠久历史的正确理解。

对事物理解的错误，必然导致判断的不可靠。为美国上“逻辑课”超出了笔者能力范围。

即使是请来逻辑学家，对美国也没有用。

美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大约有条：凡是与美国的价值标准不符的国家，美国就要干涉。美其名曰：保护美国利益，此其一。凡是美国说话不算数的地方，美国就要遏制。美其名曰：维持地区平衡，此其二。

这两条如果是强盗的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从来以“自由民主国家”相标榜，作为美国的逻辑，按照公理推论下去，结果就让人在理解上过于困难。

假如美国拿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美国的范围内玩把戏练魔术，也就由它去吧。

不过，要是在中国人民面前表演起来。而且是提着霸权主义、人权外交、强权政治、经济制裁一类道具，并且还想达到遏制中国的舞台效果，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美国的表演，再加上追随者的表演，已经让人看够了，毫无新意。美国得不到它想象中的喝彩。如果它听到了什么动静，那只能是倒彩。

在压倒一切的倒彩中，有一个更短促更有力的声音。那就是一个单音字——“不！”这个汉字在字形上看，是由一个箭头和一条直线组成。当“不”这个爆破音发出之前，是紧闭嘴唇的沉默。中国的民族魂鲁迅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旦这个“不”发出声音，就像一只箭冲破黑夜的地平线，表达一种饱受欺凌与屈辱而忍无可忍的激情与不满。

从鸦片战争起，这个“不”就被说出了，只是到了现在，这个字才有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可以说不。

现在说正是时候。

现在不说，就会被误认为挨了棍子无话可说。现在不说，就等于还等下一根棍子。

现在不说，就是对强权和非正义势力的低头。现在不说，就是对正义和公理的背叛。

一句话，现在不说，过后再说就毫无意义。

中国说“不”又怎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桌上，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麦克风前，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论坛上，在新华社电讯上，中国发出了“不！”这个声音及其正当的理由。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中国可以说“不！”而扬眉吐气。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感到了压在心底的这个“不”字终于有机会被说出，被听见，而痛快淋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正义的声音，拒绝的声音，反霸权反遏制的声音，永远在传递，永远有震撼力。

在今日国际关系中，不论国家大小、民族强弱，都是平等的一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形成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大国即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无权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更无权将自己的利益凌架于别国的利益之上，或者以牺牲别国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冷战的结束，不等于反对霸权主义也随之结束了。事实上，霸权主义更加为所欲为了。

美国还在怀念冷战的日子，还在制作已经过去的时代的幻影。

在好莱坞可以放在胶片上的故事情节是一回事儿，在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东西是怎么搬也无法搬到银幕上去的。

美国是一个喜爱虚构世界的国家。久而久之，也往往被自己的虚构所迷惑所愚弄。

麦卡锡时代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现在还不能操办一切国际事务。“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列宁关于民族发展的两种趋势的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国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

真理是不能回避的。

在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的现在，美国在听到“不！”的时候，还要再揉几次眼睛。

美国在派出“人权外交”代表的时候，应该给他（她）的皮包里放上两本书，一本是《世界殖民史》，另一本是《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的那一本可以赠送，不要担心知识产权问题。

这位代表一定要代表美国认真地读一读，如果做不到，那么至少应当记住些史料。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读史可以明鉴。”意思是说读历史和照镜子差不多。对美国来说，多读点历史有好处，用外交辞令来讲就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的代表出发之前，还要到五角大楼的电脑里拷贝一份二战以后（为了简洁也可以从冷战后开始）美国的军火贸易的历年收入情况表以及那些卖掉的军火的去向。

现在——不，现在还不能踏上行程。

这位代表还要顺便了解一下美军在国外的分布情况。如果五角大楼不愿意提供方便，那这里碰巧有一份法新社记者从华盛顿发出的电文，可以让这位代表参考：“根据可获得的五角大楼最新（截止1995年9月30日）统计数字，驻欧美军11.816万人，其中驻扎德国7.328万人，驻英国和意大利各1.2万人；驻亚洲美军8.9万人，其中日本3.91万人，韩国3.6万人；另有1.32万人分布在亚洲地区海域；在中东和北非，有9250名美军，其中40的统计数字，美国在西半球的海外驻军为1.713万人，其中古巴关塔那摩有5129人，巴拿马有7700人。”这位代表现在可以去机场了。在飞机上或者在睡觉之前有这些资料在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可以负责任地讲，这位代表如果认真看了，想了，一定会去找医生要镇静剂，用来对付失眠和发言时失误。

如果这位代表具有起码的良知，那么就有理由为他（她）能否完成使命而担忧；如果他（她）只是为了代表美国去到处传话或训话也同样是白跑一趟。

搞“人权外交”不得人心，搞人权的双重标准更会给人以伪善的印象。

对付伪善者有两种办法。一是不予理睬。二是加以揭露。

美国总喜欢把自己的国度形容为天堂。那里边不仅有民主的椅子，又有自由的调子，还有别的什么动听的东西。凡是美国想要指责、干涉他国内政的时候，就要挑选几样出来以示榜样。

令人惋惜的是，美国的天堂是天方夜谭。美国拿得来的，无非是那根国标宪兵棍子。

应该有谁来劝一劝美国。

如果大家形成了共识，劝也没用。情况就比较复杂。让伪善者承认自

己是伪善的，不能不说还是个难题。

美国性格中的偏执与狂傲，应该收敛了。许多年了，听到“不！”的声音还少吗？尝到鸡蛋和西红柿的滋味还不够受吗？在伊朗，在古巴，在伊拉克，在利比亚，在巴基斯坦，在朝鲜，甚至在美国盟友日本（比如冲绳美军基地）……美国对得到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容易健忘呢？如果不是健忘，那么只能证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美国机体的不治之症。

美国总觉得接受了法兰西民族的一件礼物自由女神之后，自家的大街小巷里便到处是自由火种。

作为伟大的雕塑艺术品，自由女神像楚楚动人、白璧无瑕。如若美国以此为化身，那就另当别论了。

伟大的发明家和幽默大师富兰克林说过：“那位在最威严的王位上的最伟大的君主也必须坐在自己的屁股上。”美国是从英王的那块殖民地上独立出来的，照理更应该在自己的屁股上坐住。可是它就是做不到。

当美国说，“自由”，就让人觉得“自由要上自由的当”。

当美国说，“民主”，那含义就是说，不管谁说“不”还是“是”，都要听它的。

这真是一个灵魂受到考验的时代。

如果美国是有灵魂的，那么它同样要受到考验。如果它已经失去了灵魂，不知何去何从，那么，受到考验的倒是世界面临的这个不寻常的时代了。

## 算盘有两种：一种是如意的，一种是不如意的

一个霸权主义的幽灵在世界上徘徊。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使美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冷战结束了。美国失去了往日的敌人和对手，这个拳击盛行的国家似乎沉浸在过去的荣耀中不能自拔。一个不能遇到挑战的拳击手的下场是令人沮丧的。美国深深地了解这一点。

当美国在第三世界中寻找对手并伺机重创对手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有着古老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国身上。非常可惜，美国这个国家在观察世界的时候总要流露出和它的历史相称的目光：短浅、好奇的粗野。美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要推销到中国大陆，不会像其推销肯德基快餐那么方便。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以蒋家王朝的覆灭而结束。饱经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正像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的那样：站起来了。当一个民族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挺立在东方之际，谁还能将她再次推向深渊呢？除非她自甘屈辱、不求上进，否则，任何外力，不论技术的还是文化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可能把她置于死地。

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熟视无睹。世界已经变了。

不管这个世界多么不平静，从海湾到波黑，从车臣到中东，和平已成

为世界的主潮。

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舞台越来越小了，尽管它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现实。

世界进入了后冷战的时期：美国依旧抱着冷战时期的唱本不肯下场，全然不顾台下无人喝彩、观众日稀的景象。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在他人面前指手划脚都有被最终抛弃的危险。美国在二战以后得到的教训还少吗？在朝鲜，在越南，甚至在同为七国集国的日本（比如冲绳美军基地事件以及美日贸易争端），美国已成为亚洲地区最不受欢迎的国家。除了李登辉之流谁还对它抱有幻想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日益壮大。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她的潜力与活力必将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同样，世界市场也不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

地球越来越小。这里有美国技术的贡献。有 IBM 和摩托罗拉的贡献。领导信息技术潮流的美国，至今还没有一种技术，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诸如此类的货色压缩在芯片中，从而在世界这架复杂的机器中通用无阻。

诗人毛泽东说过：小小环球。

然而一种惹人讨厌的嗡嗡声仍在耳边回响。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面目越来越被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所认识。这不是偶然的。那个口口声声要促进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国家，公然在世界舆论的注目下，强行在公海上搜查中国“银河号”货轮，践踏国际准则，无视中国主权，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连一声道歉也没有：在中国争办 2000 年奥运会的历程中，又是在美国的操纵下，将 12 亿人民心中的圣火化为死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中，还是美国故意阻挠，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在最近的台湾海峡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居然派出大型舰队，摆出一副为分裂中国的势力打气撑腰的架势……够了。

我们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落后挨打的历史不仅是镜子悬在我们面前，也是一把剑挂在我们头上。屈辱和创伤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上留下了太多的烙印。正当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伟大时刻，居然还有人梦想把台湾分裂出去。每个正直的中国人，每个炎黄子孙都会坚决反对。

霸权主义有搬弄石头的爱好。

那么究竟是砸了自己脚之后陷得太深了，还是因为不能自拔而砸了之后也毫地知觉？在一片制裁和遏制中国的喧嚣声中，“中国威胁论”是美国非常拿手的一张牌。当这张牌摊在桌面上的时候，我们终于看清了：这是一张不希望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国力强大的牌。

一张抽错了时间，出错了地点的牌，只能输掉全局。不仅如此，也充分暴露了牌技的拙劣。

这样的牌必然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唾弃。

然而，美国自信得很，它认为自家手里还有许多强牌可以打出来。美国这个财大气粗的玩家，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会犯现，它永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它可以在意识到要输掉的时候改变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

结果就是：赢了是它的，输了也是它的。对美国而言，赢和输是一码事儿。

必须找到适合于美国坐下来的一张板凳。

必须拿出一套真正的规则，并且告诉它美国的规则在这里行不通。

必须让美国慢慢明白，世界已走向多极化，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在过去没有办到如今就更加困难。

不管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葫芦里装着什么药，它只能在世界市场上得到自己的那一份。

世界有它自己的运行轨迹。不管美国的光荣与梦想还剩下什么，世界照样运行。

美国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软件”，别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同样也可以插入自己应心得手的“软件”。

世界不是美国的一家电脑公司。这就意味着，要想当老板还得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举手。

据说美国是崇尚民主的国家。可为什么提着美元和枪枝到处插手别国内政，干涉别国事务即使遭到绝大多数正义者否决的时候也不善罢甘休呢？就其历史而言，美国很像个儿童。来点天真也不失其可爱的一面。美国毕竟不是一个儿童。一个成年人要是装出野孩子的模样去耍赖就让人觉得太讨厌了。

美国是相信上帝的国家，至少在钞票上这么写着。相信上帝的保佑，图个吉利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别的民族，别的人民可能相信也可能不那么认真。每个民族都有与其历史根源深刻联系的文化、风俗、观念和制度。

道理是简单的。

不过，要让美国这样的国家明白过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对话与交流中求得共存。对抗与交火什么也解决不了。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空间，那么西方和美国的发达才是真正的乌托邦；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劳动力和市场潜力，西方和美国的发达最后只能是一堆废铁。

知识就是力量。很好。

这句话在美国那里却变成了技术就是强权。太糟了。

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高精尖技术。如果这些技术的取得附加着与技术本身无关的条件，那么买方就有理由从贸易谈判的会议室拂袖而去。

生意就是生意。此处谈不成，别处还可以谈。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别无选择地在世界市场中相遇。以礼相待，以诚相见，是一笔生意成功的契机和气氛。

世界市场就意味着，谁也不可能长时间地独霸下去。美国惯用的逻辑，就是把生意谈成政治，把政治变成生意。如果说这一套逻辑在冷战时期还能奏效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就不那么管用了。

美国每年都要煞有介事地讨论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每年都放出风来，威胁要取消它。结果呢？每年也都假装勉强通过了。就好像贸易最惠国待遇是美国给中国的一个什么便宜似的。其实呢？倘若取消，对美国更为不利，对美国的企业也不利。贸易最惠国待遇对美国工人而言就是就业机会。如果对美国无实惠可言，那么这贸易政策就不可能出台，也就谈不上取消了。

美国的政策当然要为美国谋利，天经地义；同样的天经地义，别国有权拒绝把谋利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

美国从苏联的解体中获得了好处，尝到了甜头，就以为对别的社会主

义国家也可以如法炮制。

美国的计算机技术是一流的，可它的算盘打得实在不高明。

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一种算盘叫做“如意算盘”。应该给美国补上这一课。很有可能，这样一来。美国至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算盘，一种是如意的，另一种是不如意的。没有分类也就没有科学。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不可能不理解这一点。算盘一旦打错，不仅丢了生意还要丢面子。

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

美国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要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将不择手段。

美国争霸世界的历史已经让它的野心路人皆知。后冷战的阴影正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夜悄悄蔓延。霸权主义这个幽灵在世界新秩序的舞台上要扮演的只能是一个丑角。至于它是以喜剧还是以悲剧下场，那就得看下去再说了。

司马昭之心一个经过改革开放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必将取得与其灿烂文化相称的伟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依旧鼓舞人心。从1978年至1995年，经济增长率年平均9.4%。这样的速度，的确让美国吃惊。美国的所谓经济制裁，不但没有挡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让它看到最不情愿看到的景象。于是，又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用心何其良苦。

真正威胁亚洲地区安全的是美国。从朝鲜半岛到菲律宾，还有日本，美军基地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决不是和平的象征。最近在台湾海峡制造的紧张气氛，更是暴露了美国贼喊捉贼的把戏。中国在自己的领海上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却把航空母舰开过来。明目张胆地为李登辉之流分裂中国呐喊助威。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两岸的统一是历史的潮流。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明里暗里的升级，除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以外，美国还能得到什么呢？1997年香港，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初也是最悲惨的一页。中国人民就是从这写满屈辱与不幸的一页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记住了许多东西。

香港的回归，使美国“下意识”想到了台湾，该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加加油了。然而，不论美国制造的“发动机”多么强劲有力，也无法安装在台湾岛上，从而驶离中国大陆。

如果说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它不是、永远也不可能是美国的。

拿台湾问题拖住中国大陆，在政治上找麻烦，遏制中国的发展，是美国险恶用心所在。

美国还在怀念冷战时期的日子。

时代变了。

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很大的权势。但是，权势代替不了权威。凭势压人欺人只能遭人憎恶。

美国总有话说。在海湾，在东南亚，在波黑。中国人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听腻了，听烦了——因为在它说话的背后总有一个世界警察气焰和面目。美国不只是充分而且越权地利用了设在家门口的联合国讲台，并使出了好莱坞电影明星们的演技。美国的“演”与“说”，由它去发挥罢，由它

去激动罢。美国迟早会注意到，台下听众越来越少。很有可能，听众都在另一个大厅里，他们也开始登台发言。内容和主题自然要有区别。他们讨论着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其中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找到一个办法，比如一根尺子那样的东西交给美国，让它在有话要说时不要忘了分寸。

美国有对“真理的标准”的不同理解，为什么不可以呢？还要提醒美国一下，不管美国现在处于怎样的亢奋状态之中也不要忘了：美国不是真理标准和制定者，也不是国际事务的最后仲裁者。

美国不是崇尚民主的吗？可为什么对其他国家的声音就不能安静地听一听想一想呢？能够和善地听取不同的声音，是自己的声音存在的前提。美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沙漠上的国家。

美国自己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地理常识”，让人感兴趣的是：它说起话来，训斥起别人的时候总像是来到了荒芜人烟的地方。这实在不像是个新大陆殖民历史的注脚。

如果真理在美国一边，就用不着扮成警察模样在世界各地指手划脚一通乱叫。

如果真理不在美国一边，开上航空母舰，放出间谍卫星也不会吓住任何有真理信念的人们。

世界已经来到二十一世纪的门槛。

中国人民也已经将历史翻到市场经济的新的一章。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智慧、勤劳和坚韧，将在新的一章里记下富裕而美好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渴望曾经被西方列强和历史的错误、荒谬和封闭沾辱过、压抑过、摧残过。正因为如此，所有企图遏制中国的阴谋，也就很难再得逞了。

如果美国的历史记忆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它可以回想起曾经有过一个麦卡锡时代；倘若美国是健忘的话，那就划出一段最近的历史比如里根时代。当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其主要矛头对准的是苏联。美国的虚虚实实战略武器的研制、把苏联的军事工业引上了与美国抗衡的发展轨道。这恰恰中了美国圈套，结果使苏联在经济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就是通过军备竞赛，削弱苏联的经济实力，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标。在冷战时代，美国的阴谋——全球战略防御体系，部分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美国按照自己的推理方式，似乎得出一个“社会主义已经终结”的“数据”。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历史的错误，没有错误的历史。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存在着一个叫做“历史的诡计”那样的东西，法西斯德国不仅要灭犹太民族，而且还要“灭绝”苏联的社会主义。结果呢？社会主义苏联非但没有被“灭绝”，而且更壮观了：东欧产生了一片社会主义的灯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下场也是有目共睹。所谓的“东亚共荣”最终给日本留下战败国的耻辱。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如果美国真正理解这一点，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了。美国的不理解，乃至感到“恐惧”，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负载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不是美国的制裁、遏制和封锁就能挤垮的。相反，一旦中国人民认清了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的本来面目就会站起来，

用一个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挺身而出”，把道路上的障碍物打扫干净之后继续前进。

美国总是低估中国人民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越是在遇到外患的关键时刻越是强大。虽说今日已不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当年，但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同样地，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潮的时代，从中国这里更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找到什么。

“中国威胁论”是美国制造出来的风车。用来煽动亚洲部分地区的反华情绪，此其一；为美国的遏制政策和战略寻找借口，此其二；混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此其三；最后，显然是针对中国大众心理的：让中国大众沉浸在已是“经济大国”的幻想中，歌舞升平，卡拉 OK，消磨斗志，自我陶醉。

美国在一个并不低洼的地方制造了一架风车，在中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散布“中国威胁论”，可谓居心良苦。

美国不是塞万提斯。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美国也不是堂·吉珂德。

即使在冷战的岁月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要与中国“面谈”双方感兴趣的国际问题。

尼克松所代表的利益用不着现在再多费口舌。这个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总统，还是要与中国打交道。

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们应该读一读尼克松、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文章，尤其要读一读最不喜欢、最不情愿的部分。实在没有时间，至少在国会休会期间腾出些工夫读一读。

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不能这样要求美国。国情不同嘛。

然而，为了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不妨提醒美国，还是抽时间想一想自己的所言所为。

早上想比晚上想要好一些，理由是“一天之季在于晨”，这是中国的老话，为什么不试试。现在医学已经证明，做梦是帮助人们休息的方式，也是为了让醒来更有精力冷静对待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良好方式。

美国为了证明“中国威胁论”，提出的论据之一就是：“中国不断加强国防力量增加军备开支。”这个论据毫无说服力。

美国的军费开支 1994 年人平均 1000 美元。

中国大陆的国防开支 1994 年人平均不到 5 美元。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非常之少。

美国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如果说美国在亚洲地区感到了威胁，那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和各国人民按照自身利益加强对话与合作的结果。

威胁世界和亚洲地区安全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最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到它本身。因为美国的一套玩法越来越提不起别的国家和人民的兴趣，越来越遭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对和愤怒。

需要遏制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把手伸得太长。如果伸过手去是拥抱正义与和平、合作与交流，那当然是绝好的事情。美国一伸手，遭到的往往是嘲笑、冷落和拒绝，这说明手伸的不是地方，世界人民知道它伸过来的用意：挑拨是非、浑水摸鱼、耀武扬威。

美国的决策者可能看了太多的好莱坞电影。久而久之，把银幕上的英雄无所不能的形象包装在自己的身上。这可说是十足的生活模仿虚构。在现实与电影之间，美国往往分辨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好莱坞的梦幻工厂确实让美国受害不浅。电影中的表演如果说还可以供人娱乐的话，那么，现实的美国就显得不那么叫观众开心了。美国的表演的确骗了不少的观众。

但对于冷静的、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观众而言，再充分的表演也要被揭穿。再者说来，美国的表演表面上五彩缤纷，骨子里如出一辙，看得多了也让观众产生逆反心理。

银幕上的美国英雄是一回事儿。

银幕下的英雄美国是另一回事儿。

国际政治舞台，与电影工业的距离，美国应该认识清楚的。否则，不仅对美国的“政治”不利，对美国的“电影”也不利。美国若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集导演与主演于一身，就要仔细区分，掌握技巧，而不要主演时忘记了自己还是导演，导演时也别忘了自己还担当着主演。

“好戏还在后头。”导演说。

“我看演完了。”主演说。

“这算哪一出？”观众说。

“真真假假，当真则假，当假则真。”评论家最后说。

## 搅得美国人睡不好觉的正是美国人

近几年，中美贸易磨擦，时常冒出一些火星。美国指责我们保护知识产权不得力，美国的知识产权被盗，如电子机计算机软件，电影版权还有米老鼠什么的。美国不顾中国严厉打击非法复制光盘、软件等事实，多次扬言报复，甚至在知识产权谈判桌上恶意中伤，说是“同小偷谈判”。外经贸部长吴仪立即回击：“我们在同强盗谈判。”的确如此。

如果让美国的谈判代表先去自家的博物馆清点一下有多少稀世珍宝是从中国的盗来的话，肯定谈判就要延期举行。因为数目太大，清点起来恐怕要费很多时间。当然，要是清点真正的美国货，那么在美国的博物馆里也就耽搁不了多久了。

在北京曾经流传着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白宫的某次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从中国给克林顿总统带来一份情报，内容是中国打算派一个由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和文物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来调查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美国是否得到了保护。这位总统顿时大吃一惊，随即取消了所谓的报复清单。

相信美国听这个笑话是笑不起来的。

如果没有中国的古老发明之一罗盘以及相应的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传播，很可能就不存在美国这个国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第一批殖民者的到达，都动用了帆船和罗盘。

即使当时西方造出了航空母舰一样的船，没有指南针做向导也只能在海上兜圈子。别说发现新大陆，连找到老家也不会太容易。



如果没有古老中国的印刷术和造纸术，世界的版权问题就不会出现。

如果没有火药的发明，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和大炮。而美国就是凭着这些东西耀武扬威的。

一部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西方列强（盗）正是用中国的技术与发明，反过来瓜分、压榨和欺凌中国一百年。

我们也不妨问一问，那一百年当中，谁保护了中国的版权？连中国的版图都被瓜分得七零八碎的，这个帐又怎么算？！“如果要谈索赔，那么，中国该索赔的东西太多了。

西方对中国的入侵和奴役，使中国的近代史，成为一部最悲惨的历史。贫穷与落后，造成了长达一百多年被动挨打的不幸历史。时到今日，中国仍然落后世界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时间，因为中国发展壮大机会曾经被西方列强无情地夺去了。世界资本主义所聚敛的财富，倘若没有中国的白银在其间滚动，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原告和被告的椅子就在那里明摆着。

如果要谈保护，恰恰是弱者需要得到保护。我们一查历史的档案，中国不但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与此相反，中国遭到的是任人宰割，从而养肥了宰割者。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二十口世纪的前夜，霸权方义者真正要保护的是自己的霸主地位。霸主的那一套强权政治，无非就是遏制发展中国家，并使这些国家永远留在发达国家的阴影之中，让“发展中”这个词语变成“不发展”的同意词。美国用美国版的词典说话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中国也有自己大词典。这部大词典同中国的灿烂文化一样厚重。中国的发言人知道，有这部大词典做后盾，说出每一句话都是有份量的。即使中国不发言的时候依旧有份量。

美国的《独立宣言》上有一句很动听的话：人人生来平等。如果这是美国的信念，那么美国就应该无条件地承认：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美国从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承认。

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始终奉行双重标准。对自己盟友是一套，对敌人则是另一套。

对不同的盟友还要区别开来——例如给英国和日本的待遇就不一样，同是西方盟国，一个近亲，一个远房。已故法国总统密特朗曾不无讽刺地指出过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在与美国总统说话时就像个8岁的小姑娘，可见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之非同寻常。日本是二战后被美国照顾大的，因此，美国总是拿出一副家长的架式，迫使日本屈服，尤其在双边贸易的问题上。

在海湾战争中，日本花了一大笔钱，让美国去英雄，让美国去胜利。

说到海湾战争，更是暴露出美国的阴险。名义上主持公道，实际上是利用解放科威特的借口，摧毁伊拉克这个不服美国的国家，进而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分而治之。挑起阿拉伯人之间互相残杀，美国才可能持久地保住自己的利益。失去海湾的石油，就等于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飞机、汽车、潜水艇的燃料箱差不多就在海湾地区。维护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远非就是为了保证美国的燃料箱一是装满，二是不要起火。

在美国的后院有古巴。

在美国的油库旁有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美国对这些死对头采取了各种手腕，目的只有一个：使这些小国彻底屈服，甘拜下风。

情况表明，美国的光荣与梦想遇到了挑战。在月黑风高之夜，依旧可以听见美国咬牙切齿的声音，它尝到了心慌和失眠的滋味儿。

如果美国放弃霸权主义的野心，本来是可以睡个好觉的。干涉别国内政，即使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也不一定马到成功。假如美国继续充当世界宪兵，就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愤怒与敌视。这样下去，留给美国的将是耻辱与恶梦。

恶梦醒来是早晨。

恶梦要是不能醒来，差不多就是坟墓了。

知耻而后勇。

勇而忘耻却成了新的美国精神。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仍旧处在拼合状态中。美国不仅要霸占最大的板块，还要操纵大小板块的移动、离合，最后按照美国的理解完成一幅构图。

美国遇到的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大。

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任何国家包括超级大国也不能将它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

从第一批殖民者所乘五月花号大帆船（船上乘客 102 人）经过在海上的 66 天的漂泊，于 1620 年 11 月 11 日抵达普罗温斯顿港。也就在同一天，乘客中的 41 名男人签署了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即使从那时算起，美国也只有 376 年的历史。

在世界史上，美国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发户。纵观美国的历史，它有着暴发户的全部特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粗野蛮横、仗势欺人。美国这个暴发户很难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美国喜欢从电视、电影画面上了解世界。画面是会骗人的。要是从电影上看美国，那么美国的英雄、正义者、有良心的法官就可谓遍地尽是了。（中国的某些电影导演也很善于把画面拍得好看，即使镜头对准的是些阴暗、丑陋的角落，也能把握住西方的欣赏口味，并且获得成功。成功地帮助了本来就扭曲的观点对待中国文化的偏见的加深。当然，中国的电影不能为西方观众的无知承担责任。不能不警惕的是：通过电影渠道为西方的文化霸权、政治霸权翻拍资料。）美国很会塑造自己的形象。

一个暴发户只能通过乔装打扮才会被人看起来不像是暴发户的模样。

装是装不像的。

必须让美国听到来自亚洲的声音。

必须让美国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

必须让美国听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不客气的声音。

把美国的货色层层剥开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亚洲和中国的野心。在海湾，在朝鲜，在台湾海峡，美国所梦想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得到。大喊大叫，即使在航空母舰上大喊大叫，感到害怕的人越来越少。美国的强权政治在其它地方也许有市场，在中国推销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强权政治不论贴上多么动听的、多么好看的标签，人家一眼便能揭穿。美国可以推销的东西也有许多，例如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波音飞机等等，即使是这些技术的推销，也只能在互利的原则上才能取得成功。

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压迫的中华民族，对霸权、强权一类的大动作、小动作都是敏感的，不能接受的。

历史已经翻到今天。

难到白宫的日历上不能显示了吗？美国的历史学家应该提醒白宫，过去时与现在时的区别。

美国在够得着的地方，就会赤膊上阵，一决高下；如果够不着的地方，或者由于有些象棋比赛规则的限制不能报名参加，美国就会在一边为棋友支着儿。

美国总是想着把自己不喜欢的对手挤出比赛，其次才是把所有的对手挤掉打掉。

美国的天真和霸道是一回事儿。

美国非常清楚，自己动手组织比赛对美国最有利可图。美国最拿手的办法还是通过修改规则和充当仲裁最终将不适应新规则的对手排除，所谓不战而胜。久而久之，美国的规则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谁喜欢参加在赛前就知道结果的比赛。

不久前在曼谷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开创欧洲与亚洲之间政治对话的通道。情况表明，没有美国参与，世界上的事情，亚洲和欧洲的事情也可以正常进行。

被搁在一边的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认识一下世界。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美国的力量不可能凌驾世界诸国力量之上。美国的一家之言不会像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那样有份量。

美国把对付日本的办法强加给别的国家是行不通的。美国动不动就以经济制裁相要挟，也说明它从制裁中曾经得到过想要得到的东西。

美国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尤其是在冷战的岁月里。

美国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在新秩序的学校里的一切。美国的烦噪与迷惘不难理解。

美国在亚洲得到的政治利益，是用石油生意、军火生意、军事存在来计算的。

海湾战争，美国拿日本人的钱不但打了胜仗也挑起了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不和与斗争，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双获丰收。既保证了石油生意，又推销了军火。不仅如此，也为美国长期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存在保存了堂而皇之的借口。海湾战争对亚洲造成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也许更能看得明显一些。

世界新秩序，光靠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支撑不起来的。况且，这个富人俱乐部里边也不时传来一阵阵激烈的争吵。情人之间的争吵也还是争吵。

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被凌辱、被奴役的历史，使那里的人民中间蕴藏着比地下石油更广阔更强大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天然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一切外来势力的干涉。

很显然，美国对这个资源的研究和分析是失败的。美国要想在世界新秩序中发挥更多的作用，那么只有通过对话而不是训话的方式才能达到效果。

要认真而不能装成认真的样子去听听别的意见，尤其要认真听听中国的意见，这样可以使美国在发言时懂得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

几年前在美国的一个什么地方举办了一个说谎比赛。有一项规定是，不允许政客参加，理由是政客们是职业说谎者。也难怪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

那么发达。倘若搞一个职业比赛，美国拿出中国威胁论一类的段子肯定会拿得头奖。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并没有照着美国的想法变化和发展。中国作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繁荣与富强，对美国而言，既不愿看到又很难理解。尤其是中国大陆平稳地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并未出现美国所预想的结局。这让美国更难以接受。

然而，现实就是现实。

美国的战略非常清楚：遏制中国，最终搞乱中国。美国给中国描绘的图画只能挂在自家墙上独自欣赏。拉开一段时间的距离之后，美国也会渐渐发现，从色彩到透视关系都出于拙劣的技法。

遏制中国，必然遭到中国的反遏制。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从经济制裁到人权外交，从散布中国威胁论到纵容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并且将航空母舰驶过两岸关系最紧张的海域。这一切无不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内政的无耻行径。

美国的警告。并不能阻止中国的陆海空协同的军事演习。如果要警告的话。那么应该警告台湾的分裂中国的阴谋势力，这方面，美国的确可以发挥作用。如果美国不愿意这样做，当中国发出警告的时候，美国至少应当与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冷静地听一听，然后再做打算。

中国的骨头是硬的。

美国及其追随者啃起来一定要当心。

一个敢于将万里长城建立在山顶的伟大民族，还能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她、摧毁她呢？没有也不可能。毕竟，历史已经发展到现在，发展到中华民族不可欺不可辱的现在。

美国是一个喜欢搬石头的国家。不过，由于算度上的失误，常常搬起的石头太沉重，免不了要砸自己的脚。这方面，美国有许多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把超过自身体力的石头抛到人家的道路上，阻碍人家的通过和达到目的地的正常时间，是困难的，也是不得人心的。这不仅是个力学问题，还是个智力问题。

五十年代在朝鲜，六十年代在古巴，七十年代在越南，八十年代在伊朗，九十年代在海湾，美国的霸权主义业绩究竟如何呢？如果美国的决策者因四处插手、忙于制裁别国来不及判断，那就向历史学家请教请教。

在美国看来，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一员。强者的利益不能建立在小国弱国的利益之上，也不能以牺牲小国弱国的利益来满足大国强国的正义感。

美国的《独立宣言》说得很好：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

还说，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每个国家的人民在世界的公理面前都是平等的，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没有生存权、发展权，自由和幸福从何谈起？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允许在殖民地存在奴隶制和奴隶生意进行有力谴责：他（英王）向人性本身发动了残酷的战争，侵犯了一个从未冒犯过他的远方民族的最神圣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他诱骗他们，并把他们运往另一半球充当奴隶，或使他们惨死在运送途中。大陆议会最后删去了这一段落。一段文章可以删去，但是，历史是无法删去的。《独立宣言》（1776）的发表已有220年的历史，但在被删去的段落里如果将主语换上美国二字再读一读，同样给人以莫大的启示。

法国诗人欧仁·鲍狄埃的诗句随着《国际歌》的旋律传遍了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美国从来是相信救世主的。

美国要么是以救世主（上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要么干脆就把它所谓的自由当做救世主招摇过市。

把入侵、占领某个国家叫做恢复民主秩序，把封锁、制裁某个地区叫做保卫自己。

美国的词典就好像是为强盗专门编纂的，如果看起来对强盗更方便那也在逻辑之中。

美国有句谚语说，假如你损害良好，良好就会向你报复。

美国的遏制政府，到头来只能引起被遏制者不可遏制地进行反遏制。

把邻居家蜡烛吹灭之后，还要说人家那里一团漆黑，并以此反衬自家的光明正大、灯火辉煌，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在中国复关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并且要价越来越高，让一个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美国及其追随者企图把中国挡在世界贸易组织大门的外边，受损害的不仅是中国，美国同样包括在内。美国在往邻居家的窗户上扔石头的时候便忘记了自己的窗户也是玻璃的。

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拒中国于门外，阻碍中国同世界各国发展多边贸易，但无法阻止中国的改革进程，无法阻止中国发展双边贸易。无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强迫中国以牺牲经济利益换取世界贸易组织的入场券的卑劣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如果不能保证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等于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套上了枷锁。

在生意场上，一方漫天要价，另一方只好拿着合同走人。没有互利互惠，大买卖小买卖一个也做不成。美国及其追随者都是买卖人不可能连这样的生意之道都不明白。

美国无非是想尽种种办法，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

遏制中国既是美国的本义，又是修辞上的花招。因为遏制比搞垮、颠覆一类词语更隐蔽些。

世界很小又很大，美国不可能一手遮天。

国际市场上，有波音飞机，也有空中客车。通过双边贸易谈判，也可以采购到空中客车。

事实上，中国已同法国签订购买30架空中客车的合同。

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不等于美国在世界上就可以操办一切。

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是亚洲地区和平的重要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亚洲的和平更有利。遏制中国，不仅不可能成功，最终也会使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中国的繁荣与发展，符合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亚洲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使美国感到霸权主义在这一地区受到挑战，感到不自在。美国以为，抛出中国威胁论、肯定会得到中国周边国家的呼应。东盟组织并没有跟着美国的调子转。事实上，东盟组织对美国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主义野心存在戒心，对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充满警惕。东亚国家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大影响表示不安。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 1994 年 10 月访问法国时提出的亚欧首脑会议的设想，得到了中国、日本、韩国、东盟 7 国和欧盟的支持。这个撇开美国的欧亚会议的顺利举行，是亚洲的胜利，是东盟与中国的胜利。客观上，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不管今后如何变化，目的就是要保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美国争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的主导权的野心永远不会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就不会是权宜之计。同样的，中国的反遏制的对策肯定会奉陪到底。

最近，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法国《费加罗报》上说，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中国的经济比美国和欧洲之和还强大。李光耀还说：我相信假如没有战争和动乱的话，到 2020 年，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将超过美国。我相信 30 年内，上海将取代香港成为国际贸易、金融、商业会议和工业制成品中心。上海将成为中国的橱窗。对这个预测，美国是听不进去的。

不过没有关系，还是让历史告诉美国吧。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本身也同样要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得到公正的判决。

一个不相信历史的国家，也就是一个不现实的国家。正如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胆略的现实主义者。

## 亚欧对话—西方不亮东方亮

亚欧会议于 3 月 1 日在泰国的首都曼谷诗丽王后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东盟 7 国与欧盟 15 国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出席了这一历史性的盛会。3 月 2 日，会议通过了《主席声明》，确立了未来亚欧关系的基本框架。会议还决定，第二次亚欧会议两年后在英国举行，第三次会议将于 2000 年在韩国举行。

在历史上，亚欧两大洲的文化在相互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这是美好的一面。另一面，从 19 世纪初开始，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给亚洲带来了不幸和屈辱的历史。欧洲人顽固的欧洲中心论观念，阻碍了欧洲的眼光，使之长期不能正视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要力量。随着冷战的终结，东西对抗已不复存在。欧盟从经济利益出发，为开拓亚洲广阔的市场，抵销美国在这一区域的日益扩大的影响，终于同亚洲在一张桌子上对话协商、共图发展了。

此时此刻，美国的寂寞可想而知。

东盟邀请中国参加亚欧会议，也表明东盟对中国这个东亚大国的高度重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已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稳定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现实力量，同时也是世界和亚洲和平的重要因素。

通过亚欧会议，中国与亚欧国家有机会加强交流、合作和对话。这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让美国了解到，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市场越来越小，光顾的人也越来越小。

亚欧会议迎来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时代。

这对美国一心独霸世界的梦想而言，不是一个令美国感到愉快的消息。

如果说二战的结束，宣告了欧洲时代的终结，那么，冷战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亚洲时代的来临。

历史的脚步不会因为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威胁与恐吓而停顿。

4 与社会调查》，在北京向新闻界公布。该《调查》对中国的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给予充分肯定。对中国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努力也表示肯定。这有力说明，中国的经济正处在健康、持续的发展中。

从 1980 年到 1995 年的 15 年中。中国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到 2000 年，中国在人口将比 1980 年增长 3 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 GNP 比 1980 年翻两番，也就是说，平均 10 年翻一番。照此情况，2005 年。中国人均 GNP 可达 1000 美元，2015 年达 2000 美元，2025 效益更好些，有些时期的增长速度更快些，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人均 12000 美元的指标可以提前几年实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达到人均 1 美元用了 100 多年的时间，中国用 30 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这是一幅令人振奋的宏传蓝图。

美国不愿看到它的实现也就不奇怪了。

历史给予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契机。不抓住这个契机迅速发展壮大，到头来还是要受人家宰割。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之后就更落后。这是历史的经验。为了这个经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也就无力抓住发展的契机。

一部人类发展史，到处可以看见弱肉强食四个字。中华民族在自己走过的道路上，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更深刻、更独到、更完整。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到中国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语，1979 时间就是生命。中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样更懂得这句话的份量了。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高速、健康、持续地发展经济，到下世纪初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不是什么神话，而是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成长，必然推动改革开放朝向纵深发展。

起步太晚，就意味走路不能太慢。

走得过快，又容易造成欲速不达。

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现实。这就要求发展速度即不能太缓慢，又要避免大起大落。

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应保

持在 9% - 10% 为宜。

在世界新格局的板块上。欧、亚、美三角均衡态势的出现，客观上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也受到欧盟、日本、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利益因素的牵制。

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国面临挑战》。《欧洲面临挑战》的作者米歇尔·阿旦尔又发表新作《两种资本主义之战》，指出当前西方社会出现了两种资本主义模式，即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是专为强者（以英美为代表）所设计。

在这种模式下，一般民众注重个人而轻视团体；企业急功近利，缺乏长远考虑。在投机风潮的驱动下，企业兼并、垃圾债券、金钱游戏盛行。这种模式的病态已经暴露，如今的美国贫富更加悬殊，教育质量下降，企业竞争力衰退，政府出现庞大赤字，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莱茵模式（以德、日、北欧为代表），则更注重社会的相对平等，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这种模式下的国家强调生产，并不断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全面推行研究开发和职业培训。他们着重集体成果，长远利益。这些国家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社会福利也较为健全。

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看便知，然而近年来却有伪币驱逐、淘汰良币的现象发生，莱茵模式的国家，反而有向新美国模式看齐的趋势。新美国模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提供了财富从天而降的梦想，比莱茵模式的沉稳、刻板的致富之道更叫人心醉。个人主义、好逸恶劳、金钱游戏等等，正在侵蚀德国、日本的社会生活。两种资本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开始了一场暗中厮杀、互不相让的战争，它同时也是一场在自由资本主义内部派生而来的资本主义手足相煎的恶斗。

阿贝尔的经济思想，对认识当前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有着重要的启示。

不断地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共产党宣言》如是说。这个论断过去 130 年了，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仍然适用和有效。

美国的霸权资本主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它也是美国长远利益的鬼门关。没有谁喜欢跟武装到牙齿的国际宪兵打交道，也没有谁愿意同披着人权外套的贸易伙伴谈生意。

美国以贸易制裁和人权外交当支点，来对付中国这样的大国，实在是把杠杆伸错了地方。

在一条死胡同里美国还能施展多大的作用呢？反遏制作为后发制人的对策，因为公理在握，自然是游刃有余。

第二十二条军规？美国把最后一张牌押在台湾的分裂势力一边。在台海局势紧张时刻，美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将庞大的作战舰群调近台湾；美国的用意是明显的：一方面给台湾的分裂势力助威，另一方面向大陆显示其海上力量。

中国举行陆海空军事演习，完全是正当的。所选择的时间与地点也无可非议。美国拿出一纸《与台湾关系法》既挡不住什么也掩不住什么。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合国的决议摆在那里。



美国无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联合国的决议，充分暴露它的霸权主义嘴脸。美国四处标榜自家民主，在台湾问题上却玩弄强权政治。违背一个中国的政策，对美国没有好处，这样做也是危险的。

台湾紧张的局势日趋缓和。

但给人们留下的思索正在深入。

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对中国不承诺不以武力方式实现两岸统一，表示不理解，即使中国大陆方面解释说这个不承诺并非针对台湾民众的，也仍未完全使关心台湾问题的人们解开疑团。现在清楚了。如果放弃必要时使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外来势力一旦介入就会很被动；如果台独势力搞分裂，那就更被动。不承诺是一柄双刃宝剑，文、武两全。

它使台独分子不敢轻举妄动，让外来势力小心谨慎行事。

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和中国经济的繁荣，美国手上的牌越来越少，越来越失去份量。把台湾问题牢牢揪住不放，美国是想借此干扰、削弱、挑逗、激怒中国从而获得政治利益。

美国的对台关系，首先是从遏制中国出发。利用不沉的航空母舰排挤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也是美国的政治图谋。

台湾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拿《与台湾关系法》同中国斗法，为台湾打开保护伞，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从中捞取经济、军事的利益。

李登辉跑到美国演说，给美国添了乱子也给台海局势扔了炸药。演说过后，中国的演习也就来了。李登辉得到的是爱国者导弹，留下的是卖国者的骂名。

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没有好下场。

美国救不了李登辉。无论邀请他过去，还是开着军舰过来，李登辉这个千古罪人已是满身污点，洗也洗不掉了。

在香港的后面，英国还在作怪。

中国的统一大业，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几股逆流汇在一起也掀不起浪头。

中国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一再向世界表明：内政不容干涉，中国的事情中国来办，决不允许一寸土地从祖国分裂出去。

中国曾经对鸦片贩子说不！时间是 1839 年，林则徐将 2000 吨鸦片当众倒入虎门的生石灰坑中。

使人沉睡的鸦片，让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了。

使人惊醒的战争，让中国永远记住虎门。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在资本主义开拓海外市场的历史上，为一桩可耻的交易居然发动一场战争，而后果又是那么惨重，是仅有的例证。

从虎门开始，中国的强国之道被一代又一代人寻找着、摸索着。

正当香港回归之际，有人妄想分裂祖国，只能引起中国人民异口同声：不！

1840 英国下议院，正在就是否决定向中国派遣远征军进行激烈的辩论。议员扎马斯·斯当东（据说是第一个会讲汉语的英国人）在发言。他说：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者一样，用剑刃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以放弃。

这个会讲中国话的议员最后说：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用再叙述了。

开始是鸦片贩子，后来又充当了战争贩子。为了更有效地推销鸦片，派来了正义的远征军，而还要人家尊敬。时至今日，让人觉得某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优越感、傲慢与偏见，就是从打败了中央帝国那会儿被助长起来的。连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分析中国事物也显得那么荒唐：印刷一首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如果愿意用其它字母的话，只要两天便可以印好了。假如西方人改用汉字，那么世界也就不会如此这般了。

不知道，没有中国的印刷术，西方人印一首诗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也不知道，如果采用拉丁字母，中国的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更悲惨。

历史就是历史。那当然。

如果历史尚有没说清楚的地方，就不能想当然，尤其是当历史被故意歪曲的时候。

历史告诉今天的，中国人需要认真地思考。只有这样，今天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坚实的土地上更有信心走向未来。

一部没有被思索的历史只能是堆废纸。

在废纸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放弃思索的民族比它的落后更不让人尊重。放弃思索就等于放弃了现在。没有现在再美好的过去也是遥远的幻影，不但提不起精神，而且会麻痹精神。

中国更需要二十一世纪。中国更需要时间来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改革开放的中国，不管还有多少艰难的路程需要跨跃（她的前景决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想象的模样），她的未来的灿烂并非不可期待与憧憬。

一个有不幸与屈辱的历史的民族，在朝向未来进发的时候，不能不回想起过去的一切。

如果这种回想是健康的，那么就不应该影响对未来的信心。

一个民族心灵创伤的愈合过程也是痛苦的。然而痛苦远比麻木好得多。

一个民族的骄傲如果避免了妄自尊大，那么骄傲一点，理直气壮一点，又有什么不好？！

一个没有自豪感的民族，不要说发展，就是存在也很困难。

骄傲和自豪，万不可变成骄横与自大。

在民族的交往史和关系史上，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融合共存。如同没有经过较量的谈判，达成的协议也没有份量。

从长城到圆明园，历史老人的絮语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依旧震荡。

在该说不时就不说，说是时才不会被误认为屈从。

在该说是时就说是，说不时才不会被认为是蛮横。

一个崇尚礼仪的民族不能为礼仪所困，更不能为礼仪所害。

说不也好说是也罢，在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只是一个技巧，目的都是

为更好的对话与交流。必须学会不和是之间相辅相成的学问。没有这个学问，在政治、经济、贸易的谈判桌上就不可能有所收获。

西方有眼光的政治家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他们愿意引用拿破仑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被震撼。然后他们说，中国已经醒来。

他们没有说错。

完全可以说中国是在世界的震撼中醒来的。

被世界惊醒的中国，也有理由给世界一个奇迹。当有人贬低、歪曲和丑化这个奇迹的时候，那正说明，这个奇迹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成了现实中的现实。这比奇迹更引人注目。

中国的苏醒，只能使世界更清醒。中国毕竟是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

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正在升起。

中国的经济活力带动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世界。谁都不会否认（包括中国的敌对势力在内）中国是一个空前的市场。

那些梦想遏制中国的国家本身也会被损害，看不到这一点的政治家一定是精神不健全的政治家。偏执和仇视，只能把事情搞糟。

美国不应当寻求同中国搞对抗，而是相反，应该寻求对话。对话，只能是平等的对话。

中美关系一再动荡，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美国必须知道，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应该致力于国内诸如失业、种族歧视、政府赤字和债务、海外驻军以及拖欠联合国的会费等等问题的解决。把这些问题解决一下，克林顿总统可以拉到不少选票，既然下届总统选举在即。

干涉内政一类的事情最好不干。

美国有一本小说叫《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世界上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有更多的读者。这条军规大意是：作为飞行员，除非疯了才能从前线回国，但飞行员不能以自己疯了为由而退伍，说自己疯了只能证明自己意识清醒，不过是担心飞机被击落而逃避战争的表现。

那么结论是残酷的：继续飞行。美国的许多行为试式和处境与面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飞行员相类似。

美国前国务卿黑格曾说，那些担心中国逐步成为强大国家的政治家是愚蠢的。中国有一天会成为强大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成为强国不是梦。如果美国把眼光放得再远一点它会看到遏制中国只能使中国更强大——十二亿中国人民通过反遏制，民族自尊、民族自强的无穷力量将突现出来。

##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把友人的约稿答应下来之后，我迟迟没有动笔。我觉得不轻松。截稿日期已近，我只好坐在灯下，铺开稿纸。这是我第一次针对文学以外的东西

说话。那些札记式的文字如今写出来，不过是 1993 年秋天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 2000 年第 27 届奥运会主办权之后的一个结果。

投票的结果对中国人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个秋天的夜晚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滋味。北京上空的气流凝固了。

我看到了不眠的万家灯火依旧映照着民族心灵的窗口。我也看到了另一把神圣的火炬更明亮了。谁要是企图扑灭她是不可能的——五千年灿烂文明在长城的烽火台上，突出着更庄严的标题。

中国人接受了奥委会的决定。

这不等于接受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体育器材来谋求政治上经济上消弱“中国项目”的卑劣用意。

奥运精神被背叛了。北京同世界广泛交流的机会被扼杀了。把体育政治化的把戏一点也不好看。

我终于明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的真正含义。他们知道投票投下去的是什么，却不知道弹回来的是什么。

中国人，中国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对西方民主曾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被猛地推了一下肩膀。

回击是正当的。

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中国人所选择的道路和目标只能由我们自己去奋斗去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丢下幻想，走出书斋；回到书斋，继续思索：现实是逃避不了的，现实的脚步来得更快，往往如此。

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这种骄傲不是任何投票结果可以改变的。中国人的忍耐、宽容作为礼仪之邦的传统在遭到无礼的对待时就会显示其另一面：“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自鸦片战争以降，正义的力量在捍卫着中国。

从我个人的命运、遭遇和痛苦中我曾经学习到很多东西。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我所学到的东西更是激励着我。

没有民族自尊的人，个人还剩下什么？作为五十六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的一员，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着。白杨树响亮的叶子从荫生到飘落都深深地触动我。给我回忆也给我憧憬。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句《易经》的话和古希腊的那句“认识你自己”一样，至今仍在说着我们必须说的一切。

冷战的余烟还没有逝去。

美国又为新的冷战升起了信号。除了美国及其追随者，没有谁觉得这个信号能照亮世界的前景。

4 草案》胎死腹中。来自日内瓦的消息再一次表明，正义和公理战胜了强权政治的图谋。

把人权作为政治工具，美国总以为好使。它还会使下去。美国的偏执狂式的做法，只能损害它自己的利益。

对美国的好斗，一是要奉劝，二是要奉陪。沉默和克制无助于美国对世界大趋势的理解与判断。

最后，我想用一个我喜欢的比喻结束我的话：我们知道狮子比驯狮者

更强大，而且驯狮者也知道这点。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点。假如狮子已经觉醒，而驯狮者还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结果又将怎样呢？

